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四卷

朱信泉 严如平 主编

孙思白 校阅

中华书局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四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朱信泉 主编
严如平
孙思白 校阅

中华书局

1984年·北京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四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朱信泉 严如平 主编

孙思白 校阅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13¹/₈印张·264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1,0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194 定价: 1.20元

前 言

一九七二年八月，我们接受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当即召开座谈会研究。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根据这一认识，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初步设想：

一、编写《中华民国史》，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绝不能因袭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修史方法。

二、写一部书，定名为《中华民国史》，拟分三编：

第一编 中华民国的创立（1905—1912年）

第二编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7年）

第三编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27—1949年）

三、编三种资料：

第一种 《中华民国大事记》

第二种 《中华民国人物志》

第三种 《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

关于人物志，需要写传记的约一千人；列入人名辞典的约四千人；另外还拟编制若干人物表。

如何写传记，我们毫无经验，只预先提出了几点要求：

一、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一个人写传记，必

须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只有对这个人的一生有了总的概念、对他的主要言行有了具体的判断、并且自信这个概念和这些判断是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然后才可以下笔。

二、要求用记叙文，不要写成评传。要通过具体的事实把正确的观点表现出来。不要离开事实材料，作过多的评论。对事实的取舍、详略以至措辞用字，都必须仔细斟酌，务求妥贴。

三、要求真实可信。传记中所写的事实，要经过反复核对，有的还要经过调查研究，务求做到确实无误。凡是有疑问而又查不清的，宁可写或不写，不要以讹传讹。

四、要求反映一个人全貌的同时又有重点。一个人的传记，要把他的家庭情况、上学情况、主要的经历和言行，总而言之，要把他的生平事迹如实地反映出来。但又不要写成流水帐或年谱。要把最能反映本质的事情，选其中最重要的一两件写得详细、生动些，其余的不妨简略。

五、要求用白话文写，文字要力求简练。没有必要就不要用引文，引文要注明出处。每篇以二、三千字为准，不要写得太长。

六、初稿后面，要附主要参考资料目录。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编写《中华民国史》，非全国大协作不能成功。即以写人物传记而论，哪个行业的人由哪个行业的人来写最好，哪个地方的人由哪个地方的人来写最好。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我们希望这批初稿，能引起各方面和全国各地方的兴趣，大家都来写，尤其

是熟悉情况的人动手写，那么《中华民国史》就不难完成了。我们还希望从事史学工作的同志，不但自己动手写，而且要把有关这方面的组织工作承担起来。

(一九八〇年五月修改)

目 录

林觉民	范启龙 (1)
方声洞	范启龙 (7)
马宗汉	史月廷 (12)
谢晋元	李 飞 (17)
詹大悲	徐玉珍 (23)
张振武	钟碧容 (30)
徐宗汉	郭 熔 (34)
阎宝航	姜克夫 (39) 李 侃
李根源	马子华 (45)
章士钊	白吉庵 (53)
冷 适	史全生 (62)
萨镇冰	陈贞寿 (69)
吕公望	魏 桥 (76)
程德全	朱宗震 (82)
阎锡山	刘存善 (90)
方声涛	陈孝华 (108)
李厚基	李锡贵 (114)
戴季陶	郑则民 (121)

朱家骅	林 泽 (129)
蒋鼎文	余 涉 (135)
董显光	任嘉尧 (142)
郑孝胥	陈贞寿 (148)
傅筱庵	汪仁泽 (154)
张啸林	朱剑良 (160) 许维之
方液仙	任嘉尧 (166)
项松茂	孙德祥 (172)
陈万运	张 志 (180)
都锦生	徐和雍 (185)
方椒伯	汪仁泽 (189)
王志莘	吾新民 (193)
郭琳爽	徐鼎新 (198)
刘柏森	朱复康 (205)
金润庠	顾振仪 (211) 来可泓
王尧臣、王禹卿	朱复康 (217)
莫觞清、蔡声白	张守愚 (223)
周作民	徐国懋 (230) 洪葭管
朱志尧	朱文炜 (236)
庞元济	王铁生 (243)

俞佐庭	陈春霄 宋紫云	(247)
沈联芳	汤肯堂	(251)
王一亭	汪仁泽	(255)
许冠群	谈玉林	(261)
黄楚九	汪仁泽 熊尚厚	(268)
殷 夫	丁景唐	(275)
柔 石	邱德新	(282)
陈望道	邓明以	(288)
舒新城	谈宗英	(297)
俞颂华	俞湘文 葛思恩	(302)
钱玄同	娄献阁	(307)
王小航	娄献阁	(315)
夏曾佑	袁英光	(321)
詹天佑	李希泌	(327)
司徒乔	任嘉尧	(334)
黄宾虹	周衍发	(342)
丰子恺	林 印	(347)
潘天寿	刘 江	(352)
江加走	周海宇	(357)
梅兰芳	林 印	(361)
程砚秋	林 印	(366)
蔡楚生	张 洁	(370)

郑正秋	张 洁 (376)
张辅忠	汪仁泽 (382)
洪式间	叶炳南 (386)
孔伯华	寿祝衡 (391)
石筱山	商一仁 (395)
师 复	杨天石 (398)

林 觉 民

范 启 龙

林觉民，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生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他的生父林孝颢，字玉珩，叔父林孝颖，字可山。林觉民从小过继给叔父为子^①。林孝颖是当时福建有名的学者，以诗赋著称。林觉民幼时体弱多病，八岁时，母亲病逝，从此，吃睡和嗣父在一起，跟随嗣父学习语文。他生性聪明，读书过目不忘。

林觉民少年时就厌恶科举，十三岁那年（1900年）嗣父要他应考童生，他不愿违背父命，快快赴试。但等试卷到手，他挥笔写了“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头一个交卷出场。^②

1902年，林觉民考入福州新创办的全闽大学堂（后称全闽高等学堂）文科学习。那时，西方的新学说已传来中国，青年学生大都沉醉于自由平等的理想，林觉民便自号为抖飞。学堂里闹过几次风潮，同学们都推举他出来领导，因为他具有不畏强暴的个性。他善于言谈，校长也喜欢他，曾对他的嗣父说过：“是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刚大浩然之气。”^③

林觉民不满于官立学堂的腐败，便和思想一致的少年朋友在城北创办一所私立小学，又在城南创设阅报所，并热心于社会的公共福利。朋友们如遇到困难，他都尽力帮助。课

后他常常和同学们一道议论时局，认为中国不走革命的道路就不可能自强。随着年龄增长，林觉民为革命而献身的志愿越来越坚决。

1905年林觉民同陈意映结婚，婚后夫妻的感情很好。第二年，生了一个男孩，他非常珍爱。他曾经对人说过：“吾妻性癖，好尚与余绝同，天真烂漫女子也！”^④他曾写过一篇名为《原爱》的文章，专论男女爱情的道理，读过此文的人都赞成称好。有位朋友写信对他说：“读大著《原爱》，理义公正，才情高绝，乃知文学家自有真也。”^⑤

1907年，林觉民在全闽高等学堂毕业以后，得到嗣父的同意，自费去日本留学，专门学习日语。一年后，带去的钱已用完，刚好有机会得以补官费生缺额，进庆应大学文科，攻读哲学；同时还学习英文、德文。

当时，外国侵略我国、清廷腐败无能的凶讯不断传来，有些留学生常常聚在一起，互相叹息流泪。林觉民悲愤地说：“中国已到危险关头，大丈夫只有一死报国，为什么要仿效古人那样相对哭泣呢？我们既然自认为是革命志士，就应该站起来仗义执剑，争取解决根本问题。这样，危如累卵的局面，或许可以得到挽救。凡是有血气的人，能够忍受和坐视第二次亡国的惨状吗？”大家听了他的话后，都肃然起敬。他善作鼓动演讲，和陈与桑齐名，人们称呼他们为“陈林”；又因为他和林文及族弟林尹民共住一房，被人称为“三林”，按照年龄的顺序排列，他是中林。

林觉民参加了同盟会，他的嗣父听说他在日本的好朋友都是同盟会的成员，便写信劝他要注意。他复信说：“大人

所不安者，恐儿学非所用，将有杀身之祸。今习文科，文科主心理、伦理诸学，岂有学心理、伦理之人而得祸者？”^⑥以宽慰之。

1911年初春，林文收读黄兴、赵声自香港的来信，知在港同志正筹备广州起义。留日福建学生立即开会研究，决定由林文去香港参与筹备广州起义事务，林觉民回福建准备响应。他们两人遂先离开日本回国，同船赴香港。黄兴看见林觉民来到，高兴地说：“意洞来，天赞我也！运筹帷幄，何可一日无君。”^⑦于是决定暂时取消他去福州响应的计划。

接着，按照林文的意见，林觉民回福建召集革命志士来广州参加起义。嗣父见他突然回家，惊异地追问是什么原因？他假托学校放樱花假，陪几位日本同学去参观江浙一带的风光。他在家停留十天，即返回香港。冯超骧、刘元栋、刘六符等人受他邀约也先后来到了香港。

4月23日夜晚，林觉民和林文、陈可钧、陈更新、冯超骧等人先入广州。第二天晚上，听说林尹民和郑烈已从日本到香港，他又邀陈更新回到香港以便为林、郑作引导。这一晚，陈更新、郑烈等入睡后，林觉民独自点灯，为家里人写绝笔书，天快亮时才停笔。第二天早晨，他拿着所写的书信嘱托友人说：“我死，幸为转达。”便偕同林尹民、郑烈重入广州。在船上，林觉民和郑烈睡在一块，他轻声地对郑说：“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宁有憾哉！”^⑧

林觉民抵广州后，因为26日还有同志从福建到来，需要

带他们进入省城，所以他于25日晚上再度赶到香港，直至27日早晨，才同陈与棨、陈更新等人率领全部福建志士入广州，和林文等在城内会合。

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半，起义开始，林觉民随同黄兴往攻督署，举枪冲锋，一直攻入署内。他找不着总督张鸣岐，知道中了敌人的好计，便怒目奋击，所向披靡。后因受伤力尽被俘。当时报纸上刊登消息称抓获一个剪短发、穿西装的美少年，指的就是林觉民。

林觉民被水师提督李准等人提讯于水师提督衙门内。他本来普通话讲得很好，可是在座的多是广东人，怕他们听不懂，而当时广东官吏一般都会英语，他便讲英语，问他们是不是能够理解？他侃侃而谈，大讲世界形势和各国的时事，宣传革命思想。敌人专心倾听，也好似为之动容。林觉民起初坐在地上讲，这时敌人为他打开脚镣手铐，请他坐在椅上谈。接着，又送上笔墨纸张让他书写，他走笔急挥，一口气写下了几千言。当他写到激烈的地方，便敞开上衣，用手捶胸，激动不已。每写满一张纸，李准马上郑重其事地取去，捧到张鸣岐面前，张鸣岐随即阅读，故作叹气的姿态。林觉民写完以后，又在堂上演讲。谈到时局险恶的地方，他咬牙切齿，捶胸顿足，并且告诫清朝官吏们应洗心革面，为自己的祖国献身，革除清朝暴政，建立共和国。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那么，自己虽死也瞑目了。

林觉民被关押了几天，一勺一水都不肯入口。赴刑场的时候，他面不改色，泰然自若，从容就义，时年才二十五岁。后与广州起义死难烈士共七十二人合葬于黄花岗。

林觉民的岳父陈陶庵当时在广州供职，最先得到他牺牲的消息，星夜派人送噩耗回福州，林家立即迁移住处。一天早晨开门，发现门缝中已塞进一包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林觉民生前托友人带回家的亲笔信，也就是他4月24日深夜所写的绝笔书：一张给父亲，只有简短的几句话：“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另一张给爱妻陈意映，写在一大块白色正方形手帕上，一千多字，语句悲怆婉转，十分动人。他首先说：“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忍悲为汝言之”，“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接着，他以生动感人的笔触回忆历年夫妻间的恩爱生活，“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虽然，眼前的小家庭是幸福的，但是，“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最后他说：“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象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⑨陈意映得知噩耗，几次昏死过去。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仲新^⑩。

注:

- ① 陈遵统等编:《福建编年史》第十辑(油印本)。藏福建省图书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 ② 林秀慧:《碧血殷殷红,黄花岁岁香——忆大哥林觉民》。《福建日报》1981年9月24日第二版。
- ③、④、⑤、⑥、⑦、⑧ 郑烈(天啸生):《林觉民传》。见邹鲁编:《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
- ⑨ 林觉民给父亲和妻子的绝命书,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 ⑩ 林仲新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曾任福建漳州市粮食局副局长。

其他参考资料:

- ① 邹鲁编:《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第十章“传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三版。
- ② 郑贞文编:《烈士林觉民事略》。见《闽贤事略初稿》,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13—216页。
- ③ 蔡寄鸥遗著:《鄂州血史》第六章,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 ④ 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编:《林觉民传》。见《福州地方志(简编)》第十四章,1979年8月铅印本。

方 声 洞

范 启 龙

方声洞，字子明，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于1886年6月（清光绪十二年五月）。他的父亲方家湜（字芷亭），是位经营运输货栈的商人，在汉口设有转运公司。由于他经常往来于京汉、粤汉铁路沿线各地，眼见清政府对内腐败无能、对外丧权辱国而十分不满。他的开明思想对子女的影响颇深，他把自己的子女甚至媳妇都先后送进“洋学堂”读书，后来还陆续送去日本留学，他（她）们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①

方声洞幼年时在福州念私塾，随后到汉口进新制学堂。他从小受家庭和学校的影晌，对现实不满的思想不断发展。1902年，他随兄、姊东渡日本留学，进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当时，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后沙俄妄图霸占我国东北、不肯按照协议撤军的事。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们非常愤慨，于1903年4月29日召开了“拒俄”大会，方声洞与兄方声涛积极参加“拒俄义勇队”。1904年，日本和沙俄在我东北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方声洞恨清廷庸儒，异常悲愤，逢人大谈国事，认为不彻底推翻腐朽的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国人便没有安枕的日子。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建立同盟会，他和哥哥方声涛、姊姊方君瑛、两位嫂嫂曾醒、郑萌^②

都先后参加，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勇敢战士。

不久，方声洞因母亲去世而回福建。他想到可以先作些开通社会风气的工作，便把家中所藏各种书籍统统拿了出来，创办一间书报阅览室，供人阅读。

1906年，方声洞再到日本，拟继续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但清政府耽心革命党人活动，禁止自费留学生学习陆军，此时成城学校也已改为普通中学了。他大失所望，但感到革命的志向不能变更，只要学会一种专长，对国家总会有所贡献，便考入千叶医学校，勤奋学习。

1907年暑假，方声洞至汉口探亲，与王颖订婚，次年暑假结婚。婚后十天，偕王颖东渡，同在千叶医学校学医。他介绍王颖也参加同盟会，并经常将国内政局和世界形势以及革命救国的道理讲给她听。1910年春，生下了儿子贤旭，方声洞对他非常珍爱。但方声洞对王颖往往无缘无故地说出“真对不起你”这样的话来，原来他早已下定献身革命的决心，随时准备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③。

方声洞一面在千叶学医，用功甚勤，一面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担任了中国留学生总代表、同乡会议事部长、同盟会福建支部部长等职务。他常常托词向学校请假，回国联络党人，秘密运送军火，往返奔波，非常辛劳。

1911年初，同盟会准备在广州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闽省旅日同盟会员最初决定由林文等人去广州参加起义，林觉民等人回福建准备响应，留下方声洞在日本接替林文的工作。方声洞对同志说：“我虽然没有什才能，但已学医几年，相

信有些心得，起义发动后，不能够没有军医。何况我早已立志献身革命，现在有这样好的机会，怎么可以不让我参加呢？如果事败不成，你们都为国牺牲，我还能单独活下去吗？”同志们劝说他不要误会，因为大家若同归于尽，不考虑后继的人，会对革命不利。经过再三解释，方声洞才悻悻然与大家挥泪而别^④。

方声洞即将于这年7月毕业。由于香港传来准备起义的消息越来越多，他便放弃功课，日夜为广州起义的筹备事宜操劳。他写信给友人说：“警电纷至，中国亡在旦夕，所希望者，吾党此举耳。”^⑤要求同志们同意自己前往参加。

3月中旬，方声洞忽然接到吴永珊（玉章）来电，便立即去东京。第二天回来对王颖说，起义即将发动，因军火不足，须马上密运一批回国接济。并且很沉着地对她说，两周以内一定回来。他在临行的前夜，预先写好了十几封家信，嘱咐王颖在他走后陆续填上日期寄回，以使家中安心，免生疑虑。行前，方声洞向学校办了请假手续，并辞去同乡会议事部长等职务，于3月28日先把军火运到横滨港，31日乘船离开日本。告别时，他微笑着对好友郑烈说：“昔年秘密开会，追悼吴樾、徐锡麟诸烈士时，君所撰祭文有句云：‘呜呼！壮志未酬，公等衔哀于泉下；国仇必报，我辈继起于方来。’今所谓方来者成为现在矣，宁不快哉！”^⑥抵达香港，见同志甚多，姊姊方君瑛、哥哥方声涛也参与协助密运军火入广州，非常高兴。^⑦

方声洞胜利完成密运军火的任务后，不顾先来香港从事准备工作的姊姊方君瑛和闽籍同志的劝阻，决心参加起义壮

举。4月25日晚上，方声洞在香港写绝命书给侄儿和生，希望他为祖国尽力，并担起照料诸弟妹、善事祖父的责任。第二天清晨到达广州后，又匆匆留书给王颖和父亲，说明“来港时，已决志捐躯于沙场，为祖国报仇，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表示“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④

27日（即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半钟，举义的螺角呜呜齐鸣，方声洞在黄兴率领下荷枪实弹扑攻督署，遍搜总督张鸣岐不见，知道张已经逃匿。他马上和黄兴等十多人离开督署，出大南门，打算和防营接应，转攻督练公所。黄兴与方声洞走在最前面，至双门底遇见起义的防营数百人，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臂缠预先相约的白布符号，以致发生了双方互射；方声洞竟在这种不幸的误会中中弹仆地，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六岁。后与其他起义烈士合葬于黄花岗。

注：

- ① 据方声洞之子方贤旭1981年6月13日来信；并据方声洞之继母访问记录。
- ② 据方声洞继母的口述，方声洞共有四个兄弟，七个姊妹。曾醒是大哥方声濂的夫人，郑萌是二哥方声涛的夫人，方声洞居三，他的弟弟方声钟现在美国。
- ③ 王颖：《忆声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版。
- ④、⑤ 郑烈（天啸生）：《方声洞传》。见邹鲁编：《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
- ⑥ 郑烈：《黄花岗福建十杰纪实》。
- ⑦ 方贤旭：《黄花英烈，光照千秋——纪念先父方声洞殉国七十周年》。《人民日报》1981年3月29日第三版。
- ⑧ 据方声洞烈士遗墨影印照片。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其他参考资料：

- ① 邹鲁编：《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第十章“传记”，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第三版。
- ② 郑贞文撰：《烈士方声洞事略》。见《闽贤事略初稿》，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212—213 页。
- ③ 陈遵统等编：《福建编年史》第十辑（油印本）。藏福建省图书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马宗汉

史月廷

马宗汉，乳名纯昌，字子畦^①，别号宗汉子，浙江余姚浒山马家路（现慈溪县）人，生于1884年3月30日（清光绪十年三月初四）。父马云骧，为附贡生，在当地开米店。

马宗汉十五岁到余姚姚江达善学堂读书^②。他喜爱诗词，闻诵岳飞《满江红》词后，曾自誓说：“长大亦当如是。”其后阅读史传，尤多感慨。他在《己亥课程》中写的一首七言绝句道：“世上英雄原不亏，雄才亦许常人为；如吾夙负平生志，当使声名千古垂。”^③在达善学堂，马宗汉结识了几个具有民族思想的少年，纵谈国事，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己任。平时，他除学习国文课外，又学习英文，能阅览英文书报，从中了解国际大事。

马宗汉从达善学堂毕业后，于1902年进入浙江大学堂学习^④，1904年勉从父亲意见，应科试入县学。举业非所素愿，不久就回到家乡，先后在润德学堂和三山学堂任教。执教期间，经常以“亡国之痛，异族之祸”相督教，学生们为之悲愤泣下。

1905年秋，马宗汉与陈伯平相识，旋即参加了光复会^⑤。1906年1月，他随陈伯平去日本。在东渡船中，又结识了徐锡麟。到日本后，马宗汉入东京早稻田大学预备科。在此期

间，他进一步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毅然剪去辫子，暗中寻求革命志士。

在日本不到半年，马宗汉同徐锡麟、陈伯平等一起回国。归国途中，三人对今后的革命工作作了初步的设想^⑥。马宗汉回国后，在家乡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着力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和组织活动^⑦。通过徐锡麟的介绍，马宗汉又认识了秋瑾。从此，他和秋瑾不时来往，以磋商革命事宜^⑧。

马宗汉在家乡时，光复会一同志曾写信劝他再去日本。他谢绝了这个劝说，认为革命的“实行必须（在）内地，他国究非用武之地，不过暂时寄迹、预备学问而已”。他在回信中还明确表示，对于革命，“我辈宗旨已定，自然坚持到底，死而后已，不以他人而怀贰也”^⑨。

当时，清廷下诏实行预备立宪，企图用欺骗手段缓和革命风潮。马宗汉著文揭露清政府的阴谋。

同年12月，徐锡麟以道员出任安徽武备学堂会办，获得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徐锡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与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的秋瑾遥相呼应，并相约皖浙同时起事。陈伯平几次往来于皖浙之间，为之联络。起义规划拟定以后，徐锡麟写信给马宗汉，促其去安庆；马因祖父去世未久和路费不及筹措，一时难以起程。

1907年春，徐锡麟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任巡警学堂会办，后又任陆军小学监督。他再次要马宗汉去安庆。5月18日，马宗汉借赴上海参加浙江铁路公司股东会之机会，前往安庆。临行前，他给家乡诸挚友写了绝命书，并嘱妻子说：“吾此行无论事成与否，必难生还，然求仁得仁，固吾素志，无

庸为我悲也。二子其善视之，异日成人，嘱其无忘乃父之志。”^⑩表现了坚强的革命牺牲精神。他经上海，与陈伯平同行去安庆，住在徐锡麟寓所，紧张地投入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6月22日，马宗汉和陈伯平奉徐锡麟之命再去上海，购买手枪与印字机等物；同时约秋瑾在上海会晤，互通消息。

徐锡麟、陈伯平和马宗汉等原定7月8日巡警学堂甲班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时，请安徽巡抚以下大员莅校观礼，以便一网打尽，然后直下南京，大举起事。为此，他们通知外地会党前来支援。不料恩铭事前已微有所闻，命将典礼提前两天举行，致使外地会党无法及时赶到。

7月5日，陈伯平和马宗汉从上海购运手枪等物回到安庆。徐锡麟立即同他们密商，决定提前至次日起事，先刺恩铭，派人守住校门，断绝政府官员退路，以尽诛诸大员；然后率领巡警学堂毕业生占领军械所、电报局、制造局及督练公所等，争取起义的成功。他们估计，军队中有不少忠诚之士，举事后会起来响应。

7月6日一早，陈伯平和马宗汉从徐寓迳赴巡警学堂。八时许，恩铭及文武官员到达警校礼堂就座，随员排列两旁。徐锡麟率领教习等站立阶前，陈伯平和马宗汉立于堂侧。徐锡麟抢步上前行举手礼，随呈学生名册于案上，大声说，“回大帅，今有革命党起事。”恩铭正惊恐间，陈伯平上前向恩铭猛投一炸弹，未爆发。徐锡麟立即拔出两枝手枪，连续向恩铭射击；陈伯平和马宗汉也拔枪射恩铭。恩铭身中七弹，由部下抢走后，当天毙命。先是，徐锡麟命巡警处收支委员顾松守住校门，但顾松拒不执行，致使文武官员得以逃脱。当

顾松乘机逃跑时，被马宗汉抓住。徐锡麟怒斥奸细顾松，连劈数刀，不死，马宗汉随即举枪将其击毙。紧接着，徐锡麟号令警校学生取枪站队，自己领先，马宗汉居中，陈伯平在后，急奔军械所。占领军械所后，徐锡麟命陈伯平把守前门，马宗汉守卫后门。不久清兵蜂拥而至，团团包围了军械所。马宗汉眼看情况紧急，向徐锡麟提议：“事已无成，不若焚此军械所，与清兵同尽。”徐锡麟制止说：“徒死无益，亟去犹可为后图。”在搏战中，陈伯平英勇战死，徐锡麟不幸被俘，马宗汉爬墙逃出后，至半途亦为清兵所捕。

马宗汉被捕后假称黄福，企望获释后再起革命，后被清政府查出，投进安庆监狱。他被囚五十天，经受了严刑逼供，使清政府得不到一个人名^①。8月24日，马宗汉在安庆监狱门前被害，年仅二十四岁。

辛亥革命后，徐锡麟、陈伯平和马宗汉三烈士的遗体合葬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并树碑立传，供后人瞻仰。

注：

-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列传二：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页。
章炳麟《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和沈懋民《记光复会二三事》作“子贻”，误。
- ② 马纯昌：《己亥课程》（手迹）。余姚梨洲文献馆藏。
- ③ 同②。
- ④ 孙元超：《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138页。
- ⑤ 沈懋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 140 页。

- ⑥ 姜枝先：《马宗汉烈士传补遗》(手稿)。
- ⑦ 同①。
- ⑧ 据马宗汉烈士家属说，秋瑾曾几次去游山马家路，同马宗汉密谈。
- ⑨ 《马宗汉遗札一》。《浙东三烈士集》，第 40—41 页，绍兴鲁迅纪念馆藏。又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31 页。
- ⑩ 马燮钧：《马宗汉》(1943 年 7 月 7 日)。《革命人物志》第四集，台湾 1970 年 6 月版，第 134 页。
- ⑪ 章炳麟：《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81 页。

谢 晋 元

李 飞

谢晋元，字中民，广东镇平（今蕉岭）人，生于1905年4月2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世居镇平同福乡尖坑村。父亲谢发香是个小贩，母亲李氏是渔民的女儿。谢晋元兄弟姐妹共十一人，一个哥哥，九个姐妹，谢晋元排行第五。由于家境贫困，姐妹大多从小送给别人，哥哥独自去南洋谋生，后来贫病早死。谢晋元幼年在家乡育民学校和三圳公学读书，继入梅县省立第五中学，毕业后考入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预科肄业。1925年12月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肄业，次年10月毕业参加北伐。历任排、连、营长、参谋主任及团附等职。

1936年日本侵华形势日紧，谢晋元将眷属送回广东原籍，临别时对其妻凌维诚说：“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遗类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之素志也。”并说“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嘱咐其妻奉养双亲及儿女^①。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之时，谢晋元适任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二六二旅旅部参谋主任。是年8月11日该部奉调由无锡开赴上海增防。8月13日沪战爆发，谢晋元所在之旅参加上海闸北八字桥之役，与敌血战。9月间该旅第五二四团团附负重伤出缺，谢

晋元遂补任该团团附，率部防守北火车站，坚守阵地达两月之久。

10月26日，大场失守，闸北、江湾守军奉令撤退。五二四团担任断后工作，掩护大军退却。谢晋元奉令率领第一营（营长杨瑞符）扼守要点。27日晨4时许，中国军队全部撤竣，谢晋元遂率所部将上据守西藏路新垃圾桥北堍四行仓库内，构筑防御工事，准备与日军血战到底。天明以后，日军大队开到，发动猛烈进攻。谢晋元率部雄踞仓库大楼沉着应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敌伤亡惨重，不敢率尔轻进，只得改采包围形势，伺机进袭，均遭挫败。

租界上的英国驻军目睹谢晋元团孤军困守四行仓库，地处绝境，曾多次劝说孤军卸去武装，准予退入租界，愿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但谢晋元毅然谢绝，他说：“我们的魂，可以离开我们的身，枪不能离我们的手，没有命令，死也不退。”^②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谢团孤军死守四行仓库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事迹传开后，上海市民莫不敬佩感泣，称他们为“八百壮士”（实际人数为四百余人）。连日来从早到晚有数万群众麇集苏州河南岸遥望，群情激昂振奋，对孤军赞叹不已，纷纷隔河挥帽致敬，连租界上的外籍人士也对孤军深表敬佩。中外人士携食物用品支援孤军者络绎不绝，但苦于交通阻绝，无法输入。10月28日，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女童子军杨惠敏潜往四行仓库，向孤军致敬，并献国旗。孤军将士即将国旗升上仓库大楼屋顶，周围观看的群众欢声雷动，外籍人士也深受感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关怀进一步鼓舞了孤军的抗敌斗志，他们精神

抖擞，严阵待敌。是日晨，谢晋元亲手击毙二名潜踵攀楼的日本兵，租界上环观之民众，皆拍手欢呼。29日，某团体接到谢晋元从四行仓库写出的信函，信中表示“洒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³。激昂慷慨，令人起敬。四行孤军的英勇事迹迅速传遍国内外，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和敬仰，而且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赞扬。但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害怕战争危及租界安全，乃电请国民政府下令孤军撤退。31日凌晨，孤军奉令撤离四行仓库，由新垃圾桥退入租界。谢团孤军坚守四行仓库计四昼夜，毙敌百余人，伤者无数，孤军仅牺牲十余人⁴。

谢晋元本打算撤退后通过租界向沪西方向归队，重新投入战斗。不料退入租界后枪械被租界当局收缴，人员也被羁留起来，“始知已陷入黑黯底深渊”⁵。全体孤军被羁禁在胶州路兵房，称“孤军营”，由租界万国商团派武装看守。在这艰苦的环境中，谢晋元身为孤军领袖（后晋升为团长），督管孤军营的内务励精图治，制定了教育、体育、生产各项计划，勸勉部下“含辛茹苦，以待光明来临”⁶。孤军自办伙食，学习技能，开办肥皂、线袜等生产工场，并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锻炼体格。为了不忘抗日爱国，谢晋元督率孤军坚持出操上课，并举行精神升旗典礼。除训练部属外，谢晋元勤学不辍，自修外文，并不时为文告激励孤岛同胞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他曾勸勉部属说：“在上海租界上，我们的言行，必须使友邦从我们身上看出中国军人之气概，从此认识中国的真精神。”⁷上海人民对孤军十分敬仰和关心，许多群众团

体向租界当局交涉，组织人员到孤军营参观访问，并捐款慰劳孤军。但孤军营的羁禁生活对谢晋元刺激很大，他内心十分苦闷，以致长期失眠。谢曾作诗述怀：“勇敢杀敌八百兵，千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⑧

1938年8月，谢晋元为“八·一一”出师和“八·一三”抗战双重纪念周年，向租界工部局交涉要在营内挂国旗，工部局阻挠不允。8月11日晨孤军在营内升起国旗，万国商团派白俄队冲入孤军营抢旗逞凶，手无寸铁的孤军为护旗与之肉搏战斗，有三位战士为保卫国旗而牺牲，负伤百余人，孤军当即绝食抗议。第二天，工部局又将谢晋元等官佐十余人移至外滩白俄队司令部幽禁，全体孤军继续坚持绝食斗争。孤军的斗争得到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支持和声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出版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上撰文“向羁留在沪坚持奋斗的八百壮士致诚挚慰问之意”^⑨。上海纳税华人会、市商会及各群众团体也纷纷向工部局抗议和交涉。租界当局被迫让步，郑重送还国旗，抚恤死难人员，谢晋元等人于10月7日回至孤军营，孤军终于获得斗争的胜利。租界当局的无理限制和虐待，使谢晋元非常愤慨，他在日记中写道：“弱国国民处处受人欺侮，不流血，不抗战，等待何时？”^⑩并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处于积弱的地位，工业大部操于帝国主义者手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⑪，必须奋斗才能维护民族独立。

谢晋元身羁租界期间，日伪曾向他多方威胁利诱，均遭拒绝。1939年9月谢晋元鉴于上海形势恶化，作书寄其父母，表示准备以身殉国，决不向敌人屈节投降。信中说：“上

海情势日益险恶，租界地位能否保持长久，现成疑问。敌人劫夺男之企图，据最近消息势在必得。敌曾向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未果，但野心仍未死，且有‘不惜任何代价，必将谢团长劫到虹口（敌军根据地），只要谢团长答应合作，任何位置均可给予’云云。似此劫夺为欲迫男屈节，视此为敌作牛马耳。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男对死生之义，求仁得仁，泰山鸿毛之旨熟虑之矣！”^②后汪伪上台，曾派人诱谢变节，也遭其严拒。汪伪诱降不成，遂策划阴谋，派人收买孤军营内部不肖士兵暗杀谢晋元^③。

1941年4月24日晨，谢晋元督率全体孤军举行精神升旗礼后列队跑步，突有郝鼎诚等四名叛兵，取出匕首向谢晋元猛刺，谢身负重伤殒命，死时年仅三十七岁。谢晋元死后，上海各界人民深为震悼，前往吊唁者达三十万人^④。5月8日，重庆国民政府下令追赠谢晋元为陆军少将。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曾褒扬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⑤，并优恤其遗属。

注：

- ① 《抗战英雄传记》。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版，第29页。
- ② 同上书，第31页。
- ③ 汉口《扫荡报》1937年10月30日。
- ④ 汉口《扫荡报》1937年11月1日。
- ⑤ 上海《新闻报》1938年8月1日。
- ⑥ 重庆《时事新报》1941年5月8日。
- ⑦ 同注①，第35页。
- ⑧ 《陆军第七十一军“八一三”淞沪抗战阵亡将士公祭特刊》1945年11月版。

- ⑨ 《群众》周刊第二卷第八、九期合刊, 1938年8月版。
- ⑩ 朱雯:《谢晋元日记钞》。正言出版社1945年版,第66页。
- ⑪ 同上书,第99页。
- ⑫ 据凌维诚所存家书影印件。
- ⑬ 参见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2,目录号508。
- ⑭ 上海《中美日报》1941年5月12日。
- ⑮ 据凌维诚所存“上海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处通知”第2347号(1949年10月27日)。

詹大悲

徐玉珍

詹大悲，名培翰，又名翰，字质存，湖北蕲春人。1887年8月3日(清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四日)生。其父詹竹亭是个秀才，在本村任塾师。詹大悲七岁随父读书，后又从人兼习数理一类课程。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07年投考黄州府中学堂时，名列第一。詹大悲在黄州(今黄冈县)读书时，就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和同学宛思演、梅宝玢、方子樵、何亚新等人一起组织证人学会，在同学中发展会员，传播革命思想。

1908年，詹大悲获悉学校当局因他宣传革命，将要开除他的学籍，于是离开黄州到了汉口。起初，他想在汉口办报，因经费不足而作罢。后宛思演接办汉口《商务报》，詹被聘为主笔，这是武汉地区最早的革命报纸。1909年冬，詹大悲、刘复基等以访员身份前往天门、潜江，通过该地驻防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与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取得了联系。从此，《商务报》成了群治学社的机关报。

1910年夏，由于群治学社的暴露，《商务报》受牵连而停刊。12月14日，梅宝玢等人创刊《大江白话报》于汉口歆生路，胡为霖任经理，詹大悲任主笔。未几，汉口发生英国水兵无故殴毙人力车夫事件，群情激愤。詹在报上对英国侵略

者的暴行大加揭露和谴责，因此英领事极表不满。胡为霖的父亲惧祸，召胡为霖归家，《大江白话报》停刊。詹大悲遂另筹三千元自兼经理，并改名《大江报》，于1911年1月3日继续刊行。

这时，群治学社已改名为振武学社，由蒋翊武主持社务。但因多次遭受新军协统黎元洪的破坏，社务几陷于停顿。蒋翊武乃邀詹大悲、刘复基等人密商办法，改名“文学社”以掩人耳目，詹被推为文学社简章的起草人。1911年1月30日，文学社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詹被选为文书部长。《大江报》遂成为文学社的机关报。《大江报》遇事敢言，凡官厅黑幕及清军中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等不合輿情之处，无不尽情揭露，甚至连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等“皆时被谩骂”^①，深得广大读者的欢迎。反动地方官吏则终日惶惶，“畏报如虎，恨报刺骨”^②。

同年5月，清政府下令将全国商办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詹大悲对清政府这种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慨，曾对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说：“国有固当，清有则否。”^③7月26日他在《大江报》上刊出黄侃(署名“奇谈”)所作《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号召“爱国之志士”、“救国之健儿”奋起进行“极烈之改革”^④。该文不过二百三十余字，却象一把利剑刺中了清政府的要害。因此，8月1日晚，《大江报》即遭到湖广总督瑞澂的查禁，詹大悲被捕。

在法庭上，詹大悲怒斥清政府将云南片马拱手让人，“丧权辱国，莫此为甚”^⑤。关于《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

他表示：此文“系外间投稿”，因为“经我过目”，“选定刊载”，所以“不能问写稿之人”^⑥；对于同时被捕的难友何海鸣，他声言：本人是《大江报》主笔，一切应由自己负责，与何无涉！由于武汉各界乃至全国各报的声援，瑞澂不得不将审判草草收场，判处詹、何徒刑各一年半。

武昌起义汉口光复后，詹大悲被迎出狱。10月14日，汉口军政分府成立，詹受命为主任^⑦兼管军事处。但没过几天，湖北军政府黎元洪等人“恐其权过重，功过高，有尾大不掉之虑，乃决意取消军政分府，改为驻汉鄂军支部，仍以詹为支部长”^⑧。25日，黎委张景良为汉口前敌临时总指挥，剥夺了詹大悲的军事指挥权。当时，清军冯国璋部正猛攻汉口，张景良非但不督战力拒，反于27日下午“突焚粮台”^⑨，在后方策应清军。结果全军动摇，兵退大智门。詹大悲依军民所请，立斩张景良，但已无法挽回败局，31日汉口失守。詹鉴于黎元洪等的猜忌，乃忍痛东走九江、上海。在上海，他得知胡瑛在山东任都督，于是赶往烟台。胡去职后詹又回到上海。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依照南北议和的条件，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由袁世凯继任。当时，不少下层革命党人对此深为不满，詹大悲认为这“无异授贼以刃”^⑩，欲办《亚东日报》以唤醒人心，但因经费筹措不易，未能遂愿。次年春，詹回到汉口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长，并当选为省议会议员。

“宋案”以后，詹大悲支持孙中山的兴师讨袁主张，并联络原文学社社员杨王鹏、王宪章、温楚珩等密谋在汉首先发

难，议定由“詹、杨等担任鄂西、鄂北军事，蔡济民秘谋内应”^①。不幸事被黎元洪侦破，计划没能实现，詹在黎的追捕下乘日舰逃离汉口。“二次革命”期间，他先后在江西和南京赞助李烈钧和黄兴的讨袁军事活动。失败后，遭袁世凯通缉，亡命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袁斗争。詹大悲首批入党，并奉孙中山之命，与王宪章等回上海策划起义。但由于计划泄露，王宪章惨遭杀害，詹侥幸逃脱，再赴日本。次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詹大悲由日本回国，准备去湖北策动讨袁起义。詹刚抵上海，即被新闻捕房派探以所谓“私造湖北官钱局伪票”的罪名逮捕，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7年7月，孙中山率驻沪海军到广东领导护法运动，詹大悲随即南下参加。9月，护法军政府成立，詹被派往四川，从事争取川军的工作。1918年5月，桂系军阀通过改组军政府的元帅制为合议制，迫孙中山辞职离粤。詹不满桂系军阀的专横跋扈，也离开广州。直到1920年11月，粤军陈炯明逐走桂军，孙中山重返广州后，他才又返粤协助孙重组军政府。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詹任大本营宣传员，并受孙的指派二次进川，联络川军共同北伐。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永丰舰五十多天，詹为追随者之一。次年奉孙之命赴泉州，与何成濬共商讨伐陈炯明事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詹大悲受孙中山指派，以湖北代表身份出席了这次大

会。他在会上积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7月，广州成立国民政府，詹被任为刑事审判委员，詹以不谙法律辞，改任参事。9月，陈炯明残部复据潮汕，妄图进犯广州。10月，广东国民革命军东征，詹大悲奉命前往江西，联络方本仁合击陈炯明。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詹大悲作为建国鄂军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会前，他与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联名通电，揭露北洋军阀段祺瑞祸国殃民的罪行，号召国民党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驱逐此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工具，建立统一之国民政府”^⑫。会议期间，他被推为大会政治决议案审查委员和起草人之一。经他参予起草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决议文》，肯定了“一大”后两年来的政治工作“确能依总理所指示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决定之政策进行”，并深望全体党员“仍以继续之努力，完成未竟之工作”。^⑬针对“西山会议派”的非法活动，詹大悲又向大会提出了速予纠正居正等解散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汉口特别市党部的议案。大会选举时，他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沪代表。

同年7月9日，广州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詹大悲随军到达武汉，先后任武汉政治分会委员、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建设科长、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代理湖北财政厅长等职。不久，湖北省政府成立，他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1927年2月武汉市政府成立，他又任市政府委员等职。在“迁都”之争中，詹大悲坚决支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1926年11月通过的迁

都武汉决议，反对蒋介石主张改迁南昌，使国民政府置于他个人控制之下的企图；詹并针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主张“把党的职权行使起来”，不能“只看见个人活动，看不见党的活动”^④。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次日，詹大悲即主持召开汉口特别市党部会议，通过了“通告下级党员一致反帝国主义，反蒋”和“根据蒋介石最近反动事实，再请中央免职查办，并开除其党籍”等项决议。^⑤

与此同时，詹积极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5月10日，他在汉口特别市党部执监委联席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加强国共两党联合的必要性。他驳斥国民党右派攻击工农革命运动的谰言，指出工农运动兴起的必要性，“因为要摧毁封建的基础，决不是省政府几个人员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对工农革命运动“不应过于压抑”^⑥。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也叛变革命，但詹仍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召集的所属各级党部执监委员联席会上大声疾呼要“加紧农工运动”^⑦。

詹大悲在武汉的言行，深为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所仇视。9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通过了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詹的所谓“附逆嫌疑”的决议。1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讨唐(生智)军占领武汉后，詹避入汉口日租界。12月17日，詹被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以“共产党首领”和“密谋暴动，希图响应广州”的罪名逮捕^⑧，当夜即遭杀害。

注:

- ① 《时报》辛亥闰六月十三日(1911年8月7日)。
- ② 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页。
- ③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69页。
- ④、⑤ 刘望龄:《革命的号角——大江报》。《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五辑第89页。
- ⑥ 方汉奇:《大江报的一个著名标题》。《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五辑第91页。
- ⑦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317页。
- ⑧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武昌大汉报社1912年版,第一册第100页。
- ⑨ 蔡寄鸥遗著:《鄂州血史》。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23页。
- ⑩ 《詹大悲事略》。湖南省图书馆藏。
- ⑪ 潘康时:《潘康时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7月版,第43-44页。
- ⑫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一号,第7页。
- ⑬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十八号,第6页。
- ⑭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3日。
- ⑮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
- ⑯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7日。
- ⑰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2日。
- ⑱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2月19、23日。

张 振 武

钟 碧 容

张振武原名尧鑫，字春三，更名竹山。湖北罗田人，寄籍竹山县。生于1870年2月8日（清同治九年正月初九）。

张幼年读书，就显露了他的聪慧；稍长，入湖北省立师范学堂，成绩优异，毕业后任小学教员。在师范学堂读书时，他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甲午之役中国战败和庚子之役联军入侵，使他感到是国家的奇耻大辱。他大声疾呼：“大丈夫忍为奴隶国民耶？”^①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变卖家产，于1905年自费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又加入体育会，练习战阵攻守诸法。1907年加入同盟会，担任联络事务。回国后，他藉教授生徒为名，以联络志士。在教学中，不断地向学生揭露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

1909年，孙武、焦达峰在湖北武昌成立共进会分会，以联络长江下游的会党。1911年6月，张振武在武汉加入共进会，负责经管财务，筹款购运军火，不足之数由他变卖私产捐助。

武昌起义，张振武是领导者之一，与孙武、蒋翊武齐名，号称“三武”。他事先积极准备，布署周密，行动敏捷。10月11日，革命党人迫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次日推定军

政府各部人选时，孙武为军务部部长，蒋翊武、张振武为副部长，当时孙武受伤就医，蒋翊武被捕逃出后未回，由张振武代理部长主持军务部工作。11月16日，张得知清军逼近新沟，汉阳危急，他亲率军务部人员及卫队奔赴前线督战，在跳越障碍物时落水，被卫兵救起。26日，战时总司令官黄兴自汉阳回武昌，召开紧急会议，报告汉阳战事失利经过，主张放弃武昌，以其兵力往援南京。张振武和谭人凤、李翊东、甘绩熙、范腾霄等与会人员大多数均表示反对，主张坚守武昌^②。27日，汉阳失守。次日黄兴赴上海，军政府以蒋翊武护理战时总司令。当时，武昌人心浮动，张振武乃骑马巡行全城，沿街高呼：“汉阳失守，乃我战略撤退，武昌万无一失。”军民见张之镇静姿态，亦稍安定。在坚守武昌的日日夜夜中，张振武亲率士兵巡视防哨，密切监视着清军的行动。不久，南北达成停战协定，武昌得以保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同盟会中发生了宗派的分化。张振武、孙武、蓝天蔚、刘成禺等人是以武汉首义自居的一派，他们不满意于临时政府中的权力分配，乃于1912年1月在上海发起组织“民社”，推举黎元洪为首领，使同盟会的力量越发涣散。随后，张即返回湖北，设立民社武汉支部。

张振武在武昌起义中为革命出生入死，是有功劳的。但“三武”都有些居功自傲，互不相能，以致他们之间也发生了矛盾。特别是张振武与孙武的矛盾更甚，各自拉一伙人，互相攻击。“党孙者毁振武，党振武者毁孙”^③。革命党人内部出现的分裂，给了嫉恨他们的黎元洪以可乘之机。

“三武”对黎元洪是藐视的。特别是张振武是逼使黎元洪

出来担任鄂军都督的代表之一，对黎当时表现的窘态，亲眼目睹，知根知底。民国成立之后，他在黎面前，仍然恃功而骄，认为黎的天下不过是他们替他打出来的。黎为此怀恨在心，暗中设想除掉他们的计划。

1912年3月15日，黎元洪召开特别会议，以蔡济民代替曾广大任军务司长，吴醒汉为副司长，解除蒋翊武、张振武军务部副部长职务，另把张振武推荐到中央去任职。黎向张谎言：袁世凯将畀以重任，“如此机会，千载一时。你切莫错过了”^④，竭力怂恿张振武赴京任职。

同年5月，张振武奉袁世凯之召进京，任总统府军事顾问，不久即回鄂。8月10日，张振武率领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十三人抵京，袁世凯为张振武等设宴洗尘。接着冯国璋、段祺瑞轮流宴请，姜桂题等则召集军界袍泽大会表示热烈欢迎。

在张振武等抵京的次日，黎元洪即密电袁世凯，加张振武等“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的罪名，乞请“立予正法”。13日，黎再次密电袁世凯，催请火速处决，其电谓：“不杀张不独为全鄂之害，实为天下之害”^⑤。8月15日下午8时，张振武偕湖北诸将校自作主人，宴请北方诸将领于六国饭店。宴罢回寓，时已夜深，路出东交民巷经正阳门，即被步军统领逮捕。段芝贵立即将张等押至京畿军政执法处，由处长陆建章略加审问后，即将张振武杀害。时正16日凌晨1时，同时被难的还有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消息传出，舆论大哗。8月16日8时，孙武、邓玉麟、刘成禺、张伯烈等前往总统府质问袁世凯。袁虚情假意地对

他们说：“我明知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将骂我，我实不能救他。”^⑥但是袁世凯绝不会代他人受过，他在宣布张、方二人的所谓罪状中，把黎元洪给他的密电全文录入，以推脱自己的罪责，也使黎元洪与同盟会之间扩大了裂痕。

8月19日，临时参议院为张振武案提出质问；8月18日、20日，黄兴两次致电袁世凯，就处决张、方事追询缘由；东南各省都督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谭延闿、孙道仁等均电诘北京政府谓：“凭一纸空文，擅杀元勋”，“请将张振武确定罪状，正式宣布”。^⑦在国内舆论谴责下，黎元洪不得不在21日的通电中除罗织张的罪状外，还假惺惺地伪装引咎辞职，并提出对张振武的身后事，从优议恤。这是民国史上第一件违法杀人的政治血案。

注：

- ①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93页。
- ② 同①，第380页。
- ③ 《真相画报》1912年8月21日。
- ④ 蔡寄鸥：《鄂州血史》。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66页。
- ⑤ 《民立报》1912年8月21日。
- ⑥ 黄远庸：《远生遗著》。商务印书馆1927年3月版，第二卷第106页。
- ⑦ 《民立报》1912年8月19日。

徐宗汉

郭 烙

徐宗汉，名佩萱，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876年（清光绪二年）出生于茶商家庭。少时随父在上海家塾读书，十八岁时，由父母作主，嫁两广总督署洋务委员李庆春之次子李晋一为妻。李晋一曾与兴中会会员陈少白的一个同学习英文，间接受陈影响，思想较进步。结婚数年后，李晋一病逝，遗有一子一女。

徐宗汉为人豪爽，与广州著名女医师张竹君交谊甚笃，经张介绍受洗礼入基督教。张在广州创办堤福医院、南福医院及育贤女学校，徐宗汉变卖首饰妆奁相助。

1907年，徐宗汉应执教于南洋槟榔屿的二姊徐佩瑶函邀，赴槟榔屿。这时槟榔屿刚成立同盟会分会，徐宗汉听到革命志士的宣传，热烈赞成，遂加入同盟会，此后即从事革命活动。她帮助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等在南洋发展党务。翌年秋，徐宗汉经香港同盟会分会派遣回粤，与高剑父、潘达微等在广州组织同盟会分机关，设守真阁裱画店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09年秋冬间，同盟会准备在广州举事，派徐宗汉等人去香港秘密运回炸药、子弹装在行李箱中，运到广州，别的人提心吊胆，坐卧不宁，而徐却态度安闲，怡然入睡。1910年2月，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倪映典准备发动广州

新军举行起义，徐宗汉担任联络工作，设机关于广州高第街宜安里，准备当新军起义时，由她分头纵火，以扰乱清吏的耳目。由于清廷采取了预防措施，而起义士兵又仓卒提前发动，使这次起义归于失败。徐宗汉在失败后逃亡香港。

孙中山、黄兴、赵声等决定在广州再行举义（即后来的黄花岗之役），遂在香港设立统筹部。徐宗汉积极参加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她在香港摆花街机关制造炸弹，临举事时又将机关迁至广州溪峡。她负责将枪械弹药从香港秘密运进广州的任务。她伪装成颜料行的主妇，把军火装在颜料罐中；并在储藏处的门口贴大红对联，装饰成屋内正在办喜事的样子，以迷惑敌人。起义前夕，她将枪械弹药发给“选锋”（即敢死队）同志。4月27日起义失败，总指挥黄兴负伤，于当天夜里脱险退至溪峡机关，徐宗汉为之裹伤，隐匿于机关。黄兴眼看起义失败，同志牺牲惨重，一时欲投河自尽，被徐宗汉劝阻，三天后，徐宗汉亲自护送黄兴乘轮船脱险至香港。由于黄兴伤势严重，住入雅丽医院动手术。照例动手术之前，必须有亲属签名负责，徐宗汉就冒充为黄兴的妻子签了名。在黄兴疗伤期间，徐宗汉对他关怀备至，待黄兴伤愈出院后，他们便结成革命伴侣。黄花岗之役的失败，使黄兴痛不欲生，曾想亲自暗杀几员广州大吏，拚一死以谢死难烈士。孙中山等革命同志坚决劝阻，徐宗汉亦对他百般劝慰，使他重振精神，筹划革命事业。

辛亥革命爆发后，黄兴自港经沪转鄂，主持革命事宜，徐宗汉随行。当他们自沪转鄂时，长江沿岸各口清吏搜查极严，无法通过。徐宗汉求助于在沪开设医院的好友张竹君。

张竹君发起组织由中外人士参加的红十字会救护队，开赴武汉战地救护，黄兴与徐宗汉乔装成救护队成员，混迹其间，得以顺利到达武汉。黄兴担任战时民军总司令，指挥抗击清军。徐宗汉则投入救护伤兵的工作，日夜忙碌。当汉阳弃守时，清军封江，徐宗汉与张竹君则以红十字会的一只渡船，护送黄兴渡到武昌江岸脱险。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2月间南北议和告成，广东北伐军姚雨平部从徐州前线回南京时，带回战时难童二百多人，黄兴通知陆军部副官处觅民房收容，成立南京贫儿教养院，由徐宗汉负责教养院的工作。从此，徐宗汉把贫儿教养工作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徐宗汉随黄兴流亡日本、美国，从事反袁活动。

1916年6月，在全国讨袁护国高潮中，徐宗汉随黄兴自美经日抵沪，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病逝。徐宗汉悲痛之余，息影沪滨，抚育遗孤。

“五四”爱国运动中，徐宗汉激于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又振奋精神，与上海博文女校校长李果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女界联合会，徐为该会负责人之一，领导上海妇女投身爱国运动。当刘清扬等代表天津各界联合会到上海呼吁发起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时，徐宗汉热烈赞助。她作为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代表之一，参加筹备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工作，并任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常务理事。她慷慨捐献经费给当时各爱国团体。“五四”运动后，许多青年想赴法国勤工俭学，但缺乏路费。徐宗汉热情资助这些青年，使其成行。她既要支持爱国

运动，又要资助青年求学，一年之间已囊中金尽，自己的生活反陷于窘困到不得不出卖住房的境地。

1921年，苏俄发生灾荒，上海成立俄灾赈济会，徐宗汉担任该会演讲部主任，到各地各团体去演讲，呼吁大家捐款，救济苏俄灾民。

1927年，北伐军到达南京后，徐宗汉回到她于1912年创办的南京贫儿教养院。她竭力整顿，使数百贫儿得到温饱，孩子们在此学习文化，兼学编织、园艺等知识。她还在安徽创办一所农场，作为贫儿劳动的场所。

1931年，她为征集贫儿教养院经费，赴美国募捐。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她立刻改变为贫儿教养院募捐的初衷，转而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为收复东北三省而奔走呼号。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带领一部分贫儿出国，流亡到暹罗，一方面为贫儿募捐，一方面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呼吁侨胞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徐宗汉从暹罗回国后，在云南大理鸡山创设贫儿院，但因经费困难，不久就停办了。她把那些流亡的贫儿转送至安徽贫儿院农场，自己于1940年春到重庆去。这时她年逾花甲，忧时愤世渐转为消极超世，静修打坐，苦渡光阴。1944年3月8日，她因肝病咯血，病逝于重庆。

主要参考资料：

- [美]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
- 《民国野史·记女斗士徐宗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十八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版。
- 《民国野史·黄兴在革命中恋爱》。同上。
- 冯自由：《徐宗汉女士事略》。《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
- 《记黄克强夫人》。重庆《中央日报》1944年3月13日第三版。

冯自由：《庚戌新正广州新军反正记》。《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月6月版。

黄一欧：《辛亥革命杂记》。《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穆云：《敬悼徐宗汉先生》，《现代妇女》第三卷第四期，1944年4月。

刘清扬：《纪念“五四”忆徐宗汉先生》，《现代妇女》第三卷第五期，1944年5月。

邹鲁：《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商务印书馆1947年4月上海版。

阎宝航

姜克夫 李侃

阎宝航，字玉衡，1895年4月6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生于奉天海城县小高丽房村。少时由于家境贫寒，在村里为人放猪。阎天资聪慧，渴望读书，常利用空闲去塾馆窗外听课。塾师出来考问，常能对答如流。塾师怜其才，允免收束脩。阎在塾读完四书、五经后，又去大旺台读高小。

1913年，阎宝航考入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预科，1917年毕业。在校期间，阎受到西方文化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认为复兴中华必须从兴办教育、启发民智入手，在师范毕业后，遂联络同学魏益新、张泊等，于1918年4月在沈阳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该校不收学费，并免费供给学生书籍、纸笔等，经过几年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效和声誉。由于各方面的支援，发展很快，不久在沈阳成立了总校和四所城关分校及实习工厂，招收贫民学生近千人。

阎宝航举办“贫校”获得成效后，渐渐引起上层社会的重视。先是阎在师范读书时曾入基督教，1920年被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聘为干事。他利用这个岗位，组织社会问题研究会，举办时事讲演会，以及游艺、旅行、电影等活动，传播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阎还通过青年会的活动，广泛结交上层人物和外国人，特别是与张学良相结识，逐渐成为莫逆之交。

1923年春，奉天青年会干事郭刚自广州开会回沈，带回一批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阎宝航、苏子元、吴竹村等在一起学习这些书籍，形成了自发的共产主义学习小组。第二年春，中国共产党由上海派韩乐然来沈阳开展工作，住在青年会。不久上海又寄来一批《向导》、《新青年》等书刊。阎宝航通过学习并与韩的接触，逐渐从“教育救国”思想中解脱出来，开始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1925年春，中共北方区委派任国桢来奉天建党，从此，阎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了声援上海“五卅”运动，6月10日他以“奉天学生联合会”名义，在沈阳组织数万人的游行示威，东北民气为之一振。当年暑假阎宝航倡议办了一所暑期大学，自任校长，出任国桢、吴晓天等讲授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等课程。同年年底郭松龄反奉失败，阎因涉嫌助郭反奉，不得不隐匿起来。旋去英国游学，1927年秋事息后回国。同年冬，阎宝航曾通过苏子元向中共满洲省委吴立石申请入党，党组织派人找阎谈过话，后因吴、苏相继离奉而中断了联系。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城市掀起了群众性抵货反日运动，号召以民众力量，督促南京国民党政府实行革命外交。沈阳各社会团体的主要成员组成“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公推阎宝航为常委会主席。次年，辽宁各界爱国人士为抵制日本帝国主义者指使浪人在满铁附属地公开设立吗啡馆，大肆贩卖毒品，成立了“辽宁省拒毒联合会”，阎宝航任总干事。他们组织学生协助警宪搜查毒品，一次即焚毁价值百万元的“海洛因”等毒品。此外，他还主持“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的工作，通过各种形式，经常宣传反日。他利用暑假发动沈阳大中学校学生千余人到

附近各县讲演，揭露日本侵华阴谋。阎的爱国反日活动，受到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爱国将领的赞赏，同时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仇视，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权助为此曾数次向东北当局提出“抗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阎宝航化装逃亡北平，联合高崇民、杜重远、卢广绩等于9月27日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收复失地，并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阎任该会常委兼政治部长。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塘沽协定》后，加紧镇压平津的抗日救亡活动，8月31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亦被取缔。阎宝航与高崇民、杜重远、卢广绩等暗中联合东北军的抗日将领，秘密成立了“复东会”，继续进行抗日复土活动，阎被举为理事长。“复东会”曾创办抗日干部训练班，请共产党人讲授游击战术等课程，学员结业后派赴东北工作。

1934年，蒋介石为了加强对民众的欺骗和思想上的控制，大搞“新生活运动”。蒋为了拉拢东北人士，指使宋美龄以基督教教友关系，商请阎宝航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阎经张学良劝说，于同年7月接受了书记职务（1937年改任总干事），同时还在国民党军委会挂了个少将参议头衔。从此，阎利用上述身份，广泛接触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除了完成张学良交给的任务外，并在掩护中共地下工作者和营救被捕人员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

10月11日，阎和高崇民、卢广绩等去沪探望被关押的杜重远，联名给张学良上书，敦劝他停止“剿共”，一致对外，保存实力，准备抗日。“一二九”救亡运动爆发后，流亡在北平、西安等地的东北爱国救亡团体纷纷出现。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为了营救张学良，阎奔走于宁、沪、奉化之间，曾三次去溪口见蒋介石，但无结果。为了协调北方的东北各救亡团体的爱国活动，1937年6月在北平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阎宝航与高崇民、车向忱、陈先舟、杜重远、卢广绩等被推为主席团成员。

同年，阎宝航再次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经中共东北特支向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周恩来报告后，于9月由博占和刘澜波介绍入党。

抗战期间，阎宝航在重庆利用他的合法身份作掩护，积极从事上层统战和搜集情报、筹措经费等工作。当时在内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人士，大都经济拮据，很多人来到重庆后都去上清寺阎家就食住宿。阎的住宅被同志们戏称为“阎家老店”。由于他的合法身份，他的家成了中共南方局对抗日团体布置工作的场所。阎宝航的活动，自然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曾受到特务头子康泽、戴笠的当面“警告”，但由于他有特殊的身份与背景，得免于特务的毒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重庆各人民团体为促使会议成功，组织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每天在沧白堂集会讲演，揭露国民党政府破坏政协会议的阴谋。阎宝航是集会的主持人之一。2月10日，重庆各界人民

在较场口举行大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却遭到以刘野樵为首的C.C.特务暴徒的围攻，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多人被殴伤。阎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将受伤者送入医院后，立即向中外记者报告事件真相，及时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破坏政协决议、坚持独裁内战的反动面目。随后，阎又奉周恩来指示，联络东北在渝民主人士宁武、刘风竹、宁恩承、王卓然等，组织“东北政治协会”，呼吁建设民主新东北，反对国民党向东北大量调兵。

1946年6月23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十万人，举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游行示威，并推派马叙伦、胡厥文、阎宝航等十人为代表去南京请愿。当天下午7点半，列车到达下关，代表们刚出检票口，即被特务雇用的暴徒推入候车室内，进行围攻。阎宝航挺身而出与他们辩论。暴徒们气急败坏，狂吼“你是共产党，跪下！”阎紧握双拳对暴徒们说：“我要给中国人保持体面，看你们哪个敢来！你们手中有枪，开枪好了，侮辱我是办不到的！”阎的凛然正气，使暴徒们相顾失色。请愿团与特务暴徒相持了三个多小时，至夜11时，暴徒趁四周群众逐渐散去，冲进候车室行凶，阎宝航、马叙伦、雷洁琼均被殴伤。请愿团的英勇斗争，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高度赞扬。

同年8月，东北各界人民代表在哈尔滨举行会议，选举阎宝航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阎遂返回离别十五年的家乡。不久，他被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为辽北省政府主席。在职期间，他以旺盛的革命斗志投入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发动农民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1949年春，平津解放后，周恩来奉中共中央委托主持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阎宝航调来任筹备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和条约委员会主任。1959年4月，周恩来在政协委员茶话会上，号召六十岁以上老年人上写历史回忆。此时阎宝航已年过花甲，自觉难以胜任繁剧，乃辞去外交部职务，到政协全国委员会参与文史资料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康生等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炮制了“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冤案，于1967年11月7日将阎宝航投入监狱。阎年事已高，又患高血压，在“四人帮”的迫害下，于次年5月22日去世。粉碎“四人帮”后，阎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他一生为革命所作的贡献，得到中共中央的赞扬。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于毅夫：《周恩来同志与东北救亡总会》。《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
- ② 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抗日复土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 ③ 张韵冷：《社会教育家——阎宝航》。
- ④ 苏子元：《怀念共产主义者阎宝航同志》。
- ⑤ 黄胄：《回忆恩师韩乐然同志》。
- ⑥ 周大文：《张学良将军学生时代的志趣》。
- ⑦ 阎宝航：《七年来东北同胞的奋斗》。《反攻半月刊》第三卷五期，1938年10月武汉版。
- ⑧ 商闻实：《“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
- ⑨ 阎宝航：《关于东北问题》。
- ⑩ 曹峰岩：《阎宝航同志生平纪略》。《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二期。
- ⑪ 胡耀邦：《在阎宝航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1月6日。

李根源

马子华

李根源，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别号“高黎贡山人”，1879年6月6日（清光绪五年四月十七日）生于云南省腾越（今腾冲）九保乡。李家祖籍山东益都，其先祖在明朝初年随沐英远征而留居云南。他的父亲李大茂，以军功获都司衔，后得“尽先补用守备腾越镇中营千总”^①。

李根源幼年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其后又得塾师认真教读经史，在“甲午之役”那年，他还是一个十五岁的青年，通过阅读上海《新闻报》，已知关心国家大事。由于他生活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对当时英帝国主义者侵占缅甸以及不断侵犯我国边疆的种种罪恶深为痛恨，因而激发了他对民族压迫的愤恨。

1898年李根源参加永昌府试，中秀才。1900年春，英军侵略滇边小江地区，总兵刘万胜应负失地丧权罪，清政府派提督冯子材巡边到达腾越，李根源以一个弱冠的青年向冯上书，请奏参刘万胜，并要求另派贤能重勘国界，为冯子材所嘉许。

1903年6月李到昆明参加乡试，未中；他即考入新创办的“高等学堂”为备取生。次年6月考取留日官费生，11月5日到达日本，进入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

成立，李即参加。同年冬，在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文部省取缔留学生规则的运动中，李根源被推选为振武学校留学生代表。1906年春，李根源被举为云南留学生同乡会会长，并担任《云南杂志》社经理。《云南杂志》出版后深得云南民众的称赞，起到了《民报》尖兵的作用^②。

1906年夏，李根源于振武学校毕业后，受云南留学生同乡会的推派，与吴焜、由宗龙等为代表回北京参加控告云贵总督丁振铎祸国误滇的罪行，清廷被迫将丁振铎调走。但清政府以为李根源是反丁风潮的首要分子，将要派警逮捕，他听到风声，急由天津乘轮潜返日本。

1907年1月，李根源被分配到日本第八师团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充士官候补生，实习一年。次年1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同年4月底，云南河口反清起义爆发，他在日本东京倡议设“云南独立会”以为声援。黄兴倡议在士官生中成立“丈夫团”，又倡议成立“大森体育会”，李根源参加了这些组织，并担任大森体育会的教员。这一年的12月，他由士官学校毕业，编在日本陆军第八师团青森步兵第五联队担任见习士官。1909年春，清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调他回云南任职。当他回到北京时，被同乡杨集祥告密是革命党人，经清吏寿勋、良弼传讯，不准离开北京。历时月余，他趁监视松懈，潜往天津，经海道于8月底返抵昆明。

李根源回云南后，被委任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后任总办。1910年法国修筑的滇越铁路通车，李根源率领全体学员到昆明的火车站外，向学员们讲述法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情况，以及国家积弱不振的原因，讲得声泪

俱下，学员们也感愤得一起痛哭起来。讲武堂的学员在李根源等同盟会员教官的爱国思想教育下，后来在辛亥革命中大都成为云南武装起义的军事骨干。关于他在维护讲武堂中的革命力量所起的作用，朱德曾在《辛亥回忆》一文中说道：“满清政府对于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对于讲武堂的摧残，是非常严厉的，李根源先生对于学校的维护，起了很大的作用。”^③

1911年1月，英军侵入云南边境片马地区，云贵总督李经羲命李根源筹办片马边防外交事务。他曾为此遍历边境地区，并乔装少数民族，深入英侵略军驻地，绘制了“滇西兵要界务图”一百二十六幅，并向李经羲提出交涉中的上、中、下三策^④。当时清政府只采用了他所建议的下策。

同年夏，蔡锷经李经羲奏调入滇，被任命为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统领，受到李根源等滇省士官同学的欢迎，加强了军队中的革命力量，但李根源却因此遭到以靳云鹏、钟麟同等北洋派官员的疑忌和排挤。李根源被调离了云南讲武堂，改任云南督练处副参议官。当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云南，李根源便和蔡锷、罗佩金、李鸿祥、唐继尧等人密谋响应。其时清军第七十三标统带不肯附合这次革命行动，李根源率同李鸿祥、刘祖武等夺取了他的兵权，于10月30日从昆明城西北进攻。次晨九时唐继尧、刘祖武等攻占云贵总督署。十时李根源、李鸿祥、谢汝翼等占领五华山、圆通山等制高点 and 皇城角的军械局。随即占领全城，取得了胜利。11月1日，云南军政府成立，蔡锷任都督，李根源任军政部总长兼参议院院长。嗣因滇西武装起义以后大理起义军和永昌起义军发

生武装冲突，11月30日蔡锷任命李根源为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改称总司令），节制滇西文武官吏，处理滇西善后。

1912年4月起，西藏地方当局受英帝国主义的唆使，派兵进攻江孜等地时，李根源曾请求率领滇军入藏平乱，为袁世凯所阻止。8月李根源卸去滇西善后事务，回到昆明。其时，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李被举为云南支部长。12月初，李离昆明作京沪之行。1913年1月底，李被选为众议院议员。2月中旬李到达北京，袁世凯曾用“高等顾问”的名义及高薪进行拉拢，他予以拒绝。嗣后袁世凯窃国阴谋愈加暴露，李根源参加了癸丑讨袁之役，失败后亡命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当时孙中山决定另组中华革命党^⑤，黄兴等人因意见相左而反对，李则调和于孙黄之间。1914年7月欧战爆发，8月23日日本宣布对德作战，李根源、熊克武、章士钊等百余人起而组织“欧事研究会”，共同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成为当时国民党人组织的一翼。

1915年10月，李根源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反袁斗争，随后到香港，策动广西陆荣廷独立讨袁。年底云南宣布护国讨袁时，唐继尧任命李根源为护国军驻粤港代表。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5月初两广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都司令部，李根源任副都参谋。不久，军务院成立，李任滇粤桂联合军都参谋。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不久实现了所谓南北“统一”，7月14日，黎元洪任命李根源为陕西省长。10月李到北京，以众议员的身份参加国会复会后的活动。当时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对副总统人选意见分

歧，李以吴景濂等人不守党纪、不能理喻，把一部分政见相同的议员，以欧事研究会的成员为基础组成“政学会”，进行政争。

1917年2月，李赴陕西省长任。4月，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因对德宣战问题矛盾尖锐化，黎则下令免段职，段祺瑞唆使督军团起而反黎宣布“独立”。5月底，陕西督军陈树藩强迫李根源通电附和督军团，遭到他的拒绝，陈将李根源软禁了七个月后才释放。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东组成军政府，领导护法运动。1918年1月李根源应岑春煊等电邀到广东参加护法斗争，2月下旬被任命为驻粤滇军总司令。恰在此时，盘据在海南岛的军阀首领龙济光率军进犯广东雷州半岛，占领阳江、恩平四邑，广州震动。李就职后于次日出师，反击龙济光军。3月初，收复恩平、阳江以及高州、化州等地。此时段祺瑞命赣南镇守使吴鸿昌率北军三万余人越大庾岭袭取南雄，滇军第三师败退，李即被任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星夜旋师，反攻南雄，击败北军。至此广州的形势虽稍趋稳定，但这时政学系在非常国会中成了重心。政学系的存在是凭借桂系的力量和依靠李根源有深切关系的滇军为支柱。经政学系活动，西南各实力派的联合，于是有同年5月改组军政府、易大元帅一长制为七总裁会议制以排斥孙中山的事件发生。

1920年2月，驻粤滇军因云南督军唐继尧与桂系军阀争夺这部份军队的统率权而发生风潮。驻粤滇军分裂为两部分，大部份滇军投入李烈钧旗帜下；李根源率所余的一部分滇军移驻琼州与雷州，李改任督办广东海疆防务兼雷琼镇守使。

同年8月陈炯明奉孙中山命率所部粤军回师攻粤时，李根源则奉岑春煊命将所部调往东江与粤军作战。后又经莫荣新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当时桂系军阀在粤连遭败北，以岑为首的军政府摇摇欲坠。10月24日，岑春煊被迫通电去职，李根源因和桂系的关系而遭到所部军官的反对，被迫离开滇军。旋即离广州去上海，以后移居苏州。

1922年夏，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派人到苏州邀李到北京任职，黎并亲书“关中贤相资王猛；天下苍生忆谢安”的对联相赠，李感为知遇，从此效忠黎元洪。李到京后，初任航空督办。不久，在汪大燮内阁中署理农商总长。次年1月张绍曾组阁，李仍任农商总长。6月曹锟窥伺总统位置，逼走黎元洪，李根源随同黎元洪出走天津。9月又随黎元洪去上海活动。10月曹锟贿选成功，黎出国去日本，李则在沪闭门读书。1924年6月李去苏州居住，常与陈石遗、章太炎、张一麐等相过从，成立“国学会”，并刻印《曲石丛书》。

“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李根源激于爱国主义思想起而参加苏州人民群众的集会，发表反对投降政策的声明，又到各处作抗日救国的讲演。这些活动曾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特务的监视。“一二八”沪战发生，他和苏州爱国群众一道参加捐款和救护伤员等活动。

“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全国抗战开始，李根源在苏州和马相伯、张一麐等人，创议组织“老子军”，号召老年人都来支持抗战。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逼近苏州，李方才去武汉，通过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与朱德总司令取得联系。

国民党的新疆督办盛世才，原先是李根源的学生，此时

电邀李去新疆。李曾为此电告朱德征询意见，朱德由临汾前线回电，赞成前往。当时蒋介石也想通过李与盛的师生关系，调和他和盛世才之间的关系，任李为军事委员会参议官。李于1938年2月到乌鲁木齐晤盛，同年9、10月间因患心脏病回昆明疗养。

1939年，国民政府任命李根源为云贵监察使，这是蒋介石政府安置“元老”的一种名誉职位。李利用这个机会，召集了一些旧耆宿儒整理云南地方文献，编印了一部《永昌府文征》。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路经云南时，曾向云南省主席龙云鼓吹他的卖国主张。龙曾想通电主张中日媾和，并邀约李根源共同签名，李立予严拒，并劝说龙云不要上汪精卫的当，帮助龙云坚定了应持的立场^⑥。1942年日军自缅甸侵入李的家乡云南腾冲一带，李根源发表了《告滇西父老书》，表示愿随滇西父老之后，保乡卫国。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辞去云贵监察使职务，被国民政府聘为国策顾问。他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十分不满，曾致电国共双方呼吁和平，并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重开政协会议。

1949年9月，李从腾冲来到昆明。当时，云南省主席卢汉在蒋介石胁迫之下，纵容国民党的特务制造所谓“九九整肃”事件，查封报馆、学校、议会，并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三百多人，蒋介石已决定杀害张天放、杨青田等十人。11月，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重庆来到昆明，李根源面恳他下达了大赦令，使在“九九整肃事件”中被非法逮捕者获得自由^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根源被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后，历任全国政协第二、第三届委员。1965年7月6日李根源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李根源生前著有《曲石文录》、《曲石诗录》和《雪生年录》等。

注：

- ① 李根源：《雪生年录》。第一卷第1页。
- ② 李根源赋《云南杂志》诗中有“民报挺生谁拱卫，云南杂志是尖兵”之句。
- ③ 朱德：《辛亥回忆》，《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0日。
- ④ 同①卷一第19页。
- ⑤ 同①卷二第10页。
- ⑥、⑦ 《雪生年录续编》未刊稿。

章士钊

白吉庵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秋桐等^①，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生于1881年3月20日（清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其父章锦曾在乡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自幼在其兄执教之私塾读书，勤奋向学，进步甚速，十三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攻读“柳文”。十六岁时母去世，为生计所迫，遂到一亲戚家为“童子师”。^②

1901年章在姐姐的资助下，离家到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此认识了黄兴。不久经业师张劭熙的介绍，到朱启铃家教私塾。次年3月到南京，入陆师学堂学军事。以国文成绩优异，得学堂总办俞明震的赏识。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沪上各学校学生在张园集会响应，陆师学生也起而响应，但受到学堂当局的压制，章与林力山率退学学生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③，他被推担任军事教习。在此与章太炎、张继、邹容相识，四人意气相投，遂结拜为异姓兄弟。当他从友人王慕陶处得闻孙中山其人，十分敬佩。因章在陆师学堂时学过日语，遂把宫崎寅藏的新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出来，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用黄中黄的笔名出版。这书一出，影响颇大，国人知重孙中山，就从这书

开始的，“孙中山”这个名字，也从此开始流传天下。^①

章到沪不一月，即受聘任《苏报》主笔。由于连续登载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节录）及《〈革命军〉序》等反清文章，使《苏报》声名鹊起。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于7月初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六人，并于7日查封了《苏报》，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被追究。

《苏报》被封后，章于8月7日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又创办了《国民日报》，同时建立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这期间，他编辑、出版了《苏报纪事》、《沈荇》^②等革命小册子。同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

1904年春，章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为会长，章为副会长。8月，华兴会决定11月1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与杨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不料因事机不密，长沙起义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等人先后到上海，计划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11月19日发生了万福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被捕。次日章去监狱探望万福华，被侦探跟踪，结果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到破坏，张继、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因此再起义的计划中辍。后在蔡锷等人的营救下，章等被保释。

章士钊等出狱后即往日本。1905年春他回顾了过去的活动，特别是在上海被捕的经过，认为自己“才短力脆”^③，连累了同志，感到内疚，“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④；同时从日本的变法自强中，觉得教育的重要，因而思想起了变化。从此，他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矢

口不谈革命。是年他入东京正则学校专攻英语，为学习欧洲的科学与文化作准备。同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章未参加，虽经张继、吴弱男等先后劝说，也无济于事。

1907年，章编纂的《中等国文典》在上海出版，他用稿费作川资赴英留学。1909年4月他与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移居阿伯丁，入阿伯丁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国外后，章即携眷返国，次年春抵南京。继而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主持上海《民立报》，同时兼任江苏都督府的顾问。

章既主《民立报》笔政，迭以社论形式发表文章。迨临时政府北迁，小党纷立，互相訾议之际，章7月5日发表《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国内现有的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然后在一段时间内各抒政见，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毁党造党说”。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当时同盟会员对此尤为不满，纷纷著文批驳，并反对以非党人上来主持该报，章士钊因此愤然离去。同年9月，章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于上海。后来人们举发王无生暗中接受袁世凯的津贴，事涉章士钊。为此，章无法继留上海，适有袁世凯之邀，遂北上。袁早年与吴弱男之祖父吴长庆有旧，所以对章颇为器重，曾授意教育总长范源濂委章为北京大学校长，事已见报，但他固辞未就。

1913年3月，袁主使刺杀宋教仁，反而嫁祸于黄兴，造

谣说“宋案”是黄与宋为争当总理而起。章从此看出袁的险恶，于是只身前往上海，拜晤孙、黄，加入了“反袁”行列。“二次革命”之宣言书，乃章之手笔。同年夏，他奉孙中山之命往说岑春煊联合“讨袁”，会谈颇有成效。继而他又往武昌说黎元洪，无结果而返。7月，孙中山命他为讨袁军秘书长，随黄兴赴南京举事。“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随党人亡命日本。

到东京后，章与陈独秀、谷钟秀等创办《甲寅》月刊，于1914年5月出版。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政府应当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宣称实行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部分党人拒绝参加，另组织欧事研究会，章任该会书记。其时，欧战已起，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妄图鲸吞中国，因此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欧事研究会议决通电全国，表示对内对外态度。这个宣言是黄兴领衔，章上钊起草。他们以担心反袁斗争将逼使袁投入日本怀抱为“理由”，主张暂时停止反袁斗争。到1915年冬，袁公开称帝，护国军起，章随岑春煊参加“讨袁”。次年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继，章代表岑北上，与黎元洪洽商善后。

1917年1月，章在北京出版《甲寅》（先日刊后周刊），请李大钊、高一涵参加工作。7月张勋复辟事起，京城混乱，章移居天津，《甲寅》随之停刊。11月章受北京大学之聘，任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18年，李大钊由上海到北京，经他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这年5月，南方桂系军阀把持了护法军政府，岑春煊为总裁。章应邀南下，任军政府秘书长。1919年被任命为南方“和议”代表，出席上海的“南北议和”会议。翌年10月，由于粤军回师“讨桂”成功，岑春煊下野，章也随之而去。

章经历几年政局波动与一段沉思之后，对曾经宣扬的西方代议制渐生怀疑。1921年春得黎元洪资助，出国考察。到伦敦后，访问英国学者威尔斯、萧伯纳、潘梯等人，渐悟农业国与工业国之不同，中国政治不宜强学西方。于是当他到柏林时，曾作《草新湖南案成放歌》^⑧一首，提出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主张。次年1月他父亲去世，奔丧回国。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准备实践他的重农主张。

章出长农大刚半年，北洋政府发生内讧。1923年6月，直系军人赶走黎元洪，部分国会议员不满直系所为而南下。章也是议员，感情上与黎接近，乃离京赴上海。10月5日，曹锟贿选为总统，章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受贿议员。继而著文抨击“代议制”。综观此时章士钊的议论，他虽然察觉出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流弊，但他却是求救于封建旧文化，思想更趋保守。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被拥上台。段为了网罗知名人士，特邀章北上。章之毁弃国会的主张，恰好投合段意，所以两人在天津会晤时，虽“夙无连谊”，而“一见倾心”^⑨。共议元首名号时，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两职。段对这个主张非常欣赏，11月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时，章被委为司法总长。从此，章便成了段祺瑞的亲信。

1925年4月14日，段祺瑞派章兼任教育总长。他到任后，宣称要整顿学风，严格考试，甚至要小学生读经，并准备合并北京八所大学。这些钳制性措施，引起了教育界进步人士及广大青年的强烈反对。5月7日，北京学生及各界群众举行纪念国耻游行。适时报上揭出教育部禁止游行的命令，群众非常愤慨，遂至章宅进行质问，结果遭到镇压，学生受伤与被捕者多人。9日各校学生四千余人再次集会，要求释放学生，罢免章士钊。章在群众指责下，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函电催促，又北上复司法总长之职。

这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全国革命浪潮不断高涨，学校青年尤为活跃。段于7月底又调章出任教育，要他对“学风”继续“整顿”。此时，章将复刊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因该刊物封面绘有一虎，其时章之行为又如此，故时人称之为“老虎总长”。他在文化上虽然标榜的仍是“新旧调合”，而实际上是为封建旧文化张目。由于他对中西学术思想都有所了解，所以他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言论，较之其他顽固文人，更具诡辩性。他不顾人们的反对，复以窃据的权力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曾一度被章无理革除，后因鲁迅提请公议，才又得复职。8月1日他派出武装警察护送新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来竟演变到下令解散“女师大”，以武力镇压学生运动。

在革命高潮到来的1925年下半年，段执政府的反动益为群众所怀恨，章士钊的行径也成为众矢之的。11月28日，为要求查办“金佛郎案”，章的住宅又一次遭到游行群众的包围

与冲击。到此，他不得不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但经段祺瑞的慰留和委派，他又出任执政府秘书长之职。到1926年4月，执政府在几派军阀互斗中垮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他自己虽已失势，但次年4月，听到李大钊在北京被捕的消息后，曾与杨度积极设法营救。

1928年底，由于前执政府之高级官员皆被南京国民党政府列入通缉之中，章遂携眷作第三次欧洲之行，遍游英、比、德等国。到1930年春，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东北大学文学学院院长。章被通缉一事，也赖张为之说项而撤消。“九一八”事变发生，他离东北赴上海，与杜月笙结识，被杜待为“上宾”，不久执律师业。1934年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1936年秋，应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之邀北上，任法制委员会主任。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章避难到上海。翌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他拒绝。不久章前往香港。1939年2月由港赴重庆。到渝后，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1943年章著的《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双十”协定签字后，毛逗留重庆；时国民党特务猖獗，章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向毛建言。1946年他到上海，再执律师业。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提出“和平谈判”。章先后两次被任命为代表，北上参加“和谈”。谈判

破裂后，5月18日，他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揭露国民党政府“备战求和”的骗局，说：“中共让步不能算少，而国民党中两派不愿和”^①，并以亲身经历说明中共对“和谈”的诚意。从此，他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参加到人民的行列中来。同年6月，他写信给当时湖南省主席程潜，劝他起义，走和平解放的光明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士钊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届代表和第三届常务委员；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讲授“柳文”。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为《柳文指要》，于1971年出版。

1973年5月，他带病赴港探亲访友，7月1日病逝香港，终年九十二岁。

注：

- ① 章之笔名除上所记之外，还有青桐、孤桐、柯老人、无卯等。
- ② 章士钊：《示侄》。《国闻周报》第5卷第16期。
- ③ 1903年拒俄义勇队被日本政府解散后，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又组织国民教育会。是年上海爱国学社亦组织国民教育会。
- ④ 章编译此书时，一时疏忽，误将孙之真名（孙文）与化名（中山樵）的姓连缀成文，于是“孙中山”之名，便从此流传。事见于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一集第243页。
- ⑤ 沈荇，清末维新派。1903年因揭露“中俄密约”被清政府杖死狱中。此处是人名，也是书名。

- 6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二集第 142 页。
- 7 章士钊：《答稚晖先生》，《甲寅》1925 年第 1 卷第 22 期第 6 页。
- 8 章士钊：《草新湖南案成放歌》，《甲寅》1925 年第 1 卷第 24 期第 23 页。诗成之经过，章在诗序里说：“草治湖南新案，拟返里试行之。诗兴忽发，且成长歌一章。”其诗云：“湘人勤俭夙宜农，立国舍此宜何宗，吾国文明本农化，更有何居足方驾……”。
- 9 同⑦，第 9 页。
- 10 《一封信戳破假和谈大骗局的内幕》，《南京人报晚刊》1949 年 7 月 8 日。

冷 通

史 全 生

冷通，字御秋，1882年6月22日（清光绪八年五月初七）生于江苏省丹徒县黄墟镇。六七岁时丧父，靠大哥在镇江开设小杂货店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供给他上了几年私塾。他十分用功，常常在明瓦下面借月光读书，深得老师和邻居的喜爱。他曾与邻居江月清等三个少年结成异姓兄弟，号称梅、兰、菊、竹，以风格节操相勉励。由于生计所迫，冷通十三岁辍学，到宝应县城的一家钱庄当学徒，饱受老板的苛待，未及满师，愤而辞归，在他大哥店里，帮助做些买卖。1902年春，安徽武备学堂招生，他与邻居江谦吾同赴安庆，考入安徽武备学堂练军营。

冷通在安徽武备学堂读书期间，正值日俄战争前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众革命激情高涨。安徽的革命志士在柏文蔚和陈独秀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革命团体“岳王会”。冷通在反满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与柏文蔚等人时相过从，关系密切。

1905年秋，冷通从武备学堂毕业，分发给在南京新军第九镇三十三标第二营任右队队官。第二营管带是后来升任三十三标标统的著名革命党人赵声，与冷通是丹徒同乡。冷通在赵声的带动下走上革命道路，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如在明

孝陵宣讲民族革命思想，在珍珠桥营部设立阅书报社，密谋发动武装起义等等。1906年，东京同盟会本部派吴暘谷来长江流域发展同盟会组织，冷遁和柏文蔚等人均加入^①。后来，三十三标的革命活动被两江总督端方使悉，撤消了赵声的标统职务，并准备大兴党狱，赵声和柏文蔚等人相继潜逸。冷遁升任为第三营管带。冷遁通过赵声的兄弟、当时在南洋陆师学堂读书的赵馥六，继续与赵声秘密联系，掩护新军内的革命活动，保存了三十三标的革命火种。

冷遁与革命党人的频繁接触，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07年冬他被撤消管带职务。冷遁听说原三十三标管带顾忠琛已被友人推荐为安徽新军混成协协统，原三十三标的一些革命志士如倪映典、熊成基等人也都依附在他的麾下，于是亦往投效。冷先后被委任为督练公所教练处提调和六十一标三营管带。当时岳王会在安徽十分活跃，倪映典、熊成基等都参加了。因此，冷遁一到安徽，即与岳王会发生关系。1908年秋，清廷命令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集中在安徽太湖县举行秋操。岳王会决定利用太湖秋操的机会发动起义，并在安庆三祖寺的杨氏试馆内设立了一个策划起义的指挥机关，冷遁平素作风稳健，又果断善谋，被公推为起义总指挥，六十二标二营管带薛哲为副指挥。他们设想：届时只要义旗一举，湖北第八镇、南洋第九镇和江西新军一齐响应，就能直捣北京，推翻清朝。不料范传甲在赴南京与第九镇新军联络时，走漏了风声，被两江总督端方使知。端方遂派其心腹余人洪去安徽监视新军，并以调虎离山之计，令冷遁回南京任转运局提调，当他一到南京时，即予以逮捕，投入囹圄。

冷遁被捕以后，在狱中多次被严刑审讯，受尽折磨，曾昏厥三次，未供一词。端方查无实据，恰又值调任直隶总督，亟待办理移交，在亲友的营救下，冷遁得于1909年春获释。

冷遁获释以后，得知岳王会发动的起义已失败，乃先回丹徒老家完婚。新婚后刚刚八天，他得知赵声正在香港组织新军起义，把家属托付给结义弟兄江月清照料，只身奔赴香港，追随赵声参加革命。冷遁到达香港以后，恰值王孝缜受广西巡抚张鸣岐委托，到北方延揽新军人才，正取道香港回广西。两人相遇，一见如故，遂邀冷遁于1909年底一道入桂。从此，冷遁又成为“广西革命最初发动”^②人物之一。

冷遁到达广西后，先任陆军小学提调，不久即因革命嫌疑被撤职。^③1910年3月，何遂、耿毅受军谕府命令前往中越边境调查，他应邀同行，趁边境调查的机会，广泛联络了各地革命同志。其后，他又与何遂一起秘密转赴昆明，访问了云南革命党人李根源、方声涛等人，在云南讲武堂密谈，讨论了在起义中联合动作和协同作战的问题。密谈后，经香港回广西。1910年8月他和何遂、耿毅等一起创建了广西同盟会支部，统一领导广西的革命运动，并共同出资发行机关报《南报》（后改名为《南风报》），宣传革命思想。1911年春，黄兴和赵声等在香港筹备广州起义时，曾多次派员与广西支部联系，策动响应，冷遁则为中间联系人。可是广州起义刚一发动，即被镇压，冷遁也因此受到广西当局的严密监视。他于是不得不养晦韬光，佯与演员相结交，出入娱乐场中，以示消极，被呼为“冷大爷”。^④

武昌起义爆发后，风声所播，举国震动。广西同盟会支

部也决定于10月30日起义响应。临举事时，忽然暴雨如注，起义受挫。旧官僚和立宪派得知新军异动的消息，惊恐万状，为了抢夺政权，决定与同盟会支部举行谈判，实行和平光复。谈判中，冷遁被同盟会员举为副支部长，主持支部工作。广西光复后，新军改称民军，冷遁任民军混成协帮统，率军援鄂。他率军经湖南，从金口渡江，绕道汉阳敌后准备发动进攻，旋南北实行停战，谈判开始。桂军暂驻孝感，略事休整，遂后顺流东下，开抵南京。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柏文蔚所率领的驻浦口的军队正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军，准备出师北伐。冷遁一到，即被委任为第一军第三师师长。接着，孙毓筠出任安徽都督，由于受到军界排斥，乃电邀冷遁赴皖任军政府参谋部长。南北和议达成后，孙毓筠辞职，柏文蔚继任皖督，冷遁改任第九师师长，驻军徐州。

当时徐州恰遭到张勋的江防营从南京败退时的肆行抢掠之后，“四民失业，哀鸿遍野”^⑤。冷遁到达徐州后，即着手整顿军队，解决贫民生计，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也得到陆军部的通令嘉奖。^⑥1913年3月，第九师改编为江苏陆军第三师，冷遁仍任师长，驻防徐州。

1913年3月发生“宋案”引起“二次革命”，部分国民党员反对孙中山武装讨袁，主张“依法处置”，冷遁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在徐州发表谈话说：“我这里是前线，敌人来了我就打。我的队伍虽不算强，对付张勋的辫子兵还是可以的。”^⑦第三师成为江苏讨袁军前锋，遭受北洋劲旅冯国璋军和张勋辫子军的联合进攻。冷遁率领全军与敌进行了多次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而败退，最后由于部下张宗昌、褚

玉璞的投敌而全军瓦解。失败以后，冷遁流亡日本。由于不同意孙中山所定加入中华革命党时须在誓辞上按指印的规定，乃与程潜等人组织“欧事研究会”，遥戴黄兴为领袖。^⑧

1915年冬，蔡锷发动护国战争，冷遁闻讯后立即返回上海，投入护国讨袁运动。次年5月，广东肇庆成立都司令部和军务院时，他任都司令部参谋处长。6月6日，袁世凯死去，冷于6月22日致电徐树铮，敦促段祺瑞恢复《临时约法》，“召集旧国会，组织合法内阁，罢黜帝制祸首”^⑨。这时他对段祺瑞尚抱有幻想。当1917年7月段祺瑞击败张勋复辟，重新掌握政权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的建议，冷遁即投入孙中山所发动的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总参议和代理内政部长。

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冷遁对政治斗争表示厌弃，想专心致力于实业和教育，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1921年，他回到镇江，筹集股本创办了江北盐垦公司。1923年，又先后创办均益、三益蚕种场和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冷遁曾与黄炎培一起，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该社理事。

1925年初，奉军张宗昌部南下江苏。当时的江苏省长韩国钧深惧张宗昌部的蹂躏，特邀请冷遁出任江苏省水陆警备司令之职，以维持社会治安（因张宗昌曾是冷遁部下）。半年后冷辞职回到镇江，继续从事实业和教育活动，并在1936年担任镇江商会主席和江苏省商会执行委员。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抗日战争爆发，冷遁主张发动民众抗战。1938年春，他与黄炎培一起，向蒋介石

面陈了发动民众的意见，随后又转赴徐州，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陈递发动民众意见书。12月，当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时，冷遹和黄炎培等于1939年1月30日联名通电，声讨汪精卫的罪行。^⑩这时，国统区内抗日民主运动十分高涨，冷遹积极投入了抗日民主运动。自1940至1945年间，他与黄炎培、江恒源等先后成立了“国讯同志会”、“经济建设策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等民众团体和政党，宣传抗日救国，被举为国讯同志会副会长、经济建设策进会常务委员、民主建国会常务监事和常务理事。冷遹还利用他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赈济委员会委员的合法身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在1944年9月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他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了促成联合政府的建立，冷遹在1945年5月与黄炎培等联名提出恢复国共谈判的主张，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于6月2日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要求“继续商谈”，“促成团结”。^⑪并于7月1日与黄炎培等一起飞赴延安，接洽国共谈判的具体事项，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热烈欢迎。7月14日，当国民党准备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以抵制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时，他即与黄炎培、江恒源联名声明反对，指出国民大会“必须在全国和谐空气中进行”，否则“其后患将不堪设想”^⑫，并拒绝出席关于国民大会的讨论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冷遹任国民党政府江苏省临时参议院议长、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农民银行监理委员和蚕桑

协会会长，利用他的合法身份继续从事民主活动。由于他不断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劣迹，还掩护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革命斗争，引起国民党特务的痛恨，1948年准备对他进行暗害，他不得不辞去议长职务，避居上海。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企图对许多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残酷迫害，冷遹得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照，及时避往亲友家中，未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冷遹历任江苏省副省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兼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兼江苏省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等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59年8月18日，冷遹在南京病逝，终年七十八岁。

注：

- ①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三期第41页。
- ② 黄绍竑：《五十回忆》，上册第16页。
- ③ 何遂：《辛亥革命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 ④ 耿毅：《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 ⑤、⑥ 李炳之：《调查徐州军队情形报告》，稿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⑦ 同⑤。
- ⑧ 同⑤。
- ⑨ 《冷遹致徐树铮电》，稿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⑩ 《新蜀报》1939年1月4日。
- ⑪ 《黄炎培日记》1945年6月2日。
- ⑫ 《新华日报》1945年7月15日。

萨镇冰

陈贞寿

萨镇冰，字鼎铭，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59年3月30日（清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生。他的父亲萨怡臣，是个秀才，以教书为生。萨幼承家学，七岁即读经子诸书，十一岁考进马尾船政后学堂，学习驾驶，三年毕业后派在“扬武”等舰见习，曾游历新加坡、小吕宋等地。

1877年3月，萨镇冰被派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三年后回国，任“澄庆”兵船大副，1882年，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黎元洪是他的学生。1886年擢升“威远”兵船管带，翌年改任“康济”号练习舰管带，1888年晋升为参将，1894年授副将衔，并补北洋海军精练左营游击。

甲午战争爆发时，萨镇冰奉命守卫日岛。他冒着猛烈的炮火，亲自把守速射炮，^①直到炮台被毁，他才按照提督丁汝昌的指示，撤退到刘公岛。威海卫之役，丁汝昌因弹尽援绝，服毒自杀。萨镇冰亦曾企图自杀“殉国”未果，战后受革职处分，回乡执教。

1896年，萨镇冰出任吴淞总炮台官，后任自强军帮统。时清政府为重整海军，先后向德、英等国购买若干只新舰，萨镇冰出任“通济”舰管带；1899年，升任北洋水师帮统，兼任“海圻”舰管带。“海圻”舰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舰。

1903年，清政府任萨为广东南澳镇总兵官，不久升萨为北洋水师统领；1905年擢广东水师提督总理南北洋海军。1908年萨奏准清政府每年派舰访问南洋，抚慰侨胞，为我国政府宣抚华侨之始，而他的声望也由此著于海外。

1909年7月，清政府派郡王贝勒载洵和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萨把南北洋海军统一编制，将大小舰艇四十余只分为“巡洋”、“长江”两个舰队。10月，萨同载洵赴英、法、意、奥、德、俄等国考察海军事务，次年8月，又往日本、美国考察。后清政府设立海军部，在“巡洋”、“长江”两舰队之上，设统制部，任萨为海军统制。

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急电萨镇冰星夜率舰赴鄂。萨乘“楚有”舰率舰队溯江兼程前进，助清军于10月29日攻陷汉口。由于海军官兵同情革命，部分已暗中联络酝酿起义，大势所趋，萨不得不自行引退。后得到黎元洪的暗中保护，他搭乘一英轮下驶，至九江英领事署住宿一宵，翌日乔装商人往上海。^②时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命萨为海军大臣，他对形势踌躇观望，未就任。

1912年，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此时，萨镇冰任吴淞商船学校校长。“二次革命”爆发，1913年8月袁世凯起用萨镇冰，委其督办淞沪水陆警察事宜，维持上海治安。翌年，袁世凯命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任命萨镇冰为办事员。同年5月，袁世凯设立了他的御用机关参政院，任命萨镇冰为参政。8月又任萨镇冰兼上海兵工厂总办。

1915年夏，袁世凯图谋帝制日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

愤，反袁活动此伏彼起。革命党人于11月10日刺杀了袁之悍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并谋先在上海发难。袁大为恐慌，派萨镇冰等加强戒备。萨自德州、汉口视察兵工厂后于12月3日抵沪。5日，革命党人联络“肇和”舰上的海军练习生陈可钧等趁机发动起义，占领了“肇和”舰，并迫使“应瑞”、“通济”两舰发信号表示赞同革命。萨镇冰与松沪护军使杨善德、杨晟等商议，决定用重金收买“应瑞”、“通济”两舰官兵。6日黎明，“应瑞”、“通济”两舰突向“肇和”舰开炮，击中锅炉，“肇和”舰遂复入袁军之手，沪上革命党人反袁斗争遭受巨大挫折。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时由于龙济光的振武军炮轰驻韶关的李烈钧滇军激起了战争，北洋政府海军部特派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率海军前往查办，8月25日萨到广州，率舰驻泊沙面镇慑，并调解龙、李，使粤事得告结束。

1917年5月，“府院之争”中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后，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萨镇冰任海军总长。7月初，张勋复辟，曾授萨为海军部尚书，未就任，张勋便垮台了，段复任总理，任萨为海疆巡阅使。时程璧光、林葆懌率第一舰队南下参加护法，刘冠雄以萨与程、林有袍泽之谊，命萨牵制羁留程、林，但此谋未逞。12月萨辞海疆巡阅使职。1918年9月，北洋政府因李厚基在闽粤战争中败北，遂派萨镇冰为福建清乡督办，企图调动海军协助闽浙军抵抗粤军。吴佩孚在 frontline 发表“罢战主和”通电后，10月闽粤议和，萨从中调解，使李厚基与陈炯明达成停战协议。1919年11月，北洋政府内阁改组，靳云鹏任总理，萨镇冰被任为海军总长，

次年5月靳云鹏辞职，萨镇冰暂代国务总理。7月14日爆发直皖战争，皖系失败，8月靳云鹏内阁再度成立，萨仍任海军总长，直至1921年5月内阁改组时去职。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靠近吴佩孚，主张参战助直，第一舰队司令林建章接近皖系，主张暂守中立。杜派员到沪劝说林的部属助吴参战遭拒绝，即怂恿萨镇冰出台。萨以海军前辈的身份，登上“海筹”舰，亲率第二舰队“海容”等舰，北上秦皇岛，炮轰山海关，截断奉军归路。战胜奉军后，5月25日，萨被北京政府授为肃威将军。后又追随吴佩孚，通电拥戴黎元洪复位。当时驻沪海军发生“倒杜（锡珪）拥林（建章）”的运动，林建章在沪宣布驻沪舰队独立，这实际是对直系的“独立”。因此孙中山对林的举动表示欢迎，萨镇冰则站在直系一边表示反对。10月，闽北镇守使王永泉受徐树铮策动，与粤军许崇智等部联合向福州进攻，李厚基连电北京告急。时萨镇冰适在安徽、福建查勘烟禁，直系控制的北洋政府遂电催萨前往应付，许其调遣海军。萨抵福州后，被黎元洪特派为会办福建军务和福建省长。此时孙中山已委林森为福建省长。12月，北洋政府命令孙传芳、周荫人为福建援军正副司令，屯兵于福建边境。时广东方面受陈炯明威胁，军情吃紧，许崇智部离闽回粤讨伐陈炯明，王永泉感到孤立，遂与萨镇冰合作，由林寿昌等人以学生会名义召开各界会议，推举萨镇冰为自治省长，林森被迫辞职。萨与王永泉、刘冠雄致电北洋政府表示拥护之忱。1923年3月，孙传芳、周荫人两部自杉关长驱直下福州，于次年5月驱走王永泉，孙向浙江进兵，周荫人继孙传

芳为福建军务督办，萨仍为省长。福建至此完全成为直系地盘。萨虽为省长，但无实权。

1926年12月2日，北伐军东路军击溃周荫人主力后，迫近福州，省城各界推举萨镇冰为福建保安总司令。3日，林寿昌在福州组织“暴动”，响应北伐军，翌日，萨弃职而去。时周荫人军张毅部在被困瓜山地区时，大肆烧杀抢夺，南港瓜山一带九十三乡人民家破人亡，哀鸿遍野。萨以下台省长的身份，出面募捐，办理赈灾工作，颇著成效。

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萨镇冰被聘为海军部高等顾问，但他这时已年近古稀，并未过问政治上的事，而是留居福州，从事社会救济工作，在社会上赢得较好的声誉。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发动“闽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萨镇冰应邀出席了福州召开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和22日举行的“人民革命政府”就职典礼。他发表演说，支持闽变当局提出的反蒋抗日原则。^③当时，福建分划为四省，萨镇冰被聘为“人民革命政府”的高等顾问和延建省的省长。他拒绝南京政府要他赴沪的劝诱。在萨的影响下，马尾海军各机关由十九路军顺利接收。但不久福建人民政府被蒋介石扼杀，十九路军撤退时，萨镇冰亲自到马尾进行联系，防止海军对十九路军的攻击，^④待十九路军全部渡过乌龙江撤离福州后，他回福州临时维持地方秩序。

此后，萨镇冰蛰居福州，同族弟萨嘉曦续修《雁门萨氏家谱》，与故旧知交赋诗饮酒。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萨前往南洋，宣传抗日。次年2月取道安南回国，历游

蜀、黔、湘、滇、桂、陕、甘各省。抗战胜利后，重回福州定居，刊行诗集《客中吟草》。

福建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曾有人看望萨镇冰，转达蒋介石之意，劝萨前往台湾，萨以病辞。后来，蒋又电朱绍良送萨赴台，萨称病住院。

福州临解放前，萨镇冰做了一些有益于福州解放的事情，与刘通、丁超五、何公敢、陈培崑等社会知名人士联名发出文告表示拥护共产党。

1949年9月，萨镇冰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他对新中国写了许多歌颂的诗章。

1952年4月10日萨镇冰病逝，终年九十四岁，葬于福州西门外梅亭。

注：

- ① 《青宁成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
- ② 《新译美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第47号附件丁。《辛亥革命》（八）第308页。
- ③ 均见闽变时出版的《人民日报》1933年1月下旬。
- ④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九辑第106页。

主要参考资料：

- 《雁门萨氏家谱》。
萨伯森：《萨鼎铭先生年表》。
《辛亥革命回忆录》（六）。

刘农：《武汉革命始末记》。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美〕奚尔恩：《狂风暴发》。《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1年第2期。

《中国近代海军史参考资料》。

冻国穆：《对萨镇冰先生言行的回忆》。

陈文会：《萨镇冰海军上将的简历》。

吕公望

魏 桥

吕公望，原名占鳌，字戴之，浙江永康县人，生于1879年2月28日（清光绪五年二月初八）。父吕春梧，在乡开肉店，兼务农，有屋五所、田一百二十亩。吕公望七岁入塾，二十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为廪生，曾在村里设馆授徒。

八国联军之役，清廷与侵略者签订“辛丑条约”，丧权辱国，激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进一步传播，吕公望也受到影响，思想上开始变化。1905年2月他将廪贡让人，到杭州，入金、衢、严、处四府公学求学，希望寻求新的知识。

1906年，吕公望经人介绍，结识了秋瑾，多次在西湖游艇或雷峰塔北面白云庵的小楼上讨论国事。同年，吕公望参加了光复会。^①

同年12月，徐锡麟途经杭州，寓白云庵，与吕公望会晤，谈得很投机。临别时徐勉励吕说：他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希望大家为革命不惜流血。^②吕很受感动。是年，他改名为公望。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他与秋瑾商定，入浙江省巡抚衙门卫队营当兵，以便结纳志士，擒贼擒王。他向抚署具呈了申请，得到浙江巡抚张曾敫的批准，即入抚署卫队当兵。吕利用同乡关系，在卫队中开展革命活动。

1907年3月，保定军官学校速成科招生，浙江选送五十

名，吕公望被选在列，于5月12日离杭。14日到沪，吕介绍同被选送的青年张鸿翔、童葆暄、叶志龙、林竞雄等至《上海女报》社访秋瑾，填写了参加光复会的志愿书。他们抵保定后得到徐锡麟因诛恩铭为官府所戕和秋瑾被捕就义的消息，並闻革命党人名册已被绍兴知府贵福搜去。童葆暄等人闻讯后惊惶不安，吕公望较有思想准备，做了一些稳定情绪的工作，后来没发生什么事故，始渐安定。吕在保定军校习炮科，期满后分发回浙，由督练公所派到八十二标第二营任见习官。

1909年广西筹办新军，吕公望应招前往，12月初到达桂林，被委为兵备处考功科二等科员。为了鼓吹革命，吕公望与尹昌衡、覃蔭鑫、赵正平等人创办了《指南月刊》，因涉讥讽被查封；改出《南风报》，又被封闭；再改名《南报》，也受检查，被迫停刊。广西巡抚张鸣岐开始时对吕公望等人尚宽容，后来加强了控制，扣押了一些有进步思想的人。吕公望见势不妙，辞职转至香港，在港会见黄兴、胡汉民等人。1910年10月，吕仍回到浙江，在督练公所经理科任财会及统计等项工作。次年升充八十二标第二营督队官。

自从徐锡麟、秋瑾举义失败后，浙江光复会形同解体。朱瑞、顾乃斌、韩肇基、庄之盘、朱健哉、虞糜甫、吕公望等人认为光复会急待重整，招收新会员，团结老会员，遂商定以吕公望在杭州紫阳山脚下太庙巷的住所作为秘密接洽点。吕受朱瑞委托，经常聚集革命党人于寓所，为重整光复会奔走。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吕公望正在北京办事，闻讯后立即赶回杭州，参加了光复会在杭州城隍山四景园召开的

秘密会议，商讨浙江独立的部署，会上与朱瑞、顾乃斌、韩肇基、朱健哉等人研究决定：（一）浙江起义时拥汤寿潜为都督以资号召；（二）促王金发速返绍兴谋独立，并由吕公望赴缙云督促吕逢樵密运革命队伍往富阳独立，诱杭州驻军外援，以分其众，为我方减轻压力，便于发难；（三）定于11月9日为行动日期，吕公望于事前赶回杭州协助一切；（四）派褚辅成赴上海秘运手枪二百枝来杭。会后，吕公望即离杭。11月4日革命党人在杭州提前起事成功^③。5日吕闻讯后当即雇快船回杭。当时南京仍为清军盘据。在7日举行的浙江省临时参议会上，吕公望提议浙江应即出兵进攻南京，奠定江南，以巩固浙江光复后的局势。参议会通过这一提议，责成吕起草动员计划。旋即由朱瑞任浙军攻宁支队长，吕公望为参谋长，与苏、沪各军共同组织联军进攻南京。联军士气高昂，经过乌龙山之战、幕府山之战、马群之战、孝陵卫之战、天保城之战，于12月2日攻克南京。^①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吕公望任浙军第十一协协统。不久清帝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袁任命朱瑞为浙江都督，浙军改称第六师，朱兼师长，后吕公望继朱为师长。1913年，吕公望任嘉湖戒严司令，驻嘉兴；1914年7月任嘉湖镇守使，驻湖州。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浙江巡按使屈映光以反对帝制为名，于1916年4月赶走浙江都督朱瑞。可是屈映光出尔反尔，一时反袁，一时又反对独立，舆论哗然。5月5日，吕公望被公举为浙江督军，同时兼任省长。他公开声讨袁世凯，任周凤岐和童葆暄为师长，将浙军列入护国军。吕主持浙江军政

后，裁撤骈枝机构，整理财政，恢复法院，很想做一番事业。但是，由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插手，内讧时起，难以驾驭，仅半年时间，只得辞职而去。^⑤

1917年1月，吕公望被段祺瑞召至北京，授予将军府怀威将军衔。时段祺瑞与继袁任总统的黎元洪之间，争夺权势，演成了剧烈的“府院之争”。是年5月黎下令免段职，段愤然离京赴津，挑动督军团倒黎，这时，吕公望站在段祺瑞一边。7月1日，张勋复辟，段祺瑞于7月3日组织“讨逆军”在马厂誓师，吕公望亦追随段祺瑞，积极参与了讨伐张勋的活动。然而段祺瑞再度上台后，吕公望并未受重用，只在将军府挂名，仍闲居天津。

1918年护法战争期间，童葆暄站在北军一边率浙军攻粤，进逼潮汕地区。护法军政府岑春煊鉴于吕公望与浙军有老关系，派秘书长章士钊到天津，邀吕赴粤共事。5月，吕公望到达潮州。7月童葆暄部发动一次猛烈进攻，攻占大埔、饶平等县。吕公望得悉童葆暄驻饶平，其左路前敌指挥陈肇英驻飞鹅颈；浙军中不少军官是吕的老部下，于是受命冒险赴前线。他带了几名护兵，手持白纸灯笼，外面写“吕公望”三字，用竹竿高举，闯进对方阵地直至指挥部，说服陈肇英倒戈投南。童葆暄闻讯急忙下令退兵，粤军乘势追击，从8月上旬起，闽西南龙岩、漳平等十余县均入粤军之手。^⑥护法军政府以吕公望有功，于8月29日授予护法军援闽浙军总司令职。

1919年岑春煊把持下的军政府内部发生裂痕。吕公望因与岑春煊关系密切，1920年兼任军政府参谋部长，援闽浙军

接受军政府命令。1921年4、5月间，闽南群众暴动，将援闽浙军参谋长兼独立旅旅长苏伏波击毙于张林乡。同时陈肇英部在潮州被李厚基部包围，全部缴械遣散^⑦。吕见大势已去，经上海到北京，不久又蛰居天津。

吕白在闽失败后，对于政治活动渐觉乏味，试图在经济事业上谋求发展。1922年，吕公望与张绍曾、金兆桂、熊希龄等在天津筹办女子储蓄银行，吕任董事长，但银行开张只一年多即倒闭。1923年又与吴鼎昌、吴天民等集股筹建跑马场，也告失败。北伐战启，吕公望离津南归。当北伐军1927年1月进入浙江后，吕公望又一度担任了江北宣抚使，招抚杂牌军队。但感到自己年近五十，政治上不顺利，决心弃军政而从事商业，不久去职。1928年他在上海集资开设永豫纱厂，“一二八”事变后停闭。1934年到浙江昌化开采锑矿，至日军占领时停办。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后，吕回到老家永康，担任浙江省赈济会委员，创办浙江省赈济会难民染织工厂，担任总经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伪装民主，拉拢一批地方名士来装潢门面。1946年起，吕公望担任了浙江省参议会副议长。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岳曾邀吕公望去台湾，吕拒绝，托病躲入医院。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吕公望先后担任杭州劳军委员会和公债推销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杭州分会副主席、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委员。

1954年7月22日，吕患心脏病在杭州去世。

注:

1. 吕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2. 同上。
3. 邹鲁:《浙江光复》,《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页。
4. 《浙军攻取南京详情》,《辛亥革命》(七)第163—165页。
5. 李净通:《辛亥革命后军阀统治时期的浙江政局》,《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6.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8页。
7. 张性白:《“浙军援闽”与护法政府的“援闽浙军”》;夏达才:《浙江陆军第一师“援闽”回忆》,均见《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其他参考资料:

1. 吕德懿:《先严吕公望生平事迹》,1961年回忆稿,稿藏浙江省政协。
2. 吴鼎元:《吕公望事迹概述》,未刊稿,稿藏浙江省政协。

程 德 全

朱 宗 震

程德全，字纯如，号雪楼，四川云阳人，生于1860年7月22日（清咸丰十年六月初五）。其父程大观为附贡生，靠教书为生。程幼年随父读书，1878年完婚后，因家贫无以自给，出外教书。程本人为廪贡生出身，1890年出川游历，至京入国子监肄业。

当时，东北边防形势紧张，程留心搜集有关东北的资料，并拜晤在京的黑龙江旗人寿山，询问东北情形，两人遂订交。1891年，程一度入璦琿黑龙江副都统文全幕。1894年中日战起，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电召程德全由京到九连参与军幕。翌年，程由依克唐阿奏保，以知县分省补用，旋分发安徽。1898年经黑龙江将军恩泽、副都统寿山奏调，程于1899年底到璦琿入寿山幕。1900年2月初，寿山赴齐齐哈尔署理黑龙江将军，任程为黑龙江省银元局总董兼办将军文案。

1900年7月沙俄军队借口义和团运动排外，准备入侵，程德全由寿山任为行营营务处总理，负责筹划防务，联络前敌各军。8月1日夜，俄军在璦琿一线发动进攻，清军节节抵抗。因军情紧急，程于8月15日从齐齐哈尔出发，赴前敌视察；8月17日行至博尔多（今讷河县），墨尔根（今嫩江县）已失守，清军“颓靡不可整顿”^①。为此，程函致寿山，主

张向俄军“请和”^②，并镇压义和团。旋奉寿山命，与俄军洽谈议和。俄军不允。由于程以死相求，俄军同意不攻省城，不杀无辜，不掠财产。程遂回齐齐哈尔，撤出军队及军火粮饷，准备和平让城。8月28日，俄军进抵齐齐哈尔郊外，疑程设计诱敌，拟即攻城。程急出城与俄军相见，以身挡炮口，恳求俄军停止进攻，俄军遂停止炮击。翌日，俄军大驱入城，将军寿山自尽。俄军欲强立程德全为黑龙江将军，程坚决拒绝，并投江自尽，为俄军救起。不久，程被挟赴赤塔，途经呼伦布雨尔（今海拉尔），因天寒患病，由俄国红十字会治疗后释回，于11月7日返抵齐齐哈尔。1901年2月，程德全被清廷擢升以直隶州知州用，赏戴花翎加三品衔。1902年9月，吉林将军长顺委程任三姓（今依兰县）办理善后交涉兼办筹饷缉捕事务。

程德全于1900年与俄军斡旋的行动，在朝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黑龙江、吉林将军也一再要求清廷破格重编程德全。1903年冬，沙俄拖延在东北撤兵，日俄战争正在酝酿中。1903年12月28日慈禧在京召见程德全，垂询江省事，程奏对称旨，被擢道员，翌日又加副都统衔、署理齐齐哈尔副都统，并专任垦荒事务。按清制，东北实行旗制，用旗人，清廷对程德全的任命，既是越级提拔，又打破了东北歧视汉人的惯例。程于1904年1月22日出京，克服了俄国人的阻挠，于3月26日抵达齐齐哈尔上任。

程德全在京时曾向清政府力陈治理江省政策为：外交上，对领土主权“宜据理力争”；内政上，认为“急须殖民实边”，“招户垦荒”^③。

1905年5月15日，清廷委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将军，程遂全权处理黑龙江军政事务。在程赴任之前，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周冕，就铁路用材和占地问题与东清铁路总公司签订合同，将黑龙江产木之区大半划给俄国人，并让铁路展地达二十万垧。程上任后，即以废约另订为对俄交涉目标，以求“争得一分便算一分”^④。俄人拒绝废约另订，周冕又阻挠程德全派员接收交涉局，因而废约另订的谈判迟迟难于开议。直至日俄战后，程为周冕弥补了欠款，才得以接管交涉局事务，并于1906年9月初派宋小濂与俄人开议，至1907年8月结案，将伐木地段缩减十分之九，铁路展地减去七万余垧。

在内政方面，程德全从改革旗制入手，增设垦务总局、善后局，并增设地方官，让旗署各员专理旗务，为设立行省作准备。当时，黑龙江无兵无饷，“大似以江省为已弃之物”，程不得不“以迂缓之荒政冀为救急之要图”^⑤。他向官僚、士绅、商人卖荒获得四、五百万两的收入，用来编练军队，增设官制，开办学校，并拨款“由官中为之提倡”^⑥，以振兴实业。他先后开办了煤矿，设立了广信公司（银行），创设了瑞丰垦务公司，并购置磨面机和轮船等等。

但是，程德全的放荒政策，使相当多的商业资本转移为呆滞的封建地产，而放出的荒地，开垦的还不到十之二、三。程的新政又把收入消耗殆尽。待放荒接近完成，不再有大宗荒价收入时，程德全面临着财政竭蹶的困难，市面银根紧张。1907年春夏间，“省城数百号铺商咸同涸辙之鱼，立可待毙”，“报关闭者已六十四家”^⑦。为此，他一再向清廷呼吁拨发巨款，但都遭到冷遇。1907年初，清廷将东北改设行省，以徐

世昌为东三省总督，程则于5月7日被任为署理黑龙江巡抚。程从此须事事听命于总督，职权削弱。于是，程德全被迫一再称病奏请开缺。1908年3月初，夹袋中另有人物的徐世昌，以程“腿疾未痊”，建议军机处“赏假数月，回籍就医”^⑧。是月19日，清廷遂将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一职开缺。

1908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去世。1909年初，摄政王载沣将徐世昌内调，命锡良出任东三省总督。于是，程德全复被起用，于5月23日任为署理奉天巡抚，旋实授。但奉抚一职，因与总督同城，遂于翌年4月28日裁撤，程被调任江苏巡抚。

程德全抚苏，以革新自命，与立宪派人士如张謇等过从甚密。他一再支持立宪派的主张，与其他督抚一起，要求设立责任内阁，从速召开国会。但实际上这是他对清廷的统治已经丧失信心的表现。

武昌起义爆发后，程德全镇静如常。时张謇适由鄂返宁，程于是约张赴苏州。张于10月16日抵苏以后，即连夜为程代草挽救时局的奏疏。程经征求各省意见后，于10月22日入奏。这一奏折，要求清廷“解免亲贵内阁，钦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负责任……并请下诏罪己，……然后定期告席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⑨清廷留中不发。11月4日，上海独立。苏属士绅纷纷劝程谋自保，得到程的同意，并与革命党人进行了联系。是夜，上海民军五十人到苏州与驻枫桥新军汇合，翌日拂晓整队入城，宣布苏州独立，推程德全为苏军都督。

程德全以前清大吏宣布反正，开始是受到革命党人怀疑

的。他不得不请张謇前来镇抚。同时，他致电各省都督，“拟联东南各军政府公电恳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⑩。11月20日，张謇再到苏州，时苏浙联军正会攻南京，程遂请张驻苏坐镇，自己于11月23日亲至高资视师，发布誓师词，27日又随军进驻尧化门。程一向多病，扶病视师，赢得了革命党人的好感。12月1日，南京光复在即，程遂由前线回沪，会商军政。翌日，南京克复。上海方面的革命党人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12月6日，程至南京组织都督府，旋因各军纷争，组府未成而返沪。15日程偕汤寿潜、陈其美至宁，调和诸军，组织政府。18日，程复因南京秩序紊乱，愤愤离宁赴沪，称病不出。1912年1月1日，江苏省议会推庄蕴宽代理都督。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于1月3日任命程德全为内务总长，程遂卸苏督职，但仍任在上海租界卧病。不过，程并未停止政治活动，他正与章太炎一起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于1月3日宣布成立，旋改统一党。至5月间，统一党又与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后程因与章太炎政见不合，遂宣布脱离共和党。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经苏属士绅推举，袁世凯于1912年4月13日令程德全复任江苏都督。程于4月下旬至苏扶病视事，通电表示“首宜以恢复秩序为唯一之方针”^⑪。程视事三日后，因病告假疗养。5月间，南京留守黄兴受总统袁世凯和财政总长熊希龄的箝制，军饷无着，被迫提出辞职。袁电程商议接收留守府办法。时苏州军界自阊门兵变后风潮未靖，程德全被迫回苏坐镇，难以兼顾。但他恐黄兴过早离职，引起变故，遂密电袁世凯，请对黄表示抚慰赞助，这样，“一面

可以促事实之进行（指解散留守府），一面可以释军心之猜虑”^⑫。袁复电表示赞同。当时，同盟会的一些人，曾要求袁世凯任命黄兴为江苏都督；而沪军都督陈其美更支持柳承烈等在苏州组织“洗程会”，准备武装暴动推倒程德全，拥陈其美为江苏都督。当时北京方面接到了陈其美暗中增兵的情报，电程严加防范。5月31日夜，在洗程会预定发动的前夕，程抢先出动军队弹压，并于翌日将洗程会骨干蒯佐同、蒯际同等捕获，并将蒯氏兄弟枪杀。事后，他将各项证据焚毁，不事声张。随后，程又将洗程会控制的先锋营全部遣散。在苏州平静之后，程德全就于6月14日前往南京接收黄兴的南京留守府，江苏都督府也移驻南京。是年7月底，陈其美被迫撤销沪督一职，由程接收。

程德全在民初的政治激流中，一再表示拥护中央，袁世凯也在政治上、财政上予程以照顾，利用程在江苏士绅中的威信以维持对江苏的控制。但是江苏是革命党人力量较强的地区，程乃依违于袁世凯和革命党人之间，充当一个调和派的角色。1912年6月15日，内阁总理唐绍仪为袁世凯所迫，弃职离京，社会上谣言蜂起。为此，程发布通电，力主调和，以“精诚相孚，腹心相示，泯南北之畛域，捐新旧之猜嫌”相号召。^⑬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程奉袁世凯的命令，亦应黄兴等人的请求，于3月25日赴上海处理宋案，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进行了会议。由于革命党人的要求和压力，程于4月间曾一再向袁世凯请求组织特别法庭以审理宋案，但未获允准。程德全与江苏民政长应德闳遂于4月25日夜12点公布了由革命党人参与整理的宋案证据，使宋案内幕

大白。袁世凯政府的善后大借款成立后，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之间已面临着决裂的局面。为此，程又一次呼吁调和，他拍着胸脯说：“政府固无谋叛之心，民党亦无造反之意，二者若有其一，德全愿受斧钺。”¹⁴⁹但是，他一再强调的“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在起着抑止革命的作用。

1913年7月12日湖口起义，二次革命爆发。14日晚黄兴抵达南京，15日晨驻南京第八师包围都督府，黄兴偕驻南京高级将领谒见程德全，迫程宣布江苏独立。16日夜，程托病离宁赴沪。程至沪即发布模棱两可的通人说：“本月15日，驻宁第八师等各军官，要求宣布独立，德全苦支两日，旧病剧发，刻难支持，本日来沪调治。”¹⁵⁰推卸了对独立的责任。袁获电后，命令程德全、应德闳就近设立机关，“迅图恢复”¹⁵¹。旋二次革命战事失利，程德全看到大局已定，遂于苏州设立行署，并于7月25日通电宣布，南京独立的“一切文电，假用德全名义号召，亦非口舌所能抗争。因于16夜冒死离宁赴沪，召集苏属水陆军警，议图恢复。”¹⁵²翌日又致电黄兴，要求黄“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¹⁵³。7月27日，程电令南京卫队营营长张鹏翥捉拿黄兴，张向黄作了报告，黄兴遂于28日夜只身离宁出走，南京即宣布取消独立。此后，南京及苏属各界吁请程德全莅宁收拾残局，但他仅派杜淮川任江苏第一师师长，赴宁料理，本人则迟迟其行，并向袁世凯请求辞职。旋何海鸣在南京发动二次、三次独立，据城与袁军死战，至9月1日失守。9月3日，袁世凯遂准许程德全辞职，任命首先攻进南京的张勋为江苏都督。

自此，程德全退出了政界，寓居上海、苏州，闭门诵佛。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拟聘程德全为政治顾问，程以老病辞谢，不愿再入政治漩涡。他晚年在工商业方面的投资几乎完全失败，但仍拥有大量的地产。1926年，程德全受戒于常州天宁寺，法名寂照。1930年5月29日病逝于上海。

注：

- ① 《驻博尔多营次上眉帅书》。《程中丞庚子函牍钞略》第5页。
- ② 同上，第4页。
- ③ 《纪入觐及之齐齐哈尔署任概略》。《赐福履笔记》第18页。
- ④ 《致徐菊人督部论创办新政之困难》。《赐福履启事》卷3第63页。
- ⑤ 《复李尧琴太史论筹边事宜》。同上，卷1第22页。
- ⑥ 《提用荒价遵行新政折》。《程中丞奏稿》卷8第13页。
- ⑦ 《致徐菊人督部筹维补救市面之法》。《赐福履启事》卷4第1页。
- ⑧ 《徐世昌致军机处电》。《程中丞奏稿》附录3第20页。
- ⑨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47页。
- ⑩ 《革命文献》第1辑第4页。
- ⑪ 《致大总统及地方议会宣告就任书》。《程雪楼先生书牍》卷上第1页。
- ⑫ 《程德全密电稿》（未刊）1912年5月22日电。
- ⑬ 《民立报》1912年6月27日。
- ⑭ 《民立报》1913年5月20日。
- ⑮ 《时报》1913年7月18日。
- ⑯ 《政府公报》1913年7月22日。
- ⑰ 《时报》1913年7月26日。
- ⑱ 《南北恶感新文牍》卷3。

阎锡山

刘存善

阎锡山字伯川，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阎六岁丧母，寄居舅父家，由外祖母抚养成人。九岁入私塾，十六岁随父阎书堂（子明）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经手高利贷业务和参与金融投机。1900年阎书堂投机失败，钱铺倒闭，阎锡山随父躲债流落太原，曾在裕盛店（客栈）当店员。

1902年阎锡山考入山西武备学堂^①，1904年被清政府选送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入陆军上官学校。学习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05年10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来又加入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1909年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习，后升监督。同年10月到北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学生会试，考列上等（分优上中三等）^②，清廷赏给阎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办军校^③，回省升任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员。1910年升任标统^④。阎在任职期间，秘密参加同盟会的反清活动。

辛亥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山西支部积极策划响应。驻防于太原城外的新军八十五标二营中的同盟会员杨彭龄等于10月29日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总司令，率起义军攻

城。当时八十六标驻防于城内，阎闻起义军由新南门攻入城内并占领巡抚衙门、击毙巡抚陆钟琦后，始率部参加，当日午被举为都督。11月4日，清政府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⑤，令其带兵入晋镇压革命。吴早已秘密参加革命，到石家庄后，邀阎在娘子关会晤，商定组织“燕晋革命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共图直捣北京，颠覆清室。惟吴旋被袁世凯收买其部属暗杀，“燕晋革命联军”遂告失败^⑥。11月15日，清政府改派张锡銓为山西巡抚^⑦，统率第三镇曹錕部进犯山西。12月12日，清军攻占娘子关，阎锡山率部北走，副都督温寿泉与杨彭龄、景定成等则率部南下^⑧。南北议和时，袁世凯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继续进攻太原，12月20日太原为清军占领^⑨。在民军代表伍廷芳的交涉下，袁世凯于1912年3月15日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⑩，阎才得重返太原。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阎锡山被任为参议。但此时，阎见袁世凯势大，渐疏远孙中山而对袁表示恭顺，一面贿买袁的左右，一面送其父长住北京意在作为“人质”，以消除袁对他的疑虑^⑪。1913年10月，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阎锡山积极执行袁的命令，在三日内将山西全省的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阎本人亦声明脱离国民党^⑫。1914年6月，袁世凯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任阎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⑬。

阎锡山投靠袁世凯后，残酷镇压革命党人。曾参加辛亥革命的李鸣鹤、景蔚文、张汉卿、孙占标、宋士杰等被杀害，贺炳煌、邢斌丞等被捕入狱，续桐溪、弓富魁、李鸣凤、景

定成等被迫长期旅居省外，受害者不可胜计^⑨。阎锡山在全省军政机关中，进一步委派同乡和亲信担任要职，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1915年4月以后，阎为迎合袁世凯称帝心理，向袁密奏“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袁世凯批复“颇有见地”^⑩。阎接着给筹安会两万元经费，并连续电袁登极称帝^⑪。同年袁世凯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为一等侯^⑫。蔡锷等组织护国军反袁时，阎锡山致电国务院，指责他们为“破坏大局，不顾国家”。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阎锡山投靠北洋军阀段祺瑞，在国内政潮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都唯段之马首是瞻，深得段的欢心。1916年7月，各省将军改称督军，阎改称山西督军，次年9月兼任山西省长^⑬。

1917年9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阎锡山秉承段祺瑞的意旨，派旅长商震率部赴湖南参战，反对护法战争，结果全军覆没。阎接受湖南丧师的教训，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标榜“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把力量集中于省内经营^⑭。他提倡以军国主义为内容的“用民政治”，建立行政网，编定村制，一村之中有村长，二十五户为间有间长，五户为邻有邻长，使他们代行警察职务，严密统治，要把每个人的财产、事业和举动看得住、拿得起，以加强行政管理；颁行《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推行六政三事〔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三事：种棉、

造林、畜牧]。阎的退守政策，加上山西的地理位置，使山西摆脱南北之争，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现象，男子蓄辮和女子缠足也确有减少，禁烟亦有成效。阎对外大力宣传，“名流”、政客也为之吹嘘，北洋政府遂授予山西“模范省”的称号²⁰。

“五四”运动后，阎锡山于1920年召开“进山会议”²¹，研究对付人民革命的策略，他声称共产主义是“人人为圣人始可办到”的制度，另提出土地公有私种、资由公给、限制工商业、实行“村本政治”等主张。他强调以村为政治本位，选举地主豪绅分任村长村副外，还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²²。他建成可以制造枪炮弹药的小型军火工业，并将晋军扩编为四个混成旅。

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阎锡山进行政治投机，先是联冯（玉祥）拥段，继而附奉（张作霖）对直（吴佩孚），又同奉、直讨冯。在战争中他据绥远为已有，并把军队扩充为十二个旅，野心一步步滋长。²³

北伐战争开始前，国民党极力争取阎锡山，双方关系开始改善。1927年6月6日，阎自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开始悬挂青天白日旗，通电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追认这一职务，并推他为政治会议委员。在此期间，他将军队扩编为八个军十七个师，又收编了国民军第三军，实力进一步增长。随后，阎锡山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阎锡山积极支持蒋介石的“清党”运动，与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密切配合，杀害共产党员王瀛，还成立自新院（后改反省院）迫害革命人士²⁴。

1928年2月，阎锡山就任蒋介石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张作霖奉军的作战。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任命他为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和北平分会代理主席，还兼任了平津卫戍总司令，把势力扩展到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市。同年10月，国民党政府任命阎锡山为行政院内政部长。1929年7月，又任命阎锡山为西北边防长官，阎当时因与蒋的矛盾日益加深，辞而不就。

国民党军队驱逐奉军出关后，蒋介石借“编遣”为名，削弱异己部队，激起其他派系军阀的不满。阎锡山受到威胁，便与冯玉祥联合以出洋要挟蒋介石。1929年唐生智谋联阎倒蒋，阎耍两面手法，同意联合倒蒋，当唐发表倒蒋通电后，阎又出尔反尔与张学良等通电拥蒋反唐。1930年元旦，阎锡山亲赴郑州，自任讨唐总司令，准备对唐作战。蒋介石表面上欢迎阎锡山参战，委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内心则怕阎乘机扩张实力和地盘，遂指使何成濬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密谋在郑州活捉阎锡山。此计被驻在电话局的阎军代表侦悉，阎遂化装逃回太原。

此时，阎锡山更感蒋咄咄逼人，一面应付编遣，一面扩充其军队为十个军（三十个师）、四个保安纵队（十二个旅）、四个骑兵师、七个炮兵旅，并以讨论“国是”为名，反对蒋介石的所谓戡乱，提出蒋阎冯同时出洋的主张。一时，国民党反蒋各派与各地军阀的代表麇集太原，密谋倒蒋策略。1930

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成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任副司令于潼关和桂平。他们联名发表倒蒋通电。南京“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拿办^⑤。7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永远开除阎的党籍。以阎锡山为首的中原倒蒋战争遂全面展开。

在战争进行期间，国民党反蒋各派于8月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表宣言，指斥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实行独裁，号召全党为去此败类而斗争。在宣言上签名的有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陈公博、商震等。8月8日，扩大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推定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1930年9月9日，阎锡山宣誓就职。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出兵山海关，阎军、冯军自山东、河南败退，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此役死伤军民近三十万人，战区及附近民众深受祸患。阎锡山失败下野，随后逃居大连，托庇于日本帝国主义^⑥。由于山西的军政要人都是他的亲信，所以阎在大连仍然遥控山西军政大权。

1931年8月5日，阎锡山在口人协助下，乘飞机潜回大同，隐居家乡河边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太原学生于12月18日举行要求抗日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蒋系分子枪杀请愿学生穆光政，受到舆论谴责。阎锡山深恨国民党对他的攻讦，便在河边村密令太原清乡督办杨爱源派兵将省党部负责人员逮捕，表示“支持”学生运动，但不久又以易

地审判为名，将省党部的负责人员解往郑州释放，以讨好蒋介石，不过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则被他勒令解散²³。

1932年3月阎在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的支持下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公开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不久又恢复了“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时他铩羽新起，又回到“保境自守”的老路上来，想集中力量搞本省的经济建设，发展自己的实力。他制订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成立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将各项工矿企业统归西北实业公司经营管理。到1937年，西北实业公司已形成一个由采矿、冶金、采煤、发电、化工、机器制造、军火、造纸、印刷、皮革、火柴、毛织、水泥等部门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修建了同蒲铁路（窄轨），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成立了山西实物准备库和山西营业公社。这些官僚资本企业的资产，共约二亿二千万元²⁴。他为了发展官僚资本，拒绝为私营工业提供贷款；为了发展本地工业，又成立土货商场，抵制外地货。后来又成立“经济统制处”，企图垄断全省经济。他还借口为同蒲铁路筹集资金，玩弄禁烟的花招，成立“禁烟考核处”，以鸦片制做戒烟药饼，公开发售，六年获利达二千万，给山西人民带来深重灾难²⁵。

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自“九一八”事变后蓬勃兴起，阎锡山认为不把群众组织起来是给共产党留下了“空子”，便指使亲信组织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人民监政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御用社会团体。为了反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他从马列主义学说中窃取某些词句，

杜撰成所谓的“物劳主张”，出版了《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一书。他把中庸之道和自己的投机经验结合起来，拼凑了投机骑墙的“中的哲学”，发表了“共产主义的错误”等歪曲和攻击共产主义的谬论。他于1935年冬重新打出了他早就用烂了的“主张公道”的破旗，成立了“主张公道团”，自任总团长；在各县成立“防共保卫团”，强迫人民唱《防共歌》。此外还有什么“思想防共”、“政治防共”、“军事防共”、“民众防共”等，反共喧嚣，鼓噪一时。1936年又提出“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⑧。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进窥绥东，阎锡山为了维护他的政治地位和官僚资产，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这是他后来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基础^⑨。

1935年冬，中共中央声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阎锡山拒绝红军通过山西开赴抗日前线的要求。1936年2月20日，红军渡河东征，阎军惨败，蒋介石乘机派援军五个师开进山西。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而蒋军却赖着不走。

“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阎迫于形势并企图破坏抗日救亡运动，遂于1936年6月把他的御用社会团体合并成为“自强救国同志会”，自任会长。当时在阎锡山面前有三种力量：日本侵略者要占领山西，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共产党要求枪口对外，一致抗日；蒋介石要吃掉阎锡山。狡诈的阎锡山采取了抗日和日、联共反共、拥蒋拒蒋的两面策略，企图周旋于三种力量之间。这时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阎锡山合作抗战，除派张友渔、温健功、邢西萍（即

徐冰)等以北平左派教授身份到太原作阎的工作外,又派彭雪枫到太原与阎锡山共商抗日救亡大计。阎锡山初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三种力量之间采取了“拥蒋联共抗日”的路线³²。

1936年9月18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阎任会长。共产党员薄一波等回晋后掌握了该会的领导权,“牺盟会”即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群众组织。它动员人民抗日并创办了山西军政训练班、山西民众干部训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训练机构,培训干部,为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山西一时成为抗日前哨,各地进步青年纷纷涌向山西。³³

1937年“七七”事变后,阎锡山于8月2日飞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1944年1月兼山西省政府主席)。阎回晋后,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当天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太原成立。9月23日,八路军划归第二战区战斗序列,挺进晋北作战。同时,在阎锡山的同意下,“牺盟会”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四个纵队、一个工卫旅、三个政卫旅,和续范亭领导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建的暂一师,统称新军,兵力后来共约四十个团。阎锡山为这些部队配备了武器装备。

日军占领北平后,继续西进。阎锡山拟组织大同会战。1937年9月中旬,日军避开大同由广灵侵入山西境内。阎锡

山驻代县太和岭口指挥作战。同时，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挺进平型关附近，于9月26日伏击日军告捷，歼敌一千多人。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信心。^②

平型关战斗后，为阻止日军南下，阎锡山组织忻口会战，激战二十余日，予敌以重大杀伤，迟滞了敌军自攻陷平津后“长驱直入”的攻势。抗日部队作战损失亦重，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骥、旅长姜玉贞、郑廷珍英勇牺牲^③。后因敌军从娘子关攻入山西，阎锡山遂放弃忻口，令傅作义等部守卫太原。傅部在太原城东北角与敌激战两天后撤退，日军于11月8日占领太原。

阎锡山从太原退守临汾后，抗日信心开始动摇，发出了“不能抬上棺材抗战”的谬论，对于德国大使陶德曼提出的等于投降的和平条件，他认为“可以接受，打下去会亡国灭种”^④。这些言论遭到抗日军民的驳斥。当时，阎锡山的旧军溃不成军，地方官吏纷纷弃职，原有组织名存实亡。阎锡山于是于1938年2月16日在襄陵县温泉村成立了新的御用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⑤。

1939年1月当他得悉“东方慕尼黑”正在加紧策划，又听说日军将发还他的官僚资本的百分之四十九时，便说：“天快下雨了，我们要赶快准备雨伞。”积极为妥协投降制造舆论^⑥。

阎锡山既对抗日丧失信心，又对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心怀疑惧，遂在日军政治诱降之下，决心采取“降日、反共、拥蒋”的路线。1939年春，经阎锡山同意，国民党山西省党部

在陕西省宜川县恢复活动。3月25日至4月22日又在宜川召开了山西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企图瓦解新军和牺盟会等进步组织。接着，就解散了续范亭领导的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11月15日，王靖国等人在军队中建立了封建法西斯的“铁军”组织。不久，梁化之等人在政权机关中组织了性质相同的“文人”组织。阎锡山企图通过这些组织，强令他的部属跟随他反共降日^②。

1939年12月初，阎锡山破坏统一战线，配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命令决死队二纵队向同蒲路日军发起进攻，同时密令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和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勾结日军夹击二纵队。二纵队负责人韩钧识破阴谋，拒绝乱命。阎遂宣布决死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挑起了山西旧军与新军的冲突。决死二纵队奋起自卫还击，胜利转入晋西北，与决死四纵队、工卫旅、八路军会合。在晋东南的决死一纵队闻警应变，未受损失；只有决死三纵队受到一些损失。这个“十二月事变”是阎锡山改变“拥蒋、联共、抗日”路线为“降日、反共、拥蒋”路线的转折点。

1940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萧劲光和王若飞同阎锡山谈判，迫使他答应不再进攻新军，并确定在同蒲路以西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晋西南为旧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新军和八路军活动区域^③。从此，阎锡山在山西只控制着晋西南的十几个县。5月9日，周恩来又写信给阎锡山，说山西发生的新旧军之争是“亲痛仇快”的事，“必有奸人播弄其间”，劝他悬崖勒马，抗战到底^④。阎锡山此后再没敢轻举妄动。

1940年夏，阎在吉县克难坡与日军特务大矢晤商，确定双方进入停战状态，共同消灭八路军和决死队，并交换物资。11月，阎令其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根据“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达成日军为阎装备三十个团的协议。1941年3月，又达成消灭敌对行动，共同防共，离（石）军（渡）公路以北由日军负责，以南和汾阳、孝义以西由阎负责的协议。根据协议，日军于6月将孝义县城“让渡”给阎军接管^①。

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吉县克难坡举办“干部暑期进步讨论会”，后改称“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②的反动谬论，进一步为其反共降日作舆论准备。

1941年8月11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在汾阳城内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签订了《汾阳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日阎取消敌对行动，共同防共；阎通电脱离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装备等。10月，进一步达成履行《汾阳协定》的细则。阎锡山分别在日军占领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成立了办事处，进行交换情报和物资等活动。

对阎锡山的降日活动，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提出警告。1941年11月30日，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会见阎锡山，为他分析国际形势，批评了他关于日军将北进袭击苏联的错误估计，并指出谁投降就打倒谁^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阎锡山所谓的“日美妥协、牺牲中国、日军北进攻苏”的幻想彻底破产，投降活动暂时搁置。但是日军却急于要求阎

锡山履行《汾阳协定》，1942年5月6日阎锡山与日“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参谋长花谷正等人在吉县安平村直接谈判。日军头子要阎通电脱离国民政府早日投降。阎锡山鉴于国际形势已变，不敢答应。会后，日军为了逼阎就范，将会议照片空投西安一带，并向阎军进攻，在晋南消灭王乾元一个军。不久，阎又与日军达成密约，以战地投降方式派遣师长赵瑞、杨诚进入太原。日军将所俘官兵编为“山西剿共军”，赵、杨分任师长；阎委赵、杨为第二战区参议，命令他们与日军共同防共，发展实力，作为内应。同时，在晋西各县加紧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1943年，阎锡山为了解决兵员和吃饭问题，在其统治区域推行“兵农合一”暴政。他将十八岁至四十八岁的男子每三人编为一组，一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二人各领一份“份地”耕种。农民除缴公粮和优待常备兵家属外，所余无几，生活苦不堪言，而阎锡山却用此法抽走农民七万多人给他当了兵^⑤。

阎锡山还利用封建帮会，欺骗部属为他卖命。1941年，他在克难坡成立了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立起“明德堂”的帮号，自封为嘉白帮大字辈老前人，道号阎大成。1942年又成立了洪帮组织“进步总社”，立起“民众山”、“进步堂”、“山川水”、“幸福香”等名目，自封为民众山的山主，化名齐济川。

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阎锡山仍利用与日伪勾结的关系，暗中派遣人员担任伪山西省公署职员和县长等职，以便日后

相机夺取胜利果实。1945年他又对日伪县区行政官员按现职发给委任状，保证将来不以汉奸论处。

1945年8月9日，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无条件投降，于次日在取得日军同意后，派军向太原前进。8月17日，阎锡山的代表赵承绶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商定：日军在原地堵击八路军，听候阎锡山受降；八路军如攻取太原，由日阎双方共同阻击。当日，阎军楚溪春部进驻太原。8月30日，阎锡山在日军保护下回到太原，窃取了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他委任汉奸苏体仁、梁上椿为高级顾问，冯司直、王骥为高级参事，改编伪军四万人为省防军，留用日俘三千余人，准备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同年8月17日，阎锡山派其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向上党解放区进犯，结果三万余人被歼，援军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被击毙，史泽波等被生俘。

1946年上半年，在蒋介石被迫停战期间，阎锡山却积极备战，在太原、大同、临汾及晋中铁路沿线修筑钢筋水泥碉堡七千余个，企图顽抗。7月，蒋介石重开内战，阎倾全力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击下，山西大部地区均告解放，阎锡山只能控制铁路两侧的少数县市。

在此前后，阎锡山继续推行“兵农合一”暴政，大肆抢粮抓兵，又在城市进行编组抽兵，仅1946上半年，即在城乡抓兵两万多人，后又抓走五万多人。同时加强特务统治，于1946年4月成立特种警宪指挥处，在太原和晋中各县组成严密的特务网，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千余人。在军队

中则由“政卫组”派遣特务，深入连队“肃伪”。1947年至1948年夏，阎锡山更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传训”（自清、自卫、自治），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个人中要除掉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把十个人中原有的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推行结果，杀人极多，仅据阎的山西省政府1947年11、12两月的统计，在太原市郊和晋中各县即残杀群众三千余人。女英雄刘胡兰（文水县）、尹灵芝（寿阳县）就是在此期间被阎军用铡刀铡死的。在经济上推行的掠夺民财的“平民经济”，则弄得私商倒闭，民不聊生。

1948年5月至7月，临汾和晋中相继解放，阎锡山只剩下太原和大同两座孤城。他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在太原成立了“山西总体战行动委员会”，组织了“民卫军”，驱赶市民为他卖命，同时却将山西各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和山西省银行的库存金银运往上海转运台湾，营造新窟^④。

人民解放军为了减少战争的伤亡和破坏，曾多次倡议进行和平谈判，都被阎锡山拒绝。1948年11月，阎还将密谋起义的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和解放军某部参谋处长晋夫押送南京交蒋介石枪杀^⑤。

一向以狡猾欺诈著称的阎锡山看到大势已去，一面叫嚷要与太原共存亡，一面暗中运动他在南京政府中的亲信贾景德、徐永昌等人，建议代总统李宗仁邀阎赴京商讨“国是”。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接到来电，急乘飞机逃往南京。

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阎锡山在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反动统治彻底覆

灭。

阎锡山逃离太原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南京解放前夕，他又逃往广州。1949年6月3日，就任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曾提出一个反动透顶的“扭转时局方案”，制订了“全面作战计划”，与一些反动头子联名发表“反共救国宣言”。在人民解放军的进击下，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10月14日，广州解放。阎锡山窜逃重庆、成都等地，12月18日逃往台湾^⑧。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阎锡山被免去行政院长，改充“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埋头于《大同之路》等反动著作的写作。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死于台北^⑩。

注：

- ① 荣鸿胪、李志舆：《太原解放前山西历届军事学校概况》。《山西文史资料》第五辑。
- ② 《晋阳公报》1909年11月8日。
- ③ 《并州官报》1909年12月3日，第109号。
- ④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10月初版，第14页。
- ⑤ 《清史稿》第25卷。
- ⑥ 《东方杂志》第8卷10号中国大事记。
- ⑦ 同⑤。
- ⑧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 ⑨ 同⑥。
- ⑩ 《东方杂志》第8卷11号中国大事记。
- ⑪ 同⑧第45页。

- 12 《阎锡山之今昔》 1930年4月出版。
- 13 刘寿林：《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 中华书局1966年3月第1版，第302页。
- 14 同⑧第49页。
- 15 同⑧。
- 16 《君宪纪要》。
- 17 同⑧。
- 18 同⑧第304页。
- 19 重庆《商务日报》1920年8月25日。
- 20 同⑧第68—72页。
- 21 1920年阎锡山为对付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而召开的一次会议。由于会址在太原军署内进山隧密深沉之馆召集的，阎名之曰“进山会议”。
- 22 同⑧第77—87页。
- 23 同⑧第102—119页。
- 24 同⑧第120—125页。
- 25 《国民政府公报》第437号。
- 26 同⑧第141—158页。
- 27 同⑧第166—170页。
- 28 南汉宸：《日前政治形势》。山西兴县《新西北报》第145号，1940年5月1日。
- 29 同⑧第191—193页。
- 30 《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错误》、《防共歌》和阎锡山关于土地村公有的文章，均见《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
- 31 同⑧；下文日军提出发还官僚资产的百分之四十九进行诱降，同此。
- 32 穆欣：《统一战线胜利的一曲凯歌》《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第1页。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廖其康：《随卫副主席到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第14辑。
- 33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
- 34 《大公报》1937年10月17日新闻报道。《中共大事年表》第53页。
- 35 《大公报》1937年11月16日新闻报道。
- 36 《薄一波同志揭露阎锡山丑恶内幕》，载《寄阎锡山书》。
- 37 杨怀丰：《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同志会纪述》《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
- 38 同⑧。
- 39 李维岳：《阎锡山的铁军组织——山止铁血团》《山西文史资料》第6辑。
- 40 同⑧。
- 41 《周恩来同志写给阎锡山的一封信》《山西文史资料》第14辑。

- 42 赵瑞：《阎锡山勾结日寇的罪恶活动》《山西文史资料》第4辑。（关于日伪勾结的材料均引自此文，以下不再加注）
- 43 阎锡山：《对暑期进步讨论会二期组训干部同志毕业训话》（民国三十年八月七日）。《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论集》第4辑，第313页。
- 44 同④第313页。
- 45 同④第377页。
- 46 同④第420-423页。
- 47 贾宜宗：《戴炳南破坏黄樵松起义的罪行》《山西文史资料》第6辑。
- 48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文史馆编辑组：《一九四九年四川大事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
- 49 《山西日报》1960年6月2日。

方 声 涛

陈 孝 华

方声涛，字韵松，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1885年8月15日（清光绪十一年七月初六）生。其父方家澍，经营运输货栈，在汉口设转运公司，时常往来京广各地，思想比较开明，陆续把子女送往日本留学^①。方声涛自幼读书习武，少年时曾习海军于天津，1902年东渡日本入振武学校。1903年，留日学生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掀起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方声涛热心参加，并负责教练军事。

1904年方声涛回国与郑孟勤结婚。其间曾受聘到侯官高等小学堂任教，对学生以革命相淬砺。之后，方声涛偕郑孟勤再东渡日本。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创立同盟会，方声涛与妻郑孟勤、弟方声洞、姐方君瑛、兄嫂曾醒均次第加入。12月，方声涛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骑兵科学习，与李烈钧、唐继尧等过从甚密。

1907年5月，方声涛毕业于士官学校，回国后先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任教习，因暗中发展同盟会员，引起当局怀疑，被迫离去。1909年到昆明，任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教习，次年改任广西兵备处帮办，并兼学兵营管带，罗致青年，灌输革命思想。

1911年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准备在广州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时方声涛正在广西训练新军，密谋约期响应，未果。广州起义失败后，方声涛几为广西巡抚沈秉堃所陷，后经按察使王芝祥庇护，受免职处分^②，离开广西。随后到四川成都，任新军第十七镇正参谋。武昌起义爆发后，方声涛参与了成都独立活动。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方声涛应黄兴电邀，前往赞襄军政，于途中发病，遂去上海养病^③。

同年，李烈钧任江西都督，方声涛被任命为江西混成旅旅长，驻九江。次年3月，袁世凯密谋杀害了宋教仁，6月又下令免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三都督职，方声涛亦因之离赣抵沪。7月初，方声涛随李烈钧到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李烈钧就任总司令，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率部与北洋军苦战于湖口。终因众寡悬殊，援助断绝，25日湖口被袁军攻陷。方声涛率部退守吴城，又遭袭击，被迫向广信方面退却，转到仙霞关，图入闽整军再战，为福建都督孙道仁所拒，部队瓦解，方声涛脱险到上海。“二次革命”失败后被通缉，遂流亡日本。方声涛在东京与一些原同盟会员策划反袁活动^④。

1915年，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方声涛是最早到云南密谋举事反袁的^⑤。他自日本经上海、香港、越南，于9月间到达昆明，利用与唐继尧等云南军人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进行策动工作，秘密会商讨袁。11月初返回上海，与海外归来的反袁人士联络。12月中旬，方又潜抵昆明。在此先后，李烈钧、蔡锷等也抵昆明，于12月25日通电宣告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向四川、两广、贵州三路出兵讨袁，方声涛

任第二军第二梯团团长。1916年2月，方声涛率第二梯团从昆明出发，3月初抵广南。这时袁世凯派龙觐光率兵经广西进入滇境，方声涛率部于广南附近抗击。由于陆荣廷于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并潜师围攻百色一带龙觐光军，歼灭了滇桂边的龙部，方声涛梯团即顺利进入广西。方率部经西林、凌云直下百色，接着乘船到南宁，5月抵广东肇庆；然后经三水沿粤汉路北上，向芦苞、清远、琶江口推进，与龙济光部相持于花城、从化一带达两个多月。后云南护国第二军改编为驻粤滇军，方声涛任第四师师长，辖朱培德第七旅、伍毓瑞第八旅，驻扎广州市区。由于广东为桂系陆荣廷所统治，方声涛的滇军第四师备受排斥。

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闹复辟，方声涛与李烈钧等通电宣布愿率军往讨。旋段祺瑞重新上台，孙中山南下护法，方声涛所率的驻粤滇军成为护法的一支力量。7月17日，孙中山到达广州，方声涛派军队在码头布置警卫，迎接孙中山。9月，护法军政府成立，方声涛任元帅府卫戍司令。

同年11月，南方护法政府组织征闽陆海联军，李烈钧任靖国军征闽总指挥，以方声涛代理。1918年5月，陈炯明的援闽粤军向福建北洋军发起进攻后，方声涛从广州到汕头，率靖国军向福建诏安方面出动。方声涛还利用张贞在福建的社会关系，联络许卓然、秦望山等，收编闽南一带民军，组织福建靖国军，活动于泉属各地。是时陈炯明的援闽粤军驻在漳州等地，同福建靖国军在收编民军问题上冲突甚烈；又由于靖国军内部斗争，杜起云部叛变，1919年底，方声涛只得离开仙游去上海^⑥。翌年8月，福建靖国军在陈炯明和李

厚基夹击下失败，李厚基重新统治福建全境。在这以后，方声涛、黄展云与张贞等十余人在上海组织福建自治会，鼓吹福建“地方自治”，号召驱逐李厚基，并派人潜回福建，组织自治军⁷。1924年春，方声涛回福建联络各地民军，在大田成立闽军总司令部，就任总司令。9月，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设大本营筹划北伐，方声涛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入湘、赣，方声涛到上海，与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商定响应北伐。后何应钦的东路军进占福建，方声涛于12月15日抵福州。翌年1月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成立，先是何应钦任代主席，何率东路军向浙江进发后，由方声涛代主席。方声涛主持下的临时政治会议，经常袒护国民党右派。4月3日，福州一伙右派举行“拥蒋护党大会”。方声涛批给经费，派人参加，予以支持。方曾对其僚属表示“必须诚心诚意，听从介公指导”⁸。7月初，福建省政府成立，杨树庄任主席，方声涛任省府委员兼军事厅厅长。由于各地土著军阀割据，政令几乎不能下达于省会之外，杨树庄愤而赴沪。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方声涛代理省政府主席。11月，蒋光鼐、蔡廷锴率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进驻福州。方声涛通过十一军驱逐了谭曙卿，遣散新编军，企图统一政令。与此同时，方声涛把陈国辉等部民军收编为福建省防军，让其驻在闽西镇压工农运动，以巩固自己在福建的实力地位。翌年2、3月间，张贞率部从南京开回福建，方声涛为了拉拢张部作为自己统治福建的支柱，便让张贞控制了漳、泉、永等地的军政大权。

方声涛就任福建省政府代主席后不久，发生了枪杀国民

党中央党务指导员谢瘦秋案，受到了指斥；同时，卢兴邦等地方军阀依然盘踞一方，全省财政也无法统一。方声涛遭到各方攻击，被迫于1928年5月提出辞职^⑨。9月，福建省政府改组，方声涛挂名省府委员。

1930年1月6日，卢兴邦在福州扣押福建省政府六名委员，酿成轰动一时的“绑架六委”事件。久居上海的方声涛被国民党政府委以福建军事特派员名义前往泉州。8月，刘和鼎部和卢兴邦部爆发战争，方声涛即率部从永春、德化袭击卢部。他运动卢部团长钱玉光刺杀卢的旅长陈荣标，卢部迅速崩溃，被押“六委”于10月获释，一场政治风波才告平息。事后，国民党政府委任方声涛为福建省政府委员兼保安处处长，代理省政府主席。在1931年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方声涛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1932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组成东路军举行东征，向闽西南进军，20日解放漳州，威震全省。当时正在南京谋改组省政府的方声涛，闻讯后急忙返闽。他前往同安设立行营^⑩，招抚被红军击溃的各地民军余部，以及零星散匪，妄图与红军顽抗。

6月，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在泉州登陆。由于陈铭枢、蒋光鼐等与方声涛颇有历史渊源，方令陈国辉部让出大部分驻地给十九路军。当蒋光鼐要改组福建省政府时，邀请方声涛为省府委员。方声涛认为十九路军志在打倒蒋介石，不会长久驻闽，一心希望他们发动讨蒋后，仍能把福建政权交给他，因此表示乐与合作^⑪。但是，十九路军入闽不久即着手消灭霸踞各地的民军，而且首先解决闽南地区实力最大的陈

国辉部；12月，十九路军改组福建省政府，蒋光鼐任省政府主席，结束了杨树庄、方声涛延续五年多的“闽人治闽”局面。至此，方声涛不得不离开福建，同杨树庄一起去“虔修佛法”了。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在汉口请教方声涛，并在出兵攻闽时，指派方声涛为行营军事特派员、福建省党务审核委员会委员。不久，福建事变失败，南京国民党政府将所有任命的民军司令、军事特派员、党务审核委员会等取消，方声涛也随之赋闲。

1934年6月1日方在上海寓所病死^⑫。

注：

- ① 方贤旭：《辛亥英豪，万古留芳》。《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2日。
- ②、③、④、⑫ 严肇：《方声涛先生纪略》。《福建辛亥光复史料》，1940年版。
- ④ 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八辑。
- ⑤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22页。
- ⑥ 许显时：《福建地方派系的倾轧与“一六事件”始末》。《福建文史资料》第一辑第86页。
- ⑦ 秦望山：《我与自治军及讨贼军的关系》。《泉州文史资料》第七辑第2页。
- ⑧ 《民钟报》1928年5月29日。
- ⑩ 福州《民国日报》1932年5月28日。
- ⑪ 秦望山：《陈国辉暨旧部与十九路军的关系》。《福建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2页。

李 厚 基

李 锡 贵

李厚基，字培之，江苏铜山县人，生于1869年（清同治八年）。其父曾任清军管带，于1900年在天津与八国联军作战时阵亡。李厚基少时随父在营念书，1889年任李鸿章的亲兵。1890年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军事，同年毕业，充当直隶总督署的卫队长。1896年在管带任内，作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的随员，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继而跟从李鸿章游历欧美六国^①。1904年为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第二营管带。1909年擢调为新建陆军第四镇第七协第十四标标统，随第四镇统制吴凤岭在小站练兵。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李厚基随清军进攻武汉，升任第四镇第七协协统。民国建立，军队改制，李改任陆军第四师第七旅旅长，驻马厂。1913年7月“二次革命”发生时，李厚基奉北洋政府命率全旅由海道增兵上海。8月13日，李指挥本部人马与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的舰队协力攻占讨袁军据守的吴淞南北塘、狮子林各炮台，迫使吴淞要塞司令居正、宝山讨袁军首领钮永建率部千余人退守嘉定。由于李镇压革命卖力，袁世凯任命李为吴淞要塞司令。

同年11月间，袁世凯派刘冠雄兼南洋巡阅使，督率李厚基带兵入闽。李到福州后，对革命党人欲尽绝根株而后快，

首先赶跑了福建都督孙道仁，继又解散了国民党人许崇智率领的第十四师，捕杀了李烈钧的参议龚永图。此时，李的资望尚浅，对刘冠雄巴结奉承备至。于是，刘冠雄把福建原有的军队改编为中央陆军第十一混成旅，以王麒为旅长，归李统辖，并向袁推荐，盛赞李忠贞能干。12月底，袁世凯派李厚基为福建镇守使。第二年7月18日，又晋升李为福建护军使督理福建军务。李厚基从此独揽了福建全省的军权。

1915年袁世凯策划恢复帝制，李厚基积极追随附和，献款资助“筹安会”，与十四省将军联名密呈袁世凯“请速正大位”，并强迫省国民大会全体代表上推戴书。10月10日，袁世凯授李厚基加陆军上将衔，12月底，袁在准备登极之时，封李为一等子爵。李当即将福建政府的一切文告改用“洪宪”年号。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改任李厚基为建武将军，仍命督理福建军务。这时，李厚基添招了福建第一旅，派姚建屏为旅长。4月，李厚基撵走许世英，袁世凯任命他兼署福建巡按使，并且接管了以臧致平为旅长的中央第十四混成旅，以加强统治地方的力量。6月，袁世凯死去，李厚基在将军行署设灵堂，率文武官员默哀致祭。

袁死后，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实权，7月6日，段祺瑞特任李厚基为福建督军，暂兼省长。李厚基由旅长擢升至督军，历时不到三年。他在黎元洪与段祺瑞争权夺势期间，支持段祺瑞，在督军团中大肆活动。1917年4月，李厚基赴北京，参与段祺瑞召开的军事会议。他拥护段祺瑞对德宣战的主张，向协约国公使表示参战的决心，强行参加国务会议，

要求国会议员们通过对德宣战案。5月23日，他专程前往徐州参加张勋召开的第四次徐州会议。会上，他既表示“倒黎拥段”，又赞成张勋复辟。但在同一天，大总统黎元洪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28日命令李经羲组阁。于是李厚基继皖、豫、浙、陕、鲁等省之后，于6月1日宣布福建独立，以示抗拒。

当时独立各省都趁机赶走北京政府任命的并无多少实力的省长，李厚基回到福州后，也于6月4日驱逐了福建省长胡瑞霖。这样，福建全省的军政大权终于全部落入李厚基的手中。

6月22日，张勋率兵入京，李厚基就赶紧宣布福建取消独立。7月1日，张勋拥戴溥仪复辟，任命李厚基为福建巡抚。李命令在督军署大堂前后左右挂起龙凤宫灯，以示庆祝。他还向日本驻闽领事大谈恢复帝制的必要性，说只有一统太平，中日邦交才会得到巩固。但不料当天晚上，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逆的消息突然传来，他临机应变，急令停葺万寿宫，停制黄龙旗，并通电各省，大骂张勋，吹捧段祺瑞，表示坚决拥护共和。^②7月18日，即段祺瑞重新组阁的当天，段明令李厚基以督军兼省长。

此后，李厚基积极推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加紧筹饷制械，扩军备战。他在福州黄店先后扩建了六个军事工厂，还在制造局内办了一个造币厂，仿铸广东毫洋。为讨好段祺瑞，李厚基不等准备就绪，就拉开闽粤战争的帷幕。10月24日，李厚基发电支持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叛变广东护法政府，并电令旅长兼汀漳镇守使臧致平饬队进援；还企图再联络龙

济光和李耀汉，一鼓荡平粤境。^③然而事与愿违，11月间，粤军、滇军攻闽节节胜利。李一面派兵增援兴(宁)、梅(县)，一面电北洋政府告急。当臧致平部被粤军紧逼包围在潮(州)、揭(阳)之时，李望援不至，急如热锅上的蚂蚁。^④

1918年初，李厚基到天津参加十六省区的督军团会议，电请北洋政府明令讨伐南方政府。4月，段祺瑞命令李厚基与浙军师长童葆暄为援粤军正副总司令，李厚基到厦门设立援粤军总司令部，派臧致平、童葆暄、唐国谟为左中右三路司令，姚建屏为省防司令兼闽北防务总指挥，并将十八个补充营编为四个支队(团)，派胡恩光为援粤军预备队司令官，率队分赴各县填防，并协同各路作战。

6月，北洋政府三路出兵南方，令李厚基、童葆暄率闽浙联军进兵广东。此时，驻闽南之北军营长朱德才、陶质彬联合宣布护法，粤军乘机占领龙溪，厦门危急。李厚基大为震惊，迭电北洋政府请兵援救，并饬童葆暄部由饶平出击，向粤军发起反攻。正当双方争夺激烈之际，浙军第一支队司令陈肇英于8月在诏安前线倒戈，闽浙联军望风奔溃，粤军、滇军长驱直入，李厚基失地二十余县，丧师两万余众。9月22日，李厚基逃回福州，终日惶惶不安，深恐北京方面出现对己不利的局面。时新任参战督办段祺瑞的参谋长徐树铮发“皓电”向李劝释，并派参战军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率部援闽。^⑤李疑神疑鬼，唯恐他人取而代之。

是年10月，由于国际形势(欧战将结束)的影响，全国呼吁和平声浪日益高涨，新任大总统徐世昌按照事前的默契解除了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李厚基权衡利弊，选择了“和

平统一”的道路，与粤军妥协，从11月1日起双方停战，12月6日与陈炯明达成停战协定。

1919年，当“五四”运动的浪潮扩展到福建之时，李厚基严禁学生集会，包庇奸商，逮捕《求是报》主笔王醒才，压制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11月16日，爆发了震动全国的福州台江事件，李厚基慑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不仅不敢出面与日方交涉，而且于28日下令封闭福建学联及其机关刊物《学术周刊》，取缔民众爱国反帝宣传和抵制日货的行动。

1920年秋，李厚基看到皖系已在直皖战争中失败，遂与陈炯明进一步订立了互为利用的协定，接收了粤军在福建所占的地盘。同时，试探着向直系靠近，于是年冬派胡恩光为代表去向曹锟、吴佩孚输诚。1921年春，徐树铮又衔段祺瑞命秘密来到福州，劝李与卢永祥合作，共倒曹（锟）吴（佩孚）。李虚与委蛇，阳奉阴违。次年4月，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又获全胜，独掌了北洋政府大权，李厚基更觉得有恃无恐，遂想借直系声势除掉异己的臧致平、王永泉两部。6月5日他到漳州解除臧致平的第二师师长职务；嗣后又想调离王永泉。

1922年8月，徐树铮在上海策划孙（中山）皖（系）同盟，派人到福州与李厚基商洽。李因已弃皖投直，拒不接见来人。徐遂促王永泉联合北伐军许崇智等部驱李。9月上旬，在王永泉的掩护和牵引下，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等部顺利到达闽北，徐树铮也潜抵延平，李厚基还蒙在鼓中。9月18日王永泉用重兵在长汀将王献臣部缴械，李厚基才惊惶起来，向曹锟乞援饷械，急派唐国漠部到古田、水口一带布防。10月6

日，北伐军许崇智等部与王永泉部联合进攻水口的战斗发起后，李厚基倾省城的兵力增援水口，至白沙遭北伐军孙本戎旅拦江截击。11日夜，北伐军李福林、黄大伟部由古田绕过水口袭击福州，12日李厚基率卫队退至南台仓前山，突被海军扣留，软禁于马尾军舰上，要李付清积欠造船所的协款。24日，北洋政府任命李厚基为“讨逆军司令”，但在此时，徐树铮、王永泉、许崇智等已进驻福州八天了，李厚基身陷马尾，一筹莫展。28日，李厚基交清海军协款后乘运输舰经沪到南京，与杜锡珪、齐燮元商讨反攻福州。11月5日，李携款及大批枪弹抵厦门，詎料臧致平已先达厦门，于11月7日夜发动兵变，李仓皇逃至鼓浪屿，托庇于日租界会审公廨。

李厚基仍不甘心失败，于11月11日到汕头向陈炯明乞援，谋联合粤军反攻。虽然北洋政府支持李厚基，派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并遣豫军常德盛师援闽，但是福建各界因仇李而拒刘入闽，臧致平与改为东路讨贼军的许崇智、张贞率领的自治军以及李的残部周永桂合作，在永安一带击溃了陈炯明的援闽粤军钟景棠师，又将李的残部张清汝旅在泉州围歼；常德盛师也被王永泉部赶出闽境。

至此，李厚基已是穷途末路，于1923年1月15日，带卫十三十余人取道汕头，遁逃南昌。李将随从的人枪馈赠赣督蔡成勳，蔡谢以程仪数千元。次年11月11日，北京政府特派李厚基为山西援军副司令；后为奖励齐燮元、孙传芳底定浙沪，于15日改派李厚基南下宣抚，妥筹善后；^①24日又任李厚基为全威将军。然而，随着直系政权的倒台，段祺瑞窃踞了临时执政的职位，李遂心灰意冷，由沪转往天津，在日本

租界定居，开木行谋生。1942年9月卒，终年七十三岁。

注：

- ① 《李厚基》。《支那现代人名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编，大正十三年六月，第299页。
- ② 参见《李厚基支电》。《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99页。
- ③ 《李厚基致北京国务院齐电》。同上书，第107页。
- ④ 《李厚基致冯国璋佳电》。同上书，第118页。
- ⑤ 徐树铮：《致李厚基童葆暄佳电》。《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7—348页。
- ⑥ 《东方杂志》第21卷第149—150页。

戴季陶

郑则民

戴季陶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1891年1月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原籍浙江吴兴，其先人入川经商，定居广汉。父戴小轩，出租土地，兼业中医。

戴季陶六岁入塾读书，并读过一些西洋史。1902年，进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到业师徐炯的影响，倾向反满。1905年秋赴日本，入师范学校。1907年秋升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任该校中国留日学生同学会会长。

1909年夏，他自日本毕业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教习。翌年春，往上海先入《中外日报》，后又入《天铎报》任主编，以天仇笔名撰写社论，抨击清廷腐败，言论激越。1911年春被官府通缉，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编辑，鼓吹革命，并加入同盟会。

辛亥武昌起义后，他回到上海参与创办《民权报》。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戴以新闻记者身份晋见。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专制野心日渐暴露，戴曾在《民权报》上著文揭露。6月，当唐绍仪内阁辞职时，他指出：“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①9月，孙中山受任督办全国铁路，戴任孙中山秘书。1913年2月随

孙中山访问日本。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讨伐袁世凯，戴受命在上海、南京间进行反袁的军事联络活动。“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参加了《民国杂志》的编辑工作，并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6年4月底，戴随孙中山返上海。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军政府，戴被任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2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后，军政府改组，戴与孙中山回上海。这时他将家迁回浙江吴兴，与张静江多所交往。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中，上海等地的工人举行罢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时戴以工人运动的同情者的姿态出现，在他和沈定一主编的《星期评论》上，用不少篇幅讨论劳动问题，报道世界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的情况。但当时他已流露出企图把工人运动引向“调和”的路上去。6月戴季陶在与孙中山的一次谈话中说：“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不从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他主张“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②在一段时间内，他还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由日译本转译成中文，于同年11月起在《建设杂志》上陆续刊出。他的文章虽然也搬用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然而实际上是阶级调和论。他声称“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的精神的”^③，“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并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家族主义’，的确是社会主义”^④，意思是说社会主义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也就不必要走俄国十

月革命的道路了。^⑤1920年夏前后，他与陈独秀等人颇多接触，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过程中，曾参与过一些活动，但后来却寻找借口拒绝参加组织而溜走了。在他研读《资本论》的同时，即1920年，戴季陶和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一起，合股设立“恒泰号”，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经营证券等投机生意，^⑥颇有所获。他们也曾为粤军回粤讨桂资助过款项，但更多地却是把投机所得挥霍在花天酒地之中。到1921年，戴投机失败，信用上出现危机，退出了交易所。

孙中山在遭到陈炯明叛变回到上海后，仍谋恢复广东，1922年10月底命戴季陶入川，对川军进行联络工作。当戴所乘的船驶向宜昌的途中时，得悉川军内战一触即发，联络工作无法下手，顿觉“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⑦，便趁夜投江自杀，幸为渔民救起未死。从此他便信仰起佛教来了。

戴在四川住了一年没有完成孙中山交付他的任务，1923年12月上旬，他从四川回到上海。当他得知孙中山已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的政策时，他表示“根本怀疑”。他写信给廖仲恺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做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做为正菜的。”^⑧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戴虽勉强出席了会议，但他阴持反对态度。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随后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但他对国民党改组后广东气氛非常不安，曾几次离粤返沪。直到同年

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邀请离粤北上路过上海时，他才又随同绕道日本北行，到天津后，他声称“国内政治之事，非我所能胜”，借口又折回上海。孙中山到北京后病危，戴季陶到了北京，赶上孙中山在病榻上签署遗嘱，时为1925年3月11日。

随着孙中山的逝世，隐藏在国民党内的假左派（即新右派）开始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戴季陶这时也就无所顾忌了。他以继承孙中山思想的“理论家”自封，“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⁹。在他的鼓动下，1925年4月24日，黄埔军校内成立了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5月，他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来反对国共合作。在上海设立了“季陶办事处”，一段时间内，他专门从事反共的“著述”。6、7月间，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出版。这两本小册子是在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幌子下，歪曲、阉割和篡改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被人称为“戴季陶主义”，其基本要点是：（一）用“道统”论把三民主义曲解为渊源于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仁爱”学说，是二千年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¹⁰。（二）否认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¹¹。他认为可以“诱发”地主、资本家的“仁爱的性能”，来解除被剥削者的痛苦。（三）提出所谓团体的“排拒性与独占性”，认为共产党员应退出国民党，把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当作“癌肿”，准备等待时机进行割除。

戴季陶的这套说教，是背叛孙中山遗教的，是在当时革

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戴季陶的两本书一出版，就遭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严厉批判，也受到进步群众的谴责，广州、北京、武汉等地群众愤怒地把他的“小册子”烧掉，斥责他是“新右派”的头目。连戴季陶自己也承认，曾受到“很大的攻击”¹²。

新右派的戴季陶原来和国民党老右派并没有密切关系，但既然要反共反人民，他就希望引老右派为同调。1925年11月，国民党内的一伙老右派邹鲁、谢持、居正、张继、林森等以反对三大政策为目的，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自称“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戴季陶同邵元冲、沈定一等也前往赴会。会议开场前夕，老右派中有人认为戴、沈曾与中共发生过关系，把他们绑架出去并痛殴一顿，威胁他们不准与会。戴被迫返回上海。但他仍然恋恋地留下书面声明，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意会议的决议。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给予西山会议派的重要分子以开除党籍的处分。由于蒋介石等人的庇护，对戴季陶以其“未曾与会”为理由，仅在关于弹劾“决议”中，“促其反省，不可再误”，“禁止三年不得作文字”¹³，并仍选他为中央执委。会后，蒋介石召戴季陶来广州负责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的改组工作，10月，戴任中山大学委员长。在“改组”工作中，戴通过令学生停课复试和教员停职另任的办法，以排斥校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

北伐军进到长江流域后，戴曾一度离开中大到江西去，

追随在蒋介石的左右。1927年2月，戴受蒋介石的派遣赴日本活动，与日本外务省官员进行会谈，寻求日本对蒋的“谅解”和“合作”，为蒋叛变革命找靠山作准备。3月底，戴从日本回到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很快发生了。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不久，5月，戴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一文，为蒋介石政权“建立纪纲”呼号。¹⁴接着国民党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党务学校，蒋介石自任校长，戴任教务主任。6月，戴季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他在校期间，多次发表讲演，向学生灌输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第二年汇集为《青年之路》出版。

1928年2月戴季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10月又被任命为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戴任院长后，即着手制定考试法。1931年7月15日起，在南京举行全国第一届高等考试，戴任主考。其后，戴多次主持制定和修订考试法规，其中有“高等考试”、“普通考试”、“特种考试”。其目的是选拔效忠于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人材。但是在独裁政治体制下，能够猎取到较高职位的人，大都是靠与当权者的私人关系，因此考试院只是统治者装潢门面的一个机构。

1931年“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为应付这一事件，国民党政府设立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戴季陶任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专议对日事宜。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戴季陶提出了一个报告，建议“以抱定国际联盟为主要方针”，力求对日妥协，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国策。

11月，戴以“困难严重”为词，发起“修建仁王护国法会”，用“诵经护国”的办法来麻痹人民。

1932年4月，国民党政府迁都洛阳期间，戴季陶奉命“视察西北”。他的一行并没有对西北应兴应革提出积极可行的计划，而是沿途为蒋介石集团对日不抵抗政策进行辩解，说什么“外交顺利”，“东北失了不要紧”¹⁵。4月25日戴在西安民乐园向两千多名学生发表讲演，其反共媚外谬论当场遭到爱国学生的斥责，戴所乘汽车亦被焚毁。

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戴季陶虽然名义上仍身居高位，但实际上已无重大活动，只是以“元老”身份，为蒋介石的统治作点缀。蒋在1934年提倡“新生活运动”，戴就以考试院院长的名义发表“尊孔读经”，“恢复固有文化”的谈话。但他又不是粹然儒者，而是越来越象一个皈依佛门的僧侣。抗日战争爆发后，戴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和重庆。1938年4月，曾代表国民政府赴甘孜等地，与宗教界的上层分子进行联络。1940年10月至12月，又奉命到缅甸和印度访问，拜谒了不少著名的佛教圣地。1943年10月他遵照蒋的指示发起“制礼”问题的讨论，11月由他写成了《礼制通议》。次年3月，把《礼制通议》和他的《读礼札记》汇印成为《学礼录》出版。

抗日战争结束时，戴已身患多种疾病，但仍在1947年6月改组的国民党政府中维持着考试院院长的名义。1948年3月所谓“行宪国大”开幕时，他勉强出席。其后，他要求免去其院长职务。6月，改任为“国史馆”馆长。

1948年底，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已处于大崩溃的前夕。戴应宋子文之约，携眷飞往广州。戴眼看中国人民

解放军即将席卷全国，国民党政府的覆灭已成定局，对前途绝望，遂于1949年2月11日夜间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死。

注：

- ① 《天仇文集》。民权报发行部1912年11月版第115页。
- ② 戴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
- ③ 《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
- ④ 《幸慈》。《星期评论》第10号，1919年8月。
- ⑤ 《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
- ⑥ 何祖培：《张静江事迹片断》。《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陆丹林：《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
- ⑦ 《戴季陶集》，上海三民公司出版。上卷第13页。
- ⑧ 何香凝：《我的回忆》。《人民日报》1961年10月7日。
- ⑨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4页。
- ⑩ 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 ⑪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 ⑫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重刊序言》。
- ⑬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载《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第84页。
- ⑭ 戴季陶：《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上海《时事新报》1927年5月29日。
- 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人事记述》。第209—212页。

朱家骅

林 泽

朱家骅，字骝先，一字湘麐，浙江吴兴县姚家坝人。1893年5月30日（清光绪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出生于商人兼地主的家庭，父母早亡，赖其胞兄朱祥生抚育成长。朱祥生经营丝业，后在张静江的两浙盐务公司当帐房，因此朱家骅少时就认识了张静江。朱家骅六岁入塾，十三岁入南浔正蒙学堂，十五岁改进南浔公学，1908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学校（即同济大学前身）。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中国敢死团”任驻汉代表，在汉口战地及伤兵医院服务三月^①。

朱家骅在同济毕业后，于1914年初自费留学于德国柏林矿科大学，研究地质，张静江曾予资助。1917年初回国，在北京大学教德文。越一年，得蔡元培帮助，获教育部公费赴瑞士研究地质学，1920年转学到德国，1922年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仍在北大，任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组主任。在这期间，朱家骅曾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等爱国运动，表现积极；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后来受北洋政府的通缉，乃不得不潜行出京，暂回原籍隐避^②。

1926年间，国民党中央会秘书长周觉自广东抵浙，劝戴季陶出任广东大学校长，朱家骅因与周有戚谊，亦偕行赴粤。

朱家骅先在石井兵工厂当秘书，自认为大材小用，牢骚满腹，一度为蒋介石撤职扣押，经周觉挽戴季陶缓颊释出³⁴，转任广东大学教授。10月，广东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改组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废校长制，任戴季陶、顾孟余、徐谦、丁惟汾、朱家骅为校务委员。当时其他四人都不在校管事，朱代理校务委员长。1927年4月广州国民党右派进行反革命“清党”后，广东省政府改组，朱因戴推荐，登上政治舞台，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并任广州政治分会委员，仍兼中山大学校务。朱创办两广地质调查所，自任所长。8月，任省教育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³⁵。是年冬，朱家骅回浙江，在张静江手下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

朱家骅回到浙江，提出“用新人，行新政”的口号，借以清除旧官场的人员，大量罗致和培植亲信。他标榜用人唯才，组织“北大同学会”作为联谊场所，吸引青年参加政府工作。他想控制全省政治、党务和警察大权，于1928至1930年间先后举办三次县长考试，设置典试委员会亲自主其事，以观察应考者的容貌和辩才，三次共录取五十余人。同时他还开办两所特种学校：一是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一是浙江省警官学校，都自兼校长。自治学校为培养全省各县区级官吏，三期共毕业五、六百人，都以区长或自治指导员任用；警官学校为整顿和掌握全省警察实力而设，分正科和速成科两部分，也办过三期，均以县警察局长、分局长和警佐任用，正科第一期优秀毕业生三十余人，还曾分送奥国和日本留学。朱家骅借助这两所专归民政厅掌握的学校培植党羽，未及两年，他的势力遍布全省。

在浙江民政厅长任内，朱家骅组织新政考察团前往豫、晋两省考察，回来后仿照山西的街村制，在浙江推行村里制（后改为乡镇制），号称为实施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他还想要整理田赋地籍，动用许多人力办理土地陈报，清丈全省土地，声称这是“平均地权”的一个步骤。此外，还推行了清查户口、兴办团练、普及卫生、禁溺女婴、移民东北、整饬吏治等“新政”。1929年3月，朱家骅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主席团，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从此参与国民党统治的中枢活动。

朱家骅在浙经营数年，党羽既多，声名日盛。到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全省代表大会选举时，朱家骅操纵亲信，几乎占据了省党部委员候选人名额的三分之二。这样，不但与C.C.系引起了权力的争夺，结果遭到陈果夫的排斥，在选举中终归失败^⑤，而且还和张静江为候选人问题酿成交让，关系破裂，戴季陶居中调解无效，是年9月，朱家骅被迫离职。

时戴季陶还兼任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也还挂着副校长名义，于是戴让位于朱。1930年1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去职，朱又得到戴的支持，调任中央大学校长。1931年春，朱兼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1943年改称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为了迎合蒋介石的需要，提出在大学和高中实施军训的方案，果为蒋所采纳，交由中央政治会议通过，通令全国施行。蒋介石自此加深了对朱的印象，复经戴季陶吹嘘，朱便逐步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人物之一。朱利用留学德、奥、瑞士三国同学会的组织，拉拢一些学者名流

为自己捧场，一面运用南京《新中华日报》制造舆论，政治资本积累渐厚。

1931年底，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主持订定中小学课程标准及小学法、中学法等，创办中央图书馆、博物馆、编译馆，并趁此机会讨好蒋介石，又提出在各大学增加政治训练的方案，还提议在大专院校设置训育员，以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充当，用以监视进步师生的言行。1932年11月，朱家骅调任交通部长，竭力整顿巨额亏累债务。1935年12月行政院改组，朱家骅改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1936年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请朱家骅兼任该院总干事^⑥，1940年3月蔡元培病故后，朱又任代理院长多年。

1936年冬，蒋介石调朱家骅为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抵浙后，已无当年做民政厅长的锐气，因循守旧一味应付。抗战军兴，日本侵略军飞机常至杭、嘉、湖一带骚扰，朱往往于黎明驱车逃离杭州去富阳躲避空袭，把政务委之于僚属。1937年11月淞沪战事失利，日本侵略军在金山卫全公亭登陆，嘉兴、湖州随告沦陷。这时朱更惊惶失措，连忙将省政府迁往金华，寇未见而人先遁，造成地方一片混乱，舆论哗然。12月，朱卸省主席职。

朱家骅卸任后去武汉，1938年3月，被蒋介石派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4月，朱改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同时兼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按中常委决定兼充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⑦。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朱为干事会常务干事，不久兼代中央团部书记长，并主持中

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一、二、三期工作。1939年12月，朱家骅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主管国民党党务；他乘机在各大学设立党部，笼络知识分子，树植个人势力。同时期他仍兼“中统”局长，抓紧机会经营特务组织，自立门户，广为发展。朱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长达四年半，他所造成的派系力量，可以与陈果夫、陈立夫的派系势力相抗衡，被称为“新 C. C. 系”，也引起二陈为首的老 C. C. 派的妒意，彼此钩心斗角，矛盾深化。1944年5月，朱卸中央组织部长职，11月，再任行政院教育部长。1945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朱不但继第四、五届又当选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并以派系力量，分赃中委名额，与二陈竞争激烈^⑧。

1946年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朱家骅主持战时教育复员工作，修正中小学课程标准，重订大学课程。当时蒋介石热衷于内战，教育经费奇绌，教育事业支离破碎。全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兴起后，朱疲于奔命，竭力加以压制。1948年冬，平津解放在即，南京亦已风声鹤唳，朱家骅派大批人马把故宫、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北京图书馆的文物、书籍等大量运往台湾，并把中央研究院搬迁去台湾。12月，行政院改组，朱不再任教育部长，调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49年夏，朱在广州出任行政院副院长^⑨。不久，大陆完全解放，朱随同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

朱家骅在台湾任蒋介石的“总统府”资政，1963年1月3日因心脏病死去。

注:

- ① 胡颂平:《朱家骅年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5页。
- ② 杜伟:《我所知道的朱家骅》。《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90页。
- ③ 魏思诚:《朱家骅触犯蒋介石坐了禁闭室》。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 ④ 何祖培:《对杨子镜“一点订正”的补充》。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 ⑤ 1930年陈果夫当中央组织部长,为便于对浙江的控制,采用《乙种选举法》,由省选出省党部执行委员加倍人选,上报中央圈定。
- ⑥ 傅润华:《中国当代名人传》,世界文化服务社1948年7月再版,第41页。
- ⑦、⑧ 胡梦华:《国民党C.C.集团的前前后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第180页、第204--208页。
- ⑨ 《朱家骅先生逝世纪念册》,1963年6月台北印。

蒋鼎文

余 涉

蒋鼎文，字铭三，浙江省诸暨县磨石山人。1895年1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生。父亲蒋子朗，在乡务农，由于嗜赌，家境日渐破落。

蒋鼎文十岁入象山私塾读书，十五岁转入湮浦镇翊忠书院求学。1912年考入绍兴大通学堂，下半年转入浙江讲武学堂。毕业后，分发浙江督署守备队见习，后升排长、连长。1915年蒋鼎文失职远走广东。以后依附于国民党人蒋尊簋（百器）门下，曾任职于援闽浙军总司令部。1921年5月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部副官，翌年1月至桂林任北伐滇黔赣军第一路司令部参谋，1923年3月回粤任兵站总监部参谋。

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蒋鼎文进入该校，初任区队长、教官。由于他有早起习惯，经常被校长蒋介石碰到，对他留下好印象。一次，军校举行野外演习，蒋鼎文任连指挥，蒋介石与外国军事顾问前来观操，向蒋鼎文发问战术上几个动作，他一一对答，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不到一年，他就被蒋介石派任教导团第一营任副营长兼第二连连长。

1925年2月讨伐陈炯明之役，蒋鼎文率领的东征军第一团第一营，与陈炯明军战于棉湖西北山地，左肋受重伤。蒋

介石得知后，犒赏他五千元，并在他医伤期间任他为第一团副团长，旋调任第二师第五团团长。1926年3月，在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中，蒋鼎文率第五团强行收缴总工会的枪械，并监视苏联顾问及其眷属，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效劳。

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蒋鼎文所属部队参加总预备队，随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推进。在攻打南昌的战役中，蒋鼎文又一次负伤。这时蒋介石正在补充嫡系部队，扩张个人势力，就调升他担任总司令部直属伤兵团少将团长。1927年4月蒋介石任蒋鼎文为南京警备团长，旋又调宁波，任浙东警备司令，兼宁波市公安局长。不久，蒋鼎文被派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先驻杭州，后移驻南京。1929年初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整编国民党军队，将第一师改番号为第九师，蒋鼎文仍任师长。不久，蒋介石与桂系决裂，蒋鼎文奉命讨桂，从浦口沿长江西进武汉，因桂系李明瑞部被蒋介石收买倒戈，蒋鼎文未发一弹，即占领了武汉，被擢升为第二军军长，辖原有第九师和赵观涛的第十师、陈诚的第十一师。同年冬，蒋鼎文率第二军沿平汉路南段北上讨伐唐生智。1930年又在陇海路东段，参与“中原大战”，奔走东西各战场，被夸为“飞将军”。阎、冯败北，他与顾祝同、上官云相会师郑州。由于蒋鼎文在新军阀的混战中为蒋介石立了汗马功劳，中原大战结束后，进驻洛阳，被委兼任陇海路西段警备司令。

蒋介石在新军阀混战中战胜了各派对手，稳住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后，就集中兵力向中央苏区红军发动了“围剿”。

蒋鼎文此时又追随蒋介石反共“剿共”。1931年8月，在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中，蒋鼎文任第四军团总指挥，率第九师、五十二师开入江西，从抚州、广昌、宁都进犯中央苏区。9月蒋军向泰和集结时，他的先头部队第九师二十七旅在老营盘遭红军奇袭被歼。于是蒋鼎文改道北窜吉安集结，又在方石岭受到红军袭击，第九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步兵营被歼；所辖第五十二师六个团全军覆灭，师长韩德勤落荒而逃。以后，蒋鼎文又率残部从吉安开赴赣东余江，进犯红军方志敏部，驻守上饶待机而动。1933年第五次“围剿”，他被任命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二路军总指挥，率第九、第八十九两师开到江西永丰布防，继续进犯红军。是年11月，蔡廷锴等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通电五省“联共倒蒋”。蒋介石立即改派蒋鼎文为左路总指挥，向福建进攻，既要迅速歼灭十九路军，推翻福建人民政府；又要“会剿”闽赣边区红军，实现第五次“围剿”的计划。蒋鼎文受命后，将他率领的十个师，再加原驻福建的两个师、三个旅，总共十五万兵力，集结于浙闽赣边区，修筑公路，向福建进犯。由于贿赂十九路军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在泉州倒戈，削弱了十九路军战斗力；又派人潜赴闽南，收买地方武装股匪、地痞流氓、日籍台湾浪人，在十九路军后方骚扰，蒋鼎文军入闽后，只在南平附近与十九路军作过短时接触，即一路下福州。先后不到一个月，福建人民政府即被搞垮，蒋介石重新占领了福建。

福建问题解决后，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从四路“围剿”红军，1934年2月委派蒋鼎文为东路“剿匪”总司

令。蒋鼎文将总部由福州迁至漳州，分兵两路向闽西红军防地进犯。他先集大军于闽西，巩固原防；继用碉堡封锁苏区，断绝物资流通；还在苏区周围实行“联保切结”、“保甲管制”等措施，规定发现红军要密报，因密报而破获者“重赏”，知而不报者和藏匿者以同等论罪。他赶筑公路，指挥各师沿路向苏区猛扑。10月红军主力从瑞金、长汀、雩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蒋鼎文率部随即侵占会昌等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著名领袖瞿秋白即于此期间在福建长汀被捕，后由蒋鼎文打电报请示蒋介石处决的。第五次“围剿”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于11月成立“驻闽绥靖主任公署”，蒋鼎文任主任，严令各“绥靖”部队清剿各地“民军”，加紧清乡。由于蒋鼎文“剿共”有功，在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12月，蒋介石电召蒋鼎文等人赴西安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西北红军，任蒋鼎文为“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嘱即进驻甘肃平凉。是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联合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进行“兵谏”，蒋鼎文亦被扣。17日，张学良让他拿了蒋介石给何应钦的手令和给宋美龄的信去南京。当时南京政府内部对于西安事变，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斗争激烈，蒋鼎文投向“主和派”，避开当时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先去面见宋美龄，报告蒋介石的情况。22日，他与宋美龄、宋子文、外籍顾问端纳一道，飞回西安营救蒋介石。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调停下，获得和平解决，25日晚蒋介石被释飞往洛阳，蒋鼎文等亦于27日被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鼎文任西安行营主任，兼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这时，他仍然执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把部队布防在韩城、潼关一带，遏制八路军的活动；并曾亲自前往青海，煽动马步芳、马步青反共，形成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包围。6月，西安行营改为天水行营，程潜任主任，蒋鼎文改任陕西省主席。1941年冬，蒋鼎文又被派往洛阳，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

蒋鼎文掌握西北军政大权以来，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他曾操纵陕西省银行，先后两次发行辅币五百五十万元，对西安物价的直线上涨起了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他又在重庆设立经营黄金、美钞的办事处，专向中央银行购买黄金，运到西安抛售，获取高利。至于向陕西人民摊派的苛捐杂税，更是名目繁多，不计其数。当地人民曾作诗讽刺：“可怜民已无多肉，便作羹汤有几餐？”^①他当时积敛的私产，其数字之巨，十分惊人。他的私人账房陆怡霖说：“西北最大的资本家毛虞琴、石凤翔的财产，只不过是蒋鼎文的零头数。”^②蒋鼎文将贪污所得，用于挥霍，狂嫖滥赌，生活极其糜烂。当时日本侵略者在黄河北岸济源县一带，张贴蒋鼎文一手抱美人、一手提钞票的宣传画。

1944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略攻势，进犯河南地区。蒋鼎文得知敌人的动向，曾于3月中旬召集所属军以上将领举行会议，结果不是研究如何对付敌人的办法，而是研究了各军军官眷属及行李、重要文件迅速向后方撤退的计划。因此，尽管洛阳地势险阻，配备的兵力亦不少，但由于蒋鼎文耽于宴乐，玩忽职守，未经重大战斗，即于5月26日

放弃洛阳，狼狈西逃。^③日本侵略军逼近潼关，关中震动，舆论哗然。7月，蒋鼎文不得不“引咎请辞本兼各职”，逃往重庆。蒋介石任他为国民党军事参议会参议。

抗战胜利后，蒋鼎文弃官经商。他东归上海，依仗巨额赃款，先后在南京和平门外开办宏业砖瓦厂，在上海开办轮船公司。1947年1月蒋鼎文乘轮游美，居留九个月，又遍访欧洲十国，1948年2月回抵上海。旋出席“国民大会”，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他眼看国民党政府危在旦夕，即派自己的小老婆蔡文媛到美国经营橡胶园，派其胞弟蒋鼎五到香港开办振华公司。

1949年3月，蒋鼎文逃亡台湾，临走时对其亲友哀叹说：“此后以天为盖，以地为底，未知葬身何所？”他在台湾曾一度出任蒋军“东南区点编委员会”主任委员、“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以及蒋介石“总统府”国策顾问。1974年1月2日病死于台湾。

注：

- ① 朱幻牲：《我所知道的蒋鼎文》。浙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存稿第1985号第10页。
- ② 同上第15页。
- ③ 张仲雷：《记抗战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洛阳的崩溃和李家钰在溃逃中遇敌牺牲》。《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48页。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文史：《蒋鼎文其人其事》。《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二辑。
- ② 吴相湘：《蒋鼎文平乱释疑》。《民国百人传》第四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1年版。

- ③ 虞庸：《飞将军蒋鼎文上将》。台北《浙江月刊》第九卷第五、六、七期，1977年5、6、7月出版。
- ④ 于燕梅：《蒋鼎文》。《民国人物小传》第三辑，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董 显 光

任 嘉 尧

董显光，1887年11月9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生于浙江宁波东南一个小镇上，世代务农。父母信仰基督教，为邻里所侧目。董七岁时入私塾读书，十岁时开始务农，农忙时插秧，力不胜任，重返私塾，遂发愤学习。其父因不甘坐守家园，借内地会教友的关系到上海等地承包与教会有关的房屋建筑，并于1899年举家迁沪。

董到上海后，被送入中西书院上学。因家境清苦，次年转入收费较廉的清心中学读书。1905年，上海发生会审公堂美国法官殴打中国审判官事件，清心中学学生罢课，并拒购美国货。董与部分同学愤而离校。董转学到私立中学读了一年。中学毕业之际，其父病逝，不得不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接受浙江奉化龙津中学堂的邀请，担任英文和数学教员。其时，蒋介石为龙津中学的学生。

1907年，董辞去中学教职，返沪和赵荫芎结婚，婚后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协助经理写英文信兼主管承制铜版等。因夫妇都是基督教徒，认识长老会的孟德高莫莱牧师，遂向他学习英文和拉丁文。

在牧师孟德高莫莱的建议下，董显光筹措旅费，于1909年1月赴美国留学，到密苏里州肯萨斯城入巴克学院。他半

工半读，做过司炉、印刷工人、园丁，以及埋装水管、学校杂务、送牛奶、餐馆打杂和农活等工作。在一次背诵圣经竞赛中，董背诵全部《旧约箴言》，获得第一名。一天，他在报上看见密苏里大学筹办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的报道，虽然已在巴克学院读了三年多，仍申请转学到密苏里专攻新闻，辅修国际史与法律，一年后获得学士学位。

1912年，董显光到纽约入新创办的哥伦比亚大学帕利策新闻学院继续深造。在学习的同时，董在《独立》杂志撰写书评，并在当地报纸兼任记者。一次，罗斯福总统^①到纽约，董显光前往采访，罗斯福向董表示：“不问世界局势有任何变动，美国和中国应该永远做朋友。”^②1913年春，董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等不及夏季取得硕士学位就匆忙取道日本返国。在横滨到上海的海轮上，见到卸任临时大总统职的孙中山，董作了一次访问，还把谈话的内容写成报道，寄给纽约的一家报纸。^③

董回到上海，一时找不到职业，后经孙中山介绍，在英文日报《中国共和报》担任副编辑。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中国共和报》显著报道并揭露袁世凯主使行刺的真相，一下子卷进了政治中心。董被邀参加在莫利哀路（今香山路）孙中山寓所召开的一连串会议，密商推翻袁世凯政权的运动。孙中山亲自派董显光代表上海几家国民党报纸的记者，到北京采访这场政治搏斗。但反袁的“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了。10月，袁世凯利用国会选自己为正式大总统。这时，董受聘为英文报《北京日报》主笔。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董在揭露袁日勾结的阴谋中起了积

极的作用。旋因《北京日报》新任社长与董意见不合，董去职。接着，董在全国煤油矿事务总署督办熊希龄处任秘书（后来随熊转入顺直水利委员会工作），并兼任《密勒氏评论报》副编辑。^④其间，由于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向熊商请借调董赴美工作，以设法阻止美国借款给日本“开发”东北。董曾在华盛顿逗留十个月，同时兼任《北京日报》驻华盛顿记者。

1925年，董用历年积蓄在天津办《庸报》，因人手甚少，自任发行人、主笔、编辑、记者并兼广告经理。次年，当北伐军到达长沙时，董访问了总司令蒋介石。1927年蒋介石进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董站在蒋介石一边。1928年6月4日发生的皇姑屯事件，董在报上公开揭露日本当局是炸死张作霖的凶手。

1929年夏，董受聘到上海任英文《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是年11月，海军上将杜锡珪出国考察各国海军状况，请董任考察团秘书长，先后访问了日、美、英、法、意等国家，历时三个月。访问归来，董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认出董是龙津中学的老师，关系又深了一层。接着，董应蒋的邀请，与《申报》主笔笔名“冷血”的陈景韩，在奉化溪口和蒋介石夫妇一起盘桓了半个月。

董主持《大陆报》前后五年多，时值日本侵略上海战争的酝酿与爆发时期。在蒋的授意下，《大陆报》不能披露“一二八”抗战的真相，董不时受到美籍编采人员的责难。1934年，董经蒋介石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1935年冬，董辞去《大陆报》的职务养病。这时，接到蒋介石的客籍顾问端纳^⑤来信，敦促董接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上海办事处主持检查外国新闻电讯的任命。董在上海成立了检查外电的机构，除了日本记者用自己的电台拍发电讯外，英、俄、法文的电讯都得经过检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0月，董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负责国际宣传。不久，宣传业务并入党务系统，董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随着战局的推移，董的工作重心，由上海转移到南京、武汉，而于1938年底到达重庆。董在两路口巴县中学内设立了国际宣传处，由曾虚白任处长，发行了英文《战时中国》月刊。国际宣传处先后在香港、纽约、新加坡、仰光、加尔各答、伦敦、旧金山、芝加哥、华盛顿、巴黎、蒙特雷以及国内昆明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规模最大的纽约办事处还组成了发布新闻的中国新闻社，发行英文《现代中国》半月刊，设立广播电台，并组织中国问题讲演处。

珍珠港事变发生后，董显光曾随同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和缅甸。1942年11月，董又陪同宋美龄赴美就医；次年2月，宋出院后作全美巡回演讲，宣传中国抗战。开罗会议举行时，董又作为蒋介石的随员之一。

这期间，外国记者云集重庆，要求准许访问延安，均遭国民党蒋介石的拒绝。直到1943年10月，董奉命解禁，但经官方批准的只有爱泼斯坦、福尔曼、斯坦因和白修德、爱金生两批记者前往。董对进步、正直的记者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尼姆·威尔斯等所写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斗争的通讯、报道，感到难于处理。

1947年5月，董显光在南京就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新闻

局局长，曾虚白和邓友德为副局长。新闻局对外国记者电讯的检查，一再受到了外国舆论的指责。《华盛顿邮报》1947年12月26日社评说：“这种检查，控制了消息的来源，是最严紧的检查。”1948年12月20日，董辞卸了新闻局局长的职务。1949年同其妻赵荫芎迁居台北，担任了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兼台北《中央日报》董事长。

1949年8月，蒋介石密遣董去香港，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白吉尔海军上将会晤，要求美国政府作如中共攻台愿予台湾以军事和经济支援的保证。白吉尔则建议台湾方面考虑反攻大陆。此后两年间，董经常作为蒋介石的使者往来欧美及日本，进行频繁的游说活动。1952年5月，台湾当局派董出任驻日本“大使”，9月到日本，工作了三年多。1956年5月，董调任驻美国“大使”，直到1958年7月卸任。1971年，董显光在美国病逝^①，终年八十四岁。

董死后，董的合作者、抗战期间任国际宣传处处长的曾虚白在整理董留台遗物时，发现董英文手稿《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即《董显光自传》），将其译成中文出版。董的其他英文著作还有《蒋介石传》、《中国和世界报刊》等。

注：

① 这位是西奥多·罗斯福，于1901—1907年任美国总统。后来又有一位弗兰克林·罗斯福，于1932—1945年任美国总统。

② 见《董显光自传》台湾《新生报》出版，1974年再版本，第26页

③ 同上。

④ 当时《密勒氏评论报》主编为美国记者鲍威尔（J. B. Powell），是董在密

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同班同学。

- ⑤ 端纳，澳大利亚人，早年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1913年与董在北京相识，时端纳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兼《远东评论》月刊编辑。后来任张学良的顾问。1928年起任蒋介石的顾问。
- ⑥ 见日本三省堂编修所编：《简明人名辞典》（外国篇）。1976年版第553页。

郑孝胥

陈贞寿

郑孝胥，字苏戡，号太夷，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生于1860年5月2日（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二日）。他的先世原籍福清县，父亲郑仲濂，咸丰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营缮司、吏部稽勋司主事。郑孝胥早年由叔祖郑虞臣教读经史。二十岁，补博士弟子员。

1882年，郑孝胥中福建省正科乡试解元。1885年，赴天津入李鸿章幕。1889年，考取内阁中书，同年秋，改官江苏试用同知。第二年任镶红旗官学堂教习。1891年，东渡日本，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次年，升日筑领事，不久升神户、大阪总领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郑回国居南京教敷营，后为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练自强军，擢升至监司。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帝下诏广求人才，郑孝胥在乾清宫独奏练兵之策，光绪帝遂派他以道员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变法失败后，郑至武昌。次年，张之洞奏办京汉铁路南段，命郑孝胥为主办京汉路南段总办，兼办汉口铁路学堂。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郑孝胥佐张之洞筹划所谓保全东南半壁之策，由张之洞授权盛宣怀和江海关道余联沅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正式会商，订立了所谓《东南互保章程》。

1903年，郑孝胥辞铁路事，旋赴上海任江南制造局总

办。此时，广西西部和西南部十余州县农民因不堪苛捐重税的负担，发动起义，一部分清军也哗变，在桂越边境行动。清政府惊恐不安，朝议整饬边防应以精军驻防。两广总督岑春煊以郑孝胥善知兵，又好用奇计，遂奏请以道员四品京堂候补督办广西边防事务，专折奏事。郑孝胥乃率湖北武建军左右旗八营共二千余人到龙州，剿抚兼施，把抗捐抗税的农民镇压下去。郑孝胥在龙州三年，练民团；创设学社，开办学堂，并选社中俊秀出洋留学。^①1904年，郑孝胥奏撤边防督办，1905年告病回籍，至上海，筑“海藏楼”，与海内人士诗文往还，并集股创设日晖织呢厂。

1906年9月，清廷为抵制革命，下诏预备立宪。12月，郑孝胥与朱福洗、张謇、雷奋等苏浙闽三省名士及实业界二百多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声言以“奉戴上谕立宪之旨趣，开发地方绅民之政治知识为目的”^②。但清廷空言立宪，缺乏诚意，加之革命浪潮蓬勃发展，于是立宪派开始把活动重心由开通绅民知识宣传转向为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1908年7月，郑孝胥等为了“劝告”和“要求”清政府加快立宪的步伐，联名向清廷请愿要求召开国会^③；又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发函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广东自治会，以及豫、皖、直、鲁、川、黔等省立宪党人，约于是年8月各派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递呈请愿速开国会书。清廷乃发布以九年为预备期限颁布宪法召集议会之诏。

1909年，郑孝胥由岑春煊推荐于东三省总督锡良，任锦绥铁路督办兼葫芦岛开埠事宜，居天津颜氏园，往来于京、津、奉天之间。次年，随锡良入京。不久锡良去职，郑孝胥

遂赴沪。1911年夏，郑孝胥至长沙任湖南布政使甫十日，湖广总督瑞澂因厘定颁行外省官制派郑孝胥赴京陈述，郑遂于9月入京，居舍饭寺，等待召见。10月，武昌起义，郑急驰回任，途次上海，长沙已为革命军光复，道阻不行。不久，中华民国成立，郑孝胥遂韬晦上海。

郑孝胥自认是对清王朝忠心不二，以不作民国官、不拿民国钱的遗老自居，隐居海藏楼，以诗酒自娱。他嫉恶共和，闭门不与世事。室中花瓶犹插清朝黄色小龙旗，凡诗文筒札题字，均用宣统甲子，未尝书民国年号，以示对清室的忠心。^④

郑孝胥工诗善书法。1913年在上海组织“读经会”；1917年在唐元素所创的“丽泽文社”讲学（1920年该社改名“晦鸣文社”）；并创立“恒心字社”。郑孝胥诗主崇孟郊，著有《海藏楼诗集》十三卷。他的书法，出入汉隶北碑间，中年以后，自谓去肉存骨，变为瘦削，尝鬻字自给，岁入数千元。

1923年夏，郑孝胥经陈宝琛引荐入故宫，甚得溥仪器重。他为清室复辟出谋献策，曾几次向溥仪建议：“要成大业，必先整顿内务府”^⑤。次年2月被破格授为“总理内务府大臣”，掌管印钥。他的整顿计划是开源节流，为复辟取得财政上的保证；“开源”的办法，是把清宫《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出版，但遭到北洋政府当局的扣压。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回师北京，囚禁曹锟，迫使溥仪取消帝号，移出紫禁城，迁居什刹海醇王府。郑孝胥和陈宝琛、罗振玉等密谋逃脱之计，并由郑与日本兵营竹本多吉大佐商定，助溥仪潜离醇王府，先至德国医

院，再入日本使馆“避难”。溥仪逃入日本使馆后，郑孝胥暂时南归上海。

1925年2月，溥仪由日本驻京使馆书记官池部保护，出走天津，居日租界“张园”（后移“静园”）。郑孝胥不久亦赴津。在天津期间，郑孝胥认为要复辟成功，惟有“列强”帮助“共管中国”。他对溥仪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按指北伐战争），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⑥。因此，郑孝胥主张“用客卿”、“门户开放”，同任何愿意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他认为：“对外国人只要待如上宾，许以优待，享以特权，外国人绝无不来之理。”^⑦当罗振玉劝溥仪出洋到日本去联日复辟时，郑孝胥则力劝“留津不动，静候共管”。

1926年5月，郑孝胥经罗振玉介绍，和在中国满蒙边境一带活动的白俄股匪谢米诺夫勾结，结成盟兄弟；他又给张宗昌和谢米诺夫撮合，让白俄党羽多布端到蒙古举兵起事，企图袭取满蒙地区建立“反赤复国”根据地。郑孝胥还给溥仪推荐一个奥国亡命贵族阿克第男爵回欧洲展开活动，以取得复辟的声援。他又为溥仪推荐一个叫罗斯的英国人，为复辟专办《诚报》。后来，他通过罗振玉的介绍，认识到“黑龙会”和日本军部系统的力量相当强大，决定暂时放下追求各国共管的计划，转而期望日本军国主义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1928年9月22日，经溥仪和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的同意，郑孝胥和他的长子郑垂、日本浪人太田外世雄东渡日本，向日本军部及“黑龙会”活动复辟，受到各种热心于复辟的日本朝野要人的接待。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总长铃木贯太郎、次长南次郎等劝他“取奉天为恢复之基”^⑧。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认为复辟时机已到，用溥仪名义派人到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活动。他代溥仪起草了一封给南次郎的信，谓：“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⑨三星期后，日本关东军派军部参谋土肥原至津引诱，郑孝胥则从中协助，竭力唆使溥仪赴东北复辟。11月10日，郑孝胥父子陪同溥仪乘日军司令部运输部“比治山丸”轮船偷渡白河，后转乘“淡路丸”渡海至营口，旋入旅顺。

1932年2月，郑孝胥两次赴奉天，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及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一伙，密商建立伪满洲国。3月8日，在日本关东军导演下，溥仪粉墨登场为伪满洲国“执政”，次日，郑孝胥出任伪国务总理，5月兼任伪军政部总长，未几卸军政部总长职，8月兼任伪文教部总长。9月15日，郑孝胥与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一任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大将正式签订了出卖中国东北主权的“日满议定书”，确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借口下，确认了关东军对“满洲”的实际统治。^⑩次年3月，又签订“委任经营合同”，规定将东北所有铁路及铁路所属财产，全部交给“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此外，他还帮助日本军国主义大力推行奴化教育，灌输“顺

天安民”、“亲仁善邻”、“王道政治”等反动谬论，并亲自兼任伪“满日文化协会”会长。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改“执政”为帝制，溥仪正式“登极”，郑孝胥改任伪国务总理大臣。21日，郑被派赴日本进行所谓“修聘”，“朝觐天皇”以答谢所谓“友邦援助之盛意”。回来后，被叙勋一位，并赐伪景云章。

郑孝胥虽是伪满国务院的总理大臣，却要事事听命于其部下日本人的总务厅长，郑曾因发牢骚惹恼了日本主子。1935年5月21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以郑孝胥“倦勤思退”需要养老为名，另换了一个对主子更为忠顺的张景惠接替了他。但为了掩盖矛盾，郑孝胥下台后，仍被赐给“前官礼遇”。1936年1月，郑移居长春柳条路白筑的新宅，创办“王道书院”。同年底，日本帝国还赠他“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1938年3月6日，郑孝胥在“王道书院”公开演讲后，突患肠疾，于3月28日死于长春，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注：

- ① 《龙州县志》上册第225页。
- ②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2页。
- ③ 同②。
- ④ 贾逸君：《中华民国名人传》。
- ⑤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
- ⑥ 同⑤，第243页。
- ⑦ 同⑤，第246页。
- ⑧ 同⑤，第251页。《郑孝胥日记》摘录。
- ⑨ 同⑤，第277页。
- ⑩ 姜念东等编：《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页。

傅筱庵

汪仁泽

傅筱庵名宗耀，字筱庵，浙江镇海人。1872年12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一）出生在镇海小港镇。幼年在私塾就读。其父傅晓春，是当地的帆船主，专为源茂木行运输木材，经常行驶于浙江和福建沿海。

1892年，傅筱庵由其父托人介绍，进上海浦东英商耶松船厂做工。进厂不久，入夜校补习英文。由于他善于逢迎，因此博得该厂大班英人潘特斯的青睐，四、五年后，被派充为冷作间的“拿摩温”^①。此后，傅一方面以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压低工人工资继续讨好洋大班；另一方面又用虚报工人名额、浮领工资等手段，积攒了一些钱。

当时，耶松船厂职工多在该厂附近赁屋居住，这些房产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理严信厚所有。严家每月派人摆渡到浦东收租，因工人生活困苦，拖欠者甚多，为此颇感棘手。傅得知此事，认为是巴结豪门严家的良机，乃毛遂自荐，在该厂每月发放工资时，由傅逐户代扣，汇集后亲自送到浦西三元宫严家。不久严家上下与之昵熟，都以“小傅”称之，傅呼严信厚之妾杨氏为干娘；并经严信厚之子严子均介绍，结识了鲁麟洋行买办虞洽卿、平和洋行买办朱葆三等人。傅又常随严妾杨氏到官僚、大买办盛宣怀家，与盛妻庄氏作方城

之戏，逐渐与庄氏及盛子重颐等相熟，对庄氏大献殷勤，不久被庄氏收为义子，遂成为盛家的心腹。

1909年，傅筱庵经严子均介绍，进招商局所属的华兴保险公司当副经理，辞离耶松船厂。不久华兴公司总经理病死，即由傅继任。

1911年盛宣怀利用邮传部大臣职权，所干的出卖汉冶萍公司产权、收铁路归“国有”等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声讨。上海的汉冶萍公司股东及四川旅沪同乡，为反对盛宣怀丧权辱国，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开会，盛重颐由傅筱庵陪同到会。会上群情激愤，纷纷主张将盛家产业充公赔偿。此时，傅竟当众跪地叩求，在一片扰攘中，使盛重颐得脱重围。从此傅益为盛家所宠信。

辛亥武昌起义后，盛宣怀率全家逃往青岛躲避，在沪财产托傅筱庵代管。上海光复后不久，朱葆三继沈缙云任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筹措军饷。傅与朱早有渊源，认缴饷款后，被都督府委为财政部总参议^②及沪关清理处长，并承认他在招商局、汉冶萍公司及中国通商银行三大企业内盛家股权的代表身份。1914年4月盛宣怀重掌招商局、汉冶萍公司职权后，任傅兼招商局经理各地栈租之缺，以酬其保产之功。此时傅已是中国通商银行董事，并任上海总商会第一届议董，负责对外交涉事务^③。

傅筱庵的社会活动有了扩大，更助长了他个人追逐名利的欲望。1916年与严子均、虞洽卿、朱葆三等人集资创办祥大源五金号，自任总经理，包揽了招商局等企业的五金进货业务，利润逐年增加。同时傅又先后充当了专营五金等洋货

进口的美商美兴洋行和英商长利洋行的买办，独霸了上海市场的五金进口贸易，俨然成为大富豪。1916年盛宣怀病死，傅这时已是招商局董事，并任该局积余产业经理、内河轮船公司经理兼主船课长。由于他执掌各轮买办及职工的任免大权，得以勾通某些买办，走私鸦片，坐地分肥；又勾结鄱乐煤矿公司谢衡臆，包办招商局各轮燃料，受贿营私。1921年4月，招商局股东大会上，股东孙某提议要求彻查帐目，并在这次会上撤销了傅的董事和积余产业经理职务。傅恼羞成怒，指使流氓混入股东会，推翻议案；并勾结法驻沪总领事，控孙诋毁其名誉，告于法租界公堂。后经施肇基出面调解，恢复了傅的董事职务，才算结束了诉讼案。此后，傅的气焰嚣张，总经理盛重颐愤而离职，傅遂独揽局务。但是股东反傅的浪潮仍不断发生。1922年秋，股东张某向北洋政府交通部控告傅败坏航政，营私舞弊，侵占公产。交通部派员来沪彻查。傅拉拢朱葆三、陈炳谦等十一人，先行组成股东自查检查会，阻挡部员检查^①，同时又请出张謇领衔，江浙豪绅联名致电交通部，为傅疏通，后来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1924年傅筱庵争夺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位，因名声不好而落选。1926年再选时，傅早作准备，依靠军阀孙传芳作后台，玩弄各种手法，终于当选为会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不久东路军攻入江西孙传芳地盘。傅调来招商局轮船九条，供北军孙传芳作军运。9月9日，江永轮因装运弹药发生爆炸，船员八十八人罹难^②。招商局海员纷起罢工，反对军运。傅勾结孙传芳的爪牙，封闭中华海员工人联合总会，捕去职员多人，对罢

工工人横加镇压^⑥。不久，上海工人纷纷响应北伐军，一再起义。傅以商会会长名义除勾结军阀进行武力镇压外，并收买流氓王皋生、徐忠信等人，谋从内部破坏工运，并于12月召集招商局机器厂、祥生船厂等三十多家大厂，筹备成立“上海机业劳资总联合会”，自任委员长，玩弄“劳资联合”的骗局^⑦。

孙传芳穷途末路，联合张作霖，组成安国军。1927年3月孙传芳、张宗昌发行库券一千万元，作为其最后顽抗之军费。傅召集上海银钱业摊认，遭到反对，无一应者。傅为表示对孙的报效，特从中国通商银行准备金中拨款捐赠二百万元。

不久，北伐军进抵嘉兴，傅筱庵见风使舵，施展其投机取巧的两面手法，派遣亲信持函往见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表示欢迎；同时又在孙传芳离沪时，亲往送别。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孙军溃逃。3月22日，白崇禧进入龙华，派人持函往晤傅筱庵，称傅为“商界领袖，群流景仰”。傅接函后喜出望外，邀同方椒伯等往访，对白恭维备至，并筹办大批慰劳品送往犒军。次晨，复邀集英、法、美等国驻沪总领事，亲自陪同往晤白崇禧。正当此时，国民政府突于3月26日下令通缉傅筱庵。傅当天得到消息，连夜搭轮逃往日占之大连。傅潜居大连三年，经常与日本海军特务小松、石井等人往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撤销对傅的通缉令，傅于10月16日重返上海，复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后转任董事长），并充当美国钞票公司买办、英商耶松船坞及机器造船厂董事等职^⑧。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图谋华北，傅应黄郛

之邀，曾赴华北一行。回沪后，鉴于抗日气氛日趋高涨，不敢妄动，深居简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上海沦陷，傅不甘蛰居，与日本政客、浪人往来频繁，并和日本侵略军搭上关系，于1939年10月16日叛国投敌，继伪“大连市政府”市长苏锡文之后，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傅任伪职期间，日本侵略者派甲斐弥次郎为顾问，从旁监视，用人行事绝无自由。傅想捞钱也无法下手。做了半年“市长”后，他自己哀叹说：“我每月薪水公费收入为两千元，只够用来敷衍日本海、陆军军官和浪人，有时还得赔本，这是一笔蚀本生意，非始料所及。”“现在是骑上虎背，由不得自己作主了。”^⑨

1939年，汪精卫到南京谋组伪政权，蒋介石指使戴笠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等人来沪谋刺汪。通过策划，由与傅筱庵有私交的开滦煤矿沪经理许天民前去勾通傅，拟待汪来沪时由傅设宴诱杀。傅一面佯允，一面向汪告密，许等因此被捕。蒋介石得报后，以傅不为己用，即命戴笠将傅干掉。戴令军统沪二区区长陈恭澍组织多次狙击未果。傅有个他所信任的老佣人朱升源嗜酒成性，沪军统人员遂在虹口斯高塔路（今山阴路）傅宅附近开设酒店，借以与朱升源交好。朱少时在日人工厂当过童工，曾受日人的欺压虐待，故有一定的民族正义感，曾劝傅不要再当汉奸，但傅不听。此时在军统特务人员的劝诱下，朱亦愿杀傅，为民族除奸，当个好汉。1940年10月10日深夜，趁傅宴游归来，倦极熟睡之际，朱用切菜刀向傅头部猛砍三刀，当场将傅杀死后逸去^⑩。

注:

- ① 英文“第一”的音译，即上头或领班之意。
- ②、⑧ 1940年10月13日《中华日报》。
- ③ 1912年《上海总商会会员录》。
- ④、⑤ 《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
- ⑥ 1926年12月1日《申报》。
- ⑦ 1927年1月3日《时报》。
- ⑨ 《汪伪汉奸傅筱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第148卷。
- ⑩ 郭旭：《汉奸傅筱庵之死》。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五辑第131—135页。

张 啸 林

朱剑良 许维之

张啸林是旧日上海的大流氓头子，与黄金荣、杜月笙号称“上海三大亨”。张原名小林，乳名阿虎，后更名为“寅”，以啸林为号。生于1877年6月14日（清光绪三年五月初四），浙江省慈溪人。张父是个木匠，早故，全家依靠母亲劳动度日，生活艰难。

1897年，张二十岁，在乡下难以谋生，举家移居杭州府拱宸桥。到杭州后，张小林与兄张大林一起进杭州机房学织纺绸。但是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专同流氓地痞为伍。不久，张弃工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在校与周凤岐、夏超、张载阳等人同学，这是后来他同军阀方面有勾搭的由来。张未毕业就离开武备学堂，拜杭州府衙门的一个领班（探目）李休堂为“先生”，充当李的跑腿；并在拱宸桥一带开一茶馆，结交了一帮地痞流氓，专以寻衅打架、聚赌敲诈为生。当时拱宸桥一带另有一赌棍，诨名“西湖珍宝”，以张小林经常勾引他的赌徒为由，同张结下了仇恨。一次，“西湖珍宝”纠集手下的赌徒向张寻衅，张因寡不敌众，不得不与同伙躲到别处，但仍靠聚赌诈骗为生。

张小林除在杭州城里赌博骗钱外，还于每年春茧上市和秋季稻谷收获的时候，到杭、嘉、湖一带引诱农民赌博。乡

间的农民受张愚弄者大有人在。有的当空卖绝，有的投河上吊，因而民愤极大。清末宣统年间，杭、嘉、湖一带人民曾投状上告，但张小林凭他在衙门里的熟人关系，仍然逍遥法外。

1919年秋张全家迁往上海，先后在三马路(今汉口路)开小花园旅馆，在五马路(今广东路)“满庭芳”一带吃赌台和妓院“俸禄”，又在劳而东路(今襄阳北路)开斗牛场，四马路(今福州路)大兴街一带设茶会。他专干勾嫖串赌、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等罪恶勾当。这时张与英租界的著名青帮流氓季荣卿结识，臭味相投，一见如故，订为莫逆之交。张还通过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认识了杜月笙。这期间张小林曾拜了青帮“大”字辈樊瑾成为师，成为“通”字辈成员，并在沪、杭一带广收门徒，发展黑势力。张身材魁梧，膂粗力大，凶狠毒辣，曾自比为奉系军阀张作霖；他的门徒凑趣捧场称他为“张大帅”。

当时，上海滩上的大流氓各霸一方，相互争雄。一次，张小林为了夺取码头上贩运水果的权利，和广东帮流氓大打出手，混战一整天，终于夺得水果贩运特权。后来，张又和英租界流氓范开泰(译名“乌木开泰”)、范回春(译名“象牙回春”)、苏嘉寿等一起，为抢夺鸦片贩运权同法租界流氓金廷荪等发生殴斗。金廷荪是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黄金荣的门徒。而张小林和浙江省长张载阳、督军卢永祥有私交，常为卢、张押运和代销鸦片。当时任松沪护军使的何丰林原是卢永祥的部下，张与何丰林也搭上了关系，其后并与何的缉私营统领俞叶封结为儿女亲家。黄金荣、杜月笙为了利用

张小林同军阀的关系，不想同张反脸；张为了在法租界发展势力，也不想同黄、杜弄僵。于是请出在上海的青帮“大”字辈“老头子”出面调停，提出了所谓“黑心钱公平用”各帮合伙贩运鸦片的约定。有一次，黄金荣因触犯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而遭监禁，张运用和军阀的关系伙同杜月笙出力营救，使黄获释，黄对此十分感激。从此黄、杜、张三人结为把兄弟。

1923年左右，黄、杜、张三人正式合伙搞鸦片联运。张依靠何丰林的保护，把鸦片从吴淞口安全运到十六铺，再由杜月笙派“小八股党”包运到法租界，然后由黄金荣发“通行证”。这样，黄、杜、张三个青帮流氓头子就成了上海赫赫有名的贩毒集团的首脑。“三鑫公司”是他们贩卖鸦片的大本营。他们借此不但自己大发贩毒财，也给军阀和租界当局带来了经济收入。所以尽管这期间统治上海地区的军阀数易其人，但黄、杜、张都是被争相罗致的对象。1924年，黄金荣把法租界华格泉路(今宁海西路)两亩地基分赠给张，杜，造了两幢洋房，张住东宅，杜住西宅，一墙之隔，亲如一家。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准备公开叛变革命，指使上海的流氓头子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反革命的急先锋。张小林是这个组织的三大头目之一。黄、杜、张指使大批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进攻，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配合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杀事件。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委任黄、杜、张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等职，以酬其功。从此，张小林成了国民党统治层中的“党国要人”。他们还和国民党的官员王柏龄、陈群、杨虎等人结

为把兄弟。这时租界当局也对张刮目相待，任命他为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会长。

1930年，张小林“荣归”杭州故里，轰动一时。当地豪绅、政客、地痞流氓为他摆酒接风；无耻文人许吾生为张献名为：“寅，号啸林”（张属虎故名寅；“啸林”即虎啸于森林之中）。此后，杭、嘉、湖一带的盗匪歹徒、地痞流氓，纷纷投在张的门下。张在杭州西湖畔和莫干山皆建造有私人别墅。

以后，张还与杜月笙等在上海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合开了一家上海最豪华的大赌台。他们还将用非法手段得来的巨款投资于银行和工商企业，由流氓一变而为“实业资本家”。国民党中的要人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也和他们有了来往。1932年，经杜月笙推荐，张当上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监事和中汇、交通等几家银行和公司的常务董事或董事。张啸林的“六十大寿”、黄金荣的黄家花园竣工和杜月笙的“杜氏家祠”落成，竟成了轰动当时上海滩头的三大“盛典”。由段祺瑞、蒋介石领衔一百人署名为张啸林六十寿辰的征文启事，则对张大加吹捧^①。

三十年代后，杜月笙在上海的权势超过了黄、张，张对杜渐生嫉妒。1935年，蒋介石施行“法币”政策，杜月笙事先得到了消息，没有把消息告诉张，自己趁势投机狠捞了一笔，张对此深为不满。张为人处事粗暴，不如杜善于玩弄小恩小惠，因而张的门徒纷纷改换门庭，投拜到杜的门下。张的儿子张法尧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张曾托杜向蒋介石引荐，但一直没有得到蒋的重用，张怪杜不肯尽心。由于上述种种，张、杜之间开始产生矛盾，张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关系也渐疏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沦陷前夕，蒋介石指使杜月笙拉黄金荣、张啸林同去香港。当时黄以年老多病为借口，留沪不走。张认为杜月笙去后，如果黄金荣不问外事，正是他可以独霸上海的好机会，所以决定也留在上海。“八·一三”沪战开始，张正躲在莫干山避暑，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潜往莫干山和张密谈。上海沦陷后，张即返沪，指使其门徒接受日本特务的指使，为侵略者效劳。

1939年前后，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授意下，张啸林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并分派其门徒到四乡为日军收购急需的煤炭、大米和棉花等重要物资，甘心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并乘机大发国难财。

1939年底，张啸林得日本特务机关支持，准备建立浙江省伪政府，由他当省长。事为国民党特务系统所探悉，决定除奸杀张。

1940年1月15日，张啸林的亲家俞叶封约张去更新舞台看戏，张因临时有事未到，结果俞在戏场中被人刺死。不久，有一次张乘车外出，一排枪弹射穿张座车玻璃窗，但未命中，得免于死。经过这样两次事件后，张闭门不出，并雇了二十多名护宅保镖，日伪也派宪兵在宅外守护。又不久，国民党特务用重金收买了张啸林的随身保镖林怀部。林于8月14日乘张啸林和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在楼上商量事情之际，故意在楼下与张的司机大声争吵，张从楼上窗口探头责问时，林拔出手枪一枪命中，射杀了这个地痞流氓和汉奸，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注：

(1) 《申报》1936年6月2日。

主要参考资料：

郑竹友、王亚陆著：《张啸林的一生》，《资料汇报》第一辑，1964年5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上海市文史馆编印。

《张啸林之子张法尧谈话记录》；《张啸林的司机阿四(王文虎)谈话记录》；《中统分子徐亮谈话记录》（以上均见《大流氓杜月笙资料》，现藏华东政法学院资料室）。

章君毅著：《杜月笙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方液仙

任嘉尧

方液仙，字传沆，小名阿揆，浙江省镇海县柏墅人，1893年12月1日（清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生于上海。方家世代经商，在沪、杭、甬及南浔等地经营钱庄、典当、银楼、糖行、南货店、药材店等，仅开设的钱庄就有“九裕”（安裕、康裕、敦裕、承裕等）“十三康”（安康、瑞康、益康等）计二十二家之多，^①并拥有大量土地。其父方选青因不善经商，家道逐渐中落。

方液仙少年时，初在美国教会办的上海中西书院读书。拜德国人窦伯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化验师）为师，学习化学，同学有吴蕴初（后来经营天厨味精厂）、李润田（后来主持鉴臣香料厂）。方在上海圆明园路安仁里寓所设立化学实验室，继续钻研。早年曾与友人合资开办鼎丰珐琅厂、龙华制革厂以及硫酸厂、橡胶厂等，大都是国人首创的企业，但均因经营不善，产品销路滞塞而中辍。

辛亥革命那年，方液仙才十九岁，他在上海独资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下称中化社），资金一万元，小量生产牙粉、雪花膏等日用品，雇人挑货郎担上街叫卖，初时颇多亏损。

“五四”运动激励人民的爱国思想，共谋抵制洋货，振兴

国货。中化社产品的销路从此打开。1920年，其叔父方季扬（钱庄资本家）见中化社有利可图，乃参加投资，总资本增加到五万元。中化社改组为股份两合公司，在河南路设总公司，延聘胡士浩为经理，于广东路设发行所。初在重庆路租屋三间作为工场，后购置槟榔路（今安远路）地基建立厂房，即后来的第一厂，制造化妆品及“三星”牙膏。1923年续建第二厂于星加坡路（今余姚路），专门制造调味粉（“观音粉”、“味生”、“味母”）及酱油精（“三星牌”），与吴蕴初的“天厨味精”一起，逐渐将日本货“味之素”挤出中国市场。

1928年，方液仙于槟榔路再建第三厂^②，专门制造“三星蚊香”，附带生产淀粉、酱色等。为了解决蚊香主要原料除虫菊的自给（本来用日本货），方在浙江余杭瓶窑镇及上海北新泾安浪渡设农场试种，聘留日农学专家俞诚如主其事。试种除虫菊成功后，又在浙江临平、温州和江苏南通、海门等地农村推广种植，解决了蚊香主要原料的供应。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三星蚊香”渐受欢迎，一向独占中国市场的日货“野猪牌蚊香”终于败北。

1931年，中化社增资到四十万元；1935年，再次增资到一百万元，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会，方季扬任董事长，方液仙任总经理，以表弟李祖范为经理。1938年，中化社增资到二百万元。

到了1939年，中化社又在第一厂附近建立第四厂。这是中化社设备最新、规模较大的一个分厂，制造箭刀牌肥皂，后来还制造甘油、薄荷素油、12醇硫酸钠、山梨醇等原料，并设立了成品仓库。在此期间，方液仙投资兴办了一批直接

为中化社服务的工厂，有：生产玻璃瓶的晶明玻璃厂，生产牙膏软管的中国制管厂等。至此，中化社产品大致齐备，原材料基本自给，经营管理有所改善，生产成本相应降低，业务蒸蒸日上，成为旧中国日用化学工业规模最大的工厂。

当时，中国化学工业社设总管理处，董事长由总经理方液仙兼，经理李祖范。下设有六部、三室、九科，职员多达二百多人，而工人不过四百多人。在国内各大都市设立了发行所，南洋各地则设有专职推销员。^③

方液仙是化学技术里手，自己懂得分析化验，改良产品，不断钻研创新。在技术制造及管理制度方面他不故步自封，曾经数度派人去美国、日本考察，引进一些先进技术设备，学会不少管理及技术方面的有益经验。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重视培养。如王修荫、孙瑞耕、黄勉英原来文化程度都不高，后来被培养成为总化学师、副厂长、技术室主任。他在经营方法上，对大批发商采取分级累进的经销特约制：一年销货一万元以上的，给以百分之三的酬劳；二万元以上的，百分之四；三万元以上的，百分之五。这样鼓励多销多得，利之所在，大批发商甘于效劳。对职工薪给采取低薪、分红制，月薪较低，年终分红数额较大。这个制度，资方在一年大部分时间里可将花红暂作周转资金，有利于扩大再生产。这是一种挖空心思的剥削方法。职工们在物价币值稳定的年份，实际所得尚较他厂为优厚，故能接受这种办法；可是到了通货膨胀币值不断下降的年头，平时工资连家人糊口都不能解决，劳资矛盾便激化了。^④

方液仙在经营中化社的同时，还主持上海中国国货公司。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中化社总务科长李康年向方建议：集合部分国货工厂筹办联合商场。方遂委李康年主持其事，由中化社联络美亚织绸厂等九家较大的工厂，选出十八种商品，在南京东路绮华公司原址举办“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在1932年“九一八”周年纪念日开幕。由于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宣传以及国货商品本身的质量能与日货抗衡，国货商场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方液仙乃萌创办中国国货公司之志，由中国化学工业社、美亚织绸厂、五和织造厂、鸿新布厂、华生电器厂、中华珐琅厂等几家大工厂，筹集资本十万元，于1933年2月在南京东路大陆商场开设中国国货公司，由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康年为经理。他们对经销厂商货物采取寄售方式，每月二十五日结帐，月底付款，一般开的是五天期票。这样，经常的流动资金周转增多了。因为国货公司商品众多，服务周到，广告宣传有方，又采取薄利多销、商品寄售等方式，有利于供需双方，加之人心向往抗日救国，绝大多数人把买用国货作为爱国行动，所以营业鼎盛。甚至促使当时一向经售舶来品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公司也不得不销售国货商品，以应顾客需要。半年后，国货公司又增资十万元，并扩充二楼南部商场，营业获得不断发展。^⑤

联合创办国货公司的各厂商，为了进一步向外地扩展业务，于1937年5月推方液仙和吴鼎昌、蔡声白、吴蕴初、王志莘、王性尧等为创办人，又在上海创办中国国货联营公司。联营公司集中原中华产销协会会员厂商的货物，向外地推销，在国内各大城市先后设立中国国货公司，对发展弱小的民族

工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⑥

方液仙主持的中化社及国货公司业务不断发展，对决心独占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个心腹之患，也是它对华经济侵略的绊脚石；再加上“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全民抗战时，方液仙先后在厂内及胶州路“申园”办了两次伤兵医院（后一次由著名外科医生倪葆春主持），也深为日本侵略者所忌恨。^⑦于是，威胁利诱纷至沓来，有来谈“合作”的，有来商议租用出让机器设备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在汪精卫傀儡政府袍笏登场前夕，大汉奸陈公博派傅筱庵前来游说方液仙，希望方与伪政府合作，说什么“日本人知道你很关心政治，记得你在战争中还办过两次伤兵医院，因此很器重你”，并以伪实业部长相许。方当即严正拒绝：“我是开厂做生意的，当不来大官。”^⑧他并规劝傅还是继续搞实业好，不要和汉奸们同流合污，否则将身败名裂。日伪见引诱不成，转而加强威胁。一时来自敌伪的恐吓信、警告信日有数起，方不为所动。

1940年夏，孤岛上海局势日益混乱，恐怖气氛日甚一日，方液仙深居简出。7月25日，方因蛰居多时，耳目闭塞，打算去附近几个工厂看看，便于上午9时从星加坡路寓所驱车外出，甫出门，就遭埋伏在附近的四名暴徒突然袭击，先打坏汽车轮胎，枪伤保镖一人，再打伤了方，又把方强行挟持到预先停放在路边的汽车上，向越界筑路方向仓皇驶去。事发后，方氏家属起初当作强盗绑票，要勒索一笔巨款。过了好几天，仍然音讯全无，下落不明。^⑨直到该帮匪徒因犯他案被捕受审时，才明白这是日伪精心策划的政治谋害案。^⑩

爱国实业家方液仙遇害时年仅四十七岁。

注:

- ① 据原中化社襄理林汝康口述。
- ② 中化三厂设在租界越界筑路地段。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后，由于设在越界筑路地段的三厂，租界当局力量达不到，方液仙将中化厂向美国注册，挂上“美商美联实业公司”的招牌，以保护产权。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挂过“美商”招牌的中化社被敌伪军管。
- ③ 据原中化社经理李祖范、襄理林汝康口述。
- ④ 在方液仙被绑架后那年冬天，中化社发工资的办法由于通货膨胀恶化，劳资矛盾激化，职工曾掀起一场“争取吃饭”的罢工斗争。
- ⑤ 据原中国国货公司会计主任叶子渐口述。
- ⑥ 据叶子渐及原国货联营公司周锡洪口述。
- ⑦ 据李祖范撰写的《中国化学工业社》（初稿）。
- ⑧、⑨ 据方液仙爱人钱彬英及其子方曾泽、女方之雄口述。
- ⑩ 李祖范：《中国化学工业社简史》。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二辑。

项松茂

孙德祥

项松茂，名世澄，以字行，别号渭川，1880年10月9日（清光绪六年九月初六日）生。浙江鄞县人。先世以耕读为业，至其父项锦三，始与其兄项仕元在杭州合伙经营皮毛牛骨山货行。项松茂幼年随父读书，稍长，进入私塾，十四岁到苏州陆姓皮毛牛骨行当学徒，工作繁重，生活艰苦。项勤工苦学，满师后为店东所倚重，委以帐务。

1900年，项松茂经在上海中英药房任经理的舅父吴志成引荐，入中英药房任会计。项办事认真，“遇事富有责任心”^①，而且“无不心细如发”^②，初露了他的才能。1904年吴志成去世，陈镜如接任经理，委项赴汉口开设中英分店并任经理。项在汉口分店独当一面，积极规划经营，“业日以隆”^③。1909年汉口组织商会，项被举为董事。1911年项受聘任上海五洲药房经理。这是项赖以发展成为西药业巨子的基地。

五洲药房于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粹芳、杭州广济医院药剂师谢瑞卿、中法药房总经理黄楚九等合资创设，“资本不过万元”^④，初由谢瑞卿任经理。五洲药房制销的药品中有吗啡含量的“甘露戒烟丸”，利润甚厚。当时谢瑞卿不专心经营，暗自制销“清醒戒烟丸”，另谋私利，经劝阻无效，夏、黄乃命谢退伙，联名电邀项来沪接任经理之职。项到任

后，即以“勤俭”二字作为办企业的方针，先将店中华丽陈设变卖移充经营资金，增为规银一万五千两。项又拉拢钱庄跑街俞钜卿为副经理，取得资金上的支持。1912年将店址自福州路广西路口迁移至福州路河南路口。项工作勤奋，“每至夜半始寝”^⑤。他加聘药剂人员，成立“合药间”，加强自制本牌成药，计有“人造自来血”（治疗贫血症）、“补天汁”（健胃补虚）、“海波药”（清血解毒）、“月月红”（调经）、“助肺呼吸香胶”（化痰止咳）、“树皮丸”（健脑润肠）等药。

项松茂鉴于国内西药市场的日趋扩大，乃与夏粹芳商定，将原为合伙组织的五洲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15年正式宣告成立，以夏粹芳（后为其子夏筱芳担任）、黄楚九、项松茂、陈如翔、印锡章等为董事，张蟾芬为监察。次年黄楚九退出五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口的西药和原料减少；“五四”运动又掀起了全国人民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潮，从而为国产成药打开了销路。五洲的“人造自来血”1920年年产量高达五万三千六百二十五公升，比1913年猛升百分之一百四十三点六。同时又增加了“代参膏”、“肥儿疳积糖”、“鱼肝油精丸”、“麦液止咳露”和“止咳杏仁露”等品种的生产。营业额和盈余额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由1915年营业额三十一万元，盈余一万七千元，到1920年时营业额即上升为一百三十七万三千八百三十一元，盈余三万二千六百九十二元，各增加百分之三百四十三和百分之九十二。这些高额利润的获得，为五洲扩展事业提供了经济实力。

西药业原是以贩售进口药品和制药原料为主要业务，但

在项松茂主持下，开辟了代理欧、美厂商经营化学仪器、医药器械的进出口业务，获利甚厚。

项鉴于“五四”后爱国运动的高涨和国外制药业的进步，遂有发展我国民族制药工业以挽回利权扩大进益的愿望。1920年项出资十四万二千两购进了闸北大通庵路地基，次年将五洲资本增为五十万两，扩建厂屋栈房。时有开设于徐家汇的固本肥皂厂欲作价出让，项与之交涉，结果以十二万五千两的低价盘进，并议定只付给现银二万五千两，另以四万两作为加入五洲股份，六万两作为存款，期限二年，利息八厘。如此安排，五洲实际上所费代价不多。成交以后，即改名为“五洲固本皂药厂”，内设制皂与制药两部。1922年又经卢鸿沧的介绍，以一万二千八百零六元的代价，收买了德商耐尔生氏所办的生产臭药水的亚林化学厂。两厂的收买，构成了五洲企业集团的柱石。1925年五洲又进一步收买了中华兴记香皂厂、南洋木塞厂，并附于皂药厂。

五洲皂药厂的生产设备，经过添置充实，日臻完善，皂、药生产也日新月异。药品生产方面，在原有老产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品种。按照各国药典的不同规格，用中草药炼制酊剂软膏，特别是开始自制“牛痘疫苗”和“醚精”、“硫酸低铁”、“纳夫他林”、“柠檬酸”等化学药用原料，跨出了西药业历来依赖外国原料加工的境域。

项松茂为了推销产品，广开门路。他与上海各大医院和开业医师开展业务联系，甚至以资金和商品帮助伯特利医院和福幼医院的建立。他积极参加国货展览，编印《卫生指南》，扩大宣传。在本外埠广设支店，发展同其他店铺的领牌联号

关系，放帐赊销。这时“人造自来血”年产量继续增高，在遍销国内的同时，并委托香港瑞昌西药行、新加坡合丰商店、仰光兴华公司、越南吴吴药房等在东南亚地区代销。肥皂生产方面，在继续制销家用洗衣的固本皂外，增加生产了“高花香皂”、“玫瑰香皂”、“檀香皂”、“透明药皂”、“硼酸浴皂”等多种。

“五洲固本皂”问世初期，就受到了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简称“中皂”）的“祥茂肥皂”的激烈竞争^⑥。当时五洲的资力和规模，与“中皂”相比，强弱悬殊。项不畏对手强大，认真周旋，在质量、价格、市场三个主要方面和“中皂”开展了艰巨的竞争。在质量上，项先亲往中皂厂深入考察其内部实况，继派制皂部主任傅怀琛乔装工人，深入中皂厂当临时工，历时九个月，尽得其技术上的奥秘及肥皂的成份和含量；回来反复对比试制，将固本皂的主要成份总脂肪酸含量提高为百分之五十五，水份减为百分之三十四，结果各项质量指标都超过了祥茂肥皂。在市场上“中皂”布成了推销网，划分上海、浙江、华南、华北、西北几个大区，派驻区长和营业员积极推销，月薪外再发奖金，在上海还采取了寄售、放帐、补价、赠送、发奖券等等办法争夺市场。五洲则针锋相对，在外埠由五洲药房支店、领牌店和代销店推销；在上海市区内得到烟纸业大同行谦泰新老板沈德华的支持，沈联络大同行同业三十余家组成专为推销固本皂的大成公司。五洲酬付大成公司以每箱肥皂佣金银二钱，交货后放帐六十天，如肥皂跌价补给差价，年终结算再按推销箱数付给酬劳。因此大成及各零售店对推销固本皂都十分卖力。

1924年，五洲固本皂销售额虽达银三十八万二千两，但由于英商的竞争，年度结算时仍亏耗五千余两。项只得“以血养皂”，即以“人造自来血”等药品利润来弥补支持。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民众群起抵制英货和日货，遂使固本皂销路大增，供不应求，日产达五百余箱，该年营业额迅增至银五十九万六千两，比上年骤增二十一万四千两。在反帝风暴中，五洲固本皂终于战胜了祥茂肥皂。^⑦

1929年，项松茂又盘进了宁波的公济药棉绷布厂，改为东吴药棉绷布厂，生产“脱脂药棉”和“脱脂纱布”。至此，五洲在本外埠先后增设的支店总计已有十七处，领牌联号共达五十五处。到1931年，“人造自来血”的年产量已递增到七万五千五百六十三公升，固本皂的日产量已增达二千余箱，年营业额已增达七百六十四万余元，盈余额多达二十三万余元。

五洲公司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随着业务的发展和扩大，日臻健全和严密。在董事会、经理之下，定有店务、厂务、店厂联席会议和技术会议，又按生产、营业、财务、管理四个系统设置科、股，分工职掌各项具体业务。1928年公司资本总额再增至一百五十万元。职工由最初的三十余人至此增加到四百余人。

随着五洲业务的发展，项松茂又向大丰工业原料公司、开成造酸公司、南洋烛皂厂、温州森林农林场和上海新亚药厂等十三个企业单位投资附股，兼任它们的董事，以取得国产原料如硫酸、松脂、除虫菊等的低价供应，同时以自产的甘油、硝酸、盐酸等原料销给大丰等公司厂家使用，密切了

交换协作关系。1931年，项与邬志豪共同发起筹组宁波实业银行，进一步与金融资本结合。项还与高恩洪联合组织沪闵南柘长途汽车公司，出任经理兼董事。五洲在地产方面的投资亦达五十五万余元。至此，项肇划经营的五洲药房已基本成为具有现代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集团。项松茂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他历任上海租界华人纳税会理事、上海市商会议董、工商部国货展览会委员、中华国货维持会执行委员、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工商管理协会专门委员、华商皂业公会主席委员和中国红十字会特别委员等职。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他积极从事救灾恤贫慈善公益事业。

项经营事业的成功，与他重视培养和使用人才有很大关系。1923年他聘任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生张辅忠为制药部主任，1927年张赴德国留学，1930年张在柏林大学获得药剂化学博士后留德继续研究，项曾给予资助；他委托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招考高中毕业生培训店员，由五洲店厂的技术和业务骨干担任教师。同时直接招考大学化学系毕业生以骨干使用。他还订购国外科技资料，供职工阅览参考。

项自支月薪高达四百元，极少数高级职员和技术人员的工资也较高。大部分店员和工人的工资在十至二十元之间；所用学徒按其学习年限仅给一至五元的月规钱。项曾拨款在公司内成立银产部，鼓励职工储蓄，并借以为企业筹集资金。1926年大革命期间，五洲职工组织了工会，由于大势所趋，项与工会订立了《职工待遇条例》，次年接受了职工要求加薪一至二成的条件。1928年后在厂内设立医务处，还在徐家汇斜徐路天钥桥东设立松茂小学，供职工子弟入学。

“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上海抗日会通过了组织抗日义勇军共赴国难决议，市商会开会员大会通令各业公会限期成立。项积极响应，在厂内编组了义勇军一营，自任营长，聘交通大学军事教育每日施以军事训练^①。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时，项勉驻厂同人照常生产，多制军用药品，以供军需。时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五洲第二支店邻接战区，住有店员蒋邦毓、虞耕丰、童永才、戚德江、徐和杰、丁兆年、陈汉坤、吴宸良、陶赋、李生才、周瑞龙十一人留守。据传有日军伤兵车辆驶近店址，受到我爱国志士的射击。日军于1月29日突来店中搜查，发现藏有义勇军制服，乃将十一人全部劫去，捣毁店堂。项为了营救被难职工，冒险亲往第二支店视察情况，遇相识的日本商团成员小山站岗，与小山约定次日相晤。1月30日下午，项偕朱灿如持盖有私章的名片再往，而小山不在；遇相识的芬兰木材商陪同进店，即为日本便衣所监视，芬兰商人和朱灿如离去，项即被日军缚送蓬莱路俱乐部，转解江湾敌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敌军头子恼怒其敢于抗日，项则抗争不屈。次晨，项与被捕店员同被杀害，时年五十二岁。后以尸骨无着，衣冠入殓。

注：

- ① 《松茂小史》《密勒氏评论报》。
- ② 刘愷襄，《纪念项松茂先生》《五洲、项松茂先生纪念号》（1934年1月）。
- ③ 黄炎培，《项松茂先生传》《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1936年）。
- ④ 卢志学，《百年来的上海工商业》《自修周刊》第50—51期，1939年2月28

日、3月7日。

- ⑤ 高友唐：《项松茂先生行述》。《五洲、项松茂先生纪念号》（1934年1月）。
- ⑥ 祥茂肥皂原是英国祥茂公司（William Gossage & Sons, Ltd）制造的一种洗衣皂，由上海英商祥茂洋行（Burkill & Sons）进口经销。后在上海英商白礼氏洋烛厂内附设制皂车间就地生产。英国肥皂托拉斯利华兄弟公司（Lever Brothers & Unilever）于1884年在伦敦设立，1925年时资本已达三亿美元，以制造“日光”（Sunlight）肥皂、“力士”（Lux）香皂等闻名于世，分支机构遍布四十多个国家，是世界肥皂工业的霸主。1923年在中国设立子公司即中国肥皂有限公司，资本为八百万元，在杨树浦购地建厂，拥有皂化锅二十只，成为远东最大的制皂厂，祥茂肥皂即改归其经营。
- ⑦ 项泽楠：《五洲固本肥皂与祥茂肥皂的竞销经过》。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64年4月。
- ⑧ 《新闻报》1931年9月30日。

陈万运

张 志

陈万运，浙江慈溪人，1885年9月15日（清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七）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幼年时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十五岁到上海一家烟纸店当学徒。陈为人稳健、机智、善于辞令，在学徒期间，工作勤奋，对珠算和心算都有过人本领。

清朝末年，大批洋货倾销我国市场，其中洋烛也是重要商品之一，以后英美商人在我国设厂制造，我国各地对洋烛逐渐采用，销路日广。棉线烛芯，一名洋烛芯，系制造洋烛的主要原料之一，英美制造商须从海外购进。当时日商中桐洋行经营烛芯，常供不应求，营业颇佳。陈万运和沈九成、沈启涌三人认为制造洋烛芯不失为一条生财之道，而且是中国手工业可以做到的。于是他们各出资本一百五十元，于1912年4月在上海土庆路，开办一所烛芯手工作坊，小屋一椽，艰苦创业，不断改进，遂使“金星牌”国产烛芯问世。不久这种国产烛芯逐渐能与舶来品在市场上相抗衡。因为是三人合伙经营，当时的“实业救国”论正很时髦，所以就取名为“三友实业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事绵延，英商洋行进口烛芯中断，亚细亚火油公司及美孚洋行等所属在华洋烛制造

厂向日商进货，而日商居奇抬价。当时“三友”所产国货烛芯质地较好，售价仅及日货之半，且在国内市场已有相当声誉，英美洋行所属工厂转向该社大笔定货，并透支资金，俾能扩大生产。虽然三友实业社生产的烛芯仍是供应洋商在华工厂，然而这对日货烛芯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陈万运在此期间努力经营，营业兴旺。三友实业社于1915年3月增资至八千四百元，改组为无限公司；同年12月再增资至三万元，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17年该社在引翔港（今属上海市杨浦区）购地三十多亩，建造规模较大的工厂，增添机器，除生产烛芯外，并生产毛巾、被单等其他棉织品，进一步与日货“铁锚牌”毛巾在市场上开展竞争。该社所织“三角牌”毛巾，终以产品精良，质胜舶来，遍销中外，盛名历久不衰，而日货“铁锚牌”毛巾在我国市场上卒告绝迹。“三友”的产品有力地冲击了日货的销路，招致日本侵略者对它的仇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该社引翔港工厂竟首当其冲，惨遭焚掠，不是无因的。

陈万运在“三友”担任经理，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民族轻工业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但该社生产烛芯原料，一度采用日货棉纱；该社所需一部分高级棉纱，如32支纱和42/2支线，因当时国产稀少，也一度仍采用日货，暴露了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对外依赖性的一面。

陈万运为了办好企业，经常住在厂内，同工人同桌吃饭，常去车间与工人、技师研究生产业务，有时工作到深夜。几十年来，他为办好企业摸索了一整套经验，如发行所门市部的安排，新设备的添置，经营方法的更新，会计制度的改革，

新产品的试制，广告宣传的利用，工厂管理的加强，得力店员的培养等。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由于陈万运经营管理得法，使企业得到很大发展。从1912年到1931年的二十年间，该社资本额从四百五十元激增到二百万元，即增加四千四百多倍。发行所遍设全国各大中城市。自1920年起，陆续增制各种日用棉织品，如全幅被单、透凉罗蚊帐及不褪色布匹等，皆为该社首创产品。有的产品还畅销南洋市场。

“三友”招收职工注意吸收知识青年。在设厂之初，“三友”曾向杭州中学一次选取毕业生十余人，其中有后来成为陈得力助手的李道发。李在1924年研制回纹浴毯织造成功，使毛巾业获得重大进步，对国产毛巾的革新作出了贡献^②。青年进厂后，陈安排他们业余学习语文、数学、技术课程，并提倡正当娱乐，提倡书法。因此早期的三友实业社给上海毛巾业造就了不少人才，如该社继任经理王家珍，太平洋织造厂李道发、赵才生，民光织造厂项立民，大费被单厂吴骏声，源康祥毛巾厂黄葆康，萃众毛巾厂范家骏、阮树敏，大生被单厂高成源等，都是上海毛巾被单业掌握技术的佼佼者。陈还多次招收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充实三友实业社，使他们担任管理职务。

“三友”在发展过程中，曾向安徽及江苏泰兴农村雇用了大量女工和童工，发给的工薪很低。在引翔港厂内，来自农村的童工最多时达五百多人，约占全厂工人半数。当时摇纱女工每日工资四角五分，而童工只有二角左右，“三友”在雇用童工一项上，每年多获利润四、五万银元。

“一·二八”事变后，由于引翔港厂被毁于日本侵略者的

焚掠，“三友”把生产集中于杭州“三友”纺织印染厂，陈万运带同李道发去杭主持。原杭厂因管理不善，一度质量下降，产品积压，资金周转不灵，经陈等整顿、改进后，新产品不断出厂，名闻全国的“西湖”毛巾、“2323”永不褪色细布及彩色印花被单等相继问世，产销两旺，从而使杭厂经营获得好转。

陈万运在经营“三友”期间，与五洲药房、家庭工业社、中华珐琅厂等共同发起组织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并参与主持《机联会刊》的发行工作，对宣传提倡与推销国货做过一定贡献。

“七·七”事变后，杭州沦陷，“三友”杭厂亦被日军强占管理，其后日方一再招致该社“合作”，均为陈所拒绝。陈万运一度避居杨梅岭，后潜行返沪，深居简出。他情愿放弃杭厂，也不与敌人合营。

在沪宁沦陷，上海的租界成为“孤岛”之际，“三友”因生产停顿，存货渐少，难以维持职工生活。陈等决定制销中药，权且过渡，所制成药主要有三友补丸、马宝、救苦丸、方便丸等；以后并代销他厂部分棉织品，惨淡经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趁机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实行经济统制，进行残酷掠夺，“三友”更趋困境，终以生产停滞，入不敷出，资金几乎耗尽。1943年底，“三友”杭州染织厂因无力经营，出盘给国华投资公司和新亚建业公司。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友”企业恢复，陈辞去经理职务，改由王云甫及王家珍分任正副经理，但因资金不足，周转困难，已无复当年魄力，“三友”虽称恢复旧业，实徒具虚名而已。这反映了在半殖民地旧中

国民族工业的坎坷遭际。

陈万运一生自奉俭约，经常短褐布衣，五十以后茹素，不饮酒，不出入游逸场所。1950年10月17日在沪去世，终年六十六岁。死后无长物，棺椁墓葬都由“三友”为之安排。

注：

- ① 陈万运和沈启涌是烟纸店伙友，沈九成原是上海南市高裕兴蜡烛店学徒。见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182页。
- ② 《上海市百货工业产销概况》。中国百货公司华东区公司编，1950年10月版，第22页。
- ③ 据李道发回忆，“三友”当时代销太平洋织造厂及民光织造厂部分棉织品。

都锦生

徐和雍

都锦生，号鲁滨，以首创丝织风景工艺，创办都锦生丝织厂而负盛名。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5月出生于杭州西湖畔茅家埠。父亲都宗祁，保定军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先后充当清末新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1919年，都锦生在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机织科毕业，留校在乙种工业（艺徒班）任教。在教学实践中，他掌握了从设计到织造的丝织工艺全过程，并根据丝织原理，谋织造丝织风景画。经过半年多的反复钻研和不断改进，终于亲手织出第一幅丝织风景——5"×7"（英寸）的“九溪十八涧”。

丝织风景画的试制成功，使都锦生产生了开办织造厂的念头。他得到叔岳丈宋春源绸庄老板宋锡九的赞许和支持，借得五百元，购置了一台手拉机，雇了拉机师傅林传莲，亲自绘制和轧出五幅“西湖十景”的意匠图和花版。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于1922年5月15日在茅家埠的家里正式开工织造。

都锦生丝织厂最初是一个家庭作坊，织造的丝织风景画以“西湖十景”为题材。茅家埠是西湖游客过往之地，都锦生在家门口展出样品，挂上“都锦生丝织厂”招牌，招揽游客。虽然当时丝织风景画仅仅是一种规格的几幅黑白“西湖十景”，

由于它新颖，别致，价格不高，受到游客们的赞赏，买来作为游览西湖的纪念品。这样，丝织风景画在西湖游客中初步打开了销路。

随着营业的发展，都锦生不断增添手拉机和织工，还聘请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机织科毕业生胡邦汉等两人，专搞设计和绘制意匠图，产品的规格和数量迅速增加。为了扩大销路，他先在西湖孤山摆摊销售，后在杭州花市路和上海等地开设门市部。1926年，都锦生将产品送往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展出，荣获金质奖章，一时名闻中外，产品也逐渐远销南洋和欧美。东北、华北的旅社、饭馆广泛采用丝织风景画作装饰品，大批订购，于是都锦生丝织厂获得迅速发展。由于茅家埠都家的房子过于狭窄，都锦生改在良山门外火车站旁建造厂房。1926年，都锦生丝织厂已拥有手拉机近百台，轧花机五台，意匠八人，职工一百三、四十人，成为名符其实的工厂了。

都锦生深知要不断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厂里必须有一批水平较高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他按意匠、轧版、织造等工种的不同特点，制订了一套技术标准，分甲、乙、丙三级，技术人员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升级。技术人员兼采固定工资和计件工资，给予较高的报酬和良好的工作条件，鼓励他们钻研和提高技术的积极性，因而造就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丝织技术人员。对织工则采用计件工资加奖励金的制度，工资标准比同类工厂定得要高一些。

都锦生认真钻研丝织技术，并组织工人和技术人员不断研制新产品。1926年，都锦生丝织厂开始试织五彩丝织画，

织造出第一幅五彩丝织花卉——“蜻蜓荷叶”。它以黑白丝为经，五彩丝为纬，在技术上比黑白织锦大大前进了一步，在题材上也突破了“西湖十景”，生动地表现了我国传统国画的民族风格。都锦生为了学习国外的织造技术，1928年至1929年间东渡日本考察。他从留法友人处获得一台法国出产的最新全铁电力机，又购买了法国织造的棉织油画风景作样品，以重金聘请专攻丝织的留日学生莫济之，与厂内工人、技术人员进行解剖分析，经过三年的努力，在1936年织造出经纬均用彩线的“北京北海白塔”等四幅五彩棉织风景油画。都锦生还从多方面吸取织造经验，试织丝织五彩台毯、绸伞、领带等。该厂的产品多样，艺术性高，享誉中外，织锦工艺迅速达到先进水平。

都锦生丝织厂产品的利润优厚，通常在百分之二百左右。1931年该厂生产丝织风景五万零四百米，营业额达十五万元，盈利约十万元。都锦生由一个教员变成了富有资财的民族工业资本家。他以独特的丝织风景画，开辟了民族工业发展的一条新路，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不可能得到顺利的发展。生产原料——生丝、人造丝的价格，被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操纵；国民党政府的捐税和需索，也是都锦生丝织厂发展的桎梏；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横蛮掠夺和疯狂破坏，使都锦生丝织厂以后陷入绝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占领，几占都锦生丝织厂产品销路一半的东北、华北市场遭到破坏。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继平津

沦陷之后，又大举进攻上海。8月，杭州遭到日机轰炸，都锦生被迫宣布停工，将十二台手拉机转移到上海法租界，托庇于法国势力，维持小规模的生产。同年12月，杭州沦陷，日本侵略者企图拉都锦生参加筹组伪市政府。都锦生是具有爱国思想的，自“九一八”之后，就停用日产人造丝作原料。当都锦生得悉要他出任伪职，他就避往天竺寺庙。翌日，报载都锦生被委任为日伪杭州市政府科长，他又立即带领全家避居上海。都在上海租了一幢房子，后又租了一块空地，建造厂房，想方设法从杭州运去二十台手拉机及大部分花版，与已在法租界里的十二台手拉机合并在一起，继续生产。日本侵略者早就知道都锦生丝织厂的产品是日本丝织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又见都锦生不为己用，于是在1939年将都锦生丝织厂在杭州艮山门外的主要厂房及所有新式机械纵火烧毁。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占领了上海租界。都锦生丝织厂在上海的生产无法维持。同时重庆、广州等地的门市部也先后被日机炸毁。只得解雇工人，关闭工厂。都锦生眼看一生的努力付诸东流，悲愤交集，终日处于忧虑之中。1943年3月，都锦生突发脑溢血症，5月26日在上海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中共都锦生丝织厂委员会、杭州大学历史系编著：《都锦生丝织厂》。
- ② 宋永基：《都锦生丝织厂的回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方 椒 伯

汪 仁 泽

方椒伯名积蕃，浙江镇海人，生于1885年11月25日（清光绪十一年十月十九日）。祖父方性斋，上海开埠后即来沪，由经商起家。父方崇年，是清末举人。方椒伯六岁时入私塾就读，八岁丧父，十七岁时应科举考试未中。次年到沪习商，管理祖父所遗企业，往返沪、甬间。1905年他集资在家乡创办培玉两等小学堂，自任校长。后又任宁波溪海公学校长及宁波教育参事会参事^①。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他参加中华民国协济会，协筹军需。次年进伍廷芳主办的上海民国法律学校攻读法律，后转学至梁启超主办的上海神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领得律师证书。但当时并未开业，复从事商业活动。1918年受北京东陆银行聘请，任该行上海分行经理^②。与此同时，兼任四明公所及四明医院董事、上海总商会会董兼商事公断处处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常务理事兼会务主任等职。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全国响应。5月9日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询上海日本商会会长之请，用总商会名义发出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归还青岛的通电。由于违反民意，舆论大哗。方椒伯等发起组织上海各业同业公会及各地旅沪同乡会等七十余团体的“各公团联合会”（方被

推为会长)，发表措词激烈的通电，反对上海总商会的荒谬主张，朱葆三、沈联芳被迫引咎辞职。方的名声遂闻于沪上各界³。

1920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成立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他参加筹组，被推为董事⁴。是年并任银行公会会董。1922年方椒伯与秦润卿、薛文泰三人集资三十万元，创办大有榨油厂，任董事长。次年兼任宁绍轮船公司董事长。

方椒伯自1922年起连任上海总商会两届副会长。而前届的正会长宋汉章常因病休假，后届正会长虞洽卿又时往北京活动，因此实际会务常由方主持。在此期间曾发生多起事件：（一）1923年5月6日从津浦线北上的一列火车，在山东临城附近被孙美瑶匪帮劫持，车内中外旅客三百余人被掳为“肉票”，沪上被难家属纷纷要求上海总商会设法营救。方主持组织了救护队，并派代表往出事地点，会同地方当局与匪方谈判，促使全部被掳旅客安然脱险归来。（二）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方在沪组织民治委员会通电反对，并致电各地商会相约不承认贿选政府，上海总商会带头断绝与曹锟政府的关系。（三）内河航行要道之吴淞江（苏州河）年久失浚，交通阻滞，地方当局因经费无着，欲委托外人代浚。方以国家主权攸关，于1924年发起组织吴淞江水利协会，任会长，召集沿江之宝山、嘉定、青浦、昆山、吴江、太仓、吴县、上海八县代表，自筹巨款疏浚。（四）1924年江浙两省军阀为争夺上海地盘，发生“齐卢之战”，继而奉军南下，全市骚动。总商会多方奔走，并筹款遣散溃兵，秩序始告恢复。（五）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一面急电在京的会长虞洽卿回沪主

持会务；一面在工人学生代表及烈士家属的再三呼吁和强烈要求下，通告会员罢市。但事后即往工部局声明称：“由于被学生强迫，不得已在全面罢市之声明上签字，此举并非本意。”^⑤此后在对外交涉中，如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会，擅改该会提出的谈判条件十七项为十三项，以及后来单独开市、退出三罢斗争等重大问题上，都唯虞洽卿的马首是瞻，表现了他软弱性的一面。此时，他并任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第四届理事长。

方椒伯与傅筱庵私交甚厚。1922年起受傅所聘，任上海中国通商银行十六铺南市分行经理，辞去东陆银行职务。1932年他辞去通商分行经理后，开始执行开业律师业务，直至1948年，曾担任多处厂商的法律顾问。他在执行律师业务中专办非讼案件，遇事常劝当事人相互退让，使之归于和解，因此从未出席法庭。此时他兼任复旦大学校董、中华职业教育社监理事、上海市商会执行监察委员、宁波通运长途汽车公司董事、上海渔市场商股常务理事等职。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后，上海租界难民麇集，“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成立，他任副秘书长兼劝募主任，经募救济金一千余万元。1939年傅筱庵投敌充任伪上海市长后，曾多次强邀他出任市府秘书长等伪职，但都被方坚拒。抗战胜利后，他除执行律师业务外，致力于经营大有余榨油厂及办理同乡会事务。1949年宁波在国民党军队溃退后，遭蒋机轰炸，损失颇重，他任同乡会劝募组长，募款汇甬救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起方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56年12月，他以古稀之年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

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委员^⑥。1968年5月24日因病在沪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注：

- ① 《方椒伯自传》：“……溪海仅设两年而停办，培玉则办至1956年始由政府接管，主持斯校达五十年，颇费心力。”（1956年12月10日手稿，现存民革上海市委档案室。）
- ② 戚再玉主编：《上海时人志》，展望出版社1947年9月版。
- ③ 孙筹成：《我所知道的方椒伯》，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总字第241号。
- ④ 何应。
- ⑤ 黄逸峰：《五卅运动中的大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
- ⑥ 《方椒伯自传》：“……当此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自应努力为群众谋福利，尽人民一分子的力量，年虽已迈，不敢后人，因此不辞衰朽，参加民主党派，一致团结，以求前进。”

王志莘

吾新民

王志莘，原名允令，1896年4月21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九日）生，上海人。五岁时，父亲王南山去世，靠母亲刺绣收入维持生活。1910年因贫辍学，由叔父介绍进钱庄当学徒。但他坚决要求读书，母亲省吃俭用，支持他到南洋公学求学。1915年毕业，先后在定海县立小学、上海留云小学教书，并到新加坡做过教员、报馆编辑，经管过橡胶种植园。1921年回国，考进上海商科大学（东南大学与暨南大学合办）读书，并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受黄炎培的赏识。1923年经黄炎培介绍，得到菲律宾华侨李昭北资助，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银行系，先后获得学士及硕士学位。

1925年王志莘毕业离美，绕道欧洲考察各国银行业务。回国后，在上海商科大学和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生活周刊》，他担任第一任主编，不久由邹韬奋接办。1926年王志莘进薛仙舟主持的工商银行，任储蓄部主任，提倡用合作贷款调剂工商资金，被称为平民银行。他又和薛仙舟、吴觉农等人设立“中国合作学社”，担任该社常务理事和“合作函授研究班”主任。1928年江苏省财政厅厅长赵棣华筹办江苏省农民银行，聘请过探先为总经理，王为副经理。不久过探先去世，他续任总经理，大力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

当时江苏省农村合作社数目之多居全国第一。几年之间，王志莘在银行界逐渐崭露头角。

1930年，王志莘出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以下简称新华银行）总经理，是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新华银行成立于1914年，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储蓄银行之一。由于经营不善，1930年时负债累累，无法维持，乃由中国、交通两行增资改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推荐王志莘主持整顿新华银行，王又引荐孙瑞璜为副经理。他主持新华银行后，发表《改组宣言》，提出银行的使命“在以社会为对象，从事于其经济力与信仰心二者之集中，进而运用之于社会，为社会福”。实际上就是采用欧美资本主义银行的作法，运用银行的资本和信用，吸收社会的闲散资金，用于投资和放款。新华银行改组后，大力举办生活储金（即活期储蓄，按十天最低余额计息）、存取两便储金、礼券储金（可转存各种储蓄，从填发日起息，也可向国货公司购货）、另存整取储金、俭约储金（亦属另存整取，但每月存储数不限）、子女教育储金、整存整取储金、整存另取储金、存本付息储金和人寿储金（办法同人寿保险）等各种储蓄存款；开办代客户经理房地产、代管理证券投资等各项信托业务；以及通过代收学费、水电费、牛奶费等各种服务方式，集聚社会零星资金。并先后设立十个市区办事处和吴淞、闵行、洛社等乡村办事处，机构之多在上海银行业中数第一。同时努力革新人事，吸收大中学校毕业生，注意选拔人才，优秀的还资助出国留学或考察。在职工福利方面，举办福利贷金、子女教育补助金、业余进修补助金、医务室免费门诊、人寿储金等，对工作满二十年的老职工

还赠送“欧米茄”金表，强调“新华精神”，喻银行为“大家庭”等，培养工作人员为银行终身服务的思想。几年之内，银行业务蒸蒸日上，成为当时上海银钱业中比较有朝气的一家新型银行。

王志莘过去在职教社工作时，就提倡“振兴实业，职业救国”，主持新华银行后，通过银行投资和放款，支持国货产销事业，因此先后担任中国国货公司、中国国货联营公司、中国丝业公司、中国棉麻公司等企业的董事或董事长。由于新华银行主要系中国、交通两行所投资，所以它不能不成为官僚资本的附庸。如该行 1932 年底各项投资和放款中，有价证券（主要是公债）投资占 56% 以上，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政府维持债信。后来每当“中央银行”紧缩通货时，新华银行就大量收回放款、出售证券，转存“中央银行”，以维护国民党政府经济上的统治。他除主持新华银行外，曾长期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负责为该社筹措经费。1936 年还应邀兼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农本局常务理事及协理。1937 年担任赴暹罗（泰国）使节团团员，出国考察。1939 年又应钱新之邀请，兼任交通银行设计处处长。

抗日战争爆发，王志莘经香港辗转到达重庆，于重庆设立新华银行总管理处，管理重庆、昆明、桂林等地分行业务。同时保留总行于上海，由副总经理孙瑞璜主持，管理沦陷区的上海、北平、天津、南京、广州、厦门等地分行业务。王志莘在重庆时，除主持新华银行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担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联合票据承兑所和联合征信所的主任委员和总经理等职务。他从抗战后与各

方人士接触和现实情况的教训中，思想上逐渐追求进步，支持进步事业。他曾对当时资金困难的生活书店一次给予巨额贷款十万元。国民党特务造谣说生活书店接受共产党津贴，对它搜查迫害，后来又予以查封。王亦因此受到特务注意。1943年他去昆明时，在重庆机场被阻回，不许他离开重庆。

1944年国际商业会议开会，他被选任中国代表团顾问，赴美出席会议。会后访问了欧美一些国家作业务考察，至1946年初才返回上海。

抗战胜利后，重庆新华银行总管理处撤销，仍由上海总行领导各地分行业务，并增设香港、长沙、苏州、无锡等分行，广州、汉口两分行也先后复业。此外，并与世界各大城市通汇，业务进一步发展。194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筹组，王志莘被推为常务理事兼总经理。当时他想把它改造成新的投资市场，结果事与愿违，乃主动脱离。1947年当选为“国大代表”。

王志莘对金融理论素有研究，著有《中国之储蓄银行史》和未出版的《合作金融》等稿。他长期担任银行学会理事长，对银钱业从业人员的学习热心支持。1946年，他担任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理事会主席和合众进出口营业公司董事长。这两个组织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但他并不知道。

解放前夕，国民党胁迫各界知名人士去台湾，王不为所动，坚守岗位，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和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新华银行是首批公私合营的银行之一，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和

支持下，业务迅速发展，还增设了青岛和南通分行，存款总额占全市合营、私营银行之首。1950年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肯定了新华等合营银行在改造企业和开展业务方面的成绩，提出了集中经营是私营金融业的新方向。会后，王志莘就和其他四家合营银行负责人磋商，于1951年成立新五行联合总管理处；半年后又扩大为有十一家大型银行参加的联合总管理处，他担任联合董事会常务董事和总管理处第一副主任；1952年金融业全行业合营，他担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和总管理处第一副主任（后改称副总经理）。在金融业改造中，他协商各方，沟通公私关系，协助筹建机构和安排人事，发挥了带头和桥梁作用。

在努力推动金融业改造的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和财经出版社副社长等职。他对台湾回归祖国统一事业十分关心，多次向台湾亲友广播，希望促成祖国统一。1955年他患胃癌，但仍非常达观，表示“愿以有生之日，尽可能为国家效力”，抱病参加各种会议和人大代表团视察活动。1957年2月2日王志莘在上海去世，终年六十一岁。

主要参考资料：

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

朱锡祚：《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沿革》。《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

黄炎培：《王母朱太夫人传》。

郭琳爽

徐鼎新

郭琳爽，又名启棠，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896年3月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生。其二伯父郭乐、父亲郭泉都是澳洲华侨，永安资本集团的主要资本家。郭琳爽在青年时期即受到郭乐、郭泉的培育和影响^①，有志于商业。

1921年，郭琳爽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为当时担任永安各联号企业总监督的郭乐所赏识。不久，即被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商情，回国后于1922年正式担任香港永安公司署监督，协助其父郭泉（时任香港永安公司司理）管理企业。在1923年到1927年期间，郭琳爽又先后赴英、美、德、日等国采购商品，学习国外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了解国际市场动向。他在香港永安公司任职七年，积累了不少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显示了一定的组织才能，因而在1929年被郭乐指名调到上海永安公司担任副司理（即副总经理），1933年又擢升为总经理。

上海永安公司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百货公司，闻名国内外。1931年是它发展的“黄金”时期，全年利润额高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郭琳爽担任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的初期，我国正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亦已波

及国内，民族工商业普遍陷入不景气状态。永安公司也由盛转衰，开始走下坡路。郭琳爽尽力协助坐镇在上海的郭乐，充分发挥永安各联号企业“同号相联”、“同舟共济”的作用，竭力摆脱困境，挣扎图存。他们为永安公司开辟新的货源，打开新的局面，在百货商场内扩大国货的销售比重，以适应日益强烈的抵制日货的社会要求。在1931年前，永安公司经销的商品多半是进口洋货，高档商品占很大比重，国货工业品在商品总额中仅占百分之二，连同土特产品、手工艺品在内，也不过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由于郭乐、郭琳爽等大幅度地扩大国货的销售比重，1934年度国货进货额已占到全年进货总额的百分之六十点五，1935年又进一步增长到百分之六十三点一，1936年高达百分之六十五点一^②，使一向洋货充斥、国货工业品几无立足之地的上海永安公司大为改观。

郭琳爽曾先后两次在上海永安公司筹设国货商场。第一次在1934年秋季，辟四楼为国货商场，但因规模不大，营业很不理想，因此不到半年便告结束；第二次在1935年至1936年间，当时各界提倡国货的呼声很高，国货公司、国货商场、国货展览会等相继倡办，风靡一时。为了与同业展开竞争，郭乐、郭琳爽准备利用即将落成的永安新厦开设规模宏大的国货商场。在筹备期间，专门在报上刊登“征求国货启事”以广招徕，一时先后前来应征的厂商累计在一千家以上^③。这一国货商场原定于1937年9月1日正式开幕，可是“八·一三”战事爆发，使它等不到和消费者见面就被迫流产了。

上海永安公司创办时曾向英国当局注册，是为了获得必要时的“保护”。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上海永安公司遭

到日机轰炸，英国驻沪总领事馆非但不愿出面同日方交涉，反以种种借口撤销了永安公司的“英商”注册。于是郭乐、郭琳爽又转而乞求美国政府准予注册为“美商”企业，寻求新的保护。但“美商”名义同样不能使永安企业免遭蹂躏。当时，座落于租界外的“永纱”二、四厂的产业，尽管也曾向美国驻沪总领事馆注册，仍然被日本侵略者当作“胜利品”而占领，甚至连郭乐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1939年，郭乐携带几名助手和一批货物去美国，从此留美不返。郭乐走后，上海永安公司名义上由副总监督郭顺主持，但郭顺当时又担任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的总经理，他的精力主要贯注在“永纱”方面，所以上海永安公司的实际掌权者为总经理郭琳爽。

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郭琳爽也萌发一定的民族感情，同情和支持上海永安公司职工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同意在商场内播放抗日救亡歌曲，曾拨出二辆运货汽车供战地使用，并捐献现金和实物。但是他对于职工改善生活待遇的合理要求却蛮横地拒不接受，曾激起了1939年底的大罢工。为对付罢工工人，郭顺带领大批武装巡捕，无理拘捕七十多名罢工职工，郭琳爽则指派高级职员和亲信诱骗职工上工，分化职工队伍的团结。他们采用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破坏了这次罢工斗争。^④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上海永安公司也被日本占领当局视为“敌产”而列为“军管理”的对象。1942年3月25日，日本侵华经济机构“兴亚院”派遣“会计监督官”进驻永安公司，控制了该公司经营管理的一切重要权力。郭顺、郭琳爽为苟安计，于1943年

4月撤销了原来的“美商”注册，6月改向汪伪政府实业部申请注册。

抗战胜利后，郭顺因在日伪统治时期曾任伪“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监事等职务，并有参与向日本侵略者献机献铁等行为，被人以“汉奸嫌疑”的罪名告发。于是他以出国治病为名，仓皇离沪赴美^⑤。此后，上海永安公司便完全由郭琳爽主管。

抗战胜利后初期，在上海市面上一度出现虚假的繁荣景象，使郭琳爽对卷土重来的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产生幻想。他迫不及待地恢复上海永安公司的“美商”注册，同时又竭力巴结孙科、宋子文等国民党权贵。他急切地希望早日恢复“环球百货”的商业经营，敦促郭乐主持的美国办庄尽力搜购各种高档美国商品，认为美货“--经到达，利益可获数倍以上”^⑥。1946年度上海永安公司美货的进货额，占从国外进货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六点六^⑦。与此同时，公司股东大会还根据郭琳爽的提议，决定把资本额由原来的法币一亿元增加到法币十亿元^⑧。同时，他又以一百十二万五千元美金的高价，向哈同洋行买下商场大楼及土地的产权，积极为扩充公司营业做好准备。^⑨

但是事与愿违，抗战胜利后初期的虚假繁荣转瞬即逝。随着美帝对华侵略的加深和国民党官僚资本日甚一日的压迫，郭琳爽复兴企业的美梦也逐渐破灭。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规定外汇限额和限制货物进口，使上海永安公司直接从国外进货的渠道几乎全被堵塞，1947年内向国民党政府“申请进口合适销售之货物几等于零”^⑩。郭琳爽望洋兴叹，

对国民党政府的外汇政策深为不满。

在美货肆虐,民族工商企业处于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况下,上海百货业职工联合一部分民族资本家于1947年2月发起“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群众运动,获得了上海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郭琳爽当时的心情是矛盾的:“爱用国货”对公司营业有利,他很赞成;“抵制美货”又同他渴求经销美货、牟取高利的方针有抵触,所以态度暧昧。当这一正义斗争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残酷镇压,永安职工梁仁达被害惨死,大批职工被殴致伤,酿成“二·九”惨案后,群情共愤,上海各界人士纷纷集会或游行,表示声援。郭琳爽慑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不敢公开表态支持,但对职工们在永安公司内设立烈士灵堂,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则始终未加干涉。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强迫收兑黄金、银元、美钞,强行限制物价,冻结工资,进一步对蒋管区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强制限价引起消费者的抢购,永安公司“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间货已购空”^①。国民党政府持续七十四天的限价政策,使历来备货充盈的上海永安公司被摧残得库存空虚,元气大伤。据郭琳爽估计:经过这场“限价”,永安公司的流动资金损失达百分之八十,相当于四万两黄金的总值^②。郭琳爽一向自诩经营有方,但面对这副衰败景象,也发出“未来局面不堪设想”的哀叹^③。同1931年相比,1948年的进货额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六点一,销货额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九点六;这一年的流动资金只及1931年的百分之十一点一,利润总额相当于1931年的百分之六点六,成为一具徒有固定资

产支撑的空架子了。¹⁴

当国民党反动统治行将复灭之际，侨居在美国的郭乐和主持香港永安公司的郭泉，曾先后七次写信催促郭琳爽及早离沪赴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获悉这一情况后，通过各种途径向郭琳爽反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争取他留沪维持企业。郭琳爽同当时主持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的郭棣活反复磋商，决定留在上海。他们两人于1949年5月12日联名复信给郭乐，陈述留去的得失，认为维持企业是本身职责所在，而如果他们贸然离沪赴港，“则经理部诸君亦当随之俱行，而经理以下者，不独无所秉承，抑亦无法负责，是未见其利，已先见其害”；表示要“为股东权益”和“事业之前途”，“痛下决心，留此尽力维护”，从而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同广大永安职工一起，保卫企业，迎接解放。

解放后，郭琳爽切身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扶持和帮助，认识逐步提高。在永安公司实行公私合营后，郭琳爽继续担任永安公司的总经理，在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很重视郭琳爽，给予他应得的荣誉和地位。从1954年起，郭琳爽先后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第三届委员、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郭琳爽遭到冲击，于1974年10月27日在上海去世，终年七十八岁。1978年11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正式宣布为郭琳爽平反昭雪，恢复名誉。¹⁵

注：

- ① 上海永安公司存档：《上海永安公司董监事历略·郭琳爽事略》。
- ②、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
- ④ 《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3期第11页。
- ⑤ 《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81页。
- ⑥ 上海永安公司存档：1946年2月9日郭琳爽致郭乐函。
- ⑦、⑧ 同②第204、207页。
- ⑨ 上海永安公司商场大楼，是在1916年间向哈同洋行租地建造的，租期为三十年，到1946年3月期满。按合约规定，期满后地面上的商场大楼须一起交还哈同。为扩展营业需要，郭琳爽决定向哈同洋行高价买受这块地产和商场大楼的产权。
- ⑩ 上海永安公司存档：《上海美商永安公司股东临时会决议案》。
- ⑪ 上海永安公司存档：1948年10月28日郭琳爽致郭泉函。
- ⑫ 郭琳爽：《歌颂十年》。《新闻日报》1959年9月29日；郭琳爽在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55年12月27日。
- ⑬ 上海永安公司存档：1949年2月22日郭琳爽致郭乐函。
- ⑭ 同②第221—223页。
所列1948年同1931年比较的数字，是统一按1931年币值，剔除1948年物价上涨因素以后的实际进货销货额、流动资金总额、利润总额相互比较而计算出来的。
- ⑮ 《解放日报》1978年12月2日。

刘 柏 森

朱 复 康

刘柏森，原名树森，字柏生，江苏武进县人。1869年5月2日（清同治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生。祖父刘养浩，是个秀才，教书乡里。父亲刘凤书经营商业。刘在兄弟六人中，行四。长兄刘树屏字葆良，光绪年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五弟刘厚生（垣）民国初年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次长，后随张謇办大生纱厂。从兄刘可毅，光绪壬辰会元，庚子义和团起义时，在河北通县被杀。

刘柏森十八岁时在家乡设馆授徒，二十五岁那年到上海，经人介绍在德商信义洋行工作。二十九岁入美商茂生洋行从事机器军械部门的贸易推销业务。1899年秋末，赴日本长崎、神户等地，考察煤产运销。回国以后，欲自设煤号运销东瀛，未及实行。翌年受闽浙总督许应骙及福州将军善联的委托，向外国订购大炮二十门，价银三十余万两，赚到佣金数千两。接着善联又汇银三千两，托他在沪代办进呈慈禧太后的贡品多种，其中第一号贡品名“万年青”^①，由于名称的吉祥，深合慈禧之意，刘也因此获得了善联的赏识。于是刘柏森怂恿善联和他合股投资开设慎泰恒字号，经销烟煤和兼营进出口贸易，获利甚厚。刘旋即从事股票投机，先后获利二、三十万两。

1904年，刘与盛宣怀合资创设三星香烟公司，开业以后，因受英美烟公司的排挤，勉强维持了四年多，终于宣告停业。1908年与粤商刘问刍、唐少义、丁价侯、夏瑞芳等组织贸易集团，出资收买怡和轮船股票，意图将怡和轮船公司从英商手中收回自办，旋因粤商中途变计售出所收股票，事遂未果。刘柏森因此亏蚀三十余万两，以产相抵，尚有不敷，所设慎泰恒号因而宣告停业清理。

刘柏森于1909年重新集资设立宝兴长号，仍旧经营燃料、纱、布等业务，并在天津设立分号。

1911年刘与张謇集资组织大维公司。通过湖广总督瑞澂的关系，租办湖北官办纱、布、丝、麻四局，在沪招去女工及机匠等凡千余人，先从纱、布两局着手，7月开车，刘任总经理^②。不久，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刘将所带机工临时乘轮避往上海。纱、布局遂为前租办人粤商韦紫封以应昌公司名义接办。迨刘率领机工人员赶回武汉，已经来不及，官司打到北京，终于无法收回。

刘返回上海，继续经营宝兴长号。1913年他与北洋政府交通部订立阳泉白煤经销合约，运沪销售给日本用户，仅三井洋行一家年销就达十万吨。通过这些经营，刘又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在1915年至1918年间，刘先后租办了伦章造纸厂改名为宝源纸厂，租办了苏州苏纶纱厂改名为宝通纱厂，租办了裕通纱厂改名为宝丰纱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事期间生产缩减，刘柏森所办各厂连年获利颇丰。至1919年棉纺业盈利益厚，刘所经营的宝通、宝丰两纱厂日产纱百馀件，每件可盈利四、五十两，当

时有一件棉纱赚一只“元宝”的说法^③。刘氏至此获利既多，更锐意力谋进取。

1919年4月，刘又在上海创设宝成纱厂，向美商慎昌洋行订购纱机四万锭，至下半年开工。同年12月又向慎昌续订纱机六万锭，创设宝成第二厂，1921年才全部开车。当时棉纱的盈利高峰已经过去。然而刘所经营的其他纱厂和纸厂，仅在1920年就获利达三百馀万两。这使他热衷再建新厂，于是续向慎昌订购纱机五万锭，在天津设宝成三厂。又向日本三菱公司收买在上海陆家咀的华章造纸厂，改名为宝源纸厂东厂，把原来的宝源纸厂改为宝源西厂。至此，刘主持经营的企业，已有五个棉纺织厂和两个造纸厂，成为上海颇有实力的资本家。他花十馀万两购进了上海有名的“愚园”作为住宅，请名画家陆廉夫绘“愚园家庆图”以志其盛。又在北京香山建造“玉华山庄”，费银二万余两，作为别业。这一时期，可说是刘柏森的全盛时期。

二十世纪初期刘柏森就约集商业界人士发起过商学会，“欲合群智群力与外侮相抵抗，勉为自存之计”^④。继又发起改组了上海总商会。1917年他和祝大椿、荣宗敬等发起组织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目的为联合同业抗御外资侵略。

但是好景不长，刘所经营的企业灾祸踵至。宝丰纱厂和宝源东厂相继遇到火灾，厂房、机器、原材料等毁损颇重。刘在创办天津宝成三厂时，所订购之纺机五万锭及向英商订购的两座发电机之价款未曾结汇，战后镑值汇价在短期内大幅度回升^⑤，因此损失达二百余万元。而英商通用公司却不守信用，以旧机充新，为此，刘柏森向法院提出起诉，涉讼

经七年之久，以致耗费不貲^①。

1922年秋初，长江南北受到大风暴雨袭击，棉花歉收，棉价暴涨，形成了花贵纱贱的局面，上海纱价从1919年的每件银二百两跌落至一百二十四两^②。影响所及，上海遂有宝成等十一家纱厂停开夜班，减缩生产。刘柏森等人为了维持纱价，通过“纱联会”决议自1922年12月18日起各厂停止工作四分之一。这是中国棉纺工业有史以来第一次限制生产的集体行动。可是这个决议并无多大效果，因为外商纱厂根本不受这一约束，反可坐收其利。

在纱价不断下跌、原棉市价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刘柏森最先仿效日厂的办法掺用印度棉花，但也无法挽回颓势。至1924年末，纱厂业萧条达于顶点，宝成营业愈感困难。刘柏森从经营商业起家，沾有较大的投机性和冒进性，不重视企业的科学管理和技术改进。更由于宝成连年扩展，营运资金早已不敷周转。早在1921年冬，刘就向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举借厂产押款日金五百万元，经过几年的盘剥，负息越来越重。至1925年2月欠东亚兴业本息五百三十万日元无力偿付，终于被迫将宝成第一、二两厂拍卖，为日商日华纺绩株式会社购去，改为喜和第一、二厂（1931年后又改称为日华第五、六、七厂）。

刘柏森在天津的宝成三厂，因为所欠慎昌借款未能清偿，开工后暂归慎昌洋行经理。刘所租办的苏州宝通纱厂，也因花纱比价采算不利而停工，之后因无法筹集资金复工，只得于1926年退租。

至此，刘柏森所经营的棉纺工厂，几乎完全丧失。他过

去办厂，一再标榜为了抵御外货的侵入，而结果他所手创的几个纱厂企业，几乎全部为外商所吞并。他经此失败后，晚年意态消沉。由于棉纺厂所需资金较巨，刘已无力经营，只能经营造纸厂，先把宝源东西两厂改组为天章纸厂；1934年又租办了徐家汇的源泰纸厂，改名森记纸厂。

1931年9月，刘柏森另组大同公司，向中国、浙江兴业和上海等三家银行借款，用以偿还宝成三厂的慎昌欠款，并亲自赴津解决，将厂收回自营；但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市场丧失，天津纱销呆滞，营业困难，虽经勉力维持到1935年，仍被迫停工。宝成三厂所欠中国、浙江兴业、上海三银行的借款，利息滚剥益重，终于由债权人拍卖，为日商东洋拓殖会社和大阪伊藤忠商事会社所合组的天津纺绩会社购去，1937年改名天津纱厂。上海天章纸厂受津厂影响，浙江兴业银行不允继续贷款维持，亦只得停工清理偿还债务。

刘柏森至此债务丛集，经济艰窘，仅赖森记纸厂盈余维持生活。

不久中日战争爆发，刘柏森益感老境颓唐，常常回忆往事，不胜感慨。1940年5月患胃癌，12月4日病故于上海。

注：

- 1 “万年青”是一种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可供观赏，根茎可入药。
- 2 据《刘柏森年谱》，张謇任大维公司总经理，刘任其副。另据湖北纱布局协理张松樵的回忆和其他的文献，都说刘任总经理。
- 3 据1959年7月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靖基访问谈话。
- 4 《序六》，《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三十周年纪念册》1929年版。

- ⑤ 中国银两对英镑的汇价，1920年2月最高价为九先令三便士，暗盘还可多结七至八便士，而同年12月银两的最低价为三先令十一便士，高低差距颇大。时人称为“先令风潮”。
- ⑥ 据前宝成三厂厂长兼工程师陆绍云访问谈话（1980年6月29日）。
- ⑦ 据前华商纱厂联合会议董聂潞生访问谈话（1959年7月）。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刘氏宗谱·刘柏生先生年谱》（1869—1921年刘柏森自订，1922—1940年其子刘卓勤补订）。
- ② 刘厚生：《先兄柏生公墓志铭》。
- ③ 《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会议录》（1917—1926年）。
- ④ 《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三十周年纪念册》1929年版。
- ⑤ 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靖基访问谈话（1959年7月）。
- ⑥ 《武汉裕大华纺织集团张松樵回忆录》（1957年5月）。
- ⑦ 前宝成三厂厂长兼工程师陆绍云访问谈话（1980年6月29日）。

金 润 庠

顾振仪 来可泓

金润庠，浙江镇海人，生于1890年7月31日（清光绪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其父系清朝举人，于金润庠八岁时去世。母沙完珍，出身于“书香门第”，能诗善文，兼通医理，曾在宁波举办女塾，开浙东女学之先。

金润庠有弟妹三人，以家中食指繁多，于1904年小学毕业后，即到汉口立昌生海味号当学徒，业余自学英语。几年后，经其母舅沙咏源介绍，至上海华通保险公司当办事员。金博闻敏慧，工于心计，颇得经理青睐，1909年升任华通烟台分公司经理，后改任华通杭州分公司经理。不久进上海美商德泰洋行当买办，又任英商光耀桅灯厂中方经理。与此同时，金以私资开设润丰恒商行，并在英人办的法律事务所学习法律。

1911年，上海发生信托公司和交易所倒闭风潮。金润庠与竺梅先两人分别代表自己的商行，参加五洲交易所财产清理案件，显示了各自的才能，互相钦佩，渐成知交。在1925年张宗昌盘踞山东时，金润庠协助竺梅先在上海为张宗昌军采办面粉。以后，两人继续合作，积资日丰。金与竺于1927年冬鉴于造纸工业有利可图，以二十八万元之代价，盘进嘉兴禾丰造纸厂；1931年又以二十九万零五百元的标价，购进

杭州武林造纸厂。他们将两厂改名民丰、华丰，设立董事会，竺梅先任经理，金润庠任协理，开始经营造纸工业。

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造纸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全国不到二十家纸厂，外国纸品充斥市场。竺、金二人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卷烟、胶鞋等轻工业发展较快，包装的纸版用量必然会随之增加，而纸版运输时吨位较多，外商无意经营。于是他们便从事纸版生产。

在试制薄白纸版过程中，竺、金两人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亲自下车间，督率技术人员、工人共同钻研。这种纸版的技术要求是正面平滑有光泽，反面宽松，即所谓“单面光”。当时既无技术资料，又无专家指导，竺、金光凭热情，闭门造车，几经试验，未获成功。但竺、金两人仍不惜工本，坚持试制。1933年聘总工程师褚凤章、造纸工程师陈晓岚先后进厂，并邀请浙江大学教授潘光圻协助，于次年试制成功，以“船牌”为商标经销。

由于中国民族工业地位脆弱，同业之间又互相倾轧，削弱了对抗外资的力量，金润庠乃与各纸厂协商，筹组“国产纸版联合营业所”，使各厂生产纸版纳入产、销垄断机构，调和矛盾，增强实力。结果与苏州大丰厂、盛华厂、天津振华厂共五家各推一人组成理事会，推选金润庠任联营所所长。规定各厂产品一律交由联营所出售，定价划一，天津振华产品不南运，南方各厂产品不北上。上海竞成纸厂不愿参加联营，以每吨纸版低于联营二元的价格抛售，金润庠便大量收购，以压缩纸版的上市量，迫使竞成纸厂就范。

1935年前后，全国有卷烟厂四、五十家，而本轻利重的

卷烟纸却仍依靠外国进口，大量金钱被外商赚走。竺、金两人便着手试制卷烟纸。除了重用褚凤章、陈晓岚等工程师外，并用重金聘请奥国工程师恩棧来厂辅导技术，向德国买进新机器，“船牌”卷烟纸迅速试制投产。1936年经国民党政府工商部批准，享有东南五省、两特别市的卷烟纸制造专利权。竺、金为了打开销路与舶来品抗衡，派人到处游说，一时南洋、华成、福新等烟厂相继采用；其后，英商颐中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也开始订货。自此，民丰造纸厂生产的“船牌”卷烟纸，在东南五省享有声誉，对于抵制外货，发展民族工商业，起到一定作用。

为了增殖盈利，也像别的资本家一样，竺、金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办厂初期，分日夜两班，每班十二小时，星期日换班时，工时长达十八小时。辅助工每天工作十小时。制卷烟纸后，才改为每日三班制，每班八小时。但厂规多达十余条，工人动辄遭到罚款或开除。

1937年上半年，民丰、华丰两厂同时扩充：民丰再增资一百七十五万元，连同原有资本共计三百万元；华丰增资一百万元，连同原有资本共计一百五十万元。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金润庠曾任上海市抗战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供应委员会副主委，劝募物资，支援抗日军队作战。以后杭州、嘉兴相继沦陷，上海租界成为孤岛，金润庠拒绝与日商“合作”，撤退到汉口，又转赴香港，与其子跑单帮作运销生意。不久，金在香港与官僚资本“中茶公司”挂钩，从宁波贩运茶叶出口，获利甚巨。他常往返于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并曾秘密潜入上海劝募抗日美金公债。1941年5月竺梅先在

宁波病故后，民丰、华丰两厂均由金润庠掌握。

在 1939 年时，日商“王子制纸株式会社”通过日本侵华机构“兴亚院”和“大使馆”强占民丰设备，盗用民丰名义，生产太阳牌卷烟纸。1942 年，日本军国主义和汪伪政权为收揽人心，宣布“发还”华东地区一百四十余家大工厂，企图胁迫原厂主“合作”办厂。金润庠由重庆回到上海，与董事们商定对策，经过多次谈判，最后谈妥由日方签约承租民丰、华丰两厂。金润庠以所得租金在上海开办大同企业公司，经营地产、股票和黄金等投机买卖和卷烟纸贩运业务。

1945 年抗战胜利后，金润庠从日人手中收回了民丰、华丰两厂。纸厂复工后，当时舶来品未及赶到，上海各烟厂均用民丰、华丰出产的卷烟纸，一时销路甚广。但好景不长，美国剩余物资大量运到，孔祥熙的扬子公司经销大批美制卷烟纸，以低于民丰成本的价格涌进市场。民丰产品无人问津，有的烟厂原装退回，存货一时积压至六千余箱。金润庠面临危局，终日忧惧，一面加紧剥削工人，一面暂时转变方向，改制部分文化用纸和手工卷烟用的连史纸，支撑局面。

1946 年秋，金润庠任民丰、华丰总经理后，把两厂厂长职务分别由原工程师陈晓岚、吴贤哲担任。两厂总工程师为褚凤章，副总工程师为陈晓岚。两厂并多次开办技术员工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

同年 11 月，华丰工人要求改善待遇，计划罢工。金润庠得悉后，要求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竺鸣涛派保安队到厂实弹镇压，强迫工人上工，并开除工人连登宝。他还将两名工会负责人调升为公司职员，以分化工人的团结和斗争。

金润庠活跃于上海工商界，任全国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等职，与国民党官僚翁文灏、张群等拉关系甚力。对杜月笙执礼甚恭，依为靠山。他还让上海的“大亨”陆京士、骆清华、王先青等人在厂里兼职、领薪。1948年，金当上了“国大代表”。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不断打击，使金润庠难以招架。孔祥熙的扬子公司从香港大批运进美制卷烟纸倾销，民丰卷烟纸至1948年冬积压已达八千余箱，相当于一百六十万美元，濒临无法周转资金的绝境，出现复厂后第二次危机。金润庠通过贿赂国民党官吏的办法，向中央银行乞求钞票纸订货任务，以济眉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拉金润庠去台湾，金拒之。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派副官把飞机票送到金的手中，金怕受宪兵迫行，遂秘密避居圣保罗公寓。一个星期后，上海解放，金才回工厂。

解放后，人民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华丰、民丰开工生产，积压的八千多箱卷烟纸亦迅速售出。1950年2月，美蒋飞机轰炸上海电厂，各烟厂因之停产。4月初，华丰、民丰两厂成立劳资协商会议，金润庠不明人民政府政策，害怕职工斗争，偕家属及副总经理竺培农避居香港。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争取，推举他为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派人赴港劝促，金乃于7月初返回上海。此后，经金润庠多次申请，民丰、华丰两厂于1953年11月起改为公私合营。

金润庠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1958年起患心脏

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于1961年6月13日在上海去世，终年七十一岁。其子女根据金“为人民办些福利事业”的遗愿，集其部分遗产二十余万元，捐献给浙江省工商联，供举办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之用。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金志朗、沙咏源：《民丰、华丰两造纸厂简史》。《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6期。
- ② 访问金润序亲属记录材料。

王尧臣 王禹卿

朱复康

王尧臣(名尔忠)、王禹卿(名尔正)兄弟,江苏无锡人。王尧臣于1876年10月7日(清光绪二年八月二十日)、王禹卿于1879年9月27日(清光绪五年八月十二日)生于无锡扬名乡的青祁村。其祖父王云亭,在苏州设肆经营南北货,后在吴县公署协助征收漕粮。父王梅森,在乡里设馆教授生徒。

王尧臣少时在其父所设村塾读过几年书,十六岁时先在无锡染坊当学徒,1899年到上海在瑞丰衣庄当伙友,后升会计。1904年由友人介绍入顺全隆洋行,司帐务。1907年在同乡祝大椿(怡和洋行买办)所设的华兴面粉厂任会计,曾先后调至华兴所设天津、营口、安东、大连、烟台、青岛等地分庄,主持面粉销售业务达七年之久。

王禹卿只读了五年书,于十四岁时搭信船到上海,在亲戚所设的胡亦来煤铁油麻店当学徒,十八岁升兼外帐。1902年经人介绍入沈元来油麻店,店主令其招揽崇、沙各帮客商交易。数月之后,王禹卿悉为罗致,店主既嘉其功,而又阴嫉其能,不久即借词辞退。王禹卿遂入恒来油麻店,被派赴烟台、天津、营口、乐亭等处进行兜销,其营业额辄胜于前任者数倍。

是年冬,王禹卿偶在烟台帮客商处,遇到同乡周某兜售

无锡保兴面粉厂所出的飞虎牌面粉。他熟悉北地各帮交易情况，并知面粉为北方人民生活所必需，销路定可打开，即去访见保兴驻沪经理荣宗敬，获得推销该厂各牌面粉的合同。不数月，便销售数万包，荣氏于是知其干练。翌年，保兴改组为茂新，添置法国钢磨，并设苏北姜堰、黄桥、泰州等处办麦机构，遂挽王禹卿入茂新工作。荣宗敬先派王禹卿到黄桥麦庄任会计兼司函牒。不久改派他推销积粉，未满月，存粉销售一空。10月，又派他赴烟台销粉，仅一月功夫，存粉三万余包售尽。1904年2月王再赴烟台，6月转营口与各帮驻营口客商广联声气，除推销茂新所产面粉外，兼销进口美粉，并营汇兑。当时适逢日俄战争爆发，粉销大畅。驻营口三月，销粉二十余万包，获利二万余两。荣氏兄弟^②知其有经营之才能，正式聘为茂新公司销粉主任。

1906年王禹卿任茂新驻津分销处主任，兼裕大祥号天津分号经理。裕大祥是上海头办资本家张麟魁、荣瑞馨和茂新的荣宗敬等所设的字号，经营北方花、纱、布、粉、麸、杂粮等贸易，以及从事股票投机。1908年因张麟魁投机失败，财务大受影响，裕大祥倒闭。茂新亦受连累，经王禹卿向欠款各庄联系，立据负责归还，方得勉强渡过难关。

王禹卿在推销面粉的几年中，深知面粉工厂前途大有可为，遂与浦文涓、浦文汀兄弟合议集股，因资金不足，又与荣氏兄弟合作，共集资本四万元（其中荣氏兄弟二万元，浦氏兄弟一万二千元，王禹卿八千元），订购美国粉机二百筒，日产一千二百包。1913年开工，定名为福新机器面粉厂，并挽其兄王尧臣为经理。这是王氏兄弟经营福新的开始。

由于福新与茂新都是荣宗敬所主持，所以福新一开始就以绿兵船牌为商标。兵船粉早已畅销国内，因而福新货未出厂，已为客帮订购一空。尤其这时的麦价对粉厂极为有利，福新第一年盈利就达三万二千元，盈利率高达百分之八十。

王禹卿看到福新已经得手，便与荣氏兄弟商议扩大经营，第二年即租办中兴面粉厂，并购地另建新厂。又恰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交战国的面粉不但无力输出，而且要向国外采购。同时，处在战线以外的广大国际市场，由于参战各国暂时退出市场，货源短缺。我国面粉价格低廉，产量较多，自然成为各国的主要采购对象。此时，日商三井、三菱、英商祥茂等洋行纷纷向我国各面粉厂采购，运销欧洲，一时发生供不应求的现象。上海面粉工业蓬勃发展，形成了所谓“黄金时代”。从1913年至1920年5月前后不过七年光景，福新系统从一个厂扩展到八个厂，分布在沪、汉两地。在全国各产麦区设置的麦庄和面粉销售批发处约二、三十处。据1928年统计：福新八个厂拥有粉磨二百八十座，资金六百一十万元，共有职工一千五百余人。平均每日用麦三万六千二百担，成粉七万零五百包，比初创时的产量增加约近六十倍，占当时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总能力的四分之一强。至1937年中日战争前，王尧臣一直担任福新第一、三、七厂经理，王禹卿任福新面粉公司经理兼福新七厂副经理。由于王氏兄弟与荣氏兄弟一起办厂，所以荣家所办的企业如申新纱厂等，王氏兄弟也大多参加了股份。

1919年欧美各国经营交易所之风甚炽，日商在上海也已设有“取引所”^③经营粉麸期货买卖。王禹卿看到这一近代资

本主义企业的产物交易所对于厂商控制原料与产品价格都具有一定作用，于是恽惠荣宗敬联合同业，发起组织“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后来更名为“上海面粉交易所”，并议定以福新系统的兵船粉为标准粉。这样，福新便能对国内的麦市和粉价，基本上有所控制。继面粉交易所成立之后，1920年王禹卿与荣宗敬等又创设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经手买卖纱布、证券等业务。

王禹卿经营企业善于窥测市场动态，对掮客、跑街不惜多方笼络，所以市情消息比较灵通，在市场竞争上常能取得优势。他深知经营面粉厂的关键首在麦源，每当新麦登场季节，他便向金融界四出联系调集资金，抢先购买大量原麦存储，到了入冬以后青黄不接之时，他厂已经停工，而福新系统各厂仍能继续生产。至于销粉方面，他不惜用高佣金招揽掮客或跑街等中间商。当时同业常例每千包付给佣金二元九角二分，他为了吸引各帮客商，把佣金提高到每千包八元一角九分，但他见销路已经打开后，又把佣金率逐步降低。

为了使福新获得更多的利润，王禹卿又联合同业，协议改革了历年遗留下来的一些办法。如：粉厂的副产品麸皮，最初不过供饲养家畜之用，都由居间人加佣转售。后来化学工业、食品工业逐渐发达，国外需要量日增，他就把居间商“加佣转售”这项权利，由厂方收回。又如：我国机制面粉，向例每袋净重五十磅，而进口洋粉则每袋四十九磅，相沿由来已久。为了与洋粉竞争，在他的提议下，经获得同业同意，自1924年5月起国产粉也一律改为每袋粉重四十九磅。

三十年代初，王禹卿看到荣氏兄弟先后在上海修建了梅

园、小箕山等处园林风景，王禹卿效法荣氏所为，也在家乡建筑了一座“蠡园”。蠡园面临五里湖，点缀亭榭，风景幽美，虽是私人园林，亦供公众游览。

1932年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再加东北沦陷，市场缩减，日粉倾销，国产面粉销路滞呆，福新营业大为衰退。后因国民党政府借款购买大量美麦，福新系统取得巨额美麦加工代磨，连同茂新代磨，占进口美麦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于是转亏为盈。此时荣宗敬经营的申新系统各纱厂，则濒于岌岌可危之境。荣氏准备采取“以粉济纱”的办法来加以挽救，王禹卿坚持不允，且要荣宗敬允许福新系统另立总公司以其本人任总经理职。荣只好同意。申新在债权团的加紧逼迫下，荣宗敬不得已于1934年夏提出辞职，由王禹卿出任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的总经理。

由于申新亏累太重，债务纷集，王禹卿也无法应付，不久亦只得辞职。后由荣德生向申新提供全部有价证券，给予全力援助，经债权人同意，仍由荣宗敬复总经理职。但福新系统在上海各厂仍由王禹卿全权控制。

1932年王尧臣在无锡设立廣裕布厂，最初资本十万元，抗战前共有布机三百三十五台，以后续有增添。1938年王氏兄弟又集资在上海创办寅丰毛纺织染厂，颇具规模，由王尧臣的次子王云程主其事。

1937年“八一三”抗战发生，福新系统的第一、三、六诸厂皆在沦陷区，二、四、七、八厂处于“租界”之内，“孤岛繁荣”期间，颇有盈利。抗战胜利后，上海属四区面粉公会，由杜月笙主其事；王禹卿以粉业巨子的地位，在公会中

与吴礼门、杨管北号称“粉厂三巨头”。这时，福新联合茂新和国民党政府粮食部组织小麦联购处，垄断了苏皖两地的部分麦源，又以廉价购进了日伪遗留下来的原麦物资，获得不少盈利。在这些联系工作中，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的活动发挥了作用，于是荣毅仁又担任了福新的副总经理之职。原由王禹卿独权控制的福新系统，又逐渐重归于荣家掌握之中。

解放前夕，王禹卿避往香港，1965年5月患心脏病卒于港，终年八十七。王尧臣于1965年4月在上海病逝，终年九十。

注：

- ① 油麻店专营桐油、苧麻丝、船钉等造船和修理材料。崇、沙各帮客商，指崇明、常阴沙一带造船商人。
- ② 指荣宗敬、荣德生兄弟。
- ③ 日语，即交易所。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王氏三沙统谱》谱首，1936年王尔忠、王尔正续修手稿本。
- ② 《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卅周年纪念册》，1929年。
- ③ 《荣家企业史料》，上海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 ④ 《上海市油粮公司档案资料》。
- ⑤ 王禹卿之媳张宜可访问谈话。
- ⑥ 王尧臣之婿、前福新面粉公司经理曹启东访问谈话。
- ⑦ 前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银帐房荣得其访问谈话。

莫觞清 蔡声白

张守愚

莫觞清，浙江省吴兴县双林镇人，1877年12月21日（清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一个开上丝行的小商人家庭。幼年曾入私塾。入学堂后，为寻找日后出路曾努力学习英语。

1900年莫经人介绍至苏州延昌永丝厂工作，因办事能干并能说一口“洋泾浜”英语，深得经理杨信之的赏识，派他在丝间工作兼翻译。两年后莫到上海勤昌丝厂任总管车。1903年莫觞清伙同王笙甫、杨孚生等在上海开设久成丝厂，拥有丝车二百四十部，所产生丝的商标为“玫瑰”和“金钢钻”。同年，上海宝康丝厂刘桂增聘莫兼该厂经理。从此奠定了莫在上海发展缫丝工业的基础。

1910年莫又在卢家湾自建厂房，置丝车五百十二部，是为久成二厂。同年并在唐家弄租厂，有丝车一百三十六部，厂名又成。旋在日晖港自建久成三厂，置丝车六百二十四部；又在恒丰路租设恒丰丝厂。综计在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莫觞清投资开设的丝厂和担任经理的丝厂有：久成一厂、二厂、三厂、德成丝厂、又成丝厂、余成丝厂、云成丝厂、云成二厂、元利丝厂、元元丝厂、大有利丝厂等十余家，共有缫丝车二千五百八十八部，执上海缫丝工业的牛耳，煊赫

一时。莫设总管理处于江西路，贴邻即为美商兰乐璧洋行，那时他已担任兰乐璧洋行的买办。

莫觞清兼做洋行买办之后，深知缫丝厂制丝外销的命脉完全操纵在洋商手里，厂丝国际市场投机性强，价格波动大，外汇汇率变动也大，盈亏毫无把握，朝夕之间就可倾家荡产。莫乃于1917年与汪辅卿及美国人兰乐璧合资开设美亚织绸厂，以增加自产的生丝在市场上的回旋余地。美亚织绸厂置有兰乐璧洋行经销的美制织绸机五十台和捻丝车，技术由兰乐璧主持。但机器装好之后，技术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开不出工达二年之久。直到1919年，在杭州工业学校毕业生蔡品珊、童莘伯、刘祖农等协助下，才试制出绸匹。但是这一年国际生丝市场价格涨跌互起，汇率波动亦很大，而莫所经营的各丝厂的原料与成品大量抵押在银行、钱庄里，仅生丝一项即有二千四百担之多，还有干茧二千数百担，价值二百三十万银元。由于丝价跌落，亏折不费，到年终无法弥补，乃不得不将美亚织绸厂厂房售与日商康泰绒布厂，机械设备分别售与锦云绸厂及杭州天章绸厂，以抵偿债务。第一个美亚织绸厂，竟如昙花一现。莫受此挫折后，对于组织织绸厂的意愿并未动摇，于1920年春与天生锦绸庄合作，再度开设美亚织绸厂于马浪路（现马当路），置有织机十二台。当时蔡声白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到美亚任职，莫看到蔡精明干练，善于经营管理，于1921年春聘蔡为美亚织绸厂经理，自己退居幕后，其后又将长女怀珠嫁与蔡。不数年莫又辞去兰乐璧洋行买办职务，让他的亲戚张惠生继任，自己过寓公生活。1938年莫觞清病逝于上海，终年六十一岁。

蔡声白，原名雄，字声白，以字行。与莫觞清是同乡。1894年11月1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七日）生于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1900年，蔡七岁时进他父亲蔡甸宣（举人）担任校长的双林学堂读书。1905年入杭州府中学堂，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1915年被保送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攻习地质，1919年获工学士学位归国，旋入美亚织绸厂任职。

蔡声白在美国学习期间，很注意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和经营方式，以及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和加强剥削工人、积累资金的手段。1921年春，蔡任美亚织绸厂经理后，“即着手添置机械，罗致人才，革新管理，扩大营业”^①，锐意经营。

蔡声白初进美亚厂时，只有织绸机十二台，规模甚小。由于蔡经营得法，1924年他就在闸北交通路开设美亚第二厂，1925年并进小沙渡路（现西康路）天纶美记分厂，1926年并进斜上路东庙桥路（现东安路）天纶美记总厂，1930年又并进久纶绸厂及南新绸厂，到1933年2月1日改组为美亚织绸厂股份有限公司时，已拥有织绸机共一千二百台。隶属美亚公司的有：美亚织绸总厂、美亚第二厂、天纶美记总分厂、美孚织绸厂、美成织绸厂公司、美生织绸厂、美利织绸厂、南新织物公司、久纶织物公司、美经经纬公司、美艺染炼整理工厂股份公司、美章纹制合作社和美兴、美隆两绸庄、美纶绸缎布匹局等。1933年美亚公司资本达法币二百八十万元，拥有职工三千多人。三十年代，美亚织绸厂的规模不但在江南地区织绸业中首屈一指，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亦是独一无二。

蔡声白为了笼络高级职员为他的企业尽力，让一些厂长、技师、会计等投资经营美成织绸厂。他还曾想以“美工”为厂名来诱引工人投资，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止。蔡为了掩饰劳资雇佣关系，以出租的名义将工厂租给厂长，而自己却在幕后操纵。如美亚苏州分厂租与厂长宋保林，而实际上厂内员工工资都由上海美亚总管理处会计科支付。蔡不允许他控制的公司所属各厂高级职员在外面另开设织绸厂，一旦有人这样干，他就借故把这个人辞退。可是美亚厂的许多高级职员看到开厂的利润比工资要高得多，便不顾当“股东”的诱惑，而纷纷离厂自己去开设绸厂。

蔡声白对产品的推销也有一套办法。上海各丝织厂的绸缎产品外销，一般都是售与绸庄，再由绸庄贩卖给洋行辗转出口，而美亚厂则直接与国外联系销售。蔡曾亲赴新加坡、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视察那里的人民喜爱穿着那些绸衣。他除了在新加坡设立分公司，委他的妻弟莫如德为经理外，并与巴达维亚富商订立销售合同。他看到南洋一带对输入用英国制人造丝原料织造的绸缎所纳关税特别低，便把美亚香港分厂所用原料人造丝全部改用英国货，产品的售价随着关税的降低而低廉，输往南洋各地颇受欢迎。这样，蔡把过去被日本绸缎排挤出南洋的中国丝织品市场，重又夺了回来。

当时上海海关对人造丝进口税率系从量征收估本达百分之二百以上，因此提高了产品的成本，阻碍了人造丝织品的外销。蔡声白通过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的关系，经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关务署批准，把上海美亚十厂改为“关栈厂”²¹，进口原料人造丝和产品出口均毋须缴税。

这样，他就利用了国内廉价劳动力的有利条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打开了销路。这是其他丝织同业无法与之抗争的。

1932年及1936年，蔡声白两次派美亚厂副总经理兼营业主任高事恒率领南洋考察团，携带了美亚厂出品的绸缎及时装表演影片，分赴南洋群岛，以及国内宁波、杭州、福州、广州、厦门、青岛等地，举办产品展览会，放映电影，广泛宣传。蔡在广告宣传方面，是不惜工本的。

蔡声白对经济活动与金融调度，主要是靠与国民党政府官僚勾结起来进行。他以美业织绸厂全部机械设备、原料和成品，向中国银行抵押，由中国银行派两个管理员驻在美亚厂总管理处，算是“监督”。这样美业织绸厂就可以长期向中国银行透支一百万元。

蔡声白善于拉拢利用各种关系，随风应变。在日伪统治时期，上海美亚厂房上高悬意大利国旗，算是意商。而到1941年12月9日日本军队占领“租界”后，美亚厂随即“聘请”日本律师冈本为法律顾问，并将“法律顾问证书”悬挂在出入要道。

1944年，蔡声白招股组织的中国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为伪储备券五千万元。他企图仿照美国“托辣斯”，准备日后与美亚绸厂合并，成为从缫丝、织绸到印染出厂的全能企业，达到垄断丝织业的宿愿。

缫丝厂原料是蚕茧，一年的原料要在鲜茧上市时一次收足，这需要很多资金。蔡声白于1944年邀请江浙同业来沪开会商议办法，当即组成丝绸业联合会，他被举为理事长。蔡以丝绸业联合会的名义，通过当时中国银行经理潘久芬、李

祖莱的关系，向汪伪储备银行联系贷款，结果由中国、交通、上海、浙江兴业、浙江实业、新华、垦业等银行组织银团，以承兑汇票方式贷给“丝茧贷款”储备券五亿元，而蔡声白的中国丝业公司在这笔贷款中得到了一半。在日伪时期，物价飞涨，伪储备券不断贬值，因此这笔“丝茧贷款”到期之时，只要若干担厂丝就可清偿。中国丝业公司就此成了抗战期间的暴发户，至抗战胜利前夕，仅厂丝已拥有五千担之多。

蔡声白曾先后担任美亚织绸厂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丝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国货联营公司总经理、利亚实业公司总经理、美恒纺织公司经理、铸亚铁工厂经理、美兴地产公司董事、劝工银行董事，以及上海市电机丝织厂业同业公会主席、丝绸业联合会理事长、商业统制联合委员会委员等职，成为上海丝织工业界的领袖人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声白曾赴美国考察，对美国丝织厂的自动化设备深有感慨，他感到“中国丝织业很难与之抗衡”。因此他去香港后，大部分精力花在做地产买卖上。

1951年蔡声白曾与吴蕴初同回上海，并去东北参观。当年又去香港，后侨居澳大利亚。1977年4月14日，蔡偕次婿香港巨商杨元龙从澳大利亚旅游返港，当晚蔡还谈笑自若，精神饱满，詎料翌晨10时尚未起床，家人进房探视，蔡已经故去。

注：

1 引自蔡声白1929年为“西湖博览会”丝绸馆特刊所撰之专文。

2. 关栈厂，就是美亚十厂织制出口纺织品所需原料人造丝，进口后堆存海关仓库，毋需缴纳进口税，惟海关派驻监督的关员工薪由厂方支付，类似现时所称“加工区”的工厂。

周作民

徐国懋 洪葭管

周作民，原名维新，江苏省淮安县人，生于1884年2月12日（清光绪十年正月十六日）。他的父亲周佩香，是个举人，在乡里设馆教学。周幼年随父读书，十五岁时转入谈覲孙办的东文学堂就读，汉文教师为罗振玉。1902年秋赴粤，入广东公学，学费多由已受聘该公学的罗振玉相助。1906年考取官费赴日留学，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肄业二年半，因广东官费停发，只能归国。1908年秋，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同时自习财政经济。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

1912年3月，临时政府北迁，周随同去北京，在财政部继续供职。1913年，熊希龄以国务总理兼长财政，对他赏识，擢升为库藏司司长。由于库藏司经手军政款项的发放和汇划，周因而与代理国库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负责人以及各地军阀及其军需人员有较多交往而相结识。

1915年，周学熙重长财政，周作民因未得重视，具呈辞职。后经当时任交通银行总行协理的任振采推荐，至该行任稽核课主任，不久，兼任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当时倪嗣冲任安徽督军，倪的心腹王郅隆任安武军后路局总办，周作民在安徽与这两人结识，这是他后来创办金城银行的契机。

1917年5月，金城银行成立，主要投资人即为倪嗣冲与王郅隆。倪投资十七万元，王投资十万元，合占资本总额五十万元的百分之五十四；加上其他军阀、官僚投资十六万元，因之百分之八十六的资本来自军阀、官僚。金城由王郅隆任第一任总董，周作民任总经理，设总行于天津法租界，并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分行。

金城银行成立后，周作民利用政治势力，左右逢源，业务发展迅速。经过三年时间，存款由四十万元增加到一千一百九十八万元，放款由三百七十八万元增加到八百五十一万元，纯益由九万元增为八十九万元，在华北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三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该行获利途径之一，是承购北洋政府的公债、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这样既为银行获得巨额利润，又为北洋政府度过财政困难提供了支持。

1921年金城银行与盐业银行、中南银行组成联营机构，次年大陆银行亦加入。这四家银行的总经理吴鼎昌、周作民、胡笔江、谈荔荪为联营机构的领导人。四行联营的主要内容是：（一）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以中南银行钞票为四行共同发行；（二）设立四行储蓄会，后来又合办四行信托部。1934年以储蓄会的资金在上海建成一座高达二十二层的国际饭店。这些都给四行扩大业务带来了不少有利条件。

周作民办金城银行是以皖系为靠山，但他恐遭政治失败，连带事业失败，常标榜他并非安福系，仅借安福系势力为事业取得各方面的便利而已。1927年，金城银行的资本总额已增为七百万元。不久，北洋军阀统治垮台，金城银行失去了

原有政治上的靠山。于是周作民通过政学系的黄郛、张群、杨永泰和钱新之的关系，积极向国民党政权靠拢，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兼职多起。他在业务上的措施，除了继续保持和华北各分行的业务优势外，开始逐渐将重心南移，加强长江流域各行的机构，并在广州与香港等处添设新机构。1935年，金城银行第八届董事会决定周作民担任总董兼总经理，集大权于一身。1936年1月，总行迁到上海。到抗战前夕，金城在全国各地的分支行处已增加到六十五处。

周作民在日本留学时，很赞赏三井、三菱的一套经营方针。因此，他想以银行为核心，控制一些工矿、交通及贸易企业。在他的主持下，金城银行的放款和投资有其特点。它放款集中于少数重点户，主要投放于其本行投资的企业和自营附属事业。在工业放款中，主要投放于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煤矿工业和面粉工业。1933年金城与中南银行一起组成诚孚信托公司来管理已经收购的新裕纱厂和北洋纱厂，并且代管恒源纱厂；又以扬子纺织公司名义，收购了大生二厂并入新裕。在诚孚公司下，设有制造纱厂部件的诚孚铁工厂。还开办了纺织实验所，吸收和培训纺织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材。由于他对永利化学公司创办人范旭东的信任，金城银行对这个公司的放款也较多，1926年该公司制造洋碱时期，金城曾单独予以六十万元的透支；后来在创办硫酸铔厂期间，又联合其他银行继续予以支持，金城的放款金额曾达到二百四十多万元。周作民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关系也很深，在资金上亦多方面予以通融。金城银行对永利化学公司和民生实

业轮船公司的投资，分别占这两大企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九点七三和百分之十六点六六。

在周作民的主持下，金城银行的规模和存款总额，在抗日战争前的私营银行中，长期居于第二位，个别年份曾跃居第一位，超过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这期间，金城承购公债和进行公债投机，仍是获利的途径之一。

1935年下半年，在国民党政府亲日外交推动下，周作民和吴鼎昌一起曾率经济考察团访问日本。回国后，成立中日贸易协会，吴鼎昌任会长，周作民任副会长。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国民党势力退出华北，周作民为了维护金城的财产安全和经济利益，把平、津、沪三个分行交给留日出身的几个经理负责。周正是利用与日蒋双方都有特殊关系，使金城银行于抗战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占领区都能同时继续营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民被任命为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实际上他很少过问。1937年11月间，他在南京参加这个委员会会议后回沪时，因沪宁路火车已经中断，遂乘轮去武汉，绕道香港回沪。随后他在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上，依然指挥沦陷区金城银行各地分支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正在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他被拘留。1942年3月，日方把他和李思浩、林康侯、唐寿民一起遣送回沪。日方意图是要他们这些人与日伪合作。周作民除任金城银行和有关投资企业的职务外，未出任任何伪职，只是与日本和汪伪方面的一些头目有所接触。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对他进行恐吓和敲榨，几有逮捕之势，后经张群、吴鼎昌

等疏通，经蒋介石批准，知照有关军、政、法机关，说他“过去担任秘密工作，迭有报告，希加保护”。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9月，又迫使各商业银行出售黄金、外汇，向“中央银行”缴存现金，进行增资。金城也被迫出售了原来陆续积累的外汇。当时，蒋经国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对金融界头面人物进行威胁，要周作民交出私人外汇，并下令非经蒋经国许可，不准离沪。但在美国陈纳德民用航空公司的庇护下，周终于安然离开上海，飞穗转港。这些严酷的事实，使周作民终于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真实面目。

195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感召下，周作民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是私营金融业老一代头面人物中第一个于解放后回归大陆的。旋即被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51年9月，“北五行”（即盐业、金城、中南、大陆、联合五银行）公私合营，他任联合董事会董事长。1952年12月，六十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时，他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在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接受企业改造，并带动其他同业，促成了联营、联管。

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因心脏病猝发，病逝沪寓，终年七十一岁。

主要参考资料：

《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周作民日记》（部分抄件）。现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
《金城银行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刊》。1937年上海世界书局代印。
籍孝存、杨固之：《周作民与金城银行》，《天津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朱志尧

朱文炜

朱志尧，字宠德，号开甲，天主教徒，教名“尼各老”（Nicolas）。1863年9月7日（清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生于上海南市董家渡。

朱氏祖居江苏青浦潭西的丝网埭，捕鱼为业，康熙末年始信奉天主教。后移居金家庄，再迁诸巷，渐由渔而商，自湖而海，贸迁有无，获利甚丰，家业日盛。到1850年时，朱家自有四桅大沙船，经营贩运；到朱志尧父亲的年代，已拥有沙船七艘、钱庄三所和一大批房地产。1860年，迁居上海南市董家渡。

朱志尧幼时，经常到造船场去观看工匠造船，对铁工活极感兴趣，曾闻其父说“木匠一工，不如铁工一拱”^①。稍长，从二舅父马相伯读于徐汇公学，又学习八股，先后应试八次，皆未中。1882年，朱家沙船在山东洋面两次遇到台风，“沙钩覆没，庄资破产”^②，家道遂中落。1887年时，他的三舅父马眉叔主持招商局局务，盛宣怀为督办，朱志尧经马相伯介绍任招商局江天轮买办，往来上海、宁波间。几年后，调任江裕轮买办，行驶上海、汉口线。1893年，朱趁休假时机，作第九次应试，中青浦县附生。

朱志尧做了十年轮船买办，积累起一些经验和资金，想

自己办点事业。他认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是“经商万无一失之道”。他看到当时盛宣怀所办织布局，积压大量棉籽，苦无出路，便在工余参考外国资料，作轧棉籽油计划，画成轧机图样一式，建议盛宣怀办棉籽油厂。盛大为赞赏，时洋人福开森在旁，说机器可向美国购来。数月后，机器运到试用，不料故障迭起，洋工程师亦束手无策，盛大为懊丧，迁咎朱志尧。朱乃乘机自荐。原来此种进口机器只适用于洋种棉籽，不适用于粒小而坚硬的中国棉籽，朱志尧请来铁匠，共同研究，自造轧机一台，半月即成，效用颇佳；因再添备零件，将洋机改装。1897年，盛宣怀开设大德油厂，委朱志尧为总办。从此，朱志尧潜心西学，并助其弟朱云佐（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第一任买办）创《格致新报》，传播西洋科学知识；又办中西书室，经售法文书籍。1898年，《格致新报》停刊，并入《沪西汇报》。是年7月，朱云佐去世，朱志尧由马相伯介绍，马眉叔担保，继其弟任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买办。

辛丑条约之后，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民族资产阶级纷纷提出“振兴实业”、“挽回利权”。朱志尧认为“惟有机器，仍购自外洋，漏卮莫塞”，乃向舅父马相伯就教问计，决定创设机器制造厂，定名“求新”。1904年在南黄浦租地七十亩开办，规划建造。是年，大德油厂获利四万一千两，这极大地鼓舞了朱志尧。乃于1905年初另创设同昌油厂，全套轧棉籽油机设备均为“求新”制造。“求新”制造业务发展很快，1905至1911年七年中，产品不下百种，较著者计有大小轮船四十艘，蒸汽引擎共五千匹马力，榨油机榨床二百部，大

小桥梁四十座，以及自重六十六吨半的上海内地自来水厂抽水机等。在当时，许多产品都是先人一着的创举，在中国机器制造史上均属空前。

求新机器制造项目不断扩大，朱志尧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自1904年迄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发起创设、投资及支持了一批与求新制造修理有关的工矿企业。除了创设大德油厂（任总办）和同昌油厂（主要出资人）外，他还投资于新诚米厂、汇西布厂、“尼各老”砖厂，以及担任华商电气公司、内地自来水厂、申大面粉厂、中国图书公司、苏路公司董事。对通州资生铁厂、常州厚生机器厂以及新祥机器厂、合兴机器厂、南洋机器厂等机器同业，也曾给与支持。

朱志尧身为买办，又是天主教徒，在经济上依赖洋人，但在机器制造上，并不迷信洋人。他曾多方设法，将外国机器改进，使求新制造的机器，更适合我国的需要。有些机器，“外国制造者不适用，求新制造者，试用颇著成效”^③。

1910年，朱志尧与马相伯同时就任江苏谘议局议员，在南京赁屋住了一个时期，常骑马到郊外马鞍山、采石矶等处游山探矿。1912年，朱志尧发起创立宝兴铁矿公司，资本一万两，朱投资二千两（至1919年资本达四十五万两，朱有股份九万七千五百两），开采安徽当涂铁矿；并着手开办长兴煤矿，作为办炼钢厂的准备。

朱志尧独资经营的求新厂的资本，从1904年的四万八千两，到1906年增至十六万两，1910年又增加到三十余万两，发展很快。同时，朱志尧还投资于其他事业及房地产。据估

计，朱志尧 1910 年时的资产总值约达八十万两。不过，他用于企业的资金，大都是以房地产及企业股份向法商东方汇理银行及教会抵押借贷而来，每年负担利息甚重。至 1913 年，朱志尧经手向东方汇理银行抵押借款共达一百七十二万两。这样巨额的债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为了能延期偿还债务，朱志尧曾到北京与马相伯同谒袁世凯，请求维持，经袁同意，再通过亲戚沈志贤与审计院副院长徐恩元的关系，得到北洋政府财政部担保，朱志尧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的归还期延长四年。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求新”由于原料涨价等原因，遭到一连串的亏损，使朱志尧的债台愈筑愈高，陷于焦头烂额走投无路之境。1917 年，东方汇理银行到期逼债，北洋政府财政部拒绝继续担保。至此，朱志尧告贷无门，束手无策，于 1918 年 4 月 2 日签订将求新厂售与法国邮船公司及歌乃达钢厂的草合同，估值为五十一万二千两，订明四个月履行合同。地方绅董、商会闻讯，反对将求新厂售与洋商，要求北洋政府收为官办，但政府答称款巨难筹，要上海总商会维持，相互推诿。8 月法商通知朱志尧履行合约；次年 3 月 1 日，法商向北京法国公使馆控告。几经交涉，北洋政府外交部核准中法合办，6 月 1 日接管求新厂，核定资本为一百二十万两，中法各半。中国资本中，保留朱志尧股份十万两及董事职位。同时将同昌油厂抵押给上海二十四家银行、钱庄，借款三十一万两，了结东方汇理银行债务。

求新厂的出售，对朱志尧是个重大打击，十五年苦心经营付之东流。但他还任东方汇理银行买办，在中法求新厂及

其他企业中仍是董事，在社会上还有一定地位。因此，他力图东山再起。朱出身航业世家，主张自辟航线，经营航运。1923年，苏北巨商杨在田邀朱志尧合办大通仁记航业公司，专驶沪扬线。朱为大通公司设计符合航线要求的船只，向中法求新厂定造千吨级隆大轮一艘，后抵押借款再造鸿大轮，一年之中成船二艘，价值四十余万元。几年间，发展迅速，再添轮二艘。朱志尧深知长江各主要口岸，都被怡和、太古、招商局三大公司霸占，是无力与之竞争的；只有大公司不走的较小码头，尚有回旋余地。1928年春，再集资二十万元，创设合众航业公司，朱投资二万元。是年秋，先购船两艘，行驶上海——海州，连接陇海铁路客货运输业务。未及一年，营业日上，又添购一轮，自辟进射洋河直通苏北阜宁航线。

大通成立以后，与大达公司有激烈竞争，经朱志尧设法改进轮机，提高航速，取得优势地位，迫使大达与大通联营，竞争始告结束。

1915年，朱志尧与虞洽卿、陆伯鸿曾合组大通地产公司，各出资一万两，向上海巡捐局订立合同，租得南市新马路以外沿浦滩地及岸线等地，三十年为期。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曾将该地没收，后经虞洽卿向蒋介石交涉，收回租赁权十五年，重新订约付租，得到赔偿损失费十五万元，朱、虞、陆各得五万元，并各得租地三分之一。虞洽卿设立的三北公司，朱志尧设立的大通公司，分别在此建立码头。1930年朱志尧在租地上集资建造合众仓库公司。

1926年，朱志尧参加美国费城“赛会”，同时参加在美举行的天主教“万国圣体大会”。他企图通过美国天主教上层分

子、为冶铁炼钢事业找到大笔借款的机会，未能成功。从美国回来，朱志尧拟以儿子继代买办职位，未获洋人同意，1927年2月买办合约终止，朱志尧退出东方汇理银行。朱志尧在中法求新厂保留的十万两股份的股金，是向东方汇理银行抵借的，曾还过二万两，1930年11月由巴和律师出面，将股份作价了结。至此，做了三十年买办的朱志尧，从法国资本中完全退了出来。

在此期间，朱志尧曾任上海机器公会名誉会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沪战起，南市首当其冲，朱志尧在经营求新失败以后创立的三个航业、仓库公司，都遭到严重损失：所有八艘航轮除一艘逃往重庆外，其余全部被征用，沉没于马当及连云港。朱志尧对此一筹莫展，遂将活动转向教会方面。

朱志尧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与天主教的密切关系，不但表现在信仰、思想及教会会务活动方面，而且深入到他的有关事业方面。在经营求新时期，经常向教会若瑟堂、三德堂、普爱堂、首善堂等处大量借款，为教会买过大量土地，曾任上海公教进行会副会长，罗马教皇曾“钦赐”给他“圣西尔物斯德费骑尉勋位”。抗战前几年，朱志尧每逢礼拜日（即星期日），常到无锡看守所监狱讲道布经；抗战期间，转到上海马思南路看守所及难民所讲道。1942年，他将东沟地亩二百亩出售，得伪中储券三百万元，把其中一百七十万元全部捐输各地教会及天主教举办的“慈善事业”。

抗战胜利后，朱志尧曾产生过一些幻想，一方面向国民党政府交涉收回大通、合众等公司产业；另一方面，通过主教

于斌向国民党政府要求赔偿战时损失、贷给巨款及由政府担保向加拿大借款购船，结果都未成功。解放前夕，大通公司仅存的隆大轮，又被征用沉没在上海江海关码头，至此，朱志尧的事业，几乎完全破产。

1955年3月17日朱志尧在上海病逝，终年九十三岁。

注：

- ① 《家史》，朱志尧档案卷 80。
- ② 同①，“沙约”，即沙船。“庄资”指钱庄的资金。
- ③ 《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图说》，朱志尧档案卷 65。

主要参考资料：

-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
朱志尧档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存。

庞元济

王铁生

庞元济，字莱臣，号虚斋，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人，生于1864年7月27日（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四日）^①。南浔地处杭嘉湖三角洲，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庞父以经营典当起家，后独资开设庞怡太丝行，为南浔镇上四大巨富之一^②。

庞元济在青年时期喜好字画碑帖，常常购置乾隆、嘉庆年间的名人字画，精心临摹^③。后发现字画买卖可获大利，于是从事此项交易。他雇了熟练的裱褙工匠和临摹工匠，从书肆中发现真迹，加以裱褙整修，然后高价出售，有时也以贗品冒充真迹。

1895年，庞元济与杭州富商丁丙等人，在杭州武林门外拱宸桥开设世经缫丝厂，资金三十万两，采用进口的新式机器，日可制茧丝一担。庞、丁等人后又在浙江德清县唐栖（今余杭塘栖）开设缫丝厂^④。这些都是浙江最早的缫丝厂。但因经营不善，无利可图，加以庞元济后来信奉佛教，认为煮死蚕蛹有悖佛旨，不久即将两厂先后盘出^⑤。次年，庞元济又与丁丙、王震元等人集资四十万两，由英国进口机器，在杭州拱宸桥堍筹设通益公纱厂。1897年建厂竣工，初期购置英国纱锭一万五千零四十枚，雇男女工人共约一千二百人，1898年产纱二百万磅，1899年达三百万磅。但管理不善，资

金不足，债台高筑，又因北方义和团事件影响棉纱销路，不得已于1902年停产，次年将该厂转让给李鸿章之子李经方^①。

1904年秋，庞元济在上海与人合资开办龙章机器造纸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严子均为协理，陈润夫、韩山羲、祝兰舫、苏宝森、顾牧斋等十余人为董事。原定官股银六万两，商股银三十万两。但在建厂过程中，几度发生资金短缺的困难，经庞元济力为挪借，终于在1907年夏建成，开工造纸^②。建厂初期由于经营不善，加以纸价行情看跌，发生亏损。1909年召开董事会，决定向清政府商部借银十五万两，另招新股十万两^③。庞元济请他堂弟庞赞臣来龙章纸厂主持厂务。庞赞臣毕业于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后改为交通大学），精通技术，来龙章后，立即将蒸气动力改为电力动力，使生产效率大增，营业蒸蒸日上^④。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资无暇东顾，更给龙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极盛时有工人两千名^⑤。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庞元济因自己年迈力衰，遂将盈利颇丰的龙章纸厂卖给其外甥、国民党要人张静江，后张将龙章纸厂拆迁重庆。^⑥

除了兴办工业以外，庞元济还在南浔、绍兴、苏州、杭州等地开设米行、酱园、酒坊、药店、当铺、钱庄等大小企业。在绍兴置田四千亩，在苏州、上海、南浔等地置有大量房地产。^⑦

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到1949年庞元济去世这段期间，庞因年事已高，不再从事实业活动，在上海当寓公。

庞元济虽属于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阶级成员，但政治

思想保守，戊戌变法时，反对维新派，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老自居。后来溥仪已是伪满洲国的傀儡，庞元济仍对溥仪念念不忘。¹⁹

清末，庞元济曾出资捐上海道台不成，后放上海商务督办²⁰。1919年前后，曾赴日本游览，历时半年。庞元济虽曾出资捐官，但系从生意着眼，出于商业需要，对政治不感兴趣。以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及日伪时期，与统治阶层人物也有所周旋，但未出任职务²¹。

庞元济信奉佛教，每日清晨盘膝打坐，念《金刚经》，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发财之后，经常为乡里举办一些赈粥、施药之类的所谓慈善事业，并曾出资兴修荻塘，用石块整修湖州至平望间长约三十里的一段运河堤岸。²²

1949年3月8日，庞元济于上海病故，终年八十五岁²³。

注：

- 1 樊樊伯炎口述。樊1934年入庞家为门客，很受庞的赞赏和信任，一直到1949年庞元济去世后才离开庞家。
- 2 据南洋藏书楼管理员汤福璋根据地方志整理的资料。庞父以经营典当起家，是樊伯炎口述。
- 3 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序言：“余自幼嗜画，年未及冠，即喜购置乾嘉时人手迹，刻意临摹，颇得形似。先君子顾而乐之曰：此子不愁无饭噉矣。”《虚斋名画录》现藏樊伯炎处。
- 4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95页。
- 5 孙世源口述。孙曾在庞元济之弟庞元澂家任账房多年。
- 6 许超：《杭州第一棉纺织印染厂七十年来的变迁》。《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1-2页。
- 7 同前813页。

- ⑧ 同④841页。
- ⑨ 同①。
- ⑩ 张福祥口述。张曾为庞元济家中多年的老佣人。
- ⑪ 同①。
- ⑫ 南浔镇工会文化工作组蔡启楨根据地方志整理的资料。
- ⑬ 同①。
- ⑭ 同⑫。
- ⑮ 同①。
- ⑯ 同①。
- ⑰ 同⑩。

俞 佐 庭

陈春等 宋紫云

俞佐庭，字崇功，1889年1月30日（清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镇海。父亲俞樵芎，是当地挂牌中医，对子女管教甚严。俞佐庭少时入私塾，勤奋好学。俞有表叔李璇祥和李咏裳，是镇海富绅，在镇海和宁波开设镇余、慎德_里两钱庄。俞佐庭十六岁时进余姚木行当学徒，满师后于1908年进镇余钱庄当职员。不久，俞到上海进恒祥钱庄任账房。1916年任宁波天益钱庄经理。俞进镇余和天益，都是表叔李璇祥、李咏裳的关系。

俞佐庭任职天益钱庄后，交友广阔，得识沪上闻人虞洽卿等。1921年，俞佐庭任上海中易信托公司副经理，和在该公司任职的陈布雷相结识并成为知友。1926年，俞通过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的同乡关系，曾一度任天津垦业银行经理。1927年俞任宁波市财政局局长。俞仍兼天益钱庄经理，遂被推选为市总商会会长，为甬地工商界出谋筹划，办了些事；同时也多次为反动当局摊捐派税。此时，上海颜料业巨商秦涵琛在甬去世，俞被邀任秦家的治丧总管，由于办事周到，深受秦家赏识。1931年俞在沪筹设恒巽钱庄，得到秦家的大力支持，共募得十一股，秦家投资五股，李咏裳和徐庆云各投资两股半，俞自认一股，并任经理。在此前后

直到抗战期间，俞先后在宁波独资开设慎生、正大、东升、万成四家咸鱼行；在宁波、绍兴、杭州、上海等地十四家企业中拥有股份，担任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监事等职。

1931年俞佐庭被选为上海市钱业公会常务委员。此时甬地钱庄存款多于贷放，多余资金亟需谋求出路。俞熟悉沪甬两地金融情况，因此甬地钱庄通过俞的关系，定期对沪地工商界进行短期放款。这样既满足了沪地一部分工商界调剂资金的需要，也为甬地资金找到了一部分出路，俞在两地工商界中的声誉也因此大为提高。1934年6月到1936年6月，俞当选为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委员。在此期间，俞鉴于橡胶业等因盲目竞争投产，造成销路呆滞，遭致严重亏损，拟就《统制工业条例》草案，由市商会报国民党政府批准在全国施行，但未被采纳，后市商会鼓励同行业自行联合，统一调剂产销。火柴业首先实行，收到了一定效果。1934年8月，在俞佐庭主持下，市商会执行委员会决议，将北河南路天后宫原已停顿的国货商场从事改组扩充，重行开幕。参加厂商三十多家，群策群力，推销国货。配合了当时全市性的爱用国货运动，也为各厂商推销了不少商品。在沪地的影响下，外地厂商也纷纷成立了类似的国货商场。除此之外，俞并重视商业人才的培养和职工的业余教育，开办了商业职业学校和商业补习夜校的劳工班等。

1936年6月，上海市商会改选，王晓籁继俞任主席委员，俞当选为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俞佐庭与杜月笙的关系密切，早在1933年便结为换帖兄弟。1935年由于市场萧条，银根吃紧，钱庄放款一时无法收

回，资金周转失灵，提存之风骤起。俞佐庭经理的恒巽和其他恒兴、恒隆、恒赉四家钱庄，更是面临倒闭险境。此时杜月笙为国民党政府指派的“钱业监理委员会”委员，在杜的支持下，恒巽等四钱庄以房地产向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组成的银团进行押款，始得渡过难关。

1935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为与日本妥协勾结，响应日本政府提出的“中日经济提携”，物色工商界、金融界头面人物，组成“经济考察团”^③，赴日进行所谓“亲善”活动，俞亦为代表团团员之一。同年四明银行因滥发银元券，发生挤兑，官僚资本乘机加以控制，加入大量“官股”。次年冬，该行改组，俞佐庭经股东大会推定为商股董事，后又在董监联席会议上被选为私股常务董事。1937年四明银行筹设四明储蓄会，该行总经理孙衡甫兼任会长，俞任经理。不久，该会并入银行信托部，俞因而离职。

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沪宁沦陷，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俞佐庭除继续经营钱庄业务外，深居简出，尽量减少社会活动，以保安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曾胁迫俞出任伪中央储备银行要职，俞不愿附逆，偕其弟俞佐宸离沪，辗转避往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俞回到上海，继续担任四明银行私股常务董事。1947年俞经陈布雷的推荐，出任四明银行总经理兼常务董事。同年当上“国大代表”。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俞佐庭辞去四明银行总经理职务，携眷迁往台湾。1950年其在台求学的独子病死后，俞离台移居香港。1951年6月病死香港，终年六十三岁。

注:

- ① 慎德钱庄后因营业不振，改组为天益钱庄，仍由俞佐庭任经理。
- ② 十四家企业及俞所任职务列下：上海宁绍轮船公司董事长，宁波水耀电力公司董事，宁波四明电话公司董事，宁波冷藏公司董事，宁波和丰纱厂董事长，宁波大丰面粉厂董事，绍兴大明电灯公司董事长，嘉兴民丰造纸厂董事，杭州华丰造纸厂董事，上海美伦毛纺厂董事长，上海惠中商业银行董事长，上海四明银行常务董事，上海统原银行董事，香港大新银行董事长。
- ③ 赴日经济考察团共十五人，吴鼎昌任团长，团员有宋汉章、黄文植、俞佐庭、陈光甫、周作民、钱永铭、刘鸿生、徐新六、唐寿民等人。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上海钱庄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3月版。
- ② 《全国银行年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1935年出版。
- ③ 《申报》1935年10月3日。
- ④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9月版。
- ⑤ 上海市工商联档案资料。
- ⑥ 俞佐庭访问记录。

沈 联 芳

汤 肯 堂

沈镛，字联芳，以字行，浙江吴兴县人，生于1870年12月2日（清同治九年闰十月初十）。沈幼年就读于私塾，十六岁时在湖州城内恒有典当为学徒。

1893年，吴少卿、李松筠在上海创办瑞纶缫丝厂，沈联芳由其舅父荐至该厂任职员。因工作勤奋，能力又强，逐渐升为高级职员。他看到当时机器缫丝国外需要甚殷，瑞纶丝厂很赚钱；自己几年来渐有积蓄，又联合了一些朋友，于是在1900年集资四十余万两，在上海北河南路鸿安里创办振纶洽记缫丝厂，系有限公司性质，沈自任经理。该厂有缫丝车二百四十部，工人多时至千名，少时亦有六七百名，在当时是一家颇具规模的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此时缫丝业正在发展，丝茧买卖非常旺盛，利润可观，因此他又开设恒丰丝号于集益里，经营丝茧买卖，获利颇丰。

1908年沈联芳在闸北建造恒丰缫丝厂，设置缫丝车三百二十部，独资经营，自任经理，聘意大利技师特乃利来厂为监工。恒丰丝厂所生产的“飞虎”和“玫瑰”两个商标的厂丝，输往欧美各国，颇获好评。由于当时生丝出口贸易完全被外商洋行所操纵，丝价起伏不定，风险颇大，他为求稳妥计，改变了对丝厂的经营方式，将丝厂出租，以收取租金代替了

自行经营。他的恒丰缫丝厂和与他有关系的振纶洽记丝厂、宝康丝厂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均出租给他人经营，坐收租利。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初期，缫丝业一度困难重重，他却安渡难关，无甚影响。

沈联芳以办丝厂起家，以后致力房地产投资，成为上海的房地产资本家。他在闸北恒丰路、恒通路等地段，建造不少里弄市房出租，计有恒丰里、恒通里、恒祥里、恒康里、恒乐里、恒丰大楼等。他与地产商卢少棠合伙购买南京东路集益里房产，当时以三十万元购进，后以九十六万元的价格售出，获得了巨额利润。又与傅筱庵争买乍浦路联安里地产等。他的恒丰丝号后来改名为恒丰号，经营房地产业务。

沈联芳除置办房产外，还投资于工商企业和兴办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在上海声名渐著。1902年被选为总商会书记议董。1910年闸北商团成立，他被举为会长。1912年被举为闸北市政厅厅长，又任闸北慈善团总董、湖州同乡会会董，并筹设一、二、三队救火会，被举为救火联合会会长。1915年初，被推为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总理，连任十余年，成为当时丝茧业的领袖人物。嗣后又任江阴利用纺织公司、上海丰业保险公司、中国丝业银行、苏州太和面粉厂董事长，闸北水电公司、中法求新厂、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董事，吴兴电器公司常务董事，中国红十字会监事等职。在他担任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总理时期，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初期外销一度呆滞，差不多陷于停顿，丝厂业岌岌可危，沈联芳出面向北洋政府交涉请求救济，于1915年由财政部拨款六十万两，用作丝业维持金，使上海各丝厂得以渡过难关。

沈联芳担任闸北市政厅厅长期间，帝国主义者往往借口开辟马路兴建桥梁，以越界筑路手段扩充租界范围，侵占我国土地。沈联芳遂发起在闸北筑路造桥，阻止了帝国主义者向苏州河以北扩展的阴谋。从此，闸北市容逐渐兴盛，南北交通也日趋便利。恒丰路和恒丰路桥的名称，就是当时袭用了沈联芳的厂名“恒丰”两字，以此纪念他的功绩。1915年11月沈联芳当选为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正会长朱葆三平时不大过问会务，一切由沈联芳主持。1919年当北京段祺瑞政府镇压“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学生首先起来斗争，并要求上海商界罢市响应。但上海总商会不仅不发响应函电，反而在上海日本商会会长授意日商三井洋行买办朱子奎（朱葆三之子）的诱迫下发出“佳电”，主张青岛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这无异支持北洋政府的卖国勾当，因此舆论大哗，朱葆三、沈联芳不得不于1920年6月联名辞职。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上海战事发生，闸北战火纷飞，沈联芳在闸北所有的房产、丝厂、企业，以及他主持的各种慈善团体的设施，几被日机轰炸殆尽，使他大部分产业毁于一旦。他心灰意懒，乃将各项业务收束，全靠未遭战火所毁的房地产收入，维持晚年生活。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因他过去在上海很有名望和地位，曾要他出任上海“副市长”伪职。沈不愿事敌，几次避居亲戚家中，后来又避居英侨哈同花园内，始得脱身。沈于1947年11月5日去世，终年七十七岁。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上海商会史料》卷号137 第79页；卷号143。
- ② 《上海指南》，1909年版。
- ③ 上海市缫丝工业同业工会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有关档案。
- ④ 《上海工商人名录》，中国征信所1936年5月版。
- ⑤ 戚再玉主编：《上海时人志》，展望出版社1947年9月版。
- ⑥ 《近代史资料》1959年第1号。
- ⑦ 访问王致祥记录。

王 一 亭

汪 仁 泽

王一亭，名震，号白龙山人。1867年12月4日（清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九）出生于上海浦东三林塘外祖母家。原籍浙江吴兴，世代务农，父王馥棠始从事商业，因避战乱，迁居江苏南汇周浦镇。王一亭早年丧父，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十三岁时，进李平书所设的上海慎余钱庄当学徒，晚上在广方言馆学外国语^①。二十岁时，进李所设的天余号做跑街，后升为该号经理。天余号拥有若干沙船，经营海运业务，走南北洋航线^②。

王一亭早在十岁时，承外祖母教读《孝经》，内有插图多幅，引起了他的兴趣，故从小喜爱绘画^③。少年时拜画家徐小仓为师。进钱庄后，仍利用早晚时间学画。因他勤勉颖慧，逐渐入门，并为店中同人所知。某次，钱庄经理命他绘画一幅，交裱画店裱装时，适被画家任伯年见到，大为赏识，探悉是王一亭所作，亲往找王，收他为徒。从此他常往任家作画，画艺有了很大提高^④。

1907年日本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清公司）在东京成立，旋在沪设分社。经李平书推荐并作保，王一亭被聘为日清公司买办。该公司借助日本侵华势力侵占我国航权，营业迅速发展，王分得佣金甚多。后来王一亭又与日商三

菱洋行买办李志芳约定合作分佣，因为日清航线专走内河，而三菱所属邮船公司专走外洋，王、李都无法预料各自营业的前途；为了相互补益，双方言明：日清公司的佣金王得六成、李得四成，三菱洋行的佣金李得六成、王得四成，如此，即可多一层保险。当时日商规定买办佣金外洋线是货运收入的3%，内河线是货运收入的5%。王一亭每年的佣金收入可达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以后，王又兼任专走天津、大连、基隆等线的日本大阪邮船株式会社的买办和三井洋行在沪所设之上海制造缂丝社社长（买办）等职，收入益厚。数年后，他积资购得南市梓园作为住宅，园内饲养各种鸟类及白鹤一头，供作绘画写生之用。

当1906年9月清政府颁布上谕宣称“预备立宪”后，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王一亭被推为董事之一^⑤。不久上海城自治公所成立，李平书任总董、王一亭等人任董事，并组织了商团地方武装。1910年清政府立宪骗局逐步败露，王一亭转向反清阵营，是年冬与沪地绅商沈缙云、叶惠钧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同盟会，王任同盟会上海分会机关部财务科长，经管分会款项。1911年武昌起义后，上海同盟会员筹划响应。10月27日，李平书经王一亭等人介绍与同盟会沪地负责人陈其美会面后，参与运动上海军警工作^⑥。11月3日，上海起义，迅即占领闸北和上海城区，但江南制造局总办张楚宝犹负隅顽抗，革命军在陈其美率领下进攻受阻；陈只身入内劝降被拘禁。时闸北已光复；清军声言将从宁、松两路反扑，“无论革党、商团，擒获者一律正法”，而制造局一时难以攻下，形势危急。次日，李平书、王一亭、沈缙云、叶

惠钧等商议于商团公会会所。李等犹豫不决，王—亭慷慨陈词，称“事亟矣。进或亦死，退则必死，等死耳。与其引颈待戮，无宁为国殉身，若事有济，则与民国前途裨益良巨。”遂决议再攻制造局，经过激战终于攻克，陈其美得救出险。不久上海光复，成立军政府，众拥陈其美为沪军都督，任王—亭为交通部长，后改任商务部长。此时王任董事长、沈纘云任经理的信成银行，几成为政府银行，都督府担保其钞票的流通。王常出面邀集沪地绅商筹措军费，并曾经手向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五万。此后他在社会上的经济活动亦得到广泛开展，先后担任上海总商会协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立大面粉厂、华商电气公司、中华银行、大达轮船公司董事，湖州电灯公司董事长等职。

1913年3月，宋教仁在沪被刺，袁世凯为宋的丧葬拨款，以掩饰其指使杀宋的罪行，王—亭被公推负责建造宋墓。不久，宋案真相大白，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上海组成讨袁军，居正任吴淞炮台司令，扼守要塞，监视长江海军的活动，王不断给予接济。王自辛亥革命以来，曾为革命军筹款数十万元，并垫付军政府所发行的公债款四十万元，后都无法收回。不久，“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下令通缉王—亭、沈纘云、李平书等人，此令被租界当局扣压，并未执行，但王已被吓倒，找张静江说：“我家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今后不能再参加革命了。”从此他脱离了政治活动，并从南市避居英租界爱而近路（今安庆路），深居简出，潜心绘画。

王的居处离名画家吴昌硕家甚近，经常走访，切磋画艺，有时请吴为其画作诗题款，结为知友。王受吴的影响，画风

也为一变，由工笔细绘趋向阔笔写意，但仍保持写实的特色。他用笔酣畅雄健，气势磅礴，设色鲜艳。吴昌硕称他：“书法醇穆雄劲，酷类平原；画则山水花木，郁有奇气”。⁸他还善于为人写照，聊聊数笔，神形兼备。旅游青岛，所作海滨浴场图、印光和尚对众说法图等，均系写实作品，别饶情趣⁹。他还常与书画家蒲作英、胡公寿、释虚谷、李梅龢等人交往，议论书画。日本对中国国画向颇崇尚，王一亭的作品也被日本画界认为具有“浑厚”的气势，受到广泛的欢迎。王每年选送精品去日本，并多次被邀东渡，举办画展，曾受日本天皇接见，声誉日增，作品也愈传愈广。抗日战争前每年销日作品约数万元，所得大都用于国内慈善事业。1923年日本大地震，他曾代表上海绅商租招商局轮船一艘，捐募满船救济物资，赠与日本灾民。此时他在日清公司的买办事务交其子代劳，自己整天作画，当时向他学画的生徒有陆伯龙、邓怀基、许醉侯及其幼子王季眉等数十人。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日清公司首先受到影响，营业一落千丈。王一亭每天收到很多责难以至警告的信件，谴责他“为虎作伥”。对此他内心极为紧张，但又不愿放弃优厚的买办收入。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成立上海市临时政府，原拟任命王一亭为财政厅长，后因他的买办身份为人所反对而作罢¹⁰。不久蒋介石到沪，曾专程访王；蒋在南京建立国民党政府后，特邀他赴宁，授以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之职，用以酬谢他对蒋在陈其美手下任职时的接济和“二次革命”期间蒋寓居梓园时所给予的款

待^①。

王一亭因受其母亲的影响，信奉佛教。晚年由于其次子投机失败而受牵连，所任面粉交易所理事长一职被杜月笙所取代，住宅抵押后尚不足清偿债务，刺激甚大。但由于精神空虚，信佛益笃。在五十岁以后，家设佛阁，每日焚香礼拜，茹素持斋，十分虔诚。在此前后，他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与人共同举办义赈会、孤儿院、残疾院、中国救济妇孺会、同仁辅元堂、普善山庄等。曾为华洋义赈会作流民图多幅，印发各地劝募赈款。在绘画方面，常作佛象和佛家经典故事。在佛教团体中，王先后担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佛学书局董事长、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等职^②。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侵入淞沪。由于他的地位易被日方利用，蒋介石电召其离沪去香港。到港后本拟即赴内地，后因病滞留近一年，其后病情日见沉重，1938年11月上旬从港搭船返沪，13日病故于上海觉园住所，卒年七十二岁。

王一亭的遗作传世甚多，已刊印出版的有《白龙山人画集》一至四册、《廿四孝画册》、《王一亭选集》、《孔子哲学》及《王一亭题画诗选集》等多种。

注：

① 《王季綰谈他父亲王一亭先生事略》（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29—127）。

② 郑熊丞：《王一亭史料补充》（二）（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29—228）。

③ 王贤：《吴兴王一亭先生行状》中引王一亭自述。

④ 同①。

- ⑤ 《预备立宪公会报》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第二十期。该会正副会长为郑孝胥、汤寿潜、张謇；会董除王一亭外，尚有李云书、李平书、周金箴、许鼎霖等人。
- ⑥ 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自叙》。
姚文枬：《通敏先生行状》。
- ⑦ 伍特公：《上海商团克复上海纪略》（1947年回忆，抄本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章开沅：《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
- ⑧ 吴昌硕：《白龙山人小传》。
- ⑨ 王曼伯：《王一亭轶事简述》（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29—130）。
- ⑩ 王晓籁：《关于王一亭点滴情况》（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29—96）。
- ⑪ 周浩泉：《王一亭父子与蒋介石的关系》（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29—231）。
- ⑫ 桥川时雄：《中国文化界人物鉴》。昭和十五年（1940年）版。

许冠群

谈玉林

许冠群，名超，以字行，1899年12月25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于江苏武进县城内双桂坊。父许广澄，字孚康，常州汇丰钱庄经理。许冠群童年跟随谢伯远和曾熙读书。1918年去上海，到三新纱厂任会计员。晚上进外人开办的上海商科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挂牌执行会计师业务。

“五四”运动爆发后，人民群众抵制日货情绪高涨，许冠群与陈蝶仙曾共商制造国货蚊香以抵制日货野猪牌蚊香。后许与友人集资六百元，设“新农除虫菊公司”，雇工在常州试种蚊香原料除虫菊，1923年冬在沪试磨制除虫菊粉，由于收得率低，未能成功。翌年，许改做化妆品生意，试制“艳秋霜”雪花膏、花露水、生发油等，亦无发展。

当时日商三昌洋行跑街赵汝调，系日本千叶大学药科毕业，在戒烟运动影响下，赵向许提议以印度红土为主要原料做戒烟丸。1926年5月，由许冠群、赵汝调和赵的内弟屠焕生三人合伙凑集银元一千元^①，在上海成立“新亚化学制药公司”（简称新亚药厂），雇用一个职员和二名工人，生产“戒烟丸”。不久，改生产“人寿水”（即星牌十滴水），这是许冠群正式从事制药业的发端。

1927年许冠群拉拢亲戚顾厚夫等向新亚药厂投资，股本增至一万元^②，并把公司迁至白克路（现凤阳路）二十四号，职工增加到十五人，并将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公推当时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关务署长的吴葆之为主席董事，许自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开始制造注射用水，第一只产品是“灭菌蒸馏水”，是为新亚药厂自制针剂之始。

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抵制口货运动遍及全国，新亚产品销路因而打开。此时，新亚兼出产之“孔雀牌”化妆品，曾在小吕宋国货商品展览会上参加陈列，并开始进入南洋一带市场。

注射用水所用的“安甬”必须用硬质中性玻璃，当时从国外进口，破损甚大，成本加重。1930年6月许冠群聘请日人田之助为顾问技师，试制中性硬质玻璃。9月租赁麦根路（今淮安路）七百十四号设立较完整的制药厂，从事制造各种针剂和成药，复增设玻璃工厂，正式制造中性“安甬”、注射针筒、玻璃仪器等；同时将白克路原址改为发行所，资本增至五万元^③。1931年2月起，许冠群将化妆品业务收缩，专扩充药品业务及玻璃工厂，任赵汝调为制药厂厂长。8月起其父许广澄即担任了新亚药厂主席董事（后改称董事长）。

“九·一八”后，抗日爱国运动兴起，日本药品受到人民的坚决抵制。新亚药厂出品的针剂、片剂和针筒销路因而突飞猛进，1932年夏秋二季营业更趋旺盛^④。许冠群于是在新亚原有基础上大加扩充，增设了药片、药丸制造部和软膏、浸膏等工厂。1933年4月，新亚药厂资本总额增加至二十五万元，职工人数增至一百多人^⑤。

许为解决新亚药厂制药的原料来源和产品出路问题，竭力联络华美、五洲等几家大型药房作为依靠力量。华美药房在新亚初创时就贷给流动资金四千元，后来转为投资；五洲药房除投资外并供应新亚制药原料。华美、五洲从新亚药厂进货，在一般按定价六折的批发价之外，并有再打八折九扣的优待，新亚仍有百分之一百三十的利润可得。^⑥

为了给新亚产品作宣传，许冠群自1929年起每年印发《星牌良药集》。1932年12月以“新医药刊社”名义，出版《新医药杂志》，以沟通各地医药情报，因此很受外埠医师的欢迎，每期发行量在二万册以上。1938年许聘请中医师丁福保为总编辑，出版《国药新声》。1939年聘请潘仰尧等为编辑，出版发行《健康家庭月刊》。

1933年，许冠群召集新亚、信谊、五洲、中法、海普、余氏、民生七家同业，发起组织“上海市制药厂业同业公会”，许冠群当选为第一届主席委员。在此前后，许还任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员、上海市化妆品业同业公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和全国新药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以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委员等多项兼职。

1936年新亚营业额已达一百万元以上，资本增加到五十万元，职工人数增至四百余人，成为上海的一家大型药厂。除上海新闻路设总公司外，在广州、北平两处设有分公司，在国内一些大城市设有办事处十四处；另在新加坡、吉隆坡、檳城、马尼拉、怡保、马六甲、仰光、雅加达、爪哇、海防、西贡、曼谷等处设有发行所，派专人进行宣传和推销。

1936年，许冠群和赵汝调通过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许世

英的介绍，曾东渡日本参观了设备先进的“武田”、“盐野义”等制药厂。从日本归来后，许曾有在林肯路（今天山路）购地筹建新厂的计划。先是，年初许已在沪设立“新亚化学药物研究所”，至此聘请了东京帝大药理学博士曾广方为所长，研究制造有机合成砒素剂“新消梅毒”（即“606”）。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许在林肯路的建厂计划停顿。上海人口骤增到四百五十万人，军、民用药品需要量增加。许于是设立新亚卫生材料厂，聘请曹峙玉为厂长，专门制造橡皮膏、橡皮手套、血压计和药棉、纱布等产品。1938年4月1日又设立新亚血清厂，聘请美国哈佛大学细菌学专家程慕颐为厂长，研究制造血清、牛痘苗及其他生物学细菌制剂。新亚产品除供应本市外，并曾以红十字急救包十万只运经香港转供内地。

1938年10月，为争取西南市场，成立了香港新亚药厂，资本为港币十万元，许自任董事长，以其弟许冠英为厂长。这时上海的资本额从1936年的五十万元增加到1940年的三百万元。1940年3月，许冠群购进新闸路一千零四十四号辛家花园楼房十八幢，作为新亚总公司的新址。1941年，许又设生物研究所，聘请美国哈佛大学细菌学博士、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部主任余溃为所长，研制防痨特效剂及新亚青霉素等产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进占租界，上海与外洋的交通完全断绝，欧美原料及药品不能输入，再加战时通货膨胀，币值渐趋低落，社会游资争谋出路，出现了各方大量囤积商品的投机之风。许冠群为了适应投机市场的需要，采取了不

断增资的办法，从1941年至1943年连续增资三次，达到伪中储券一亿二千万元，为1940年的四十倍^⑧。增资以后，他先创办了一个新亚建业公司，作为新亚企业集团投机的中心机构，将新亚药厂、新亚联合地产公司等企业置于它的管理之下；另外又与蔡声白等组织成立“中国股票公司”，从事股票投机买卖，牟取暴利。

许冠群获利以后，即向业外发展。经其创办或投资合作的厂商共达三十五家之多，成为一个范围庞大、机构复杂、托拉斯式的新亚企业集团。这个集团大体可分五大类型：金融投资地产业十二家；化工制药食品业九家；棉纺织印染业七家；印刷造纸业四家；金属制品贩卖业三家。新亚建业公司是总枢纽，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并任中国工业银行等单位的董事长或总经理，达到了全盛时期。

194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成立“商业统制会”（简称商统会），控制和搜刮战略物资。在汉奸梅思平的撮合下，许冠群担任了商统会的理事^⑨。新亚药厂替日本人加工制造药品。新亚酵素厂生产的酒精全部由日本人包去。

1943年底，新亚建业公司和国华投资公司两家各出资一半，盘进三友实业社杭州染织厂，改名为杭州第一纱厂，许任该厂董事长，国华投资公司派张文魁去担任该厂总经理。

新亚企业的职工队伍在企业的发展中也逐步壮大，由初创时的几个人增加到千余人，其中一部份是从常州孤儿院中招收的贫苦儿童。但为了提高职工的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也注意吸收高中生和培训专业人才。新亚职工的待遇很低，平时一般工人的工资约合中白粳三石左右；抗战后期通货膨

胀，有时工资只值米数斗。日本投降时，许不顾工人生活，囤积了大量大米，工人提出每人发米五斗的合理要求，许拒不接受，终于爆发了一场罢工斗争，许立报警局派人开车前来逮捕“为首分子”，但工人坚决斗争，使之未能得逞。许后来改用分化办法，收买工人代表，破坏了这场罢工斗争，一次解雇了职工五百多人。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许怕被检举为汉奸，于11月间抽走了一部分资金逃往香港。到港以后，与弟许冠英共同掌握香港新亚药厂，还另办了香港中国工业银行和香港新亚联合地产公司，但经营并无起色，在一次对南朝鲜的进出口贸易中受到严重亏损，一蹶不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启发和在港亲友的协助下，许于1950年9月怀着对新中国半信半疑的心情从香港回到了上海。当时上海新亚药厂董事长已是吴蕴初。吴把董事长一职让出仍由许冠群担任；同时让许担任杭州纱厂总经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下，许冠群当上了浙江省政协委员和杭州市人民代表。他在杭州还筹办了一家华侨饭店，动员侨胞在国内投资；并在沪杭两地捐款办学，为培养人材作出过贡献。

1972年5月7日，许患癌症在沪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注：

1、2、4、8 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的回顾》，1964年

③ 《工商史料》，第二集，上海机联会1936年12月版。

- 5) 《新医药杂志》1932年12月创刊号。
- 6) 根据原华美药房帐载材料和合同议据和1936年《五洲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128页。
- 7) 《制药业同业公会会员厂历史沿革》，1948年上海市工商联。
- 8) 《上海工商名录》“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一览”，《申报》1945年版。

黄楚九

汪仁泽 熊尚厚

黄楚九名承乾，字楚九，号磋玖，以字行，晚年自署知足庐主人。1872年4月9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初二）生，浙江余姚人。少年时随父行医，略谙医术。十五岁时父死，偕母蒋氏迁居上海，入清心书院读书。不久辍学，初在茶肆酒楼叫卖眼药，后在旧城内开设诊所，取名“颐寿堂”（又名“异授堂”）。自炫为祖传眼科名医，兼制中成药发售，但限于资金，只能零星经营^①。业余阅读中西医书，认为西药效速利厚，转试图经营西药。当时缺乏资金，黄向一富孀借贷，每次如期归还，因而取得信任^②，后累借达数千元，聚为资金。1890年黄将颐寿堂迁至法租界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改名为中法药房，除仍制销中成药外，兼售西药，营业甚佳，资本增为一万元。后几经搬迁，于1904年迁至汉口路，变独资为合伙。黄又利用股东间矛盾，以低价收买股东股本，资本愈滚愈多。

1905年黄楚九从吴姓药剂师处购得普通安神健脑滋补剂处方一份，针对时人崇洋心理，将药名洋化为“艾罗补脑汁”。“艾罗”本系英文yellow（黄色）的译音，但他却在药瓶贴上印有虚构的洋博士“Dr. T. C. Yale”商标，并附英文说明，宣称能治种种疾病，营业因此蒸蒸日上，日销达千元。由于

本轻利重，黄从此发了大财。1906年他将左邻茶园盘下，扩充为八开间门面，自备沪上尚属少见的汽车代步，俨然成为商贾巨子。此时有一外国流氓，自称是艾罗博士之子，指控黄盗用其父秘方，扬言将赴会审公廨诉之于法，蓄意敲诈。黄明知不值一驳，但怕露馅，竟将计就计，拿出数千元了事。1910年5月，黄以中法药房名义开办“同征长寿团”，办理人寿保险业务；并以劝人戒鸦片烟为名，制销以吗啡为原料的“天然戒烟丸”，仅此一项每年获利十万余元。

辛亥革命前夕，民众掀起提倡国货、抵制洋货运动。此时日货“仁丹”行销我国城乡，漏卮甚多。黄楚九以“挽回利权”为名，设一“龙虎公司”，研制国产“龙虎人丹”。因销路难以打开，两年后出盘给中华书局陆费逵，改名“中华制药公司”，继续制销。不到三年，该公司六万元资本也全部蚀光，1915年重新回盘给黄楚九，成为中法药房的附属企业。此时日商以“仁丹”曾向中国官方登记注册为由，提起诉讼，黄专聘律师据理抗争，逐级上诉至北京大理院，经内务部最后裁定，“名称不在专用范围内”，因而两药得以同时在市场上销售。

黄楚九于1907年曾与夏粹芳等合资创设五洲药房，任董事，至1916年因意见不合而退出。1915年他将中法药房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十万元，自任董事长，并出资向北洋政府捐得大总统府谘议官衔^③。次年，黄盘入罗威药房，并创设公益玻璃厂。1923年又从顾松泉手中盘进中西药房，自任总经理。

是年黄楚九又新出开胃润肠药一种，定名“百灵机”。因

系新药试销，怕影响中法药房信誉，故由虚设的“九福公司”出面，大做广告，宣称是“炼取百药之精华制成”，“可以补血补脑补肾”，“有意想不到的效力”。定价故意较贵，消费者信以为真，争相购买，销路不脛而走。1926年营业额高达一百二十万元。仅四五年时间，以一家虚设字号而积累资金达几十万元，添置机器设备，盘下大世界对面五开间门面，成为一家略具规模的药厂。后来又增出“补力多”补药和“乐口福麦乳精”，抵制市上既销的同类产品美货“帕勒托”和瑞士“华福麦乳精”。1926—1927年间，黄楚九在福州路山东路口和北京路芝罘路口，分别建造中西药房绿色磁砖五层新厦和中法药房黄色磁砖五层新厦。1929年中法药房迁入新厦，资本也由十万元增至五十万元。

辛亥革命后，黄同时经营新兴的娱乐事业。1912年在九江路浙江路口开设新新舞台。1913年，和上海地产商经润三在新新舞台楼上开辟“屋顶花园”，取名为“楼外楼”。游客可登高凭眺上海景色，颇受游人欢迎，为上海第一家屋顶花园。“楼外楼”有说书、杂耍及地方戏曲等节目，常常日夜客满，颇获厚利。1915年，他又劝说经润三出资创设新业公司，在跑马厅附近租地建造三层楼的新世界游艺场，内有溜冰场、弹子房、文明戏、大鼓书、口技和南方戏剧等，观众入场，可任意选择观看玩乐，不受时间、场次限制；并附设中西酒菜馆，颇能吸引游客，营业发达。黄担任经理，成为上海游乐场业中的著名人物。

1916年经润三病故，黄楚九与经妻意见相左，遂辞去经理职，与他人合组大发公司，集资八十万元，另办游艺场。

在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西藏路口觅得地基，翌年年初破土，7月落成开幕，取名“大世界游艺场”，占地一万四千七百多平方米，较新世界大一倍，每天可接纳观众二万多人次。所设剧场、剧种较新世界倍增，并设一“共和厅”，引入上海名妓，排演所谓“群芳会唱”节目；又设“乾坤大剧场”，聘请坤角演出京剧；所设电影院则从美国进口“惊险格斗”影片，独家放映；又辟一露天娱乐场，置有高空飞船吸引儿童。可谓百戏杂陈，应有尽有。除在各报刊登广告外，还请帮闲文人办了一张《大世界》小报，大肆渲染。不久果然游客如云，卖座冠于各游乐场，附近市面也随之热闹起来。此后由于租界上的恶势力渗入，招引娼妓，设摊赌博，立坛扶乩，大世界遂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周围赌场、妓院、燕子窝（鸦片烟馆）林立，形成以大世界为中心的罪恶蛛网地区。1918年黄楚九又设立共发公司，统一管理他所属的全部企业。此后黄还同周炳臣开设了三星舞台及三星地产公司，并独资创办中华电影公司。

1919年黄楚九又在云南路开设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日夜银行，它的开设，大大方便了附近赌场的赌客^④。该行又以附近职工、商贩、劳苦大众的零星积余为吸收存款的对象，采取利息较一般略高，开户不限存款多少，存取手续简便，凡一次存入百元以上者，赠送大世界入场券两张等办法，以致该行存款不断增加，为扩展其他企业积累了资金。

1920年冬，黄趁当时兴起的交易所投机风，与叶山涛、袁履登等人合伙在大世界底层创设别开生面的“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自居理事长，从事买空卖空活动。以其所经营企

业的股票为主要对象，暗中哄抬，牟取暴利。但好景不常，次年夏，沪地银根紧缩，股票价格暴跌，交易所纷纷倒闭，酿成信交风潮，夜市交易所也被卷入，宣告停业。股票持有人拟组织财团对他进行控告索赔，黄恐累及他的全部企业，乃遍延法租界会审公廨登记的外国律师十多人，每人赠送或一千、或五百两作为公费，贿赂他们不为持票人承办申诉案，从而避过困境^⑤。

黄楚九除如上述经营西药、游乐等业外，还于1915年创办大昌烟公司。1917年某日上海各大报第一版上，同时刊出一只套红的大红鸡蛋，既无标题，又无说明，引起人们的好奇。两天后始知是大昌烟公司为了小囡牌香烟问世而大送红蛋。然后又随大世界门票，赠送小囡牌试吸香烟，游客人手一支，使小囡牌香烟立即风行一时。当时称霸烟业的英美烟公司洋老板急商对策，以二十万元代价，向黄买下小囡牌商标销毁了事。1919年5月，英美烟公司针对中国人民抵制日货运动，阴谋搞垮我国民族卷烟业中最大的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藉口南洋主人简照南曾入日本籍，出钱四十万元，唆使黄楚九到北京向北洋政府诬告南洋“纯为日资”，应撤销其登记。黄得款后中饱二十万元，其余二十万元向农商部人员行贿，北洋农商部遂饬令南洋停业^⑥。后简去日本办理脱籍手续，并得到国内舆论支持，南洋始告复业。1925年“五卅”期间，黄又接受英美烟公司贿托，将洋货香烟改装为由他所新设的福昌烟公司香烟，派人往汉口等地推销^⑦。

二十年代中期，上海房地产业，租地造屋之风甚盛，获利丰厚。黄将日夜银行部份存款移作投资，大兴土木。除于

1927年前后，在白克路（今凤阳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等处分别建造九福制药厂和中法药房制药厂房外，并在浙江路宁波路一带租地造屋。但建成后正值沪地市面萧条，新屋店面一时乏人承租。黄骑虎难下，遂延聘熟悉各业的人才，开设黄隆泰茶叶店、温泉浴室、萝春阁茶楼、黄九芝堂中药铺等各种商店。

1927年西药业公会改组为新药业同业公会，黄楚九当选为第一任主席。黄为人圆滑，善于见机应变，平时起居豪华，讲究个人享受^⑧，但对于公益事业，亦愿解囊认捐，博取“慈善”美名。是年他倡议筹建了西藏路上海急救时疫医院，又在龙门路开设黄楚九医院，向贫民施诊舍药。但1927年后黄的事业由盛转衰，其原因之一固然由于当时市面不景气所影响，但更主要的是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投靠蒋介石后，亟需发展自己的经济势力，从而对黄进行打击。黄楚九本人既不参加帮会组织，又无政治靠山，纯系一个商业资本家，而他所经营的大世界等企业树大招风，竟成为黄、杜之流覬觐的对象。1930年，黄、杜等指使徒众中伤日夜银行信誉，引起存户惊恐，纷纷提存，致使黄疲于应付，焦虑成疾。1930年底黄赴杭州私寓九芝小筑休养，杜等更乘机在小报上散布黄已急得病死的假讯，提存之风益炽。次年初，黄抱病回沪调度，但终因企业众多，财力分散，一时移东补西，难以招架。黄、杜等趁火打劫，迫使黄楚九内外交困，病情恶化，终于1931年1月19日病死上海，卒年五十九岁。

黄死后，日夜银行等随之倒闭。原来黄所遗大小企业数十家的资产尚足以抵付债务^⑨。但法租界当局和黄金荣、杜

月笙等人借口清理，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以致劳动人民在日夜银行的小额存款大部分未获清偿，成为实际的受害者。他们扶老携幼，聚集龙门路黄宅，呼天号地，发生吞金、投河者多起。大世界游艺场也经多方角逐，是年6月遂归黄金荣所占有^⑩。

注：

- ① 曹厚哉：《黄楚九生平事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总第110号）。
- ② 戴桐秋：《黄楚九最初起家的根源》（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总第30—34号）。
- ③ 同①。
- ④ 同②。
- ⑤ 陈星五：《黄楚九事迹片段之一》（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第30—251号）。
- ⑥ 陈子谦、平襟亚：《香烟小史》（《上海经济史话》第一辑，1962年版）。
- ⑦ 《方椒伯回忆》（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总第154号）1925年6月30日《血潮日报》上亦有类似记载。
- ⑧ 同①。“黄楚九在当时素以衣着讲究而出名，每日辄换长袍数件，时行团花绸袍，晨着含苞欲放花样，中午换奇葩突开，晚上又换盛花初绽花纹。黄死后，拍卖财产时，长袍有上百件之多。”
- ⑨ 根据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所存史料记载：当时虞洽卿、方椒伯等人，曾拟出面聘请徐永祚会计师为黄所遗企业进行全面清理，但因受法租界当局及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的阻挠而未果。
- ⑩ 1931年5月29日上海《新闻报》载有黄金荣的“荣记胜利公司承租大世界”和1931年6月1日起“接办大世界”的启事广告两则。

其他参考资料：

- ① 江上青：《往事今谈》。
- ② 平襟亚：《漫谈黄楚九及其事业》。《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
- ③ 勃德：《中华今代名人传》。
- ④ 《黄楚九小传》。上海《新闻报》1931年1月20日。
- ⑤ 朱光照：《中国资本家是怎样起家的？》。

殷 夫

丁 景 唐

殷夫，原名徐柏庭^①，学名徐祖华^②，别名徐白，笔名任夫、殷夫、殷孚、白莽、莎洛、莎菲、Ivan等。1910年6月11日（清宣统二年五月初五）^③出生于浙江象山县东乡大徐村^④。父亲是个医生。殷夫幼年在乡间读私塾，1921年初进象山县立高等小学校读书。^⑤次年父亲病故，由慈母抚育。殷夫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他最小。

1924年初，殷夫从杭州赴外地求学^⑥。1925年8月，考入上海民立中学初中二年级读书^⑦。他十四、五岁时开始写诗。现在留存的一组《放脚时代的足印》的小诗，就是1924—25年写的。这一组小诗显露出诗人少年时代的才华。

1926年7月，殷夫越级考入上海浦东中学高中三年级。这时开始同革命运动发生了关系^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因一个国民党员的告密而被捕，囚禁三月，几被枪决。后由他在蒋介石总司令部当参谋处长的大哥徐培根保释出狱。这次入狱对他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深刻的教育。他在狱中所作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⑨详细地叙述了国民党员的告密，敌人的搜查，押送去牢狱途中的经过，以及诗人的思潮起伏，表现出少年殷夫立场坚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和高贵的品质。殷夫出狱后，徐

培根把他软禁在身边。但殷夫仍坚持学习社会科学，阅读革命文艺书刊，激励自己的革命意志。后殷夫回象山家乡。现有《人间》和《呵，我爱的》两首诗即作于此时。

1927年9月，殷夫想考大学，因曾被捕入狱，没有中学文凭，得女友盛淑真（后改名孰真）的帮助，通过她的同学向浙江上虞人徐文雄借到一张中学文凭。殷夫就顶用了徐文雄的姓名，考入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一年级乙组读书^⑩。有一段时间，殷夫和革命组织失却了联系，尔后才重新接上关系，继续投入革命工作。殷夫在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读书时，刻苦学习，半年以后，即能从事德文翻译。1928年2月，殷夫用徐文雄署名写信给创造社的刊物《文化批判》，对该刊一月号上彭康《哲学底任务是什么？》的译文，提出商榷的意见^⑪。

殷夫还经常留心阅读《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奔流》、《太阳月刊》等进步刊物。1928年1月《太阳月刊》创刊后不几天，他就投寄一束诗稿给该刊编辑部。这就是发表在《太阳月刊》第四期上的长诗《死神未到之前》（署名任夫），得到了著名左翼诗人、小说家、翻译家蒋光慈和著名文艺评论家钱杏村（阿英）的赏识。随即参加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

1928年秋季，殷夫再次被捕。不久，由他的大嫂托人保释出狱。殷夫出狱后回到象山县城家中。1929年初，殷夫潜离家乡，来到上海，寻找党的地下组织。经过一个短时间的流浪生活，同党的地下组织接上关系，从此离开了学校，专门从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和青年工人运动，成为一个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写

下《血字》组诗和《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一类被誉为红色鼓动诗的革命战歌。

1929年上半年，殷夫用了白莽的笔名向鲁迅主编的《奔流》投寄抒情诗篇，开始同鲁迅发生联系，得到鲁迅的热情关怀、培养和帮助。从1929年6月到1931年1月，有关殷夫的记载见于鲁迅日记的，有十八次之多。1929年6月16日的《鲁迅日记》上第一次出现了白莽的名字：“下午复白莽信”。鲁迅这次复信是因为殷夫从德文译出匈牙利民主革命诗人彼得斐（今译裴多菲）传，投寄给鲁迅主编的《奔流》。鲁迅发信索取德文原文，以备核校，由于原文是载在彼得斐诗集里面的，因邮寄不便，殷夫就亲自送到鲁迅那里。这就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写到的第一次记殷夫来访的事。

鲁迅收到殷夫翻译的彼得斐传后，又写信建议他配合传记，再译十来篇彼得斐的诗，一同发表。他特地托柔石转给白莽一信并彼得斐集两本。不久，殷夫译了几首诗，亲自送交鲁迅。鲁迅为了校阅译文，将殷夫送来的那本德文彼得斐诗集留下，而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买来留在身边的两本德文版彼得斐诗集相赠，托柔石亲自送去。殷夫用白莽的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奔流》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抒情诗四首，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译文《彼得斐·山陀尔行状》一篇和彼得斐·山陀尔译诗九首。

同年7月间，殷夫在上海丝厂罢工斗争中第三次被捕，¹²³遭到了毒打。在囚禁了一段时间后被释放。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和《白莽作〈孩儿塔〉序》中，对殷夫第三次被捕事，曾有记叙。殷夫当时因为衣物都被没收，没有长衫，而又要

穿长衫，便从朋友那里借来棉袍，在大热天穿着它，汗流满面地去看访鲁迅，受到鲁迅的热情接待，并给以资助。

这次出狱后，殷夫很快恢复了工作，专门从事青年反帝大同盟、共产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同年冬，他参加了党领导的青年反帝大同盟的刊物《摩登青年》的编辑工作。从1929年末到1930年秋冬之间，参加了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的编辑工作。直到1931年春他被捕牺牲前，他在党刊《红旗》、团刊《列宁青年》、青年反帝大同盟刊物《摩登青年》上写了不少政治论文，还自学俄文翻译政论文章。著译涉及当时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拥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红军中的宣传教育工作、青年工人运动、少年先锋队工作、文化工作，以及党内的路线斗争等等方面^⑬。这一时期他在《列宁青年》上，发表了二十八篇作品，其中政治论文等二十一篇，文艺作品七篇。在《摩登青年》上发表政治论文两篇、诗两首。在党刊《红旗》上用徐白署名发表《拥护苏维埃运动中劳动青年群众的任务》和《扩大共产主义的儿童运动》两文。此外，在1930年10月1日《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十八期上还写过《英美冲突与世界大战》的政治论文。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殷夫列为发起人之一。他为“左联”的刊物《萌芽月刊》、《拓荒者》和李一氓编的《巴尔底山》等写了不少红色鼓动诗和一些散文、随笔，成为“左联”有影响的诗人之一。

殷夫由于处在斗争第一线，与工人群众血肉相联。这一时期的诗，集中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中心、中国工人阶级最强大的基地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反映了觉醒的工人阶级和党的干部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伟大气概。炽热的战斗情绪，高昂的旋律，构成了殷夫红色鼓动诗的特色。这些诗，正如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所评论的，它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殷夫还写过一些散文、速写、传记、剧本等。这些作品的成就不如他的红色鼓动诗篇，但也不同程度地描写了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变化。发表在1930年5月《拓荒者》第四、五期合刊上的《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¹⁶，是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战士向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哥哥，公开宣告决裂的宣言书，是一篇优秀的散文。

1931年1月17—21日，林育南、李求实（即李伟森）、何孟雄等二十几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被叛徒出卖，分别在东方旅社等处被捕，其中包括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四位“左联”青年作家在内。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2月7日深夜，殷夫同这些革命者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在上海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荒野里，年仅二十一岁。

二十几位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开后，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立即向全世界革命作家和进步文化界，用中、英、日等几种文字发布了对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左联”五烈士的抗

议书。“左联”专门编印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刊登了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烈士和另一位早一年在南京雨花台牺牲的宗晖烈士的肖像、传略和有关的作品等。鲁迅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和《柔石小传》，阿英写了《殷夫小传》。两年以后，鲁迅又为纪念殷夫、柔石等“左联”烈士的牺牲，写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越三年，鲁迅又特为殷夫的诗集写了《白莽作〈孩儿塔〉序》和《续记》。

殷夫的政治论文和其他作品散见于《列宁青年》、《红旗》等秘密刊物和《太阳月刊》、《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和《摩登青年》等公开刊物，生前都未能结集出版。据阿英《殷夫小传》所列，殷夫著译计有：（一）《孩儿塔》（诗集），1930年初殷夫自编；（二）《伏尔加的黑浪》（诗集），1929年；（三）《一百零七个》（诗集），1930年；（四）《诗集》（包括译诗），1928—1930年；（五）《小母亲》（小说、随笔、戏曲集），1928—1930年；（六）《苏联的农民》（翻译），1928年；（七）《苏联的少年先锋队》（翻译），1930年；（八）《列宁论恋爱》（翻译），1930年。其中除《孩儿塔》原稿幸由鲁迅保存下来外，其他七种迄今未有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出版有《殷夫选集》（1951年7月，开明书店）、《殷夫诗文选集》（1954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殷夫选集》（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孩儿塔》（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仅收原集中六十五首诗中的二十七首）。

注:

- ① 瞿光熙:《殷夫的出身和家庭》。《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第四次印刷版,第252页。
- ②、④、⑤ 参见丁景唐:《〈殷夫烈士的一些新史料〉补正》(《学术月刊》1964年第5期)中引用1921年3月《象山县立高等小学同学录》。
- ③ 殷夫生年,历来以阿英《殷夫小传》为依据,作1909年。但据殷夫的大姐徐祝三和殷夫的挚友盛孰真证实:殷夫生肖属狗,生于庚戌年(清宣统二年)端午节,即1910年6月11日。
- ⑥ 承殷夫亲友提供1924年初(甲子正月)徐培根在一张同殷夫于杭州合影照上题字“云妹惠存,时在甲子正月白弟将赴上海摄于杭州”,但未查到有关资料,或谓系赴宁波读书,今也未能确定。
- ⑦ 据青年友人康锋查出:1925年8月28日上海《申报》、《新闻报》载:《上海民立中学校续取新生案》有殷夫借用徐培根的名字。1926年7月6日上海《申报》载《浦东中学第一次录取新生》高三级有徐白之名。1927年9月18日上海《申报》同济大学附设德文补习科有徐文雄之名。
- ⑧ 阿英:《殷夫小传》(最初刊于1931年4月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后收入《殷夫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7月版及《殷夫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8月版),是有关殷夫生平的最早传略。由于当时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不能明说殷夫是参加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还是CP(共产党),只是含蓄地用了“开始和革命运动发生了关系”的措词。至今尚未见到确凿资料以肯定殷夫当时是共青团员或共产党员。
- ⑨ 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署名任夫,发表于1928年《太阳月刊》4月号,为建国后出版的四种殷夫选集所未收。
- ⑩ 《国立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1928年9月)第296页上,写着:“姓名徐文雄,号之白,年龄十九,籍贯浙江上虞,预科德文补习科一年级乙组。”
- ⑪ 徐文雄:《被奥伏赫变的话》。《文化批判》1928年第3期。
- ⑫ 丁景唐、陈长歌:《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上海《社会科学》1979年5月第1期第127页注⑥。
- ⑬ 参见丁景唐、陈长歌:《殷夫烈士和〈列宁青年〉》,《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二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8月版;《殷夫烈士和〈摩登青年〉》,《学术月刊》1961年第7期。
- ⑭ 《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与组诗《血字》七首,同刊于1930年5月《拓荒者》第4、5期合刊(另名《海燕》),署名Ivan。后由阿英用张若英笔名,把它编入《现代文学读本》第一册,现代书局1930年7月出版,署名改为伊凡,文中“D大学”也被改为“大学”。建国后出版的四种殷夫选集,都未收入这篇重要作品。

柔石

邱德新

柔石，本姓赵，名平复。笔名除柔石外，还用过赵少雄、赵璜、金桥、刘志清等。浙江宁海县市门头(今并入象山县)人，1902年9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生。柔石的家庭，前几代都是读书的。到他父亲时，家境衰落，后开一小店，由于苛捐杂税，家境仍很困难，柔石十岁才上小学。

1917年夏天，柔石毕业于宁海县正学小学。同年秋天，到台州浙江省立第六中学上学，因对学校教学不满意，中途退学。1918年暑期，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除努力于学业外，也很留意阅读一些有关苏俄和社会主义的书刊。他在一封家信中曾说：“俄国为实行社会主义之一国，其目的在打破万恶之政府，以谋求世界之大同，改革贫民之经济，以求人道之实现，欲人人安乐，国国太平。”^①“五四”运动爆发时，柔石积极响应，在学校和一些青年组织文学小团体“晨光社”，出版刊物，宣传新文学。

1923年夏，柔石在第一师范毕业。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没有继续升学。1924年春至慈溪县普迪小学任教。这时，柔石利用教书之余，开始文艺写作。1925年1月，在宁波自费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疯人》。作品反映争取个性自由、

婚姻自由的思想，表达了作者对旧社会的不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时期的一些社会问题。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多数带着伤感和虚幻的情绪，缺少积极上进的精神。作者自己后来也说：当《疯人》“装订完毕后，自己就很愿意它立即灭亡，因为发现内容之幼稚和丑陋。那本书，以后我是送给我底开着一家小店的哥哥拆了包货用了”^②。1925年春天，柔石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常去听鲁迅的课。当时他的生活颇为艰苦，有时吃不上饭，但仍然很乐观，曾写信给家里说：“虽然没有早餐的钱，也不过一、二天，我正可以从这种时候多读几句书”，“读书人更应该从苦中磨炼出来，才能够懂得比书中深一层的道理”^③。

由于经济窘困，无力继续在北京学习，柔石应友人的聘请，于1926年3月回到浙江，在镇海中学教书，不久任教务主任。他一边教课，一边从事文艺创作。1929年10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就是这一时期写作的。这本书初稿完成于1926年上半年，正是北伐战争的前夜，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烈火，渐成燎原之势。作者在本书的“自序”中指出：“在本书内所叙述的，是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八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经过。”“那时，正是段祺瑞在天安门前大屠杀北京学生的时候，我滞留在上海。那时内心的一腔愤懑，真恨的无处可发泄。加之同住在上海的几位朋友，多半失着业，叫着苦。”“这部小说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作者号召人们为新社会的诞生而努力战斗。这是作者进步思想的一个表现。然而，黑暗社会怎样才能死去，未来的新社会应当是怎样一个社会？对于这些，作

者还是朦胧不清的。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了。当时，柔石不顾反动军阀对学界的镇压，和镇海中学进步师生一起，到群众中去，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号召群众响应北伐。那年秋天，柔石患病咯血，但他还是坚持斗争。后来病势严重，不得不回家养病。在养病期间，他仍然帮助宁海县的青年筹办宁海中学。1927年春天，北伐军到达杭州，浙江全部光复，柔石到宁海中学任教。他和学校几个朋友一起，组织“消夏社”，办义务补习班，帮助贫苦青少年学习；又组织“教育储金会”，资助贫寒子弟升学。不久，他担任了宁海县教育局长。当时，教育界的封建势力还是很大的。柔石不顾新旧官僚的威胁和阻挠，致力于全县的教育改革，清除教育界里的封建势力，把全县小学校长和教员作了一次大的调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928年5月，宁海县农民在本县旁亭（今属三门县）举行起义，反对反动统治，宁海中学二、三十名师生参加了这次起义。由于反动派的镇压，起义不幸失败，宁海中学被解散，一些师生惨遭杀害，柔石也被迫出走上海。

在上海，柔石着手修改他的小说《旧时代之死》。不久，经友人介绍，他认识了鲁迅^①。从此直至柔石逝世，他始终和鲁迅在一起，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工作，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柔石是鲁迅的“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②。1929年初，经鲁迅的推荐，柔石担任过半年之久的《语丝》的编辑。

1928年秋天，柔石在鲁迅的帮助下，和殷夫、胡也频等

爱好文艺的青年组织了“朝花社”。他们除积极创作外，还着力介绍外国文艺，尤其是当时东欧和北欧的文艺作品。“朝花社”出版了《朝花周刊》（后改为《朝花旬刊》），附出《艺苑朝华》（画集）。此外还出版了一些书籍，如：《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北欧文艺丛书》、《朝花小集》。在“朝花社”里，柔石是骨干，除写稿译书外，“大部分的稿子杂务都归他做”^⑥。

“朝花社”开始成立时，经费不足，虽有鲁迅的支持，由于刊物销路不大，经费一直困难。后来“朝花社”无法支持下去，不得不于1930年1月宣布结束。柔石在这个时期的作品有中篇小说《二月》和短篇小说集《希望》；译作有《丹麦短篇小说集》和高尔基的《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即《颓唐》）。

《二月》写于1928年夏至1929年底，正是中国革命暂时陷入低潮时期，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变化，有一部分人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处在徬徨之中。《二月》通过对青年知识分子萧涧秋寻找生活道路的描写，给当时尚处于徬徨的知识分子指出了—个方向：只有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伟大潮流中，把自我这个小小的齿轮与社会革命的大齿轮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鲁迅对这部作品很重视，不仅有详细的口头批评，而且还写了《〈二月〉小引》。

《希望》收集短篇小说二十八篇，均写于1928年8月至1929年7月。作品多数直接取材于劳动人民或生活在底层的人物，反映了他们在苦难中的呻吟，控诉了旧社会对他们的残酷压迫。这是柔石创作转变的一个起点。

1930年1月，柔石创作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发表

在1930年3月出版的《萌芽》月刊上。这是柔石政治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作品直接触及到了封建社会中两个对立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揭示了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反动派大肆迫害进步作家，查封进步刊物，实行文化“围剿”。为击破这种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柔石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系列活动，表现了革命者的坚贞品质。1930年2月15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简称“自由大同盟”）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柔石是发起人之一。大会发表宣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思想政策。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柔石是筹建者之一，被推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后来任常务委员兼编辑部主任，担任“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的编辑^⑦。同年5月，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⑧。不久以“左联”代表资格，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会，并向大会宣读了鲁迅等署名的《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祝词》。6月，写《一个伟大的印象》一文，报道了这次会议的生动情景。

1931年1月17日晚，柔石参加在上海东方旅社召开的党的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告密，同与会者三十余人一起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不久，由租界当局将他们“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当局。在狱中，柔石仍然坚持学习德文。2月7日，柔石和其他二十余人，在上海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附近的荒野里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柔石逝世后，鲁迅因“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和自己“失掉了很好的朋友”^⑨，悲愤地写了《柔石小传》和《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来纪念他。

注：

- ①、③ 赵滢江：《我的爸爸柔石》，《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7月版，第186页。
- ② 柔石：《希望》自序，商务印书馆1930年7月版。
- ④ 鲁迅与柔石第一次见面的确切日期，目前没有弄清。据王世善的《鲁迅传》记载，鲁迅在1928年9月9日从景云里二十三号搬到十八号，把原来的房子让给柔石住。《鲁迅日记》中最早记载与柔石的来往则是在9月27日。由此看来，柔石找到鲁迅的时间，可能在8月下旬至9月初之间。
- ⑤、⑥、⑨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1、482、486页。
- ⑦ 《萌芽》月刊，原为鲁迅编，1930年1月创刊。自第三期起，成为“左联”机关刊物。
- ⑧ 关于柔石入党的时间，阳翰笙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载《人民日报》1980年3月5日）一文中说，柔石在1929年9月就已经是“党内的负责人”之一了。但在这以前的其他资料均说他是1930年5月入党。目前尚无材料证明哪一种说法准确。

陈望道

邓明以

陈望道原名参一、融，别名雪帆、晓风等，浙江义乌人，1890年(夏历十二月初九)^①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祖父、父亲都以耕田为业。他六岁入私塾，读儒书，“并在课余帮助耕种”^②，直到十六岁。

1906年，陈望道入县立绣湖书院学习博物与算术。其时，他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深感不满，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影响，认为要使国家强盛，就应“破迷信、开民智、兴实业”^③。于是在1907年回到故乡分水塘，“随在乡先进毁佛兴学”^④。次年，他又考入金华府中学堂，专攻理科。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后来，他认为“要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必须借助欧美的科学”^⑤。为此，于1913年到上海，先在一个补习学校学习英语，继而又往杭州入之江大学学习。1915年初赴日本留学，先后进了东京物理学校、早稻田大学法科、东洋大学文科，最后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得法学士学位。在留日四年中，“从社会到自然无不涉猎”^⑥。

留日期间，陈望道“有鉴于辛亥革命的失败”^⑦，非常关心国内政治。激于爱国热忱，与留日同学积极投入反对袁世凯卖国独裁的斗争。课余，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学习和钻研，接触了新思潮，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

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⑧。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在留日学生中曾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时，他结识了日本著名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并和他们一起积极开展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

1919年6月陈望道从日本回国，受浙江第一师范校长经亨颐的聘请，任语文教员。这时“五四”的浪潮已冲击到了浙江，他立即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和其他进步师生一起，对封建文化和习惯势力，进行勇猛的冲击。他们的这些行动遭到了顽固势力的反对，他和其他三位进步教员被目为“四大金刚”。不久，第一师范的一个学生发表了《非孝》一文，从而在浙江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省教育厅以所谓“非孝、废孔”的罪名，并以“公妻、共产”等骇人听闻的诽谤，强加在该校进步师生的头上，下令将“四大金刚”撤职查办。这一反动措施遭到校长经亨颐等人的抗拒，浙江省当局竟悍然出动军警包围学校，制造了流血事件，酿成了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由于得到全国声援，最后迫使反动当局收回了“撤职查办的成命”。但陈望道等也不得不因此离开学校。

陈望道经历了“浙江一师”这场风潮，受到一次深刻的锻炼和教育，“认识到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⑨。他在这一年年底回到故乡分水塘，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

1920年4月，陈望道应《星期评论》社的邀请到上海担任编辑。抵沪后，该刊因故停办。旋又应陈独秀的邀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这年的5至8月，他与陈独秀、李汉

俊、李达等酝酿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此之前先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同年11月，他又参加S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以后，随即开展了宣传活动，首先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我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8月15日创刊《劳动界》，在工人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11月7日创刊《共产党》月刊作为党的内部刊物，宣传共产主义，介绍共产党知识。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期间，陈望道还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以及《马克思底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底解释》、《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劳动运动通论》等文章，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0年12月，陈独秀赴粤，上海马克思研究会由陈望道和李汉俊负责^⑩。陈独秀离沪时，“把《新青年》编辑事务交给陈望道”^⑪。《新青年》自第八卷第一号起，正式改组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其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方向，遭到胡适的反对。在《新青年》杂志办刊方针问题上，陈望道得到李大钊和鲁迅的支持，同胡适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期间，他参加上海工人运动，组织了纺织、邮电、印刷等工会。1920年5月1日，他参加了在澄衷公学举行的上海首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他还亲自到沪西工厂区，和其他同志一起开办职工补习夜校和平民女学。

为了扩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宣传阵地，陈望道取得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笔邵力子的支持，后来他担任了《觉悟》的编辑，在该刊上增加了介绍苏俄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内容。此外，他还编辑了《民国日报》另一副刊《妇女评论》，鼓吹妇女解放，提倡叛逆精神，指出妇女解放必须走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夕，陈独秀与李汉俊发生了争执，并牵涉到陈望道。对此，陈望道十分气忿。他坚持要求陈独秀予以澄清并公开道歉。陈独秀不允，陈望道就声明脱离组织和不出席党的代表会议。当时，他“以为不参加组织也可以革命”^⑫。

1923年至1927年，陈望道在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被英帝国主义武装占领，学校被迫转移。邓中夏去广东领导工人运动，他接任了上海大学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率领全校师生继续投入反帝斗争。1927年“四·一二”政变，上海大学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在革命斗争激烈的时刻，上海大学能够屡仆屡起，陈望道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

陈望道在参加早期建立中国共产党活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积极从事革命的文化教育工作。他从1920年9月起就在复旦大学任教。1927年上海大学停办后，他又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28年至1930年，他在中共的领导下创办了中华艺术大学。在他任职期间，“左联”在此召开了成立大会。

由于陈望道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很注重运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教学与科学研究。他主张改革传统的以熟读和模仿为主的语文教学方法。在关于白话文的普及和提高、新文艺的发展以及文法修辞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许多进步

见解。他是我国最早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1923年，他发表了《作文法讲义》，系统地阐明了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他对美学、因明学、伦理学等都很有研究，著有《美学概论》、《因明学》等书。他还努力介绍国外的社会科学学说和新兴的文艺理论，作为宣传新道德、发展新文学的借鉴，翻译有《艺术简论》、《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社会意识学大纲》、《苏俄文学理论》等重要著作。

1928年及其后一段时间，他和几位朋友开办“大江书铺”出版进步书刊，成为当时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据点。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大江书铺出版了陈望道编辑的《文艺理论小丛书》和《艺术理论丛书》，发行了《大江月刊》和《文艺研究》季刊。

1931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因陈望道保护左派学生，密令加以暗害，他被迫离开了复旦大学，因得避地专心从事《修辞学发凡》的著作（1932年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今汉语文的修辞学专著。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人民成立各界民众抗日救国联合会。2月3日，陈望道与鲁迅、茅盾、叶圣陶等四十二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2月8日，上海“中国作家抗日会”成立，陈望道被推选为书记。这是一个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他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投入抗日救国斗争。

1933年7月，陈望道应聘赴安徽大学讲授“文艺理论”，半年后又因受反动派的迫害而离职。1934年2月回到上海

后，担任左联《文学》杂志的编委工作。同年6月，陈望道与乐嗣炳邀集了胡愈之、叶圣陶、夏丏尊、陈子展等十二人共同发起“大众语运动”，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口语，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他写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建立大众语文学》等多篇文章，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又在鲁迅的支持下，于9月创办了《太白》半月刊，这是实践大众语的刊物。《太白》与林语堂等人为迎合保守反动势力，鼓吹所谓“化沉痛为悠闲”的幽默小品文的《论语》和语录体的《人间世》等刊物相抗衡，把小品文作为武器去揭露和批判当时黑暗的现实。《太白》半月刊办得很有生气，首倡在刊物上用民间的“手头字”，首创“科学小品”，开辟“掂斤簸两”的栏目，专登匕首式的杂感。鲁迅曾赞扬这个刊物说：“杂志上也很难说话，现惟《太白》、《读书生活》、《新生》三种，尚可观，而被压迫也最甚。”^⑬《太白》仅战斗了一个年头，就被迫停刊了。

《太白》终刊后，陈望道得知国民党反动派又将加害于他，于是在1935年8月到了广西大学，任该校中文科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他立即从广西回到上海，参加中共领导的上海文化界联谊会，从事抗日救国运动。1938年，他在中共地下组织创办的夜大学“社会科学讲习所”任课。抗战初期，他留在上海，推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组织“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等进步语文团体；热情支持“上海新文字研究会”等抗日的群众性文字改革组织。他是上海战时语文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1939年11月，敌伪势力已侵入租界，他不顾敌人的威胁，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的

名义举办“中国语文展览会”，不仅是对青年宣传文字改革，实际也是对广大群众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这期间他还编成《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一书，是他领导上海语文学术界发动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的集结。

1940年秋，陈望道为避免汪伪汉奸的迫害，从上海经香港转赴抗战后方，回到当时迁校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43年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等职。这时他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常给进步学生以支持和帮助，营救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进步学生。为此国民党学校当局不断对他施加压力，校长章益扬言要把他赶走。

抗战胜利后，他随复旦大学复员回上海。在当时学校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十分激烈的斗争中，他继续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开展活动。

1947年，他首批加入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1948年，他被推选为上海国立大学赴南京请愿代表团的成员。上海解放前夕，“大教联”理事会改选，他出任理事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望道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高教局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四届代表、第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四届委员、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上海市第一至五届人民代表等职。

1957年6月陈望道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还担负着许多学术职务，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等职。他虽已届高龄，仍坚持学术研究工作。1956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亲切地接见了她，关心他的文法、修辞的研究。后来，他在复旦大学筹建了语言研究室，并亲自主持这个室的工作，以促进语文研究的开展。1961年，他担任修订《辞海》的总主编。1972年他修订重印了《修辞学发凡》。1976年秋，他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在上海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注：

- ① 根据1952年陈望道自填的履历表，生年之公历月日尚待考订。
- ②—⑧ 引自陈望道填于1952年的履历表。
- ⑨ 陈望道：《五四运动与文化运动》。《文艺月刊》1959年5月号。
- ⑩ 《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生前谈话记录。《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 ⑪ 茅盾：《回忆录》（四）。《新文学史料》1979年总第4期。
- ⑫ 引自陈望道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小结。
- ⑬ 鲁迅：《致吴勃的信》1935年2月14日。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记录。《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 ② 陈望道：《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1980年第一辑。
- ③ 陈望道：《党的建立时期情况》。同上。
- ④ 陈望道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小结。

- ⑤ 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党史资料》1980年第一辑。
- ⑥ 茅盾：《回忆录》（四）。《新文学史料》1979年总第4期。
- ⑦ 乐副柄：《绍道同志二三事》。《文教资料简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1978年第1期。
- ⑧ 许德良：《五卅运动与上海大学》。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二辑。
- ⑨ 薛尚实：《回忆上海大学》。同上。

舒新城

谈宗英

舒新城，又名维周、心怡、遁庵，湖南省溆浦县人。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生于1893年7月5日（清光绪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世为小农，家境贫寒。五岁入私塾读书，1907年进酃梁书院，次年转入溆浦县立高等小学，1911年因闹学潮被开除。辛亥革命后，曾在常德第二师范附设单级教员养成所、长沙游学预备科和武昌文华大学中学部暑假英文补习科等处求学，1913年8月借用同族舒建勋的中学毕业文凭，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本科英语部，1917年毕业。此后在长沙兑泽中学、省立第一中学及长老会所办福湘女学执教。在福湘女学曾任教务主任，但未及一年，因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发表《我对于教会学校的意见与希望》一文而去职。在此期间，他致力于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曾据美国人贺恩（H·H·Horne）的《教育上的心理原理》等书，编著《心理原理实用教育学》。离开福湘女学之后，又与宋焕达、杨国础、方扩军等创办《湖南教育月刊》，以“研究我国教育所应采之宗旨，介绍世界教育之思潮，批评旧教育之弊端，商榷新教育之建设”为目的，出至第五期即在军阀张敬尧的胁迫下停刊。此后，他在省立第一师范教授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与此同时，他还为《体育周报》写《儿童学》，为北京《新

中国》杂志写《美学》，为《北洋时报》写《心理学》等。

1921年7月，舒新城应张东荪的邀请，至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后改名中国公学附设吴淞中学）主持校务。他不满当时的教育制度，一意实行改革，如推行五年的能力分组制和选科制以及男女同校等。时适美国人柏克赫斯特（Helen Huss Parkhurst）创始的道尔顿制传来中国，舒对此作了研究，认为道尔顿制的自由合作原则，即不用旧日的班级制及钟点制，而使學生按照自己的能力与同学共同研究、自由学习的教学制度，可以解决年级制及学科制的许多问题，其理论与办法都比国内现行的制度好。于是力排众议，从1922年10月起，与常乃息、沈仲九、孙俚工等在吴淞中学进行试验，主要措施有三：（一）改教室为各科作业室，按学科性质陈列参考用书和实验仪器，使其兼备旧日教室、自修室、图书馆、实验室的作用，每室由教师一人或数人为指导员，学生可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入室研究问题。（二）废除课堂讲授，由教师将各科学学习内容制成分月、分周的作业大纲，并规定需要完成的各项作业，由学生自行学习。（三）制定学习进度表，由学生将各科学学习进程及所费时间记录在表上，以检查自己的成绩，再由教师加以考核，决定其是否达到某种程度。舒新城在试行道尔顿制的同时，还为《教育杂志》的《道尔顿制专号》撰文，广为宣传，以期引起教育界的注意。

1923年2月，舒新城因吴淞中学内部对推行道尔顿制有分歧，愤而辞职，举家迁居南京。不久应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主任廖世承的聘请，在该校任研究股主任，继续实验道尔顿

制。同时还在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兼课。此时，道尔顿制已逐渐为教育界所重视。他因最早试行道尔顿制，故各地通函及面询者很多。于是在这年夏天，他专为东南大学的暑期学校讲授道尔顿制，旋又应上海、上虞、武进、宜兴、武昌、长沙等地的邀请，到各地作有关道尔顿制的讲演，介绍研究所得，供有志改革者参考。

同年11月，舒新城经恽代英、李儒勉等人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积极参加该会的活动，曾与会员杨效春、曹台起草少年中国学会的办学计划，规定学校的目的为“实现本会之宗旨，创造中国的教育”，但因时局纷扰，未能实现。

1924年4月，舒新城为了研究实际教育问题，又先后至芜湖、安庆、宁波、上虞、绍兴、杭州、嘉兴、上海、徐州等地，深入调查中等教育。在此期间，他连续发表了《心理学初步》、《人生哲学》以及介绍道尔顿制的四部译著：《道尔顿制概观》、《道尔顿制讨论集》、《道尔顿制研究集》和《道尔顿制浅说》。此外，他还翻译了桑戴克（Edward Lee Thorndike）的《个性论》、莫尔（J·S·Moore）的《现代心理学之趋势》等。

11月，舒新城由南京溯江而上入四川，在国立成都高等师范任教育学教授，旋因学校发生风潮，在川不足八个月，即于1925年6月返南京。从此专门从事著述，翻译了美国人林勤（A·J·Lynch）所著《个别作业与道尔顿制》，又与余家菊等合编《中国教育辞典》，编著《教育通论》、《现代教育方法》、《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国新教育概况》、《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和《教育指南》，还发表了大量有关教育史的

论文。由于他对清末以来的留学教育方针不满，著有《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建议“以后的留学政策，当以研究学术改进本国文化为唯一目的”，并提出改进办法：“国家应调查国内学术界之需要，通盘筹算，预定每年应派出国研究某种学术的名额，公开向全国召集此项专门人材；留学生研究期满回国后，应严格试验以验其所学，及格者予以适当的事业使之办理，俾能展其所长，以免空耗国家经济、个人精力”等。

在这同时，他还主编了二百余万言的《中华百科辞典》，从拟订体例至校阅全稿，用力极勤。全书收集通行名词万余条，一以中等学校之各种科目为标准，一以一般社会所需要之基本知识为根据，尤注意于教科书或专业训练中所不易见的常识事项。故此书实为兼备常识教科书作用的百科辞典。

1928年，舒新城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约，继徐元诰主编《辞海》。任事之后，立即组织力量从事编纂；同时又为全书厘订编辑计划，规定内容体例及排列方法。他以原稿中已死的旧辞太多，流行的新词太少，乃变更方针，删旧增新，并改加新式标点。1930年舒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曾创刊《新中华》等期刊。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与刘济群合编《淞沪御日战史》。1936年，收词十万条以上，兼有字典和百科性质的综合性辞书《辞海》正式出版，受到读者的好评，对当时的文化教育界颇有影响。次年陆费逵去香港，舒为中华书局代总经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他因久病仍留居上海。1944年长沙沦陷，日本侵略军曾企图强迫他返湘出任伪职。他以病重为托辞，坚

决拒绝。抗战胜利后，继续主持编辑所工作，出版了大量教科书和各种读物。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对于所主持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一贯重视，尤其注意收集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史料，进行研究。1957年秋，他提议重新修订《辞海》，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后即着手筹备。次年春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59年夏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任主任委员。他积极筹划，全力以赴，即在病中亦经常关心。1960年11月28日，因癌症在上海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舒新城日记》（现存上海辞书出版社）。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

舒新城：《我和教育》。中华书局1945年版。

舒新城：《道尔顿制概观》。中华书局1923年版。

舒新城：《我怎样恢复健康的》。中华书局1947年版。

魏文伯在舒新城公祭仪式上的悼词，《解放日报》1960年12月1日第3版。

俞 颂 华

俞湘文 葛思恩

俞颂华，名珪，江苏太仓县人，生于1893年3月9日（清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父俞书祥，字隶云，在上海电报局工作，初为电报生，后逐步升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俞颂华少年时代，曾肄业于上海澄衷中学，后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又转入上海复旦公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1919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

俞颂华自日本毕业回国后，应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张东荪之邀，任该报副刊《学灯》主编，并参与《解放与改造》杂志的编撰工作。时在五四运动之后，《解放与改造》杂志曾介绍当时西方新思想，如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费边主义、乌托邦、无政府主义等，各派学说因而风行一时。

1919年底，我国派驻海参崴的外交代表李兰洲（家鳌）邀俞颂华担任日文秘书。俞颂华志在新闻事业，对日文秘书工作不感兴趣，故到海参崴不久就放弃了这个高薪的工作，回到上海，仍任《学灯》主编。

1920年秋，《时事新报》与《北京晨报》联合派一批记者赴苏俄采访十月革命后的情况，被派的有俞颂华和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瞿秋白、李仲武。这是最早去苏采访的中国记者。他们与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同行。但由于当时西伯利亚铁

路暂时中断，他们滞留哈尔滨甚久，于次年1月25日始抵莫斯科。他们游览了莫斯科并访问了列宁格勒，曾会见了列宁、莫洛托夫等革命领袖。3月初又访问了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所写的采访通讯，分别在《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上发表。后来《北京晨报》把通讯辑成《赤俄见闻记》一书印行，曾再版多次。这些通讯对帮助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起了重要作用。

俞颂华在苏采访约有半年，随后他离俄国经波兰到德国。在那里，他一面仍担任记者工作，一面进柏林大学研习哲学、论理学（逻辑学的旧称）和马克思主义等。其间曾两次赴法国。

1924年俞颂华自德回国，任上海中国公学教务长兼教授。后中国公学停办，由钱经宇（智修）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并先后在中央大学商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沪江大学商学院、暨南大学、劳动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校兼课，讲授社会学、逻辑学等课程。他为《东方杂志》的国际栏撰写时事述评，直到1932年“一·二八”日军进攻上海时，商务印书馆被日机炸毁，《东方杂志》暂时停刊，他才离开商务。随后，经黄炎培介绍，他进入上海申报馆工作。

俞到申报馆后，任新创刊的《申报月刊》总编辑。《申报月刊》创刊于1932年7月，在《创刊词》中提出创办这个刊物的宗旨乃是“认清时代潮流的趋势，以增进最大多数劳苦民众的福利为目标”。为贯彻这一目标，俞颂华邀约许多知名人士为该刊写稿。1936年《申报月刊》改成《申报周刊》。在同

一时期，他还与俞寰澄、李孤帆等创办了《新社会》半月刊，提倡革新政治，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前后办了两年。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起了变化。1937年4月，申报馆派俞颂华和孙恩霖赴延安采访，他们是西安事变后国内最早派往陕北抗日根据地采访的记者。他们到延安后的第二天（4月16日）晚上，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烛光下作竟夜之谈。其时在芦沟桥事变前三个月。他们聆听了毛泽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形势估计与中国方面应采取的战略问题的谈话^①。第二天又会晤了周恩来和朱德，并在当天晚上出席了延安的文艺晚会，和毛泽东、朱德、史沫特莱同座观看了“抗日剧团”的演出。后来俞颂华在他所写的通讯中说：剧场虽然简陋，但表演的人很有精神，表演的戏剧和节目都很有爱国的意识。他还说：“在离肤施（延安）的时候，我们回首看城门两旁城墙上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八个大字，不由得感到愉快，因为我觉得这八个大字，足以代表国难严重中的一线曙光，亦是全国国民的一致愿望。”^②这篇通讯是国内新闻界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陕北情况较早的一篇，曾引起广泛的注意。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后，俞颂华于8月应邀赴广州筹办《星粤日报》未成，转往武汉，参加《申报》汉口版的工作。

1938年春，俞颂华应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新闻系主任马星野邀请，赴湘西芷江任该校新闻系教授，讲授“逻辑学”、“新闻写作”、“新闻学专题研究”等课程；同年暑期，随该校

迁往重庆。因与学校当局的关系不协调，1940年他离重庆赴香港任《星报》（晚报）主笔。不久又应胡文虎的邀请，去新加坡任《星洲日报》总编辑。但国民党有关当局不肯放过他，要胡文虎解聘他，因此他被迫再去香港。到港后，适值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在香港创刊，梁漱溟任社长，俞颂华应梁的邀约担任了该报的总编辑。

《光明报》只办了两个多月，即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香港而被迫停刊。俞颂华始则隐姓埋名，以后化装商人，离港到桂林，任《广西日报》总编辑。《广西日报》系地方报纸，原来销数只有几千份。他负责编辑后，力加整顿，邀请从香港撤退到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如金仲华、千家驹、胡仲持等为该报撰稿，报纸面目为之一新，销数随之日增，多时销行到两万多份。

俞颂华在《广西日报》期间，该报也受到国民党的压力，不许他在该报工作，他又一次被迫离开，转往湖南衡阳任《大刚报》总编辑。他为《大刚报》开辟了“星期增刊”。特别是他创办的“敌后航空版”（用飞机载往日军占领区散发），成为当时新闻界的创举。

俞在《大刚报》工作了近一年。1944年日本侵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侵占衡阳，俞颂华再次转往重庆，受黄炎培之聘，主编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国讯》杂志。抗战后期，由于长期流离颠沛，他的健康受到损害，患了肺病，但因经济拮据，无力医治。

抗战胜利后，俞到四川璧山任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主任

任，但仍兼《国讯》主编。1946年夏，他随校迁往苏州。1947年10月11日因肺病在苏州逝世，年仅五十五岁。遗著除前述在苏俄采访时的通讯集《赤俄见闻记》外，尚有《柏拉图》一书。

注：

- ① 1981年孙恩霖与作者的谈话。
- ② 俞颂华：《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1937年5月23日《申报周刊》。

钱玄同

娄献阁

钱玄同，原名夏，字中季，号德潜。浙江湖州归安（今吴兴）人，1887年9月12日（清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生。其父钱振常是个举人，曾任礼部主事，晚年任绍兴、扬州、苏州等地书院山长。

钱玄同六岁入塾，初读传统经、史、文学诸书。到1901年因得见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佩服刘氏之说，遂信公羊而疑左传。稍后，由于受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等改良主义刊物的影响，政治上曾一度赞同过保皇派的主张。1903年冬，钱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1904年又读了章的《诂书》、刘师培的《攘书》以及其他传播革命思想的刊物，政治思想上发生变化，渐有排满反清意识，并毅然剪掉辫子，表示“义不帝清”^①。当时他还与友人合办《湖州白话报》，不再用光绪年号，只书“甲辰”字样。

同年，钱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一文中得知清初音韵学家刘继壮（字献廷）造新字的学说，引起了兴趣，于是便矢志作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改号“掇献”，表示要“掇拾刘献廷之坠绪”^②。

1906年其兄钱恂任留日学生监督，他随兄去日本，旋入早稻田大学学师范。其时章太炎在东京任《民报》主笔，钱曾

往谒，并于翌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章太炎在民报社开办国学讲习会，钱与鲁迅、龚宝铨、黄侃等一起听章太炎讲《说文》，“治声音训诂之学”^③；同时亦受章太炎在古文经学上的某些影响。此外钱还颇留意于“章草”的研究。

1910年钱玄同回到国内，先后在浙江嘉兴、海宁、湖州等中学任国文教员。翌年曾谒崔适，认崔为师，读崔的《史记探源》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书，遂背章氏古文经学说而宗经今文家言。后来新文化运动兴起，钱又打破“家法”，对经今古文均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一度觉得推翻清朝的统治即是光复汉族，一切都应回复到中国古代的情形，并参照《礼记》、《书仪》、《家礼》等，写了《深衣冠服说》。时沈钧儒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长，聘钱为教育司科员、视学。1912年3月，他穿戴着深衣玄冠到司办公，意在提倡，但无人效法，且被传为笑料。

1913年钱恂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钱玄同也随兄到了北京，担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国文教员。1916年起改任高师和北大教授，与鲁迅、周作人等常相往还。

1917年陈独秀、胡适发起文学革新，钱玄同很快表示赞成，积极加入了这一革新的行列。同年7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论应用文亟宜改良》的信，除阐明改革应用文的理由外，还提出了改革大纲十三事。在此前后，钱写了不少文章、随感录和通信鼓吹白话文，主张言文一致，反对用典，提倡小说、新诗、新戏，建议采用阿拉伯数字、以公元记年、改横排加西式标点符号等，并希望《新青年》及其撰稿人做除

旧布新的示范，对“所有认做‘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④。

1918年，钱作为《新青年》杂志的轮流编辑之一曾邀鲁迅投稿，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在钱的推动之下写作发表的。此外，钱玄同还与刘半农合演双簧信，即先由他化名王敬轩致信《新青年》，从反面说出守旧派的各种谬论，然后再由刘从正面逐条进行驳斥，特别点名批判了守旧的林纾。林大骂钱等“伤天害理”，并在其毁谤性小说《荆生》中，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百般加以丑化；而鲁迅则热情称赞钱是“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⑤。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的言行是颇激进的，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件事可以不改革。他多次批驳保存国粹和灵学等谬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是他首先提出的，并称这两种文妖“为有害文学之毒菌，更烈于八股试帖及淫书秽画”^⑥。钱更反对孔教，拥护捣毁孔家店。1919年2月，他在写给S·F的信中说：“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要人们“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刑政、历史、文学弃如土苴”^⑦。不久，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钱先是站在前面热烈欢迎；但运动过后，他便逐渐退回书斋专搞语音文字等学问了。

早在1917年，钱玄同就加入了国语研究会，成为国语运动初期的活动分子之一。1918年首在北大讲授音韵学，编有音韵学讲义，后以《文字学音篇》印行。他教授此课达二十年，对语音声韵颇有研究，但专著不多。同年钱曾参预审定《国音字典》，又与马裕藻、沈尹默等创编国语课本，字傍加注音

符号，供北京孔德学校小学一年级用。当时钱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多是宣传国语的，尤重视注音符号问题，曾陆续写了《论注音字母》、《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等，对注音符号的改进与推广提供了不少意见。

1919年4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钱任委员兼常驻干事。曾与刘半农等提出“统一国语进行方法”案，主张改国文为国语和编纂辞典等，得该会第一次大会通过。1920年国语讲习所开课，他主讲国音沿革，并有《国音沿革六讲》一书排印。

钱玄同十分重视汉字改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曾提倡世界语，希望废汉字用世界语来替代，说这是灭孔学与道教妖言，使中华民族成为二十世纪文明民族的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但很快觉得这个理想太高不易达到，逐渐转向国语罗马字的研究。1922年经与黎锦熙等商议，决定把他们准备推行的新文字叫做国语罗马字，并发刊“汉字改革号”^⑧，以促进汉字改革运动的开展。为此，钱精心撰写了一篇题名《汉字革命！》的长文，系统论证了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着重强调汉字革命必须“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不仅使用注音符号，而且应进一步“采用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⑨。他曾拟定两种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钱仍任教授，同时继续参加国语工作。这年召开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大会，决定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和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他为该两会的成员之一。他又提出增修新式标点符号的意见书，建议增加隔号、音界号、略字号和连

字号等。1925年章士钊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后，又在小学恢复读经，并将《甲寅》杂志复刊，宣言不收白话文，复古逆流再次抬头。钱很有打“章老虎”的勇气，与黎锦熙一起在《京报》附设之《国语》周刊上对《甲寅》作战，反对古文，积极维护国语运动。

同年9月，刘半农由欧洲回国，发起语音学者团体“数人会”，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参加，经过一年时间，开会二十多次，合各家意见，排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草案，以国语统一筹备会名义于1926年11月公布。同时钱还努力从事增修国音字典工作，编成了十二大册稿本。

1928年秋，钱玄同任北师大国文系主任，讲授“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学术思想概要”等课程。同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授权他与黎锦熙筹备成立国语研究机构，他们拟定了一个计划书，将编纂国语大辞典、设立国语专修学校、广印国语罗马字和汉字注音符号读物等均列入计划。不久教育部聘钱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常委。同时在北平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钱为纂著部第一组国音大辞典股主任。

1929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决定由钱主持编纂《国音常用字汇》，到1932年编成出版，经教育部公布定为发音标准。该字汇共收一万二千余字，编选十分精当，卷首的长篇例言是钱精心撰写的切实之作。1933年大辞典的纂著开始，钱与黎锦熙分任总编纂，黎主字义和词类，钱主字形和字音。同年，他还写成《说文部首今读表》、《说文音符今读表》各两卷。

1934年著名的语音学家刘半农、白涤洲先后病故，钱很悲痛，在纪念文章里写了“人生若朝露，为学贵及时；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力追”^⑩的俚语来自励。当时钱玄同的身体已很虚弱，仍担负师大及北大的授课任务，又撰《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还准备编写《简体字谱》一书。在他看来，简体字有裨于国语前途者甚多，此虽是治标的办法，然而却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⑪。同年他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经国语统一筹委会通过并把编制简体字表的任务委托给他。1935年钱因病休假，但仍抱病赶编。第一批编了两千三百余字，最后教育部长仅圈定三百二十四字公布，还遭到当政的某些要人反对，竟下令暂缓推行。

同年国语统一筹委会裁撤，另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由十三人组成，钱仍是委员兼常委，但已没有固定经费，很快因时局关系便偃旗息鼓了。

除语音学外，钱玄同还注意搜集古今有关辨伪的著作。按照他的意见，所有古籍都只是可供参考的史料，“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⑫。不仅辨伪书，更要辨伪事。从1921年起他就与顾颉刚等通信讨论书史之真伪，取号“疑古”，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成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钱不单疑子集诸书，而且疑“群经”，1931年发表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是他在经学方面的得意之作，曾被译成日文。

随着学术成就和名位的增高，钱的思想逐渐趋向保守，曾受到他的老朋友鲁迅的讽劝与批评。但是当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时，他的爱国情绪又从书斋中萌动起来。从1931年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即断绝与日人往来。1933年日军进一步侵占榆关、承德，更使他感到痛苦。1936年面对国难极端深重的局势，钱和北平各大学教授共同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塘沽”、“何梅”等卖国协定，并提出中日外交公开、不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及取消一切伪组织等项要求。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师大迁往西安，钱因病留平。他在病中完成了编校《刘申叔先生遗书》的工作。钱是个知名人士，不能不为敌人所注意，有的朋友曾劝他及早离开北平，但终为病体所不许。钱曾多次表示决不任伪职，决不当汉奸。1938年他复名钱夏，“夏”即非“夷”，意即不做日伪的顺民。他长期患有高血压症，至1939年1月17日因脑溢血去世，终年五十二岁。

注：

- ①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语丝》第8期。
- ② 钱玄同：《以公历一六四八年岁在戊子为国语纪元议（与黎锦熙罗常培书）》。《国语周刊》第77期。
- ③ 钱玄同：《章草考序》。《师大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第71页。
- ④ 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4号。
- ⑤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⑥ 同①第4卷第6号。
- ⑦ 同①第6卷第2号。
- ⑧ 《汉字改革号》即《国语月刊》1922年第7期，实际印行于1923年1月。
- ⑨ 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第1卷第7期），第19页。

- ⑩ 钱玄同：《哀青年同志白涤洲先生》。《国语周刊》第160期。
- ⑪ 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第1卷第7期），第160页。
- ⑫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古史辨》第1册，第29页。

王小航

娄献阁

王小航原名照，字藜青，号小航，又号水东。河北省宁河县人。1859年6月8日（清咸丰九年五月初八）生。曾祖王锡朋做过安徽寿春镇总兵，1841年于定海对英作战时阵亡，谥刚节，赠提督衔。父王楫为太学生，袭骑都尉兼云骑尉职。王小航幼年丧父，由叔父抚养。从小喜欢观察星象，爱读天文、地理、兵法之类的书。十岁以后从塾师学诗文，1877年入书院。

当时北京同文馆招生，王欲报考，家中长辈以其曾祖被“鬼子”害死，后人不该学“鬼子”，拒允。但他仍广求时务诸书，凡同文馆、上海制造局和教会译印的新书均尽量搜集研读，亲族乡人把他看作中了魔气^①。

1891年王小航中举人，1894年取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适逢中日甲午战争，为维护地方秩序并准备御敌，他在家乡芦台办起了乡团，曾受到直督王文韶的称赞，说王小航“所练之乡团，队伍严整，饷项分明，为沿海一带表率”^②。

1895年王赴北京应散馆试，改任礼部主事，于是将乡团收束，至京供职。中日战争失败后，朝野要求变革之风日炽，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897年回芦台创办了一所小学堂。是年冬，王仍回京供职。翌年3月，王又与同省京官徐世昌、李

石曾等在北京设立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③。

1898年戊戌变法时，王小航参与维新活动，多次上书言事。在“请布纶言以祛众惑，广慈训以定众志，设教部以释众疑”一折里，批驳守旧顽固派的言行，说明变法图存的必要性，提议设立“教部”。他的奏议中请求：“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达到“道可卫而学可兴”的目的，从而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温和。他劝光绪帝奉慈禧太后“巡幸中外”，“以孝治镇服天下”^④，想让慈禧到海外去开开眼界。该折递到礼部，礼部尚书许应骙不允代奏，并劾王小航包藏祸心，而光绪则赞扬王“勇猛可嘉”，超擢四品京堂候补，并赏三品顶戴；同时怒斥许，将礼部堂官六人革职^⑤。

在变法中，王与康有为等经常往来，但意见不完全相同，面对新旧势力和两宫间的激烈斗争，康主张扶帝抑后，削弱旧党的权势，王则想调和两派的矛盾，阴弭宫闱的变乱；康主急进，王主渐进；康较注意军政，王却看重教育。王小航曾对康有为讲：“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康反驳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⑥在康等私下策动袁世凯行兵谏之前，谭嗣同等两次要王去劝说聂士成保护光绪帝，并许聂以督直相酬。王认为那是使光绪去冒险，坚决加以拒绝。此外，当时光绪的亲信张荫桓力助康有为变法，王以张奸贪，不顾康的劝阻严劾张。正因这样，“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⑦。

不久戊戌政变发生，王小航与康有为等均逃亡日本，此后

王即退出政治舞台，与康的关系渐疏远。王流亡日本一年多时间，先后游历了东京、高知等地，作诗二百多首，大半是抒发胸中悲愤之情，后自选一部分编成《雪泥一印草》。王颇注意研究日本的假名文字，为以后创造“拼音新字”奠定了基础。

1900年春，王潜行归国，不敢公开露面。他身穿僧装，诡称“台湾和尚”。他从烟台上岸后，在山东、河北、江苏等地以化缘为生，备尝艰苦，有自撰《行脚山东记》记其事甚详。

同年秋，王小航回天津隐居。不忍空耗岁月，着手仿日本片假名创编官话合声字母，初刻本翌年印于日本江户，署名“芦中穷士”。该字母共有声母五十（初为四十九），他叫“音母”，韵母十二（初为十五，后省去衣乌迂三字），他叫“喉音”，总计六十二个音符，均取汉字的某一部分构成。王制此字母主要着眼于普及教育，“专为无力读书无暇读书者而设”^⑧，在拼法上，概用两拼，反对三拼。言文一致，只拼北京白话。拼音字母可用来注音，也可代替汉字。有人称它为“简字”，实际是中国文字由衍型过渡到衍音、实行拼音化的初步尝试，比以往的切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文字改革运动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推行新字，1901年王冒险到北京求见李鸿章。李托病不出，由于式枚代见。在谈话中王提出教育救国的主张，说“中国政府非注重在下层的小学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又“非制出一种沟通文语的文字，使文字语言合而为为一不可”^⑨。于式枚很不喜欢他的这套说教，王扫兴而归。

1903年，王小航在北京裱背胡同首次设立官话字母义塾，因不便与多人见面，用门人王璞为教员，自己隔屏听之。

同时化名赵世铭往来京津保间，暗中进行传播，取得不少人的同情。先是王璞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称这套简字是使人人能看书看报的便捷之法。张等迫于下面的呼声，不得不在同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⑩其后直督袁世凯也曾依从保定大学堂学生何风华的请求，飭督署学校司妥拟推行办法。翌年直隶学务处通令全省启蒙学堂传习，更在天津办起了简字学堂。此外，名儒严修、吴汝纶等皆热心提倡，于是官话字母不胫而走，习者越来越多。

随着官话字母的流行，王小航正在为推行官话字母而尽力时，他的处境却日趋危险。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开始他尚不以为意，后他的朋友沈荃因揭露《中俄密约》被捕，忽以戊戌余党杖毙狱中，王才感到大难临头。但别无良策，他只好于1904年春向提督衙门投案自首，幸而得到那桐和庆亲王奕劻的帮助，免于—死，但仍定为永久监禁。不久，奕劻为缓和舆论，建议慈禧太后宽赦党人，清廷特诏除孙文和康、梁外，皆赦。王获赦出狱，并得开复原衔，但他不愿做官，继续搞他的拼音字母。

1905年，王在保定创办了拼音官话书报社，次年迁至北京。该社所刊行的拼音官话报销路很广，又印有伦理、史地和自然科学等拼音官话书，发行多达六万部以上。一时间官话字母颇为风行，除河北外，两江总督周馥、盛京将军赵尔巽，均令在省城设立简字学堂；河南、山东、山西等地亦都有人学习和推广，迅速流传至十三省区，识者不下数万人。1907年劳乃宣在王氏所创字母的基础上，增加宁、吴、闽、

广音各若干，成《简字全谱》，包括全国各地方言，从而官话字母在长江以南也可以通行。但是当时学部诸要人多反对以北京音为官话，在在掣肘。1910年摄政王载沣竟借口恐汉文废绝，严禁官话字母传习，并将官话书报社封闭，王也被迫避往江苏。

辛亥革命后，王寓南京水明楼，曾撰《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一文，继续致力白话教育之推广和普及。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王小航被选为副会长。会上，王与正会长吴稚晖发生意见分歧，形成两派。吴强调汉字音读，王重视造新字；吴主张将十三浊音加入字母，王则极力反对，双方争辩相持不下。王采取联合北方及川滇闽粤代表提出了每省一个表决权案，使他的主张得到大会通过。会议还议决了一套“注音字母”（后称注音符号），又审定了六千余字的读音。王小航对这一结果不完全满意。不久吴、王相继辞职，由王璞代理会务。

读音会期间，袁世凯曾有意晤见王小航，王因袁曾出卖光绪破坏变法而不愿为伍，以“闲人不便搅忙人”婉辞。此后数年，王闲住北京德胜门附近水东草堂。段祺瑞当政时，王一度入幕，但很快离去。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亲至草堂邀王做国语统一会领袖，王以年老力衰未允。

1922年直奉战争之前，王曾写信给徐世昌反对财、内两部征收房捐，并批评了徐世昌纵弟贪赃的行为。又致书劝王士珍不要组阁，谓“不能以恢复国会、容纳南方护法之意，不必登台”，“不能废止妖异之督军团制，不必登台”^①。不久，直奉之战结束，黎元洪复任总统。当时人民要求和平统

一，王小航对黎抱有反感，也跟着凑热闹，作《屯田议》一文，主张“寓兵于农”，上书于黎^②，还提出了十项具体办法，然而根本不可能实施。

1923年以后王从事著述，主要有《三体石经时代辨误》、《表章先正正论》和《读左随笔》、《读易随笔》等，均持古文经学家的立场。1925年曾在《甲寅》杂志上发表《说纲》一文，主张维持儒家的“三纲”，与时代思潮格格不入。1927年又撰《方家园杂咏记事》，揭露了一些清廷内幕，较有价值。

王小航晚年仍持“教育救国”的主张，说“我国非教育内閣不能挽救”，又说他“三十余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③，但晚年思想由保守日趋反动。1928和1930年他先后写了致李石曾、阎锡山、梁漱溟书多篇，反对三民主义，更公开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王于1933年6月1日病故，终年七十四岁。其著作大部分收在《水东集》中。

注：

- ①、②、③ 陈光森：《老新党王小航先生》。《国闻周报》第10卷第29期。
- ④ 王小航：《戊戌六月礼部代递奏稿》。《小航文存》甲第1至6页。
- ⑤ 黎锦熙：《王照传》。《国语周刊》第129期。
- ⑥ 王小航：《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小航文存》丁第72页。
- ⑦ 同⑤。
- ⑧ 王小航：《摘录官话字母癸卯再版凡例十一条》。《小航文存》甲第37页。
- ⑨ 王小航：《大谬》。《小航文存》丙第42页。
- ⑩ 黎锦熙：《光宣语运史略》。《国语周刊》第130期。
- ⑪ 王小航：《劝聘老勿上台书》。《小航文存》乙第25页。
- ⑫ 王小航：《屯田议》。《小航文存》乙第7页。
- ⑬ 同⑥，第70、71页。

夏 曾 佑

袁 英 光

夏曾佑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杭州人。生于1863年11月（清同治二年十月）^①。父亲夏鸾翔（字紫笙），是晚清著名的算学家，曾任詹事府主簿等官职，著有《致曲图解》、《少广缙凿》等书。在夏曾佑出生后不久，他就病死于广东，身后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夏曾佑少年时生活不富裕，在母亲的教育下，学习文化知识，十四岁进学，二十六岁考中举人。

1890年夏曾佑二十八岁，至北京考中进士，任清廷礼部主事，仍利用时间读书。他聪明兼勤奋，得以博览群书。这时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我国日烈，民族危机加深，国内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了改良主义思潮，作为理论依据的今文经学也日渐流行，夏曾佑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成为今文经学的信奉者。1892年左右，他在北京和维新运动人物梁启超、谭嗣同相识，而且住所相邻近，他们之间乃时常讨论公羊学。由于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气味相投，交往十分密切，成为“讲学最契之友”^②。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统治之所以腐败，政治思想方面应该归罪于荀况，因而在戊戌变法前夜曾企图发动“排荀”运动。并谓“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

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使用‘禽贼禽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③夏曾佑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几句是：“冥冥兰陵门（指荀学），万鬼头如蚁，质多（即魔鬼）举只手，阳乌为之死。”^④

1895年夏曾佑居住于上海，在梁启超、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中经常发表论文。次年他改官知县，在京候选未着，生活困窘。乃于是年年底赴天津，应同乡孙宝琦之聘任育才馆教师，历时三年。此一时期，他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国闻报》，以宣传新学和鼓吹维新变法，和上海的《时务报》分执南北舆论的牛耳。由于办报关系，他与严复接触频繁。关于这时情况，他在给表兄汪康年的信中说：“到津之后，幸遇又陵（即严复），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如遇”^⑤。通过严复的媒介，夏得以系统地了解天演论进化学说。于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使之由传统的今文经学历史变易思想发展为进化论的拥护者，并成为政治上的维新派。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夏曾佑虽然没有被株连，但《国闻报》被迫停办，育才馆也将他解聘。次年年底，他出任安徽祁门知县，目睹地方吏治之腐败，民气之闭塞，而自己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思想上日趋消极。根据他所信仰的“优胜劣败”的原则看来，中国民族“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然而，他又十分热爱自己的国家，不甘心于亡国灭种，因此又认为“物极必返，将有大变，若不变者，则地球将退化，岂仅黄种之忧哉！”^⑥

1900年5月，八国联军入侵，镇压义和团运动。夏曾佑在祁门闻讯后，十分震惊，但是，他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反侵略压迫的斗争上，而错误地寄托在帝国主义侵略者身上，认为英、美帝国主义者会帮助被幽禁的光绪帝亲政，再行新法。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走，并暗中与帝国主义谈判投降。夏曾佑这时鉴于自己幻想的再度落空，遂甚为悲观失望，慨叹“此次北方事起，全体震动。竟将全国中隐微深锢之情形和盘托出，仔细思之，必至无救。”^⑦他估计这次八国联军入侵的结果，“支那必为埃及、印度之续矣”^⑧。因而在政治上的进取心几乎完全消失，说什么不论在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采取“二面绝不与闻为长策”，即“无论何事，必做二者之间，即可自存”^⑨。

夏曾佑在祁门做了三年知县，据说是“政简刑清，祁民颂曰：‘数十年无此好官。及行也，攀留者如潮涌’”^⑩。1902年4月，夏卸祁门任后，寓居上海。不久，以直隶州知州用，旋因母丧归。丁忧期间，居家无事，遂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他这样做，主要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前途渺茫，力图从历史研究中探索出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这时已认识到历史与现状有密切关系，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以为推而已矣。”为什么能推呢？因为“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⑪不可。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迹象，只有从历史中才能找到它的根源。他在《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中指出：“变法之说发端于甲午，实行于戊戌，闾寂于己亥，重演于庚子。然皆变法而不见变法之效，非变法之无效也。”其原因是由于变法没有以历史为根据，所以遭受了失败。

他强调变法必须抓住本国的历史特点，不然“立不合于历史之政治”，则其统治下的人民“不能一日安”，而政治的本身“亦无有不归湮灭”。“凡其能行之而不废，循焉而有效者”，都必须“推本于历史”。他提出“致治之密合于历史”，其程度要做到“几如在躬之衣服，其长短必符其身，攻疾之药石，其寒热必视于病。”^⑫

二十世纪初，夏曾佑和康、梁一样，还幻想帝国主义国家会帮助中国自强，1904年他写了《论中、日分合之关系》^⑬一文，反对联俄，主张联日，希望在日本的帮助下使中国强盛起来。对国内政治，他仍主张通过变法保存封建君主制，而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中国还不够开化，说“无教之国，在不开化之地者，决不可行开化之事，强而行之，不受大祸，亦有大累”^⑭。照他看来，当时的中国不但不应当向革命转化，连改良都应该推迟到将来去进行。其理由是中国“盖其为物也大，则感动必迟；抑其建国也古，则守旧必笃。积笃与迟，则其立宪居万国之终，自然之理，无足怪者。”^⑮1905年8月，夏曾佑居丧期满，亟待复职，适值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夏曾佑经友人介绍，作为五大臣随员之一，赴日本考察，于1906年4月出国，历时两月回国。之后，又作为两江总督特派代表的随员，北上会议官制。当时，《东方杂志》为立宪问题出了临时增刊，他为该刊写了《刊印宪政初纲缘起》^⑯，为清廷的假立宪制造舆论。1908年初署理安徽广德知州。但这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夏曾佑眼见立宪不成，前途渺茫，思想上越发消极颓废，遂致力于佛学的研究，与沈曾植、张尔田等人谈佛，终日不

倦。

值得重视的是夏曾佑从事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史学著作：《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这是供当时中学堂用的一本教材，原书分三册，1904年至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排印出版，以后又重印过几次。1933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加以句读，并改名《中国古代史》，作为大学丛书之一重行出版。本书虽然只写到隋朝，只能算半部古代史，但它突破了传统的封建史学编撰方法，于编年、纪传、记事本末三大体裁之外，应用章节体编写历史，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中可说是第一人；也是试用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指导总结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夏曾佑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他又结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当时考古学方面的成就，又将三大时期“细分之为七小时代”。在上古时期内他分为两个小时期：一为太古三代，因无信史，称为传疑时代；二为由周中叶至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造成，称之为化成时代。中古之世，他分为三个时期：一为由秦至三国，此时中国人材极盛，国势极强，称之为极盛期；二由晋至隋，由于周边各族攻入中原地区，并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而宗教（即文化——引者）亦大受外教之影响，称之为中衰期；三为唐朝一代，此期国力之强，略与汉等，而风俗不逮，称之为复盛期。近古之世，也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为五季宋元明为退化之期；二为清代二百六十年为更化期。夏曾佑这样划分历史时期，是依据历史的进化、演变和因果关系而划分的，

虽然还看不出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因果关系，但他打破了几千年封建史学不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旧传统，在史学研究上作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后，夏曾佑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凡四年，后调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自好友严复、沈曾植等相继逝世后，他落落寡欢，杜门谢客以诗酒自遣。1924年4月17日病逝于北京^⑰。

注：

- ① 关于夏曾佑的生卒年月，各书颇多歧误。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年表》，谓生于清咸丰，未注年月。夏元琛《夏曾佑传略》谓生于咸丰癸亥十月，年六十二。按咸丰无癸亥，或为同治癸亥(1863年)之误。1863年至1924年适为六十二年。当以《传略》为是。
-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 ③、④、⑰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全集·文集》第十五册。
- ⑤ 《汪穉卿先生师友手札》夏曾佑部分第十三(下简称《手札》)，原作藏上海图书馆。
- ⑥ 《手札》第四十七。
- ⑦ 《手札》第六十。
- ⑧ 《手札》第五十九。
- ⑨ 《手札》第六十二。
- ⑩ 夏元琛：《夏曾佑传略》。《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
- ⑪ 《中国古代史》叙。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页。
- ⑫ 《东方杂志》第2卷第8号。
- ⑬ 《东方杂志》第10卷第1期。
- ⑭ 《手札》第六十。
- ⑮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页。
- ⑯ 同⑮第10至23页。

詹天佑

李希泌

詹天佑，字眷诚，原籍安徽省婺源县（今属江西省），1861年4月26日（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七日）生于广东南海县一个没落的世家。他的曾祖詹万榜是清乾隆间太学生，因经销茶叶来到广州，遂在广州落籍。到他父亲詹兴洪时，詹家开设的茶行因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倒闭了。由于家境中落，詹兴洪把家搬到南海，务农为生。

詹天佑在七八岁时，进塾读书。这时，广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侵入，洋货源源从香港输入广东。这使詹天佑有机会接触到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工业品和机器。他喜欢玩弄机件，几次把家里的自鸣钟偷偷地拆开来又装上，留心观察机器的构造和各个零部件之间的关系。

1871年年底，清政府派容闳到香港主持“选送幼童出洋肄业”的招生工作。次年初，詹天佑到香港参加考试，被录取。8月11日，詹天佑等第一批留美幼童，自上海启程赴美。詹天佑在美国的小学和中学毕业后，于1878年6月，考入美国耶鲁大学以雪费尔命名的科学学堂，在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①

詹天佑在大学肄业期间，刻苦钻研，成绩优异。他在数

学方面是一个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时，曾获得数学奖金。在毕业考试中，他的考试成绩是全班第一名。他的毕业论文《码头起重机的研究》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1881年6月，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这一年，由于清政府内顽固派对留学生计划的攻讦与破坏，清政府命令容闳把前后派送出洋肄业的四批幼童共一百二十名全部撤回，其中仅有詹天佑与欧阳庚二人得到了学士学位。

同年11月，詹天佑回国后，被清政府派在福州水师学堂学习驾驶。1882年9月，他以一等第一名在水师学堂毕业。12月，被派往“扬武”兵轮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4年6月，中法战争爆发。8月23日，法国海军在马尾向福建水师发动袭击，中国军舰十一艘、商船十九艘在半小时内均被击毁。詹天佑在“扬武”兵轮上，和他的战友们奋不顾身与敌作战，表现了无比的沉着与英勇。詹天佑嗣即调任福州船政局后学堂教习，教授英文和驾驶等课程。不久，两广总督张之洞调他去广州，任博学馆洋文教习，并兼任测绘海图的工作。在一年内，他用西洋测绘方法绘成了一幅中国沿海形势图。后来，博学馆改为水陆师学堂，詹天佑在水陆师学堂继续任洋文教习。

1888年，詹天佑通过他的留美同学邝孙谋的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这才开始献身于中国的铁路事业。这时，帝国主义国家贪婪地掠夺我国的领土和主权，其中包括铁道的筑路权。中国铁路公司是在外国殖民者控制下的“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之一，公司里的外国工程师不把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放在眼里。詹天佑愤愤不平，他决心要用中国人

的技术力量来修建中国的铁路。他先是参加修建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当工程进展到滦河时，需要架一座横跨滦河的大铁桥。英、日、德三国的工程师打桩都失败了。詹天佑认真分析了外国工程师用过的各种打桩方法，仔细研究了滦河河床的地质土壤情况，经过缜密的测量与调查，决定改变桥桩的地点，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配合机器进行打桩，终于顺利地奠定了稳固的桥基，完成了滦河铁桥的全部工程。

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通知詹天佑，他被选为该会会员。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詹天佑多年努力修建的山海关外铁路工程被迫停工，他被调任萍(乡)醴(陵)铁路的工程师。一年后，又调回参加收回被美、俄两国侵占的关内外铁路的工作。詹天佑“胼手胝足，沐风栉雨”，“在事异常出力”^②。

1902年秋，詹天佑被派任新易铁路的总工程师。这是袁世凯献媚于西太后，为便利她去西陵祭祀而决定修建的。该线从高碑店至西陵，是京汉铁路支线，总长四十五公里，限于六个月内完工，不能贻误第二年春天祭陵的日期。这是中国工程师自修铁路的开端。詹天佑接受了这项工程任务后，经过周密计划，率领全体工程人员努力修建。他每天工作十五小时，有时通宵工作，结果提前两个月便全线完工通车，曾受到西太后和袁世凯的赏识。1905年，詹天佑被派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总办为官僚陈昭常。一年后陈调任吉林殖边督办，詹天佑升任总办。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首先致力于测线与选线的工作。为了寻找一条比较理想的线

路，詹天佑亲自背着标杆和经纬仪，在峭壁上精心测量，定点制图。他还时常骑着小毛驴四处访问老农，征求他们对线路的意见。他白天翻山越岭，晚上住在老乡家里，伏在油盏下绘图设计。他勉励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员，一定要认真对待选线工作，不能丝毫马虎。他们一共测了三条线，最后选定了通过关沟的这条线路。它比外国工程师所选路线在隧道工程上可减少二千多公尺。

詹天佑把全路工程分为三段。1906年1月6日，开始从丰台铺轨。事先有人认为京张铁路要通过关沟，以铺用窄轨为宜。詹天佑不同意，坚持使用1.435公尺的标准轨距。他说：中国真正统一要从铁路的轨距划一开始。在丰台铺轨的第一天，工程列车中两节车厢间的车钩链子突然折断，造成事故。这次事故提醒了詹天佑：不仅要有坚固的路基和标准的轨距，还要使列车的各车厢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特别是爬向高地或自高地下降，都必须十分安全。他引进和使用自动挂钩，使十几节车厢牢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这种自动挂钩有效地保证了行车安全，被人们称之为“詹天佑钩”。第一段工程不到一年就竣工通车了。

第二段工程是京张铁路中最艰巨的一段工程，其中主要是居庸关和八达岭两个隧道的工程。詹天佑根据两个隧道不同的地层结构和长度，决定对较短的居庸关隧道，采用两端对凿的方法，对长达一千零九十一公尺的八达岭隧道，除两端对凿以外，在中间开一竖井，向两头开凿，均获得成功。由于八达岭附近地势险、坡度大，詹天佑决定不采用通常的螺旋式的线路，而是从青龙桥起，依着山腰作“之”字形的线

路。列车到了这里，改用大马力机车从后面推列车前进；到“之”字的交叉点时，再加用一台机车在前面把列车往上拉。车厢原在前头的，换方向后就改在后尾，不用调拨，比较方便。同时，每节车厢之间都改用自动挂钩，十几节车厢连结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在大马力机车的牵引下，列车就可以顺利地爬上八达岭的岭巅。这是詹天佑在铁路工程上一个创造性的设计。

京张铁路在1909年7月4日完成全线铺轨工程，9月24日全线通车。10月2日，在南口举行盛大通车典礼，庆祝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的胜利通车。这条原来计划需要六年才能修成的铁路，四年就完工了，工程费用比预算节约了二十八万多两银子。京张路建成使詹天佑名噪中外。为表彰他的功绩，清政府授以工科进士衔。

京张铁路通车以后，詹天佑曾计划将京张路向西延展至绥远(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以沟通西北。可是库藏空虚，于是发行张绥铁路公债券，以募集路款。詹天佑把他自己连同他子女的积蓄，带头购买了张绥路公债券，渴望我国铁道事业能日益发展。

1909年秋，詹天佑去宜昌任商办四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之川路宜万工程总工程师，主持路线的勘定工作。1910年，詹天佑应商办广东省粤汉铁路总公司的聘请，就任粤路总理。这时，川、湘、鄂、粤等省发生保路运动，他对此是大力支持的。他到粤路后，几个月内，就将行车、购地、储料及筑路等事项逐一整理，有条不紊。辛亥革命期间，他努力使列车照常运行，保护铁路财产不受损失。1912年5月，他到汉

口就任粤汉铁路会办。

这时，孙中山已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他宣言要在十年内建筑十万公里大铁路，袁世凯虚伪表示“推诚接受”，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特任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詹天佑被任为该路会办。孙中山邀约詹天佑协助他制订修建十万公里大铁路的计划。不久，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亡命日本。1914年，詹天佑继任汉粤川铁路督办。

詹天佑在任汉粤川铁路督办期间，因用人权、财产权及经营管理权都受制于帝国主义银行团派来的外国工程师，但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在1918年9月16日建成了全线中的武(昌)长(沙)段并通了车。

1919年初，詹天佑以交通部技监与汉粤川铁路督办的身份，被北洋政府派往哈尔滨，任美、英、法、日等国组成的所谓监管西伯利亚铁路及中东铁路特别委员会技术部的中国代表，参加技术部会议。4月15日詹因病请假回汉口治疗，24日病逝。

詹天佑在1912年夏曾将年初成立的“中华工程师学会”、“中华铁路工同人共济会”与“中华工程师会”三个团体合并组成“中华工程师会”，设事务所于汉口。詹天佑被选为会长。1913年改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该会在团结全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该会刊行《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以交流技术经验，并出版了詹天佑所编《京张铁路工程纪要》、《京张铁路标准图》与《华英工学字汇》等书。1916年9月，詹天佑捐资在北京西单

报子街购买该会永久会所，该会遂从汉口迁至北京。

詹天佑逝世后，中华工程师学会为表彰他修建京张铁路的功绩，捐资在青龙桥车站建立詹天佑的铜像，以志纪念。

注：

- ① 王金职：《詹天佑生平事略》。
- ② 袁世凯、胡燏棻：《山海关内外铁路告竣援案请奖在事中外各员片》。

司徒乔

任嘉尧

司徒乔，小名乔兴，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生于广东省开平县赤坎塘边村。父亲司徒郁，曾在本县小揽地方开过小米店，由于英、法商人在广东倾销洋米以及本人不善经营，不几年功夫便倒歇。他回到乡下没事干，于是弄起画笔，学着给人画真容，画关羽、岳飞，因无法解决一家生计，后经堂兄介绍到广州美国教会办的岭南大学附小管杂务，办伙食。当时每个校工可享有一个孩子免费入学的优待，他便把司徒乔从乡间鸣鹤小学转到岭南附小上学。在各门功课中，司徒乔最喜欢图画课。学校每年的图画奖，都是他领走的。

司徒乔在岭南附中读书时，同洗衣妇冼大娘的儿子冼星海最要好。他们虽然不同班级，但都爱好艺术：一个绘画，一个拉小提琴、唱歌。两人十分契合。在一位油画老师和广州赤社美展、全省美展的启发下，司徒乔一边揣摩，一边练习，经过两三年实践，终于画出了《搁浅》和《海》两幅早期的油画。后者曾在国内多次展出，还参加了1929年的巴黎沙龙画展。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对当时的青年影响巨大。岭南许多学生纷纷北上转学，冼星海转到上海音乐学院。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司徒乔也于1924年到北京入燕京大学神学院，靠

免费继续上学。他赞同蔡元培的“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不愿听《圣经》上那套说教。他热爱绘画，课余时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等等，试图画出人民的辛酸疾苦和街头的悲剧。他还给未名社和《莽原》半月刊画封面、插图。1926年6月，司徒乔把七十多幅习作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水榭举办画展。鲁迅曾选购了《五个警察和一个0》、《馒头店门前》两幅画，对初出茅庐的司徒乔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司徒乔大学毕业了。他决心不当牧师，而要用画笔来参加变革人民生活、挽救祖国命运的斗争。他毅然拿起画笔，背着简陋的行李，搬进北京西城的贫民窟，去与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接触，走上了荆棘丛生的创作道路。

1926年12月初，他用十天时间画成了十幅画，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万国美术展览会的展出。俄国女画家罗尔斯卡娅认为“司徒乔年轻，很有希望”，并指出作家画家必须到工厂去，到贫民窟去，到人力车夫的家去，在那里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真正有生命的作品”。司徒乔的《被压迫者》在英文《晨报》星期画报上被称誉为“全场五幅最好的人像之一”^①。

北伐战争爆发后，1927年2月司徒乔来到扬子江畔的武汉，在苏联顾问鲍罗廷办公室工作，用画笔进行政治宣传，鼓动人们战斗。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不久武汉白色恐怖也开始了。他化装逃往上海。

在上海，他好不容易在虹口租到一座三角形小屋，取名为“乔小画室”，又开始了创作生涯。1928年春天，挑出了七十多幅作品，举行了“乔小画室春季展览会”，引起了文化界

的注意，鲁迅特地为他的展览会目录写了序言^②，徐悲鸿撰文赞扬说：“司徒先生对色调之感觉，为当代最敏之人，又有灵动之笔，供其纵横驰骋。”^③随后，万国美术会在上海给他开了个展览会，会上出售展品获得了几百元收入，使司徒乔筹得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川资。行前，还在上海、香港举行了画展。

1928年年底，司徒乔怀着兴奋的心情到达巴黎，向写实派大师比鲁求教，在名师指点下严格锻炼。但好景不长，仅仅半年时间，他无法偿付高昂的学费，被迫辍学了。即使靠画稿所得的一些稿酬，也只能断断续续地上学。巴黎的艺术宝库鲁佛尔宫藏有欧洲各国的名画佳作，司徒乔常带着几块黑面包，整天在绘画大师的作品前留连，用达·芬奇、伦勃朗、米勒、杜米埃、莫奈们的心血来灌注自己的艺术生命。有时，还通过朋友的介绍，探访有成就的画家、雕塑家、收藏家，来丰富艺术修养，增长社会知识。

也就在这个时期，司徒乔遇上了爱好文学的冯伊湄。冯是复旦大学毕业生，正在法国留学。由于艺术创作上有着共同的语言，两人友情弥笃。1930年初，冯的父亲经营的赣省矿业被军阀方本仁掠夺而破产，不久身故，冯接济断绝，不得不辍学东返。而司徒乔靠朋友的帮助，要到美国去观摩学习。两人只得暂时别离。

司徒乔到了纽约后，靠着替饭馆装饰壁画的菲薄收入维持生计。他把五十七号街画廊陈列的名画当作课堂，把书店里的名画复制品和画家传记视为自己的老师。

就在1930年，戏剧家梅兰芳访问纽约，他卓越的京剧艺

术风靡了美国。罗马尼亚著名的肖像画家斯托恩内斯库渴望为梅画一幅戏装画像。司徒乔促成了这事，从而第一次亲眼目睹一幅杰出的油画是怎样绘成的。正好印度诗人泰戈尔来美讲学，司徒乔用最新的心得，以大刀阔斧的笔触画出了这位诗哲丰采粲然、神思清澈的半身像。

正在他半工半读学习和创作逐渐登堂入室的时候，警察以留学生画画赚钱、触犯移民法的罪名予以拘禁，他在监禁中终于病倒。监禁期满又花了一笔罚款，才被释放，但限令在两星期内离境。

1931年5月，他横渡太平洋，回到广州。这时，岭南大学开了美术课，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奇峰教国画，司徒乔教西洋画。冯伊湄在中山大学教书。他和冯在8月间结婚。冯业余爱好国画；司徒边练习油画，也边学国画和书法，试图画出中国气派的油画，把中国画简练有力的线条化入素描和速写中去。埋头苦练了一年，他在青年会开了个画展。富有“东方精神”的油画《夜未央》（画的是在茫茫的黑夜里，珠江上一个老船夫划着小艇送客过江的情景），更博得舆论的好评。

不久，岭南大学美术课停开，司徒乔又染上肺结核病。1932年，邹鲁当中山大学校长，一下撤换二百多人，冯伊湄在被撤之列；司徒乔的父亲又失了业。这时司徒乔的长女刚出世，六个弟妹都在念书，因此生活十分窘困。

1933年，日军强占热河，进犯察哈尔。广东人民组织了粤东各界慰劳团北上慰问抗日同盟军，司徒乔不顾疾病，随团到了张家口，为冯玉祥将军画速写油画像，表达了支援

打日本的心意。为了描绘抗日战士的不朽业迹，他四处奔走搜集题材，后来病倒在一家小客店里，被送到北平治疗。

1934年春，冯伊湄在西山疗养院找到了司徒乔。冯这时在民国大学教古典文学，光靠薪金是不够维持生活的，家里断炊是常事。恰好《大公报》要办《艺术》周刊，司徒乔把这工作接下来，每月有编辑费六十元。北海、什刹海、天桥，到处有入画的题材，可是限于经济，他那时画的都是竹笔速写和素描。

华北局势日益紧张。司徒乔一家于1935年12月初移居上海。《大公报》接着出上海版，但《艺术》周刊只继续办了几个月便夭折了。他再度失业。这时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了。他急忙赶到万国殡仪馆，含泪画下了鲁迅的遗容，一共画了三张，最后一张背面写上：“鲁迅先生盖棺前五分钟司徒乔作”。不久，七君子^④下狱，司徒乔痛心人民没有爱国的自由。

正当就业无着的时候，司徒乔被介绍到南京中山陵园去画孙中山像。为了把孙中山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体现到画面上，他八易其稿，经半年多的呕心沥血，终于完成。这幅画曾被誉为“惊人的肖像画”^⑤，陵园管理处只送润笔费二百元，他对此并不介意。由于积劳过度，他重又病倒。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15日，日机突袭南京。司徒乔十二年的创作，连同书籍日记文稿，都化为灰烬。他一家乘轮船到了武汉，又遇见冼星海。不久，冼星海去延安，他因病打算返家乡疗养。到了广州，冯接到仰光福建华侨女子师范学校的聘书，便举家于1938年1月到达

缅甸。司徒乔的病体有了转机，三个月后，他便画出《泼水节》、《缅甸古琴图》、《街头夜宵》、《莱雅湖上的清洁工人》等作品。后来因为司徒乔夫妇给陕北公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募捐，把钱汇给香港廖承志（岭南大学时的同学）转去，触怒了当地的国民党分子，被扣上一顶红帽子，使他俩不能在仰光立足，于1939年4月流离到槟榔屿，同年末到达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乔一家历尽艰难，于1942年2月到达重庆。

在重庆，他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了，生活也无着落，在贫困和疾苦折磨下，他花了十个月功夫，画成了高达一丈七尺的大壁画《尚未瞑目》，后改名为《国殇图》^⑥。过了一年，他参加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西北视察组前往新疆，画了二百八十多幅作品，其中有《生命的奔腾》、《珠勒多斯草原》、《新疆集体舞》等，于1945年9月举行画展时，轰动了山城。

抗战胜利后，司徒乔谢绝了为司法院院长居正作画的邀约，却应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之聘，到遭受天灾、战祸严重的粤、桂、湘、鄂、豫五省旅行创作。他倾注了真挚的感情，用有力的彩笔，写了地狱的一角，写了黄河的水，写了无名英雄，写了忠骨和义民，写了人间的互爱，写了神州的剩水残山，把受折磨的劳动人民苦难遭遇在画上再现。1946年6月、7月，灾情画展先后在南京、上海展出。《义民图》的长卷最吸引观众，人们不忍离开这些血泪交织的作品。郭沫若对司徒乔只以三个月的努力画出这许多画面，深深“佩服了他的献身精神”^⑦。司徒乔如此热爱生活，热爱事业，可是肺病加剧了，不得不于这年8月离开上海，去美国治病。在洛杉

矾遇见医生贺达（去灾区作画途中的旅伴），承他热忱款待和细心料理，病情有些起色。然后，去纽约一所肺病疗养院诊治，那时链霉素刚问世，医药费昂贵，幸有美国友好人士马莉·璧珈和她的弟弟以及侨胞们的支援，加以冯伊湄的辛勤照料，经过五个月的治疗，他肺上百孔千疮的病灶大都结了疤。其后，又相继在两所免费医院疗养。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了。司徒乔兴奋欢腾。1950年8月28日，他一家从三藩市启程返国，同行的还有物理学家钱学森、赵忠尧等。10月底到达北京，结束了长期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

这是司徒乔第三次来到北京城。他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又立即描绘《毛主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新作了。1952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有七十八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他打算采用中国画法以简练明快的线条来纪录时代的脉搏，画一幅有一百二十五位代表形象的巨幅史画（可惜这幅史画到他生命最后一息只完成了初稿）。在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他为农民诗人王老九、《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等人画像。他还创作了《鲁迅与闰土》等插图。1956年10月，去上海庆祝国庆，用画笔记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图景。1957年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他画了《秋园红柿图》，这是他最后一幅创作。

1958年2月16日，司徒乔病逝于北京，终年五十五岁。正如他的老友廖承志所说：“司徒乔把整个生涯贡献给了祖国的劳动人民，司徒乔的一生是为苦难祖国和人民服务的一生。”

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民族敌人的刻骨的仇恨，他的节操，他的淡泊，他的无欲，都可为我们的师鉴。”^⑧

注：

- ① 冯伊湄：《未完成的画》，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3 页。
- ② 鲁迅：《看司徒乔君的画》。见《三闲集》。
- ③ 《良友画报》第 26 期。
- ④ 1936 年 5 月，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红军议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蒋介石政府坚持卖国内战政策，于 11 月悍然逮捕了上述七位爱国人士，时称“七君子事件”。
- ⑤ 引自一位德国人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文章中的话。
- ⑥ 这幅画的构思是：在雄巍的山头上，就山形凿成一个抗日阵亡将士横卧的石刻。他脚边有长明的火焰，他身后出现抗日阵亡将士们的英灵，他们都睁着眼睛好象在问：我们舍命保卫祖国，你们为祖国干了些什么？在重庆展出时，国民党的军委政治部却不许用《尚未瞑目》作画题，司徒乔只好改题为《国殇图》。
- ⑦ 郭沫若：《从灾难中象巨人一样崛起》。《清明》杂志第 4 号。
- ⑧ 廖承志：《〈未完成的画〉序》。《未完成的画》，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黄 宾 虹

周 衍 发

黄宾虹，名质，字朴存，1865年1月27日（清同治四年正月初一）生于浙江金华。原籍安徽歙县潭渡村。因潭渡村有滨虹亭，中年更字宾虹。父黄定华，字鞠如，虽是商人出身，但长于书法和绘画。

黄宾虹五岁时，父亲延师教他读书。老师赵经田是个秀才，会画山水和兰竹。他在父亲和老师影响下，从小喜欢绘画和篆刻。六岁时，临摹家藏的沈廷瑞（樗崖）山水册，后来又从画家倪逸甫学画和篆刻。十一岁时，他已能临刻邓石如印谱十多方。十二岁那年，黄宾虹随父去歙县应童子试，名列前茅。十四岁时，考取金华丽正、长山两书院。十九岁时为了写生，他游览了杭州西湖、金华北山、安徽黄山、九华山以及浙江的永康、缙云、诸暨等名胜地。为了画夜景，他曾借月光苦习。

1886年，黄宾虹补廪贡生。同年去扬州，在两淮盐运使署任录事。盐运使程桓生的儿子程夔也喜欢书画，与黄意趣相投，经常共同习画，或去字画收藏家那里观摩。在这期间，他从画家郑珊学山水，也从陈若木学画花鸟。郑珊所画山水，笔意苍厚，善用积墨，颇得龚半千遗意。黄宾虹的画深受郑的熏染。

黄宾虹在两淮盐运使署任职数年，以后他辞职回到家乡。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严重，维新派要求变法图强，黄宾虹深表同情。他的友人萧辰，与康有为、梁启超有交往，黄宾虹常与萧辰谈论维新派的活动，并研读康的著作。1895年，康有为在京师发动“公车上书”，要求变法，黄宾虹致函康、梁表示支持，并申述个人见地。同年夏天，谭嗣同到上海，黄宾虹得友人介绍与谭订立文字交。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黄宾虹获悉谭嗣同被西太后杀害，悲痛不已。为了悼念他，曾写了一首挽诗，有“千年蒿里颂，不愧道中人”句，表露了他对谭嗣同死难精神的赞佩。

1899年春，黄宾虹被人以维新派嫌疑控告，因事先闻讯，仓促出走，辗转到河南开封避居。到了冬天，又潜回歙县。翌年北上，途中闻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只得在南京住了一段，后郁郁而归，隐迹山村，与里人郑搢书等筹办董理歙东的庆丰场，以利农耕。

1906年，许承尧在歙县创办新安中学堂，黄宾虹应聘任国文教员。他同陈去病、许承尧、江炜、汪律本等，为纪念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黄宗羲，组织了“黄社”。“黄社”表面上以议论诗文为名，实际包含了反对清朝统治的用意。1907年，他为同盟会筹款，再度被告密，遭清政府通缉，在朋友帮助下，化装逃到上海躲避。

旧中国的上海，情况复杂，黄宾虹富有爱国心，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昏聩腐败非常不满，总想有所表现。1907年至1911年间，他曾协助邓实、黄节诸人编辑《政艺通报》、《国粹学报》及《国粹丛书》等。这些书刊都具有一定的

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在此期间他和章太炎、刘师培等常有接触，进一步受到新思想的影响。

黄宾虹年过四十以后，致力于学习我国传统画法。他大量临摹古人名作，一笔不苟，极似原作；或只取其意，得其大略，因而在技法上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这期间画的山水屏条皴法疏简，笔墨秀逸，深受新安画派的影响。1909年“南社”成立，他同陈去病赴苏州出席盛会。他还常去著名画家吴昌硕主持的“海上题襟馆”叙谈。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商团响应起义，攻下沪南高昌庙江南制造局，黄宾虹兴奋不已，手制大白旗高悬，以示庆祝。他对帝国主义分子在我国云南、龙门、敦煌等地盗窃文物，破坏古代文化艺术，非常愤慨，曾作漫画，投寄高奇峰、高剑父主办的《真相画报》。

1915年，黄宾虹在《上海时报》工作。当时，袁世凯图谋称帝，筹安会成员谢连荪来诱说他北上共事，并以厚利相许，黄宾虹毅然拒绝，并对朋友说：“助纣为虐，不是君子所为”。

民国以后黄宾虹长期居留上海，他除了从事绘画和篆刻工作外，还在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上海时报社等单位任编纂撰述工作前后达十三、四年之久。他参加过编印《神州国光集》、《神州大观》、《历代名画家书画集》、《中国名画集》等画册；曾主编《艺观》双月刊，又兼《国画月刊》的编辑；还编纂了《美术丛书》和《金石书画编》。撰写的有《古画微》、《滨虹麈尾》、《匋钵合证》、《黄山画家源流考》、《画史编年表》、《虹庐画谈》等，以及《中国山水画今昔之变迁》、《滨虹论画》、《鉴古名画论》、《画法要旨》、《龙凤印

谈》、《画学篇》等著作。1926年，他发起过组织“金石书画艺术学会”，积极推动艺术的交流活动。他还先后任暨南大学中国画研究会导师和昌明艺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30年中国艺术专科学校成立时任校长，又任上海美专教授。

在五十岁以后，黄宾虹所绘山水画幅，显示出他的独特风貌。他对祖国山川，观察仔细，冷静思考，身到心至，因而泼墨作画，立意奇，丘壑多。他在表现上，能陶熔宋、元人的画法，或作干皴湿染，或用浓重积墨，行笔谨严而又纵逸奇峭，无不如意。《桂林山水册》、《北碚纪游》、《秋云堆里出重岗》、《霜容点碧岚》等皆是他的著名作品。

1937年5月，黄宾虹全家自上海迁居北平，在北平艺专教授中国文学和美术史。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黄宾虹欲南归，未成。为此，他杜门谢客，惟于故纸堆中与蠹鱼争生活。1940年，北平伪文物研究会推举他为美术馆馆长，他坚辞不就。1941年，他写信给在福建的一个学生，勉励他为人要有骨气，不能消极，“风雨摧残，繁英秀萼亦不因之消歇”。八十岁时，侵华日人别有用心地想为他举行“庆寿会”，寿堂已设，他仍拒绝与会。

抗战胜利，他非常兴奋，致函诸友，说自己“无异脱阶下之囚”。1946年，他继续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48年秋，他应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之聘南下讲学。徐悲鸿在他画的一块巨石上添画一只展翅雄鹰，送他留念。

黄宾虹晚年的山水画更加浑厚自然，臻于妙境。“取古人之长皆为己有，而自存面貌之真不与人同”。“黑、密、厚、

重”的特色十分显著。高燮评其山水说：“图写自然，千笔万笔无一笔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宾虹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曾出席浙江省人民代表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1955年黄宾虹九十寿辰时，获华东行政委员会颁发之荣誉奖，被称为“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同年3月25日，黄宾虹因胃癌逝世。生前所藏书籍、字画、金石、拓本以及自作书画、手稿等一万零一百余件，遗嘱全部捐献给国家。人民政府在西湖栖霞岭他的故居，建有“画家黄宾虹纪念室”。

注：

引文均见王伯敏著：《黄宾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黄宾虹：《八十自叙》。
- ② 王伯敏：《黄宾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
- ③ 《黄宾虹画语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
- ④ 张宗祥：《我对黄宾虹先生的看法》。《东海》月刊1962年第10期。

丰子恺

林 印

丰子恺原名丰润，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家，1898年11月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生。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县石门镇）人。他的父亲丰镛是清代末科举人，后因废科举在家设塾授徒。丰子恺六岁跟父亲诵读《千家诗》、《三字经》。九岁时，他父亲病故，由他母亲钟氏抚育成人。

丰自幼对绘画有兴趣，十岁影描芥子园画谱人像。1914年丰十七岁小学毕业。同年秋，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丰在校图画成绩优异，受到美术教师李叔同的赞赏。李是著名的艺术家，丰决心追随李叔同学艺，终生从事艺术事业。丰又在业余时间向李叔同学习日文。

第一师范的语文教师是著名文学家夏丏尊。由于夏的指导和鼓励，丰开始学习写作，培养了日后写作散文的兴趣。

1919年丰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因家境贫困，未能继续升学。同年秋，他和同学刘质平、吴梦非一起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该校美术教师。

1921年春，丰得到亲友的资助去日本游学。起初他在东京学习西洋画和提琴，同时补习英文和日文。后来曾到横滨等地去参观画展。他在日本只学习了十个月即因经济困难不

得已回国，复任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教师。

1922年夏，丰应夏丏尊邀请去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同时在宁波第四中学兼课。丰在春晖中学执教两年多期间内，开始尝试用毛笔和宣纸作画；所作画或借用古诗词的意境，或反映儿童生活。他的画风受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影响，也受中国画家陈师曾的启发。丰在《太平洋画报》上看到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作品，感到寥寥数笔，余趣无穷，为之心折。

丰的画稿，融会各家之长，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同在春晖中学任教的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等对丰的画都非常赞赏。1924年丰在朱自清和俞平伯合办的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1924年春晖中学同人与校长经亨颐意见不合，集体辞职。丰和其他教师一起带了一部分学生到上海创办立达中学（后称立达学园），主张用“爱的教育”教育学生。1925年秋，丰的《子恺漫画》在郑振铎编辑的《文学周报》上发表。1926年1月，开明书店将《子恺漫画》出版，朱自清曾为它作序。序中写道：丰的一幅幅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我们就象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①

丰观察儿童生活细致入微，如他画的《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瞻瞻的脚踏车》等，使观众久久难忘。丰作的某些社会现象漫画，寓意也很深刻。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母亲由于无力喂养自己初生的婴儿，不得不把他舍送到育婴堂去，路旁的母狗反而能哺育自己的小狗，于是画出《最后的吻》。

丰说他自己的漫画创作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描写古诗

词时代；第二是描写儿童相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但又交互错综，不能判然划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②

丰既作漫画，又写随笔。他写的若干篇短小的散文，集结为《缘缘堂随笔》印行。

丰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丰的画和散文有不少是反映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说明他有“为人生而艺术”的一面；但也有一部分反映了他出世的佛家思想。他所尊重的老师李叔同于1918年在杭州虎跑大慈寺出家，法名弘一。这件事对年青的丰子恺思想影响极深。十年以后，丰子恺三十岁生日那天，他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宿舍竟然出人意料地举行仪式，宣称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并取法名婴行。1928年为祝弘一法师五十寿，丰绘成“护生画”五十幅出版，由弘一法师题字。以后每隔几年出版一集《护生画集》，直至第六集。1931年他又由弘一法师介绍，为厦门南普陀寺广洽法师绘释迦牟尼佛像。

自1925年至1929年，丰在立达学园负责美术教学。这个期间，还先后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上海艺术大学、澄衷中学及淞江女子中学兼课。

1929年丰担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1930年他和夏丏尊、章锡琛等合作编辑《中学生》杂志。自1933年开始，他长住故乡石门湾“缘缘堂”，专门从事绘画和译著。他时常往来于上海、杭州、石门湾之间，直到抗战初期。在这五年左右的时间，他出版了许多漫画集和译著，如《子恺漫画选》、《儿童生活漫画》以及散文集《缘缘堂再笔》、《车厢社会》等。另

外，他还写作和翻译了一些美术理论和音乐方面的书籍。他的艺术理论著作深入浅出，很受读者欢迎。

1936年10月，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丰子恺也参加了文艺界团结御侮的活动，在鲁迅、巴金等拟定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了名。

1937年11月6日，丰正在“缘缘堂”作画，石门湾突遭日机空袭，当晚他携全家老小十人在潇潇暮雨中与“缘缘堂”匆匆告别，走上流亡的旅途。途中几经波折，全家于1938年到达桂林，遂在桂林师范任教。1938年底，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约，往广西宜山浙大讲学。1940年南宁失守，他又随浙大迁往贵州遵义。1941年秋，在浙大升任副教授。丰在遵义时应开明书店要求，重绘在抗战期间散失的漫画，共四百二十四幅，分编成六册：一、古诗新画；二、儿童相；三、学生相；四、民间相；五、都市相；六、战时相。总名《子恺漫画全集》，于1945年出版。1940年，他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译成日文，在日本创元社出版。

1941年11月，丰带领全家去重庆，就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职，兼任教务主任。1942年暑假后，他辞去艺专职，在重庆沙坪坝自建“沙坪小屋”，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抗战后期，他曾到泸县、自流井、乐山、长寿、涪陵、南充、内江等地旅行，并开画展。1946年7月3日他率全家离开重庆，取道成都越秦岭，于9月25日抵达上海。由于他的“缘缘堂”旧居早已在沦陷期间被毁，全家迁居杭州西子湖畔。1948年9月，他和开明书店的章锡琛结伴同游台湾阿里山、

日月潭，11月回到厦门短住。1949年3月，丰闻解放军即将南下，于4月令家属先回上海，他自己则因事绕道香港，再由香港飞回上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丰作了《百年难逢开口笑》的画幅，以志庆祝。1950年出版了他所作的《绘画鲁迅小说》四册。他从事翻译，译了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

1952年丰被聘为上海文史馆委员。1954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56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8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就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1962年被选为上海文艺界联合会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间丰虽受到干扰与冲击，但他仍坚持作画和翻译工作。1975年9月15日丰患肺癌去世，终年七十七岁。

注：

- ① 朱自清：《子恺漫画》序。开明书店1926年版。
- ② 丰子恺：《我的漫画》。《缘缘堂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丰子恺漫画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
- ② 《缘缘堂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 ③ 陈古海、葛子厚：《丰子恺传》。《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十辑。
- ④ 《丰子恺传》，潘文彦、胡治均、丰陈宝、丰宛音、丰元草、丰一吟合写。《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二、三期。
- ⑤ 丰华瞻：《丰子恺传略》。《晋阳学刊》1982年第四期。

潘天寿

刘江

潘天寿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在有的作品上或自署“阿寿”。1897年3月1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出生于浙江宁海县北乡冠庄村。父潘秉璋是个秀才。他童年随父启蒙识字，七岁入塾。课外喜画画、写字，热心于临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的绣像插图；村里祠庙墙壁门窗上的彩绘人物、山水、鸟兽等，也是他摹仿的“范本”。假日或课余常帮助家中放牛、砍柴、车水、耘田。冠庄村西有群山，最高者为雷婆头峰，是他常去樵牧的地方，故晚年画上署别号“雷婆头峰寿者”。

潘天寿十四岁时去宁海县城小学读书。课外临习各家碑帖。后从市贾处购得《芥子园画谱》，如获至宝，有空就按图临绘，习作常为同学及亲友所喜爱。

1915年秋，潘天寿高小毕业，步行到达杭州，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他在一师接触到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分子，如教育家经亨颐、文学家夏丏尊和李叔同等，对于他们的才学和品德，极为敬佩。“五四”时，一师师生举行罢课、游行，潘也曾参加了活动。后来官方镇压爱国运动，校长经亨颐被免职。潘天寿目睹现状，思想彷徨，觉得青年人应当力挽狂澜，但自己“无干事之才，只有画画还能胜任”，

因此决心以国画为振兴民族精神的工具。在校几年，他向长于西画的李叔同学习素描，向经亨颐请教书法篆刻，使自己在诗、书、画、印诸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并积极参加学校里研究书法篆刻的“乐石社”和“寄社”，闲暇时常去裱画店观赏古今名家字画作品，假日常为同学书写楹联、绘画中堂等。因此在一师五年，他对书画的笔墨技法、气韵品格诸项，都有了相当的体会和理解。

1920年潘天寿于一师毕业后，先后在宁海、孝丰等地农村小学教书。他在乡村大自然环境中，留心观察各种强劲有力的动植物，以及富有野趣的画材，耳濡目染，铭记于心，晚间则尽兴挥毫，以雄阔气魄试画松、鹭、竹、梅，常至深夜。从这些早期作品中，已开始显露出他独特的气势与审美情趣。

1923年，潘天寿经师友介绍，来到上海，任教于民国女子工校。他一面执教，一面更加广收博采，对青藤、白阳、石涛、八大山人、石谿诸家，悉心研究，朝夕临摹，艺事日益精进。他在创作中，受当时名家吴昌硕、黄宾虹等人的影响。当时吴昌硕已年近八十，有一次看了他带去的几件作品，对他的才气十分重视，殷切勉励，曾写了一付篆联送他：“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吴又作了一首长古《读潘阿寿山水障子》相赠，称他“久久气与木石斗，无挂碍处生阿寿，寿何状兮颀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①。以后潘天寿与吴昌硕过从甚密，请益甚多，并常观摹吴作画，深得其气势与神韵。

同年秋，潘天寿受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之聘，

为国画系讲授中国画与中国绘画史等课程，著有《中国绘画史》于1926年出版。1928年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成立，院长林风眠聘潘为国画主任教授，潘遂定居杭州；同时仍在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等校兼课，每周来往于沪杭之间。1929年赴日本考察艺术教育。1932年他与诸闻韵、张振铎、吴萑之、张书旗等在上海组织了“白社”国画研究会，主张以扬州画派石涛等人的革新精神发展民族绘画，举办展览，并出版《白社画集》。“九一八”后，外敌入侵，国内新军阀又混战不休，潘天寿原先设想的以美育来振兴民族精神，收效极微，思想甚为苦闷，一度曾寄托于道佛禅理以求解脱。这种情绪也反映在他这时期的作品中。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上海相继沦陷，潘天寿随杭州艺专西迁，辗转于浙、赣、湘、黔、滇、川诸省，其间曾短期在东南联大、英士大学艺术系任教。在湖南沅陵时，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改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潘天寿任国画系主任、教授等职。

1944年秋，潘天寿在重庆被任命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立即着手复校杭州的准备工作，于次年夏迁回杭州。这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通货膨胀，人民怨声载道，爱国学生多次游行示威。身为艺专校长的潘天寿，对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深为不满，但又无力满足学生的正义要求，加以某些人争权夺利，终于在1947年秋被迫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国画系主任。

潘天寿在国画艺术和教育上，一贯主张可用国画“振兴民族精神”。他认为国画教学不仅是为了传授技巧知识，“民

族绘画的发展，对培养民族独立、民族自尊的高尚观念，是**有着重要意义的**”^②。因此他启导学生要有忧国忧民的思想，要求画家注意人品的修养，常说“品格不高，落墨无法”^③。他主张在学习时间的分配上，“可三分读书，一分写字，五分画画，一分其他（包括社会活动、体育锻炼、文化生活等）”^④。在专业教学实施上，他认为应分科教学，因为“人物、山水、花鸟等科各有其特点与要求”，“写生要活写，不要死写”。他还主张既要继承一切优秀传统，又要推陈出新。他说：“凡事有常必有变。常，承也；变，革也。承易而革难。然常从非常来，变从有常起”^⑤，“体现民族风格不等于同古人一样，有继承还要有发展”^⑥，画家“要有时代性”，“要有自己的个性、风格、特点”。^⑦

潘天寿的作品，确实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他取材平凡，立意深邃，章法奇特，结构严谨，表现出一种坚韧、憨厚、挺拔、浑朴的风格。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潘天寿感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振兴民族精神的愿望得以实现，无限欣喜。他多次下乡下厂并参加上改，画了《踊缴爱国粮》、《文艺工作者下乡》、《和平鸽图》等作品。1957年他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1958年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分会主席。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等。1963年他任“中国书法家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

“文化大革命”中，潘天寿受到冲击，1971年9月5日在杭州去世。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中共浙江省委为潘天寿平反昭雪。1979年在杭州建立了“画家潘天寿纪念馆”。

潘天寿除著有《中国绘画史》外,还撰写有《听天阁画谈随笔》、《中国书法史》、《治印丛谈》、《顾恺之》等著作,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成《潘天寿美术文集》出版。

注:

- ① 吴东迈:《吴昌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15页。
- ② 潘天寿:《谈谈祖国目前的国画情况》(1959年)。《潘天寿美术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版。
- ③ 潘天寿:《听天阁画谈随笔》第21页。
- ④ 潘天寿:《在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学工作会上的讲话》。同②。
潘天寿:《在泰安讲学记录》。记录稿。
- ⑤ 同③第8页。
- ⑥ 潘天寿:《谈谈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同②。
- ⑦ 潘天寿:《对浙江美院附中讲话》。记录稿。

江 加 走

周海宇

江加走，字长清，福建省泉州花园头村人，生于1871年11月12日（清同治十年九月三十日）。父亲江金榜，是个民间木偶神像、木偶头雕刻、粉彩作业师。江加走与哥哥江凹司（字雨水）幼时都读过几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在家，边种田，边学艺。

江加走随父学艺，学做木偶头坯的雕刻，哥哥江凹司做木偶头的粉彩。兄弟俩孜孜不倦，技艺上不断精进，是他父亲的得力助手。1888年江加走十八岁时父亲病逝，他与哥哥共同挑起生活的担子。他分析当地的行市，向他哥哥说：“当今木偶头雕刻、粉彩业务繁荣，泉州涂门街周冕号黄家是名牌，产品常供不应求，所以买主跑到乡下来求购，只要我们兄弟俩同心协力，精研技术，信守交货时间，生意就会逐渐争取过来。”其兄深以为然。从此，兄弟俩经常切磋各种木偶头像传统造型的优缺点，在制作中不断地改进；至于交付订货的时间，更是钟点不误，赢得了木偶戏师傅的信任，业务逐渐兴旺起来。

由于他哥哥结婚时所欠债务一直没有还清，父亲去世时又添了不少债，江加走到三十二岁才独立成家。兄弟虽然分了家，可是在木偶头像的制作上，还是分工合作。1920年

其兄去世后，江加走把木偶头像的粉彩工作也担当起来。为了保证绘画的质量，他日夜伏案练习，以自己的作品反复对照其兄的遗作，又常到涂门街周冕号向老师傅学习，观摩他们的作品，技术上越加提高。

1920年春末夏初，有一位掌中木偶戏老师傅要试演《封神演义》，需要很多表现神话小说人物的头像，来和江加走商量制作，并为江指出泉州地方大寺庙的菩萨都是古代雕塑家的名作，很值得学习借鉴。江加走承应了这项富有独创性的制作，向那老师傅提出了两个要求：一、将《封神演义》的那些人物形象、性格逐一列出表来；二、经常来共同研究这些木偶头的造型和色彩。这时江加走虽已年近五十，但他身体健壮，精力旺盛，经验又丰富，跑遍了泉州的大寺庙，琢磨着木偶戏师傅送来的人物表进行构思，决心要将这套木偶头像制作得既有传统风格，又具有木偶头可以夸张的特点。他先从《封神演义》上的主角纣王入手。根据纣王沉溺酒色，荒淫无道，杀人不眨眼，宠信妲己，设“酒池肉林”这些特点，他把纣王的头刻得胖胖的，眼睛能够左顾右盼，一副奸气吓人的面孔。为了突出纣王的嗜杀，江加走运用了闽南民间的一句话：“眉中一撮毛，杀人不用刀”，在这个木偶头像的两眉中间，画些疏疏的眉中毛，并特加长了其中的一根。这个木偶头像创作出来，立刻博得木偶戏老师傅的赞许。三个月后，全部木偶头像完成，通过掌中木偶戏的演出，一时遐迩轰动。

江加走制作《封神演义》木偶头像的成功，使他声名大振。从此，掌中木偶戏师傅要演新戏，需要创作新的木偶头像，都来和他计议。那时涂门街周冕号的老艺人黄良司、黄才司

先后染疫亡故，江加走就承揽了泉州、漳州、厦门、福州和南洋各地的提线、掌中木偶头的雕刻和粉彩业务。江加走在继承他父亲和泉州老艺人的传统技术的基础上，汲取和借鉴其他戏剧和民间艺术的精华，细心加以提炼，因而能够不断塑造出各种富有独特性格和色彩的木偶头像。他把父亲教给他的五十多种头像发展到二百八十五种，其中二百五十种都有称谓；发式由一二种梳“平髻”的发展到十多种头髻、发辫；把不会动的木偶头像的下巴、两腮、眼睛都变得会动了，使没有灵魂的木偶头在木偶戏师傅手中变得活了。当时，泉州的行商把江加走制作的木偶头像带去台湾，受到了台湾木偶戏艺人的欢迎，以致后来引起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嫉忌，下令禁止入口。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来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侨汇中断，素在侨乡流行的木偶戏无人雇演，木偶头像没有销路，江加走的业务受到很大影响。而伪乡、保长以为江加走制作木偶头赚钱轻易，经常来抓丁、派款，敲榨勒索，使得江加走一度生意冷淡，生活困难。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侨汇开始恢复，略有人为酬神雇演木偶戏，但他制作木偶头像的业务仍不景气。

1949年9月1日泉州解放，江加走产生了新的希望。时已年近八十的江加走一有空闲便坐下来精心雕刻，并将他的卓越技艺传授给他的儿子江朝铨。1951年冬，泉州提线木偶戏艺人组织起来，成立泉州木偶实验剧团，准备春节演出，江加走为他们粉彩了全部旧木偶头。翌年夏，又为新成立的泉州木偶艺术剧团制作了《小二黑结婚》全部新头像。他把

“三仙姑”塑造得“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两片嘴巴笑咪咪，眼睛含有邪气。泉州木偶实验剧团同年11月到上海，与苏联木偶专家奥布拉兹卓夫进行艺术交流，1953年春又赴京演出，并拍摄《新潞安州》木偶剧影片。以后又到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参加国际木偶节演出。江加走木偶头像的成就遂名闻国内外。

1954年，江加走被中国美术家协会聘为会员，被华东美术家协会聘为理事，并被选为福建省文联委员、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同年10月11日，江加走因病逝世于泉州故居，终年八十四岁。

梅 兰 芳

林 印

梅兰芳，字畹华，我国卓越的京剧艺术家，被人誉为“四大名旦”之首。他原籍江苏泰州，1894年10月22日（清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生于北京一个梨园世家。他的祖父梅巧玲（1842——1881）是十九世纪著名的京剧演员，又是当时北京四大徽班之一“四喜班”的老板；父亲梅竹芬（1874——1896）也是一位优秀的京剧演员；伯父梅雨田是著名的琴师。梅兰芳三岁丧父，十五岁丧母，幼年家境困苦，依靠伯父梅雨田拉胡琴收入来维持生活。

梅兰芳八岁开始学艺，教师吴菱仙是时小福的弟子。吴与梅巧玲生前友好，追念故人，对梅兰芳另眼看待，教戏时特别认真。

梅兰芳初次登台是1904年8月17日（农历七月初七），这年他才十一岁。那天，斌庆班在北京广和楼贴演《天河配》，他在戏里串演昆曲《长生殿·鹊桥密誓》里的织女。过了三年，他正式搭班“喜连成”（后改名“富连成”，是叶春善手创的科班），一边学习一边登台演出，演技进步相当快。这时他除向吴菱仙学青衣戏之外，还向姑丈秦稚芬和伯母的弟弟胡二庚学唱花旦戏。他早期的武功是得之于替他操琴的茹莱卿的传授。后来他演的《木兰从军》、《霸王别姬》，都是茹莱卿帮

助排练的。

梅请教过的老前辈很多，如著名京剧教育家王瑶卿，演员路三宝，专教昆曲的乔惠兰、谢昆泉，精通武功的钱金福，著名青衣陈德霖，架子花脸李寿山等人对梅都有过较大影响。他肯于勤学苦练，因而在唱、做、念、打等功夫方面，在少年时代就打下了稳固的基础。成名之后，练功也从未间断。

梅兰芳在艺术上的进步与深入，除了名师指点与自己实践外，也很得力于看戏。他搭班“喜连成”的时候，每天总是不等开锣就到剧场，一直看到散戏才走。由此吸收了许多前辈艺术家宝贵的经验。

梅平时在演戏练功以外，业余爱好养鸽、养花和绘画。他幼年时眼睛微有近视，有时迎风流泪，眼珠转动不够灵活。从十七岁那年起，他开始养鸽，因为经常要观察鸽子在天空翱翔的姿态，有时要从鸽群中辨别属于自己的鸽子，由于天天这样做，不知不觉使眼睛变得灵活起来。这和他后来表演中的眉目传神有一定的关系。

梅向许多名师学画，并有自己的画室。他特别爱画仕女和佛像，他认为可以从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京剧艺术。

梅兰芳二十岁时，已经是一位驰名京沪的京剧演员了。在当时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戏剧演员的社会地位低下，经常遭到屈辱和打击，不少有才能的演员在艺术上也往往无法进行新的探索。然而梅兰芳却能突破各种困难，不断勇敢地攀登艺术高峰。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和著名京剧演员王凤卿一同去上海演出。演的是《彩楼配》、《玉堂春》、《武家

坡》，曾轰动了上海。但不久以后，他的剧目中开始出现了《穆柯寨》、《虹霓关》等不属于青衣的戏，打破了过去传统的青衣、花旦等角色分行的限制。

梅兰芳回到北京后，开始创作《孽海波澜》、《宦海潮》、《一缕麻》、《邓霞姑》等反对封建婚姻、揭露官场黑暗的时装新戏。他大胆的尝试，对京剧艺术的革新起了不小的作用。不久，梅兰芳又排演了一些古装新戏，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等剧目，刻划了那些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青年妇女的形象。这些是舞台上从未出现的古装新戏，取材于神话故事或文学名著，为观众所喜闻乐见。后来，梅兰芳又向前辈学习昆曲，演出昆曲剧目《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断桥》等。从1915年4月到1916年9月这十八个月当中，梅兰芳以他旺盛的精力，创演了十一出新戏。

随后，梅兰芳在继续创作新戏的同时，还整理和上演了许多著名的传统戏，如《宇宙锋》、《花木兰》、《思凡》、《拷红》等等。1921年他编演了《霸王别姬》。他演虞姬，细腻深刻。这出戏后来成为梅派保留剧目中比较优秀的一个。

1922年梅兰芳应邀赴香港演出。他的琴师茹莱卿因病不能同行，改由他的姨父徐兰沅接替操琴，王少卿任二胡伴奏。具有特色的梅派唱腔，就是梅兰芳和徐兰沅、王少卿共同研究创造的。京剧配乐中增加二胡，使演出伴奏的音色丰富起来，便是从这时期开始的。

“九一八”后，梅兰芳迁居上海。他创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用来表达他对敌人的恨和对祖国的爱。这时期他和现代戏剧家田汉、欧阳予倩时相往来，受到他们的戏剧理论

上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身在沦陷区，拒绝为敌伪演出，蓄须明志停演八年。他曾经因为停演而影响生计，卖掉了北平的住宅。抗日战争胜利后，梅兰芳再度出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久，梅兰芳应邀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51年3月，梅兰芳被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他组织了“梅剧团”到祖国各地为工农兵巡回演出。从1951年到1955年，共演出五百多场，观众超过一百万人。1953年梅兰芳曾亲自率领“梅剧团”到朝鲜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作慰问演出。从朝鲜回国后，又到广州去对人民解放军作慰问演出。1958年到福建前线为战士们演出。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梅兰芳以六十五岁的高龄排演了《穆桂英挂帅》。他以炉火纯青的演技，创造出一个爱国女英雄穆桂英的形象。

梅兰芳经过不断的斗争实践和学习，政治觉悟日益提高，195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梅兰芳在五十多年的舞台生活中，上演的传统剧目数以百计，创演的新戏共有三十余出。他继承了我国京剧悠久的优良传统，又进行了自己独立的艺术创造。在过去许多名旦角表演艺术的基础上，他不断加工，使他的唱、做、念、打结合成一体，表演技术达到了十分优美、动人的境界。他还带头取消了演员在台上饮茶等陋习，把原来出现在舞台上的乐队移到纱幕后面。从这些细节的改革中，也可看出他对待艺术的认真态度。

从1919年到1950年，梅兰芳曾率领剧团先后多次出国演出，把京剧艺术介绍给日本、美国、苏联等国的观众，赢得各国戏剧家的好评。他在1929年冬到1930年春访问美国演出时，荣获美国波莫纳大学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美国著名艺术家卓别林、范朋克、罗伯逊等都曾和梅兰芳结识，交流艺术心得，因而他也从外国艺术家那里吸收到某些营养来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

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七岁。

主要参考资料：

- 《梅兰芳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
- 《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 《梅兰芳戏剧散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 欧阳予倩：《一得余抄》。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程 砚 秋

林 印

程砚秋，原名艳秋，字玉霜，满族，1904年12月20日（清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四日）生于北京。他幼年丧父。六岁时，因家贫给京剧演员荣蝶仙立契为徒，学青衣，合同八年。学徒期间，程砚秋经常要为荣家做日常生活琐事，还挨打骂。十一岁开始登台演唱，十三岁倒嗓，声带音哑。这时荣蝶仙与上海戏院订立一个月的合同，要程去上海演出。先是，罗惇龢（字瘦公）曾看过程的演出，发现程很有培养前途；得知程在倒嗓期间将去上海演出，很着急，即向银行借七百元给荣蝶仙解除合同，让程提前出师。

程砚秋离开荣家后，十四岁到十六岁期间，由于罗的帮助，得到了扎实的基本功训练，为后来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基础。当时罗给程砚秋订下每日课程表：上午练声、练武功，下午学昆曲，夜间到王瑶卿家学京剧。每星期一、三、五罗还亲自陪程去看电影，让程学习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

京剧教育家王瑶卿教戏有个习惯，不到夜间十二点以后精神不来，王家客人又特别多，有时程砚秋接连几夜到王家去，也未必学到一点东西。但程砚秋仍然毕恭毕敬地等到天亮才回家。程砚秋这样兢兢业业，终于感动了王瑶卿，他看出程砚秋真心求学，从此每夜必教他一些东西。后来，罗又

介绍程砚秋拜梅兰芳为师。梅兰芳每次演出都为程砚秋留座，程砚秋从梅兰芳的演唱中也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

程砚秋十七岁那年，嗓音渐渐恢复，开始独立成班，成立鸣和剧社。他聘请罗为他编剧，由王瑶卿导演配唱腔。程砚秋倒嗓期过后，嗓音未能全变，也没有全倒，出现了一种立音，即所谓“脑后音”。王瑶卿启发和鼓励他利用自己“脑后音”的条件，创出一种独特的唱腔。程在传统的青衣唱腔基础上，吸收了各种地方戏以及外国音乐中优美的唱腔，融会贯通地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形成广大听众欢迎的“程腔”。他的唱腔，能深刻表达剧中那些在封建社会里被压迫妇女的思想感情，于幽咽婉转、曲折低徊之中蕴涵着一种刚劲清新的力量。这是“程腔”最可贵的特色。

程砚秋从幼年学艺受到的种种折磨，加上他生长的时代，对他的艺术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对黑暗势力深恶痛绝，对受压迫的妇女深为同情。罗根据程砚秋的艺术思想，创作出合乎程个性的剧目。他们共同创作排演了十个剧目，大部分是反映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所遭受的压迫和苦难。《鸳鸯冢》被誉为“伟大性爱的悲剧”。以除奸反霸为主题的《青霜剑》，后来成为程派重要剧目之一。

1925年秋，罗惇彘因病去世后，金仲荪为程砚秋创作剧本。程砚秋和金仲荪合作编写排演的《荒山泪》、《春闺梦》，表达了广大人民反对内战的愤激情绪和抵御外侮的迫切愿望，使程派京剧艺术达到新的高峰。《荒山泪》一剧，程砚秋通过女主角张慧珠发出正义的呼声：“我不如拚一死，向天乞请，愿国家从此永久和平。”反映了广大人民遭受战乱、掠夺、

流离失所的苦难和渴望和平的愿望。《春闺梦》则是把杜甫的《新婚别》、《兵车行》和陈陶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意境，再现于京剧舞台。

除了罗惇融和金仲荪以外，和程砚秋合作编写剧本的还有翁偶虹。《亡蜀鉴》和《锁麟囊》是程和翁偶虹合作创演的代表作。

1930年后，程砚秋接触了较多的进步人士，对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1931年12月25日，程砚秋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演讲中谈到自己的戏剧观时说：“一则从意义上认识戏剧的可演不可演，二则从观众的感情上认识戏剧的宜演不宜演，守着这两个原则去演剧，演剧才不会倒坏。”程派二十多个保留剧目中，大多数是具有对封建社会的反抗精神的。陈叔通曾说，程砚秋为人刚正，观其剧如观其人。

程砚秋不仅在剧目、唱腔方面有优异成就，在创造人物形象上如表情、动作、身段、特别是水袖工夫等方面，都达到精确完美、炉火纯青的境界。程砚秋喜好太极拳，经过长时间的艺术实践，他把太极拳的进退转运运用在舞台动作上，使他的表演动作更加优美。

1932年1月，程砚秋去西欧考察德、法等国家的戏曲音乐艺术，于1933年回国。他回国后发表《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对改革我国的戏曲音乐提出一些建议。程砚秋还与焦菊隐、金仲荪合作，参照欧洲戏剧教育经验，开办了北平中国戏曲专科学校，培养了一批后起之秀。

程砚秋为人富于正义感，不满旧社会的种种黑暗，曾于

1932年元旦改艳秋名为砚秋，改字玉霜为御霜，表明他的态度。当北平沦陷后，有一次在北平车站碰见伪军“警务团”欺压同胞，他路见不平，立即挥拳向汉奸还击。以后他虽然多次受到日伪的威胁，但他仍拒绝为日伪演戏。他隐居到市郊青龙桥董四墓村务农，直到抗战胜利。

北平解放前夕，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程砚秋欣庆旧社会的丧钟已响，新时代即将降临，特画梅花一幅寄意，并题诗云：“料得喜神将莅止，毫端先放几分春。”

1949年初，周恩来去程家探访，未遇；程到怀仁堂演出时，周又到后台慰问，使程深为感动。是年4月，程参加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同年秋，他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4年，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0年以后，程砚秋曾到重庆、昆明、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喀什等地作巡回演出。同时对民间戏曲艺术作调查研究。1951年4月他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

1957年10月，周恩来亲自介绍程砚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3月9日程砚秋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程砚秋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程砚秋舞台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52年版。

《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

蔡楚生

张 洁

蔡楚生，广东潮阳人。1906年1月12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于上海，后随家人返至原籍，就读于私塾，并从事田间劳动。

蔡楚生十二岁时到汕头一小商店当学徒，虽十分劳累，仍勤奋好学。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参加了汕头店员工会，担任工会的宣传和戏剧演出等工作，并学习写文章和绘画。

蔡楚生由于从事工会活动，受到迫害，1927年潜往上海。经友人介绍，在几家影片公司担任临时演员和剧务、宣传等工作。1929年，他进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在郑正秋手下当了副导演，兼任置景。他协助郑正秋摄制《战地小同胞》（1929年）、《碎琴楼》（1930年）、《桃花湖》、《红泪影》（1931年）等影片，在工作中逐渐显露了他的艺术才能，得到了郑正秋的重视和赏识，为电影界所注目。

蔡于1931年离开明星影片公司，加入联华影片公司制片第二厂，正式担任编导。从1932年起，相继拍摄了他编导的《南国之夜》和《粉红色的梦》。当拍摄《粉红色的梦》时，“一二八”战争爆发，深重的民族危难激发他转入拍摄抗日新闻片。为了配合当时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他和联华影片公司导演

史东山、王次龙、孙瑜等协作，迅速完成了反映“一二八”抗战的《共赴国难》；同时还以“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为背景，编写了《血溅红颜》，后来国民党审查机关以“内容激烈”为借口，禁止拍摄。

《粉红色的梦》在上海放映后，左翼电影评论界曾给以热诚、中肯的批评和帮助。后来成为蔡楚生最好战友的聂耳，也曾希望他“能很快走上一条正确的大道，不要再做艺术家的迷梦”^①。经过批评、帮助，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领导电影小组的积极影响下，他很快提高了认识。后来，他在一篇题为《会客室中》的文章里，分析批判了自己，认识到《南国之春》和《粉红色的梦》是“两部盲目的创作”^②；并诚挚地表示了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即“最低限度要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从此，蔡的电影创作由脱离现实转向反映现实。

1933年2月9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蔡楚生当选为执行委员。该会发表宣言，号召电影界“亲切地组织起来”，“认清过去的错误”，“探讨未来的光明”，开展“电影文化的向前运动”，建设“新的银色世界”^③。蔡楚生于同年创作了《都会的早晨》，受到电影界和观众的好评，被上海《良友画报》誉为“联华伟大作品之一”。这是他转变创作思想后热情歌颂劳动人民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他走上左翼电影运动行列的开始。

1934年春末，蔡楚生不顾国民党对进步电影的迫害，完成了又一部进步影片《渔光曲》。它以现实的题材，动人的情节，通俗的手法和精湛的技巧，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赏。6

月14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时，正值高温盛暑，但盛况空前，连映八十四天，场场满座，创了连映的最高纪录；次年2月在三十一国参加的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上，获得了“荣誉奖”。这是我国电影获得国际荣誉的第一部影片。

继《渔光曲》后，蔡楚生在1935年又成功地导演了《新女性》，曾引起广大青年学生的强烈共鸣。

1936年，蔡楚生编写了反映旧社会流浪儿童苦难生活的《迷途的羔羊》，1937年上半年又完成了控诉旧社会、揭露汉奸罪恶的《王老五》。在创作《迷途的羔羊》之初，他曾在一些儿童故事和描写流浪儿的书籍方面下功夫，但他终于发觉到从这些书中收到的效益不大，不如设法去接近一些流浪儿童——活的书本。在实地接触流浪儿童中，他发觉他们具有那些“上流”社会儿童所没有的聪明、热情、理智和勇敢，从而更加强了他“为这些无告的人们而呼吁的决心”^④。后来在创作《王老五》剧本时，他也曾到上海打浦桥一带污水河边的棚户区，进行深入的体验、观察和了解。这使他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只有现实的社会生活，才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只有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作品，才能充分发挥艺术的战斗作用。

为了团结电影界的爱国力量，加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蔡楚生和欧阳予倩等于1936年1月27日发起成立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他们发表宣言，号召全国电影界联合组成救国的统一阵线，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同年7月11日，蔡参加了上海文艺、电影、戏剧工作者百余人联名发表的《争取演剧自由宣言》，抗议租界当局无理禁止和破坏我国电影、戏剧界爱

国活动的蛮横行径。1937年7月28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蔡当选为协会理事。^⑤

1937年8月，蔡楚生和夏衍等根据舞台剧《保卫芦沟桥》和自编的电影剧本《为自由而战》，综合编成为《华北的黎明》。后因战局影响，未能摄制成影片。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以后，蔡楚生离沪南下，转移香港。当时港澳一带粤语影片盛行，蔡和司徒慧敏等人，制作了抗战粤语片《血溅宝山城》；接着又合作为启明影片公司拍摄了粤语片《游击进行曲》。后一部影片于1938年摄制完成后，竟被港英当局无理勒令禁映；直到1941年6月，经过删剪并易名为《正气歌》，才和观众见面。当时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香港建立了大地影片公司，蔡便参加该公司，于1939年9月完成了《孤岛天堂》。这部影片描写上海租界地区成为“孤岛”后，一群爱国青年与汉奸特务作生死斗争的不屈精神。在重庆、香港和南洋一带放映时，受到普遍赞扬。

1939年底，大地影片公司被国民党政府解散。次年6月，留港进步电影工作者又组成了新生影片公司，蔡楚生参加了“新生”的工作，编导了反映当时香港工人群众拒运军火原料资敌斗争的《前程万里》，于1941年在港公映。为反映在日军铁蹄下南海渔民的凄惨生活，他写出了南海渔民与敌人作生死斗争的脚本《南海风云》，准备在香港拍摄。后因香港沦陷，没有拍成。

蔡楚生由香港到了桂林，国民党文化部门曾派人拉拢他，要他去重庆，他拒绝了国民党人的“邀请”。1944年春夏之交，日军南侵，衡阳、桂林告急，蔡又由桂林转移柳州。后

来柳州告急，撤往贵州独山。又几经波折，末后到贵阳住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蔡楚生回到上海和郑君里合作，开始创作《一江春水向东流》，于1947年10月完成了此片的编导和摄制。《一江春水向东流》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上下两集，是蔡楚生的代表作。影片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深的艺术造诣，赢得了国内外广大观众的欢迎，轰动了整个中国影坛，被誉为“标志了国产影片的前进的道路”^③。据1948年1月11日上海《正言报》发表的统计数字，自1947年10月至1948年1月连映三个多月，场场满座；总计观众达七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四人次，又打破了他三十年代编导的《渔光曲》连映八十四天的纪录。

蔡楚生在完成《一江春水向东流》后，又创作了《西湖春晓》电影剧本，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他和其他进步电影工作者一起，于1948年底再次由沪转移香港，这部影片的摄制也就被搁置起来。

1949年5月，蔡楚生和许多进步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召唤，奔赴解放了的北平，出席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此后，蔡楚生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他曾先后担任了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和中国电影协会主席等职务；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56年，蔡楚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底，蔡楚生到新建的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整理改编《南海风云》原稿，并与王

为一、陈残云合作，完成了改编剧本和上集的摄制任务，定名《南海潮》。影片通过一个渔民家庭的遭遇，概括了从大革命时代起，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的广东沿海渔民的斗争经历。其后，“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他的电影创作活动，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他于1968年7月15日在北京去世，终年六十二岁。

注：

- ① 上海《电影艺术》第1期，1932年6月。
- ② 上海《电影·戏剧》第2期，1936年12月10日。
- ③ 上海《晨报》1933年3月26日。
- ④ 上海《联华画报》第8卷第一期，1937年1月。
- ⑤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417页。
- ⑥ 上海《新闻报》1947年10月27日。

主要参考资料：

-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
王为一：《悼念蔡楚生同志》，《作品》1978年第8期。
上海《良友》、《时代》画刊及有关报纸。

郑正秋

张 洁

郑正秋，原名伯常，别号药风，广东省潮阳县人，生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幼年被上海一个贩卖鸦片的巨商认领为“螟蛉子”。郑少时聪慧过人，十四岁时肄业于上海育才公学。成年后参与其义父的鸦片生意，成了一个很会赚钱的少老板。但后来由于“所托非人”，资产亏蚀过半。

清末，他因对清廷的政治腐败不满，和一些革命人士相结识。那时他对京戏很感兴趣，经常出入各大剧场，并以“正秋”为笔名在当时鼓吹革命的《民呼》、《民吁》和《民立》报上发表剧评，这是上海出现“剧评”的开始。

1912年底，京剧著名演员谭鑫培在上海新新舞台演出，因年老体弱，唱做衰退，观众李午初喝了倒彩，引起新新前台老板黄楚九的恼怒，率众殴辱李某，引起诉讼。郑为李鸣不平，在报上写批评文章。从此，他就被人看做“不畏强御的剧评家”^①。后来，他一度出任上海《民言报》的戏剧编辑，又在当时的《民权报》、《中华民报》等开辟专栏，发表戏剧评论文章。后自办《图画剧报》，主张改良旧戏，提倡新戏，认为戏剧必须是“改革社会，教化群众”的工具。从这时起，他开始与新剧发生关系。

1913年，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顾问张石川认为郑正秋是

自己经营电影生意“最好的合作者”，因而邀郑正秋、杜俊初、经营三等组成新民影戏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剧、导演、搜罗演员和摄制影片的全部业务。这时，郑编写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剧本《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并与张石川联合导演了这部影片。这部影片是根据郑“改革社会，教化群众”的观点，以郑家乡潮州的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当时还没有女演员，所有角色全部由男演员担任。由于这部影片抨击了当时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所以1913年9月底在上海新新舞台首次放映时，曾轰动一时，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共鸣。随后，他因与张石川意见分歧，离开电影界去从事新剧活动。

同年底，郑正秋组成新民新剧社，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剧目有郑自编的《恶家庭》、《火浣衫》、《义丐武七》等，其他还有《遗嘱》、《家庭恩怨记》、《婚变》、《血手印》、《恨海》、《爱之花》，以及一些外国家庭故事剧如《空谷兰》、《梅花落》等约三十余出。这些剧目的内容，大都是描写有关家庭和婚姻问题的。由于“浅显易懂、颇多兴味”，因而“男女老少，个个欢迎”^②。

郑正秋在新民新剧社，一面当老板，一面当编导和演员，能胜任多种角色。如在《义丐武七》中扮“武七”，在《武松与潘金莲》中扮“武大郎”，在《恶家庭》中扮“老太太”等，都能演得维妙维肖，得到好评。但新民新剧社因敌不过张石川、经营三组织的民鸣社的竞争，一年后不得被迫并入民鸣社。从此郑不愿再负领导责任，专做演员和编导。

1915年，郑退出民鸣社，另组大中华新剧社。1918年又

组织药风剧团在亦舞台演出。1919年参加笑舞台和平社新剧部。至1921年，他曾一度登报脱离新剧界去做交易所生意。结果一败涂地，又回头重新搞新剧。

在近十年的新剧活动中，郑所编演的的新剧，虽标榜“改良风俗，破除迷信”和“改革社会，教化群众”，而实际上则相反。因此，剧评家啸天曾对此提出批评，说所演新剧，“除家庭儿女外无剧本，除妒杀淫盗外无事实，除爱情滑稽外无言论”，并“未能导人为善”^③。1918年郑在《药风敬告》一文中也发出过慨叹说：“新剧为我国所必当有者，因社会万恶，不可无药药之耳。乃剧人不德，使吾有新剧万恶之叹。”最后还说他想筹几十万资本，编演正当的小说戏。随后，郑编演过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新剧，如《隐痛》、《石家庄》、《桃源痛》、《蔡锷》、《中山被难》、《窃国贼》、《徐锡麟秋瑾合传》、《女学生的觉悟》等，都具有较好的内容，风格有所变化。

1922年，郑和张石川、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又合作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他们都感到影戏潮流将来势必发达，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另一方面，在郑说来，仍把电影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④。在制片方针上，郑仍主张艺术应“教化群众”，强调应摄制“长片正剧”^⑤；但张石川却认为这种理想只应先作尝试，从业务发展着想，仍应“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⑥，郑不得已而屈从之。

郑在“处处惟兴趣是尚”的方针下，先后编写了《滑稽大王游华记》、《掷果缘》、《大闹怪剧场》、《张欣生》等。但这些低级趣味的影片，并不受观众欢迎。明星公司营业不振，经济情况岌岌可危，只好回头采纳郑正秋拍摄“长片正剧”的

主张。于是郑又开始编写宣扬“改良主义”的所谓“社会片”，其主要思想不外是“教孝”、“惩恶”和“劝学”之类。他的第一部创作是1923年完成的《孤儿救祖记》，由于在艺术上“全片富于影戏色彩”^⑦，“带有较多的民族生活气息”^⑧，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上映后颇为轰动，因而摇摇欲坠的明星公司的经济得以复苏。

《孤儿救祖记》获得成功，郑于1924年编写了《苦儿弱女》、《好哥哥》、《玉梨魂》，1925年又编写了《盲孤女》、《二八佳人》、《一个小工人》、《小情人》、《上海一妇人》和《最后的良心》等。这些环绕“妇女问题”的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婚姻、蓄婢制度和娼妓制度的吃人罪恶，有其进步意义。

但在1927年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之后的形势下，郑又开始趋向以武侠片为中心的创作以迎合小市民观众的口味，如《侠风奇缘》、《山东马永贞》、《黑衣女侠》、《北京杨贵妃》、《血泪黄花》、《梅花落》等。郑将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改编成《火烧红莲寺》。此片在上海放映时颇为轰动，票房收入激增。明星公司见有利可图，三年之内竟将《火烧红莲寺》改编达十八集之多。从此，什么《火烧青龙寺》、《火烧剑锋寨》、《火烧九龙山》、《火烧七星楼》、《火烧韩家庄》等等，一时“火烧片”空前泛滥，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抨击。此后，郑虽表示不愿再与“武侠片”同流合污，但在1929年编演了《战地小同胞》后，又回到改编文明戏的老路上去，把《碎琴楼》、《桃花湖》、《红泪影》等搬上银幕。

到“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郑思想上才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他带有悔悟的心情说：“横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

条路，一条是越走越光明的生路，一条是越走越狭窄的死路。走生路是向时代前进的，走死路是背时代后退的。”^①在敌寇深入、民族危亡的形势下，神怪、武侠和鸳鸯蝴蝶之类的影片已失掉了观众。因此他曾积极主张聘请左翼文艺工作者担任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他参加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工作，曾在《明星月报》上发表过一篇《如何走上前进之路》的文章。

由于思想倾向上的改变，他的创作实践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如1931年写的《自由之花》、《春水情波》和1933年编写的《姊妹花》等，有了比较进步的内容。特别是《姊妹花》，剧中描写的贫富和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的阶级矛盾。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描写细腻通俗，当1933年在上海公映时，曾轰动一时，创造了连映六十余天的票房纪录。

郑自幼体质素弱，经常患病，为了解除痛苦，逐渐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至拍摄《姊妹花》时，他虽已戒绝烟瘾，但身体健康已每况愈下，难以正常活动，只能躺在床上进行导演。《姊妹花》问世后，1934年又勉力完成了《再生花》和《女儿经》里的一个片断，以及《热血忠魂》的部分编写工作，终于1935年7月16日病逝于上海。

注：

① 《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第75页。

② 同上第一辑第69页。

③ 上海《新剧杂志》第一期1914年。

④ 上海《影戏杂志》第一卷三号1922年5月25日。

- ⑤ 郑正秋：《明星未来之长片正副》。《晨星》创刊号，1922年上海晨社出版。
- ⑥ 张石川：《敬告读者》。《晨星》创刊号，1922年上海晨社出版。
- ⑦ 上海《申报》1923年12月26日。
- ⑧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第62页。
- ⑨ 上海《明星月刊》第一卷一期，1933年。

张 辅 忠

汪 仁 泽

张辅忠，别名僮无、佐时、一仁，我国近代的药物学家。1888年10月30日（清光绪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浙江余杭良渚镇。他的父亲在当地开设酱园。他少年时在私塾读书。

1907年初，张父曾要他辍学帮助照料店务，但他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国家受外国的欺凌，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用科学救国，因此决意继续升学。当年春天，他只身离开家乡来到杭州。由于升学未获家庭同意，因此在经济上得不到支持，只得先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员，积蓄了一点钱，然后考进了一所中学。1913年考取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为药科第一期生，生活依靠晚上当家庭教师来维持。1916年药专毕业后，任夏超所部第八团司药正，驻杭州。

1922年张辅忠离开部队，经老师李觐唐的介绍，到上海五洲固本皂药厂，任该厂药部主任。1924年在厂内秘密参加了国民党。他好学不倦，一面工作，一面利用业余时间自修英、德、日三国外语。生活上节俭朴素，打算积下一些钱，到国外去留学深造。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动员厂里的职工参加上海工、商、学各界支援“五卅”运动的“三罢”斗争和大游行。1926年12月五洲厂工会成立，他被选为工会委

员。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他曾出席上海市民代表大会。4月，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张辅忠的朋友和同学，有的被捕，有的失踪。他不愿再去登记国民党党籍，同时也感到在上海难以安身。就在这一年，他远涉重洋，到了德国，进入柏林大学有机化学系深造。

1931年张辅忠在柏林大学毕业，成绩优异，获得该校药剂化学博士学位，并参加了他的老师Manish教授主持的科学研究项目，两人合作取得了有机化学Manish反应^①的研究成果。虽然当时在德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较优越，但是他热爱祖国，于1933年毅然回国，带回代五洲固本皂药厂在德购买的制造甘油的机器设备。回国后，他帮助该厂设计创办了国内第一个甘油厂，后来又扩展为五洲制药厂。他所采用的提炼甘油新技术，使在制造肥皂时的副产品甘油，得到充分的利用，从而降低了肥皂的成本，提高了肥皂的质量，使五洲“固本肥皂”能与英商祥茂肥皂竞争畅销，挽回了不少权益。后来他担任了五洲制药厂厂长，先后研究仿制了三十多种过去依赖国外进口的西药，计有消费量很大的常备消毒剂红汞，从植物中提取的维生素乙，磺胺类制剂S.D、SST，治疗梅毒“六〇六”的同类制剂“化治梅”，抗痨药PAS，治痢疾药“安痢生”，治癫痫病药“苯妥英纳”，治麻疯病药“大风子油”，以及牛痘疫苗、激素制剂、止痛剂、“安乃近”等等，对我国的药物化学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研制的过程中，他总是一丝不苟，亲自动手，带领助手仔细操作。在试制“化治梅”药剂时，原料是剧毒的砷，金属钠在接触时

会腐蚀皮肤和衣服。而该药的制造技术，国外是保密的，他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试制了近百次，毫不灰心，最后终于成功。又如磺胺类药物的试制成功，在当时青霉素未普及应用前，由于用途广、销售量大，有效地抵制了外货的倾销。在这期间，他还受聘到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中法药学院等大专院校任教，他的学生中有很多后来成为我国药学界的骨干。

张辅忠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勤奋好学。后来他又自学掌握了俄文。工作之余，则埋头治学。1947年，五洲药房股份有限公司（五洲制药厂是其所属企业之一）的总经理病故，董事会决定由他接任总经理职务。同年，他的德国老师 Manish 教授从美国哈佛大学来信，邀请他去美国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一切出国的手续，连护照也已代他办好，但是他考虑到国内药物研制的需要，并已承担公司的重任，遂谢绝了出国的邀请。

解放前夕，他接受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示，说服资方把原来准备拆迁到台湾去的机器设备留了下来。

解放后，他于1950年接受人民政府的聘请，放弃了五洲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高薪职位，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药政处处长的的工作，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且筹备建立了华东药品检验所，兼任所长。药品检验所的建立，标志着人民政府执掌了药政的主动权，从此改变了过去洋药、假药充斥市场、无人管理的局面。1953年他调任华东药学院（后来改称南京药学院）院长。他曾当选为江苏省人民代表、上海市人民代表和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

解放后祖国灿烂的前景，党和国家给他的荣誉，更激励他为祖国、为人民努力工作的热忱。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辛勤劳动。1957年2月6日张辅忠因肺癌病逝，时年七十岁。

注

- ① Manish反应是指通过活泼的金属离子（如钾、钠、镁等）参与化学反应，促使某些有机化学物质的迅速结合，常应用于制药工业等方面。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张辅忠生平传略》（未刊稿）
- ② 《五洲药厂工会十周年纪念刊》，1936年版。
- ③ 《五洲》（五洲药厂厂刊）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1月版。
- ④ 《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1936年10月版）。
- ⑤ 笔者采访记录。

洪式闾

叶炳南

洪式闾，字白容，浙江乐清人，1894年5月4日（清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生，祖父和父亲都是晚清的秀才。

洪式闾少年时先在浙江温州中学肄业，后随父至河南开封，进开封中学堂，于1911年毕业。1913年至1917年，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读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0年7月至1922年3月，以进修员身份被派赴德国柏林市立医院进修，初修病理学；后决心以扑灭寄生虫病作为终身努力目标，改而专攻寄生虫学。1923年洪任北京医科大学教授，并曾一度代理校长。经他倡议，把寄生虫学从病理学中分出，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924年6月至1925年4月，他又被学校派遣赴德、美等国，以进修员身份进行考察。

洪式闾早期研究寄生虫卓有成绩。1922年他曾用德文发表《基础膜染色法》的论文；1926年又用德文发表关于他所发现猴体内两种新线虫的论文，为纪念其德国老师弗来朋（Fuelleborn）教授六十诞辰，把其中的一种线虫以弗氏之名命名。同年，他创造了钩虫卵定量计算法，解决了防治钩虫病的基础技术问题，为世界各国所采用。在此期间，他还先后编著出版了《病理学总论》和《病理学各论》两书，这是国内最早的、也是当时最完整的病理学专著。

在北伐军胜利进占浙江后，杭州发生了一起“广济医院事件”。1926年冬，开办广济医院的英帝国主义分子梅藤更（David Duncan Main），慑于大革命的风暴，担心自己披着宗教外衣，掠夺、欺骗我国人民的种种罪行将受惩办，借口年老匆匆回国，他的代理人谭信也仓惶逃遁。为此，杭州市十六个群众团体召开市民大会，请求临时省政府派员接收自办，先由姜卿云等人接收，不久，洪式闾应浙江省民政厅长马叙伦的邀请，到杭州担任广济医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增聘了不少著名的内外科医师，并对医院业务进行了有效的整顿，使各方面的工作显著改善，在社会上迅速树立起由中国人接办的新广济医院的声誉。但至翌年，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了取悦于英国政府，勒令将广济医院交还给英国人。杭州市民闻讯，群情激愤，纷致函电，要求南京政府改变此决定，但未能成功。洪式闾愤而辞职以示抗议，并将医院全部财产清点列册，送交浙江省民政厅，而不愿直接交还给英国人。同年7月，洪与盛佩葱等共同发起，自筹基金，创办杭州医院，与之抗衡。此一义举，给当时社会民心以很大振奋。医院创办伊始，经费支绌，在最困难时，洪将妻子的首饰等拿去变卖，赖以维持。当时洪等曾印有《青白之广济》和《筹组杭州医院宣言》等宣传品，揭露梅藤更“假慈善之名，逞侵略之暴行”；痛斥国民党政府“劫（怯）于强国之大势，率不免于屈从”；宣称“有生之日，誓与异族以周旋，未死寸心，愿为国家而奋斗”^①，表达了反帝爱国、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同年，洪式闾还创办了杭州热带病研究所，任研究员兼

所长、从事寄生虫学的实验研究。11月，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的马叙伦推荐，被任命为教育部编审处主任。一年后，洪以宁、杭两地工作不能兼顾为由，辞去这一职务。1929年9月，他应日本九州医学会的邀请，前往日本作关于萧山姜片虫病问题的学术讲演，提出了姜片虫只有一个种别，仅因年龄不同而形态有所变异的独立见解，否定了认为姜片虫有许多种别的传统错误看法，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回国后不久，日本九州大学即给他寄赠了医学博士的学位证书。

1936年8月，洪式闾应聘去江苏，任南通学院教授兼医科主任，他所主持的杭州医院随即停办。抗日战争爆发后，洪组织南通学院医科师生，代办“军医署第七重伤医院”，辗转扬州、衡阳等地，救护抗日伤员。1938年10月，南通学院与江苏医政学院在湖南沅陵合并，成立国立江苏医学院，洪任该院教授兼寄生虫学部主任。以后洪随学院迁贵州和四川北碚，对当地农村严重流行的钩虫病开展了研究和防治工作。1945年，他与杨复曦合作，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蜡制蠕虫模型制作法》一文。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洪式闾眼看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既满怀义愤，又为自己只是一介书生的无能为力而感到痛苦，常饮酒以解苦闷悲思，赋诗抒发忧国情怀。在所写的《端午诗》中，他咏述：“关怀时局费周章，尤憾强权反擅场，蓦地罡风来直北，漫天烽火过端阳。九州义士非秦帝，七泽词人念楚王，一样忠诚为爱国，几忘身世与家乡。”另一首《中秋诗》说：“远离浙水已三年，走遍西南亦偶然；自恨于时无补益，更

嗟所学忒拘牵。书生爱国唯憔悴，志士捐躯貌瓦全；惭愧嘉陵江畔住，中秋望月两回圆。”^② 显示出—位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赤忱之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洪式闾随江苏医学院回到镇江，任教授及寄生虫研究所主任。这个学院为陈立夫所控制，院长即为陈的亲信，洪觉得难以共事，于次年11月应聘去台北，兼任台湾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1948年3月底，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无理电令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辞职，洪对此极感气愤，认为“乱命”不能从，遂自动辞去兼职，仍回镇江江苏医学院执教，以示抗议。^③ 后因高血压引起鼻腔大量出血，请假到杭州休养。

1949年春，镇江、杭州相继解放，洪式闾兴奋地抱病回镇江继续任教。7月，赴北平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工作。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年底，洪到杭州参加筹办浙江卫生实验院，任院长。1950年9月，他代表我国医学科学界去捷克斯洛伐克出席第六次国际微生物会议，宣读了寄生虫学方面的论文，并被邀请去斯洛伐克大学作学术演讲。11月，他兼任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院长；1951年又被任命为浙江省卫生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外，他还被选为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和担任浙江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等职务。1954年8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4月15日，洪式闾亲自主持召开浙江省肺吸虫病治疗研究学术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台湾肺吸虫病流行情况》的学术报告。就在这次会议

期间，他因劳累过度，高血压症复发，于4月24日去世，终年六十一岁。

洪式间数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寄生虫学的研究，先后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的重要论文有四十多篇，并有十多本著作出版。他对于疟原虫的形态学和疟疾的流行病学，阿米巴痢疾的病理解剖，姜片虫的种别问题，毛圆线虫的人体寄生问题以及钩虫问题等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成就。他和李非白、胡旭庚、范学理合作编著的《钩虫病和毛圆线虫病》一书，为防治我国四大寄生虫病之一的钩虫病，提供了系统的资料。他并为培养我国寄生虫学的研究和教育方面的人材，作出了贡献。

注：

- ① 参见杭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史料研究组：《英帝国主义“英雄”梅藤根在杭州》。《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34—153页。另见李肃遐：《接收杭州圣公会广济医院前后经过概略》。稿存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② 转引自李非白：《怀念崇敬的老师洪式间教授》。《钩虫病及毛圆线虫病》，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版第95页。
- ③ 参见洪式间：《誓竭尽全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浙江日报》1954年12月29日第三版。

孔伯华

寿祝衡

孔伯华，名繁棣，字伯华，以字行，号不龟手庐主人^①，山东曲阜县人，生于1885年6月5日（清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父亲孔庆铎，清末曾在军谘府任职。

孔伯华六岁时开始在私塾就读。稍长，随其祖父宦游。因祖父善岐黄之术，他耳濡目染，便对中医发生浓厚兴趣。十六岁时，全家迁居到河北易县以南的白杨村，他随父亲读书的同时，向当地老中医蔡秋堂、梁纯仁学医。二十二岁时，孔伯华在易县正式行医。二十五岁时应聘到北京外城官医院任中医内科医官（即医师）。不久，他在京私人开业，全家迁北京定居。

1917年，孔伯华曾先后参加晋绥和廊房地区的防疫工作，临床经验日益丰富。其后，他与同事曹巽轩、陈伯雅、杨浩如、张菊人、陈企董、赵云卿等合编有《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一书，共十卷。

孔伯华在广为患者诊治过程中，注意医理的研究和医疗经验的积累，善于汲取各家之长，学术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声誉日隆，成为驰名全国的中医师，与萧龙友等同为北京四大名医。他擅长内、外、妇、儿各科，尤精于医治温热病。由于他善于灵活施用生石膏，曾有“石膏孔”的雅誉^②。

孔伯华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热心中医界的社会活动。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召开“中央第一次卫生会议”，西医余云岫等人在会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等等。此案竟然得到通过，中医被明令取消。广大群众和中医药界闻讯莫不愤慨，纷纷抗议，于3月17日汇集于上海，召开大会，决议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进行斗争，并组成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孔伯华被推选为临时主席。他率领请愿团前往南京，与反动当局据理力争，强烈要求取消这项荒诞的决定。在社会舆论的强大支援下，反动当局被迫收回成命。

1930年，孔伯华与萧龙友合办北平国医学院，共任院长^⑤。1944年北平的日伪当局曾企图接管国医学院，孔伯华毅然将该院停办以为抵制。北平国医学院自开创到停办十四年间，共毕业学员七百余人，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培育了一批人材。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蓄意摧残中医事业，南京考试院于1946年10月通知北平全体新照中医师，均须重新通过考试而定取舍。这一以考试为名而行其取缔中医之实的阴谋，为北平中医师所识破。他们奋而组织起“北平中医师新照同仁福利促进会”进行反抗。孔伯华任该会顾问。他们四出请愿，进行说理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反动当局取消了这次所谓新照中医考试。

在医理方面，孔伯华坚决主张辨证论治。他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症，将症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

开。认症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辨证施治，参、术、硝、黄，并能起死，苓、连、姜、附，尽可回生。喻嘉言尝谓：‘医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认症。’故主张先议病，后议药。朱丹溪亦主张‘认症为先，施治为后’。若但知以执某方治某病，不论因时、因地、因人，不审何脉、何因、何证，是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无误。殊不知施治之妙，实由于辨证之真，寒、热、虚、实，不昧于症，而又不惑于症，汗、吐、下、和，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则，疑似甚多，临症莫决，见病治病，十难效一。”^④孔伯华的精当、明快、果断的医疗风格，为世人所称颂。

孔伯华一贯关怀患者的疾苦，以济世活人为宗旨，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在外城官医院供职时，虽所入不丰，仍常解囊资助贫苦患者药费，及至成名之后，更不计锱铢，对有困难的故旧一直坚持义务施治。晚年因求诊者众多，常应接不暇。他左右虽有不少生徒待诊，但对危重患者一定亲自悉心诊断，不辞辛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孔伯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卫生部顾问、中国医学科学研究所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新老中西医，互相学习的方针政策，曾上书毛泽东主席，认为：“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仅其理法不同耳。今逢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以教

育人才始。”他建议大力发展祖国医药事业，培养中医工作者，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与支持。

孔伯华深以应诊过忙无暇著述为憾，晚年经常深夜执笔著书立说，著有《脏象发挥》、《时斋医话》等。他以古稀之年既忙于诊务，又勤于著述，终以体力难支，猝然卧病。他自知不起，遗嘱亲属说：“儿和弟子等，凡从我学业者，务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承我未尽之志。”1955年11月23日孔伯华在京逝世，终年七十岁。

注：

- ① 不龟手庐主人：龟通鞣，《庄子·逍遥游》：“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孔伯华取其造福黎庶，有裨家邦之意，以明志自励。
- ② 孔伯华深通药性，对生石膏的功能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因而除以生石膏用于镇热外，往往通过灵活的佐使，发挥生石膏的解表功能，为一般医师所不及，故有“石膏孔”之称。
- ③ 北平国医学院开办时，孔伯华、萧龙友二人皆为院长；1940年萧告老引退，孔仍任院长职，直至最后决定停办该院。
- ④ 孔嗣伯：《孔伯华先生学术经验简介》，《中医杂志》1962年第7期。

石筱山

商一仁

石筱山，江苏无锡人，1903年10月21日（清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二）生于上海。曾入上海神州中医专门学校肄业，该校停办后，回家随父从业学医，二十二岁开始悬壶，以善治骨折伤痛闻名江、浙一带。

石氏伤科，以独特的正骨复位手法和独创的伤科内治经验方，成为我国南方伤科的一大流派。它的开创始于清末太平天国期间，数代相传，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石筱山的祖父石蓝田，年轻时因习武而留心于跌打损伤的治疗术，后发展为理伤正骨，曾在无锡农村为农民驱痛治伤。石筱山的父亲石晓山也从小熟习拳棒，对接骨入骹，技法圆熟。石筱山继承先辈治伤经验，加上自己努力钻研，技术益加精进，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又从偏治外伤进而善治内伤，兼理针外科，是以声名大噪。

1929年，国民党政府卫生署曾明令取缔中医中药，粗暴地干涉有数千年历史的祖国医学，石氏伤科也横遭摧残，被污蔑为“卖狗皮膏药”的“江湖医生”，伤科技术被当作“邪术”。但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广大病家的信任，使他们得免厄运。

石筱山的私人诊所，初设在上海南市大东门外复兴东路附近的新新街。抗战之前，这一带属于华界，周围住户多为

码头、搬运、建筑和人力车工人。他们终年胼手胝足，筋骨损伤的事故特别多。经过石筱山的治疗，解除了他们的痛苦，重新获得健康。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石筱山的名气不胫而走，成了城乡老少皆知的伤科名医。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石的诊所迁至当时的法租界吕宋路（今连云路）一条弄堂里面，病人仍然很多，其中还有来自四乡的农民。当时诊所内医生和职工有十余人，多系石氏族裔。门诊无固定时间，往往从太阳出来看到万家灯火。诊所除看病外，也配制、出售部分成药及外用药，予病人以方便。

在几代人努力的基础上，石筱山对家传的“三色敷药”、“消散膏”又进行了提炼，并发展了一系列临床有效的内服经验方。这些药膏、药方对骨折、脱臼、脑震荡、胸肋内伤等伤病都有很高的疗效。

石筱山对正骨复位手法的运用独具匠心，诸凡摸、接、端、提、按、摩、推、拿等八法，无不精通，做到“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他纯熟的技巧，能使损伤的骨节、肌肉或筋络，离者合、斜者正、陷者起、突者平，筋急者松弛，疼痛者减轻，肿硬麻木者逐渐宣通而柔和。^①

“内外兼治、动静结合，全体与局部相关联而又重在内治固本”，为石筱山伤科的医疗特色。其基本原则是根据祖国医学中的辨证施治，做到气血并重。如有的病人头部内伤，来就诊时已神志不清，伤势十分严重，经石诊治后得以起死回生。又如对老年人常见的“髌部骨折”，石既重视手法运用，又强调牵引和夹板固定，再加上外敷内服，效果也很好。还有不少疑难病例，在石筱山手中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团结新老中西医的方针”，十分重视祖国医学遗产的整理，并大力予以扶持。石筱山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及华东医院顾问。

1952年，上海市卫生局联合各科专家组成“中医公费医疗门诊所”，石筱山欣然跨出他的私人诊所参加公费门诊。从这时起他不但扩大了带徒弟的范围，第一次接受国家分配给他的学员，而且公开了石氏秘方。在1958年的中医献方热潮中，他把石氏经验方，包括百年来祖传老本子全部公诸于世，为不少医院包括解放军军医院所采用。

石筱山治愈的各类伤科病人，多不胜数。他晚年体弱多疾，仍念念不忘把自己一生从事伤科的经验留传给后世。根据石筱山口述，由他儿子石仰山协助整理长达二十万字的《石筱山医案》原稿，是石筱山毕生心血的结晶，伤科技术的精华。^①

1964年7月，石筱山因患癌症去世，终年六十岁。

注：

① 《医宗金鑑》，卷八十七“正骨心法要旨”。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276页。

② 本文资料主要根据石筱山之弟石南山（已故）及子石仰山提供。

师 复

杨 天 石

师复，原名刘思复，民国初年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84年6月27日（清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五）生。十六岁时考中秀才，但不久即对科举失去兴趣，专心研究诸子学、文字学及中国古算术，颇有心得。1901年在香山创立演说社。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8月加入同盟会，旋至横滨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制造炸弹。1906年初归国，在香山创办隽德女学，提倡女子教育。不久，应谢英伯邀，至香港编辑《东方报》。

1907年春，为配合许雪湫、邓子瑜在潮州、惠州两地发动的起义，同盟会计议暗杀粤督岑春煊和水师提督李准，刘思复慷慨自请任实行委员，因试验水银炸药击伤脸部，未能成行。同年6月初，李准镇压潮惠起义后班师回广州，刘思复即准备乘其赴总督衙门参谒时截击。11日晨，装配好炸弹，不料出门时发生爆炸^①，面部及左手受伤，五指全废。岗警闻声赶来，发现铁弹，巡警道龚心淇命将刘思复先抬入医院治疗，待伤愈后再行审讯。治疗中，刘思复左手下部被医生截去。出院后，清吏多次审讯，刘思复均自称为三水人李德山，因试验化学受伤。清吏虽怀疑其为革命党，也查出了他的真名实姓，但因得不到确实证据，于同年9月判令解回香

山原籍监禁。

1908年9月，革命党人郑彼岸创办《香山旬报》，刘思复在狱中起草了发刊词，宣称“欲令邦人士女，拂拭真智，咸革旧染，兴化砺俗，作我民气，因以恢复自由”^②。他在报上先后以净慧居士、寥士等笔名发表了《净慧室随笔》、《寒柏斋剩言》、《纲庵澜语》、《粤语解》等著作多种，宣传民族、民主思想，涉及历史学、方言学等方面。他还曾起草《改良监狱议》，受到香山县令的激赏。1909年10月，经陈景华、郑彼岸等营救出狱，赴香港，受到同盟会南方支部的热烈欢迎。

两年多的牢狱生活给了刘思复不少刺激。在香港，他专心研究《新世纪》宣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自己已属于“反抗强权之革命党，而非复政治之革命党”^③。1910年春，与谢英伯、高剑父、朱述堂等组织支那暗杀团，幻想以个人行动警醒社会，推动革命。据有关人士回忆，该团初次宣誓时，厅房四周围以黑布，中间置一圆桌，围以白幔，上放一骷髅头，屋边燃着一支白蜡烛，宣誓者须在烛影摇红中独对骷髅三分钟，由主盟者宣读暗杀团宗旨和方略^④。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刘思复曾帮助林冠慈谋刺李准，后又曾准备刺杀清摄政王载沣。武昌起义爆发后，刘思复在东江一带领导民军起义，号称香军。同年冬，和未婚妻丁湘田、同志郑彼岸一起北上，准备暗杀袁世凯。途经上海时，正值南北和议告成，于是往游杭州西湖，隐居于白云庵。

1912年5月，为了散布所谓“社会革命”的种子，刘思复

回广州组织晦鸣学舍，印行《无政府粹言》、《无政府主义丛刻》等小册子，免费赠送。7月，废姓，易名师复。同月，因仰慕托尔斯泰及其道德自我完成说，与郑彼岸、莫纪彭组织心社，宣称“破除现代社会之伪道德、恶制度，而以吾人良心上之新道德代之”^⑤。该社无章程，无规则，取绝对自由主义，仅公布《信约》十二条：（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⑥。师复自誓永远遵守。心社的成立及其活动引起广州社会的注目，称许者誉为圣人，反对者目为禽兽。师复曾于广州《平民日报》辟《心社析疑录》一栏，刊载讨论《信约》的有关文字。在论证其所谓“废婚姻主义”的时候，师复引用《史记》材料，说明孔子也是其父与人野合而生的“野子”，引起尊孔派大哗。同年秋，师复认为世界大同当以语言统一为先导，发起研究世界语，任环球世界语会广州分会会长。

师复厌恶资本主义的都市生活，曾拟邀约几个同志建立无政府主义新村，已经选定了零丁洋畔一块地方，有田七十亩，荔枝五百株，命名为红荔山庄。因国民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计划中辍。

对“二次革命”，师复态度消极，认为两方面的是非胜败，均无“评论之价值”。1913年8月20日，他在广州发刊《晦鸣录》（一名《平民之声》）。其中除中文外，特设世界语部，是近代中国较早的世界语刊物。该刊宣称：“今天下平民生活之

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⁷⁷。《晦鸣录》仅出两期，9月8日广东都督兼民政长龙济光下令“永远停版”，晦鸣学舍亦同时被封，心社被“立饬解散”⁷⁸。12月20日，《晦鸣录》转澳门出版，更名《民声》。出版两期后，龙济光又奉袁世凯命，串通葡萄牙驻澳门领事予以封禁。1914年4月，师复又转上海继续秘密出版《民声》。

7月，师复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对外名称用A·K·G，译名“区克谨”。该社宣言说：“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天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⁷⁹其后，南京、常熟、广州先后有人成立类似的组织，表示响应，克鲁泡特金、格拉佛、高德曼、大杉荣等国际无政府主义者也纷纷来信表示支持；日本鹿泰治并到沪担任《民声》世界语部分的编辑工作。8月，师复致书万国无政府党大会，报告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提议组织万国机关、注意东亚的传播、与工团联络、万国总罢工、采用世界语等五事。11月，上海漆业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师复曾撰文鼓吹工团主义，要工人“不恃政治而惟恃自己实力以天除贫富阶级”⁸⁰。

在师复传播无政府主义期间，江亢虎正组织中国社会党，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传播社会改良主义。二人间曾展开辩论。师复批评江亢虎“违背社会主义之根本要义”、“颠倒奢乱”、“饰说欺人”⁸¹，并将有关文字编为《伏虎集》；其实，师复自己由反对剥削、压迫进而笼统地反对一切政治、政府和

权威，也是错误的。五四运动至1927年前后，师复的信徒们曾将他的思想吹捧为“师复主义”，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1915年1月，师复肺病加重。医生建议多食牛肉汁、牛奶、鸡蛋等营养物，但他不愿违背心社《信约》，拒绝不吃；有人为筹集其医疗费，提议出卖印刷《民声》的机器，他表示此为“吾党主义、东方命脉”，不能“断之以活一人”^⑫。当时，住院费极为昂贵，《民声》也因捐助经费者日少，陷于困难境地，他感慨地在致郑彼岸书中说：“文明科学本为富人之专利品，托尔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绝之也。现在《民声》垂危，几将易箠，余之忧《民声》，比忧病为更甚。倘《民声》呜呼，余又真成为不治之痲病，则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⑬

同年3月27日师复病逝。

著有《师复文存》。

注：

- ① 《驳江亢虎》。《师复文存》第225页。
- ② 《香山旬报》第1号。
- ③ 同①，第226页。
- ④ 郑佩刚：《关于刘思复之暗杀活动》，《广州文史资料》第5辑。
- ⑤ 《答凡夫书》。《师复文存》第144页。
- ⑥ 《心社意趣书》。《民声》第14期。
- ⑦ 《编辑绪言》。《晦鸣录》第1期。
- ⑧ 《粤督解散心社》。《民立报》，1912年12月16日。
- ⑨ 《师复文存》第53页。
- ⑩ 同⑨，第84页。
- ⑪ 同⑨，第31、224页。
- ⑫、⑬ 文定：《师复先生传》。《师复文存》第8页。

主要参考资料：

- 《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7年8月初版。
- 《晦鸣录》（《民声》）。1—29期。
- 《师复纪念号》。《进化》第1卷3期。
- 《师复纪念号》。《民钟》第2卷3号。
- 颉父：《师复君行略》。《民声》第23期。
- 冯自由：《心社创作人刘思复》。《革命逸史》第2集。
- 冯自由：《香港支那暗杀团成立始末》。《革命逸史》第4集。
- 郑佩刚：《关于刘思复之暗杀活动》。《广州文史资料》第5辑。
- 秋雪：《回忆刘思复和“心社”活动》。同上书。
- 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
- 郑佩刚：《师复年谱》。未刊稿。
- 郑佩刚：《师复传》。未刊稿。

附录：

《中华民国人物志》中的 《民国人物传》选录草案

《中华民国人物志》分三部分：其一为《民国人物传》；其二为《人名辞典》；其三为《人物表》。这个草案是《人物传记》暂订的选录标准。

一、传记选录人物限于：自1905年同盟会创立起，至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灭亡止，这四十五年间的著名人物。

二、传记选录的人物，暂定范围如下：

(一)清末(1905年后)反动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

(二)1905年后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同盟会革命活动中牺牲的著名烈士。

(三)1905年后人民自发反帝反清斗争中著名的领袖和烈士。

(四)1905年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人物。

(五)中华民国成立后，各主要党派、政治团体的首领和主要活动分子。

(六)历届“国会”和相当于“国会”的各种代表会议（如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蒋介石的国民代表大会等）的议长、副议长(或主席、副主席)和重要议员(或代表)。

(七)北洋军阀政府首脑及总理全部列入。各部总长、次

长最重要者列入，各省、区、地方的都督（或将军、督军、督理、督办）、都统和省长亦择其重要者列入。

（八）护国、护法和国民政府时期，南方各届政府中的首脑，以及重要的部长、军长、师长。

（九）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民间自发斗争中的著名人物。

（十）国民党政府首脑全部列入。院长、部长、各省市的省长、市长之重要者。军人限于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密切关系的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等。特务机关中的主要头目。

（十一）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对派政府（如两广政府、福建政府）中的重要人物。

（十二）伪“满洲国”等六个傀儡政权中臭名昭著的汉奸。

（十三）在中国直接从事侵略活动的重要帝国主义分子。主要的“外国顾问”。

（十四）金融界、工商界著名的资本家及其主要代理人。

（十五）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卫生等各界的知名人士。

（十六）少数民族著名人物、华侨知名人士、宗教界知名人士等。

（十七）著名的帮会首领、土匪头目、黄色工会头目等。

三、著名人物中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党内有相当影响者，以党史记载为宜，此处不列入。

四、只为已经去世的人写传。现在还在世的，一律不写传，只积累材料。

五、目前先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分类列名，全部写成后，一律按笔画顺序排列。

（一九八〇年五月修改）